

文軍研究叢書



武漢

“七二〇”事件實錄

徐海亮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徐海亮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男，1944年8月重慶出生，江蘇無錫人。

1967年畢業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長期從事水利工程技術、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2002年9月離崗，受聘于國家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中心，任客座研究員；并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水資源研究中心等部門有關旱澇災害/防災課題研究。同期撰寫出版《黃河史自然篇》、《東湖風雲錄》、《從黃河到珠江》、《走近黃河文明》等著作，集體譯校出版美國友人韓丁著作《深翻》。曾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在世界近代史、文革史、水利史、自然災害史、水利與環境、文化史方面發表論文60餘篇。



武漢

“七二〇”事件實錄

徐海亮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研究叢書

武漢“720”事件實錄

徐海亮 著

責任編輯：柳 陽

封面設計：世 慧

ISBN 978-988-19703-1-2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0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0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德士古道 220-248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1609-1616 室

Tel : 00852-23818251

Fax: 00852-23971519

定價：HK\$ 140 元

武漢“文革”的口碑歷史

王海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階段，有三個城市直接影響和左右了全國運動。第一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第二是上海，“一月奪權”的策源地；第三就是武漢了，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的發生地。這三個城市事件構成了“文革”運動不斷激化的三個波次，終於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推到了頂峰。

1967年7月爆發的武漢“七·二〇事件”，與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策劃“一月奪權”的情況完全不同。它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謀定後動的“戰略部署”，而是在“文革”各種矛盾中激烈碰撞出來的意外事件。武漢是毛澤東常來常往的城市。1967年7月的毛澤東武漢之行，本是想親自解決武漢軍區的“支左”問題。軍隊於1967年1月奉命“支左”，首先支持了保守派，一些地方還動用了武器鎮壓造反派，出現了全國範圍的“二月鎮反”。這就與“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意圖發生了背離，必須要調整“支左”的方向。武漢軍區還沒有發生軍隊動槍的流血事件，如能夠

從支持保守派轉到支持造反派上來，這不僅僅是解決了中原地區的運動大方向問題，對全國部隊糾正“支左”錯誤也是樹立了一個樣板。

有毛澤東全黨全軍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親自坐鎮，動員武漢軍區轉彎子，本應是馬到成功的事情。但就在毛澤東停留武漢期間，卻出人意料地爆發了“七·二〇事件”。保守派及其軍隊支持者，激烈反對中央表態支持造反派。一批被激怒的軍人和群眾甚至衝進了毛澤東的駐輦之地，扣押和毆打了前來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大員王力等人。這是中共自1949年執政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毛澤東立刻意識到有發生“兵諫”的危險，破例乘坐飛機迅速撤離武漢。所謂乘興而來，鑊羽而去，莫過於此。

“七·二〇事件”的發生，對“文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無產階級司令部”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全國一度有所收斂的群眾造反運動風雲再起，各地掀起了衝擊軍隊的浪潮，接連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涉外事件。“文革”運動一度出現幾乎失控的局面。最後，毛澤東不得不把“七·二〇事件”的英雄，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當作替罪羊拿來祭旗，勉強控制了局面。

武漢“七·二〇事件”雖然事出偶然，但任何的歷史偶然都不會是空穴來風的偶然，都有其發生的必然性邏輯。從地區的“文革”運動情勢而言，武漢與北京、上海各有特點，在運動一開始就有些不同差異。這些地域性的政治差異，加之運動本身發展的不平衡，構成了“七·二〇事件”發生的複雜背景。這裏既有“文革”領導意圖前後矛盾的問題，有決策層與執行者的脫節，有傳統體制和新“文革”的抵牾，有階級鬥爭觀念和路線鬥爭觀念的矛盾，有群眾運動的自

發無序和軍隊維持秩序的衝突，有兩大派群眾組織相互攻訐的混戰，甚至也隱含黨內鬥爭的歷史陰影……等等。在“七·二〇事件”這面歷史多棱鏡中，折射出了所有的“文革”矛盾和衝突。

從地域“文革”的特點看，武漢是九衢交匯之地，武漢的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南地區的運動。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文革”中的盛極而衰，也構成了“七·二〇事件”發生的另一個重要背景。

陶鑄、王任重在“文革”前一直是毛澤東信任有加的地方領導人，對毛從來是亦步亦趨。如在“四清”運動中，毛澤東、劉少奇估計基層政權有三分之一不在我們手裏。王任重就有報告說：看來一半都打不住。毛澤東也是把王任重作為心腹愛將，曾有“總理之才”的期許。陶鑄對毛澤東一向以忠貞不二自詡，在對領袖個人崇拜不竭餘力的鼓吹方面，在地方大員中是屈指一數的。毛澤東發動“文革”，陶、王也都是緊跟的。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把陶、王調到中央工作，分別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副組長等重要職務，以加強“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力量。但是，在運動向批判“資反路線”的轉軌的過程中，他們又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甚至發生抵觸，不久就相繼落馬，被打倒在地。他們在“文革”初期的大起大落，對中南地區，特別是武漢的“文革”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陶、王雖然很快倒了，但他們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運動思路，一直延續下來了。地方黨、政、軍領導人和基層領導的思想觀點都是聲氣相投的，軍隊也是傳統體制的一部分。武漢軍區的“支左”思路就是扶植保守派、鎮壓造反派，終於在“七·二〇事件”中爆發出了巨大的歷史迴響。

“文革”畢竟是一場億萬群眾參加的運動。多數群眾參加運動不乏真誠，也有自己的利益表達的要求。如果把群眾看作只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群眾，也是過分簡單化了。不然很難解釋為什麼毛澤東三番五次要結束“文革”運動，卻始終結束不了的問題。武漢“七·二〇事件”就是毛澤東在駕馭群眾運動時遭到挫敗的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有到了“賊窩”的憤怒之語。

從群眾運動的角度看，武漢的群眾造反運動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有研究者說：北京的“文革”是學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革”，武漢的“文革”則是學生與工人聯合的“文革”。從群眾運動的主體來看，這個解讀不無道理。對於象武漢這類市民傳統濃厚的南方城市，沒有北京那種皇城根兒政治的紅牆情結，一般都是小政治，是從自己生活感受來判斷是非的，對體制的不公比較敏感。工作組時期，在武漢大中學校的一批激進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挨整的同時，武漢的一些工人也挨整了。所以，武漢工人造反組織出現的比上海等地還要早，而且與學生造反派關係一開始就比較密切，在尚無工人組織之前，一些激進、有文化的青年工人，甚至以個人名義參加紅衛兵活動。

武漢保守派勢力的強大，在全國是名列前茅。保守派組織代表了傳統體制的社會基礎，組織成分比較純正，成員出身好的多、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多，在“文革”初期持保衛省市黨委的立場。在1966年底67年初奪權以後，保守派組織瓦解，各派群眾組織都稱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各自觀點並不一致。此時稱為保守派的，多是指傳統體制影響較深的一派，確也有些組織就是從過去的保黨委的一派直接轉變過來的。軍隊的體制是集中制的黨軍體制，尤其

是地方部隊和人民武裝部系統，原本就是在地方黨委領導之下，與地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思想傾向是保守的，他們的“支左”，支的都是保守派。武漢的情況就非常典型。奉命支左的部隊，特別是省軍區的獨立師，對造反派有天然的反感，視之為“牛鬼蛇神”，支持保守派組織打壓他們。“百萬雄師”聯盟中核心組織之一，如“紅武兵”，是武裝部領導各單位基幹民兵組織組成的，專事進攻造反派組織，還有其他成分組成的名目繁多的專業武鬥隊。當時在群眾組織中設有專業武鬥隊的，這可能是全國最早一家。武漢軍區制止武鬥不力，並還有些暗中慫恿的意味，獨立師部分官兵甚至直接參與了“百萬雄師”群眾組織的活動，這在全國也是不多見的。

在派性武鬥方面，群眾組織在政治上的保守與激進，與他們在行動上的穩健和激烈並不一定劃等號。得到軍方支持的保守派組織，在組織武鬥上往往要比造反派更為兇猛。武漢保守派組織武鬥的情況是很厲害的，反使普通市民對造反派多有同情。《苦戀》的作者，著名作家白樺，當時是武漢軍區的創作員，曾在“七·二〇事件”前寫了《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的詩集，譴責“百萬雄師”搞武鬥，當街打殺人的行徑。事實上，無論那派群眾組織，要想通過武鬥壓垮對方，只能使雙方的仇怨越結越大。在處理武漢問題時，毛澤東曾對武漢軍區領導人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位階級鬥爭大師似乎講得太輕易了，與他一再強調的階級鬥爭理論也是二律背反的。恰恰正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這種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比真實的階級鬥爭

更沒有調和的餘地。經過“文革”運動的反復折騰，進入到派性武鬥階段，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已在現實的運動過程得到印證，虛擬出來的假想敵已經變成了現實政治的冤家對頭。兩派都把對方視為仇讎，能搞垮對方就是革命的，被對方搞垮就是反革命的，鬥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鎗銖必較，寸利必爭，這樣鬥爭的結果只能是兩派的勢不兩立。

在“七·二〇事件”前，“百萬雄師”是刀俎，“三鋼三新”為魚肉。“七·二〇事件”以後，“百萬雄師”成了“反革命組織”，獨立師成了“叛軍”。“三鋼三新”又成了刀俎，“百萬雄師”為魚肉。俗話說：“相打無好手，相罵無好口”。在運動中造成的族群分裂和心理創傷，即使在動亂局勢穩定之後，也是如影附形，無處不在。在改革開放 20 多年後的中國，已經遠離了這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我們有理由說，無論哪一派，“百萬雄師”也好，“三鋼三新”也罷，都是“文革”的犧牲品。但是，作為我們曾經歷過的這一段慘痛的歷史，絕不能把它從我們的歷史記憶中抹掉，需要把它如實地記錄下來，昭示後人。

在“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對“七·二〇事件”重新做了處理結論，給“百萬雄師”和獨立師平了反，成為三中全會前後撥亂反正的一個重大事件。關於“七·二〇事件”的歷史敘述也由此開始。1980、1990 年代，許多重要的歷史當事人發表了回憶文章和書籍。如時任武漢軍區司令的陳再道對事件的回憶，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對事件的回憶，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陪同毛澤東南巡的回憶等，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近年來，一些群眾組織的人士也相繼發表了自己對事件的回憶文章和書籍。這些從不同當事人從各自角度的回憶敘述，使越來越多的歷史細

節相繼浮出水面，對復原歷史很有幫助。

在復原歷史的工作中，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史的研究對重建歷史現場是非常重要的，彌補了文獻材料的闕失。但兩者的功能又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從自己在歷史事件的特定角色出發講述的個人經歷和見聞，提供的是素材。後者則是從整個事件的完整性出發，向當事人叩問真相，追尋歷史的無字之書，是一種去偽存真的研究性工作。1978年，在胡耀邦領導下，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史”的教學研究工作，為配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需要，金春明、于南等一批前輩學者，對“七·二〇事件”的孔慶德副司令員和“百萬雄師”頭頭等有關當事人進行了採訪，在中央黨校最先講述了“七·二〇事件”的課題。這應是對“七·二〇事件”最早的口述史研究了。

在“文革”的群眾運動大事件中，“七·二〇事件”的研究起步是比較早的，有關著述可能也是最多的。但最初的研究工作是具有鮮明的政治特點，服務於當時徹底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這就不可避免地要遮蔽許多東西，回避許多敏感問題。所以有些經歷者感慨地說：“真實的歷史藏在人們的心裏。”現在，這段歷史早已經從我們的現實政治生活中淡出了，許多當事人已經故去，當時的年青學子也都過了退休的年齡。但復原這段歷史的工作還沒有完成，許多歷史細節還是模糊不清的。而這個任務又很難完全依靠更年輕的下一代學人來做。固然，在後人的眼裏可以更加客觀冷靜地看待這段摧心剖肝的歷史，但是要求他們完全體會到那種驚心動魄的歷史情景也是比較困難的。這就不僅需要經歷者為後人提供更完全更具體的歷史信息，還要傳承給他們對歷史現場的感知和把握的能力。所以，江

青的首任秘書閻長貴先生把傳承“文革”的歷史記憶，視為“我們這一代人最後的歷史責任”。

徐海亮先生是記錄“文革”歷史的有心人。“文革”發生時，他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四年級學生，水利電力學院是武漢“文革”學生運動的一個重鎮，運動的信息比較集中，所以他能對“七·二〇事件”前後的整個過程有著比較完整的歷史印象。這些年來，海亮先生收集了大量武漢“文革”的史料，採訪了許多當事人，編著了《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一書（2005年），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採訪、探討，訂正、完善，寫出這本集中記錄事件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

這本書逐日記載了“七·二〇事件”前後半月發生的事情，材料非常豐富。包括了當時的官方文件，群眾組織散發的傳單小報，當事人的回憶，領導人的傳記年譜，以及作者大量的採訪筆記。這些材料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歷史的各個側面：有武漢軍區的，有中央文革的，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的，還有兩派群眾組織活動積極分子、當年專事重大採訪的記者、中間派群眾、後來研究者的。這樣就從不同當事人的不同事件角度，構成了互證的全息的歷史鏈條。在對“七·二〇”群體性事件的歷史敘述中，作者主要以群眾的歷史活動作為歷史敘述的中心，重點放在“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方面，把“文革”的上層活動和群眾的底層活動聯繫起來考察，顯現了歷史發生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在上下互動中考察歷史活動，立體地再現歷史現場，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作者無疑是向這個方向努力的。在這部書中，作者試圖讓“七·二〇事件”的各方當事人一

起“對簿公堂”，讓每一方的當事人都說出有自己的道理，這是對歷史抱有同情式理解的態度。事實上，只有讓各方都陳述自己的理由，我們才能看到歷史發生過程的複雜性，才能進而認識到對於這次悲劇的發生，冷靜地思考我們集體走進的失誤，剖析我們真正缺失的東西是什麼。

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是明天的歷史。當前中國正是在各種社會矛盾的多發期，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的情況嚴重，民粹主義情緒漸有高漲之勢。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不少青年人對“文革”群眾運動的盲目讚揚，所言多是對歷史的錯覺誤記，這即說明了我們歷史記憶的殘缺，更表明了一種非常危險的社會情緒。這是很有些問題的事情：一方面，這段歷史離開我們並沒有多遠；另一方面，這段歷史在我們的頭腦中確實是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讓我們的為史者感到慚愧。現實的問題，需要我們重溫歷史，警示未來。讀讀這部武漢“七·二〇事件”的歷史記載，看看我們當年的理性與瘋狂、真誠與虛妄，應是不無裨益的。可以說，昨天的歷史教訓，也就是在我們今天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必須作為鏡鑒的問題。

2010-9-13, 于大有北里望山居

《東湖風雲錄》書稿自序

1980年代以來，每與時值中年的相識或不相識者，談及人生與自己，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講到一個字眼——“當年”或“當時”。在今天50多歲到70來歲的中國人的口語裏，涉及人生的“當年”，幾乎是一個完全可以意會的，具有民族共同心理認同的詞彙，就是“文革”（當年）。甚至，“當年”具體就指1966年。我多年來發現，當時（1966年）的紅衛兵一代人，不論當年他們是否在同一地區或同一學校，是否相識，他們會在開啟心扉之時，自報當年是幾年級的！這一代人，已知天命或年逾花甲，但處在一起，他們還說“幾年級”的某某，誰誰應該是幾年級的。他們似乎已經被永遠定格在1966年的那一年級！

我的母校有位50歲的博士導師，早已是聲蜚海內外的某學科大師了，一次我們在專業學問之外偶爾談到學校，他突然也來了一句“唉，其實我當時還是個小學生”！我明白了，他依然指的1966年，但我們並未談論文革呀。我不止一次在與美國、瑞典、日本、意大利和法國的中國研究者談天時，他們居然也是那樣一句：“你當年是大學生？在

哪個大學?!”

邂逅于行旅、茶餘，軍人會自報“我是哪年的兵”，說**當年**自己是什麼軍區的什麼級別軍階的，在哪裏支左見過什麼。老工人有工人的語言，申明**當年**是幾級工，是什麼廠幹什麼工種的。機關幹部，可能會告訴你，**當年**自己還是二十、三十幾歲，是黨員或團員；也談到運動剛開始**當時**，自己正在某某地方帶工作隊搞四清……

總之，**當年**，成為一代人的文化“專利”和專用名詞。1966年，被之後的話語確認為**當年**、**當時**了。不論你處江湖之遠或居廟堂之高，是擁護或反對，還是一言難盡、不置可否，不論你是早已淡忘還是主張淡忘，毛澤東發動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都被定格在我們一代人的生命歷史裏了。這是一代人政治初戀的歷史。

當年，我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讀書，是當時四年級的學生。

馬克思恩格斯把英吉利比作經濟的民族，把法蘭西比作政治的民族，把德意志比作思想的民族。這僅僅算一種比喻。我較認同這比喻，而且想過，我們中華民族是否是一個歷史的民族？中華民族不僅歷史悠久綿延，且最善於在謀算現實時計較一下過去；“前世不忘，後世之師”，以古而鑒今。我們常常指責別人“數典忘祖”。既然一代人把1966年定格在心底裏（不管是“徹底”否定還是五味俱全），我總是不會“數典忘史”吧。

老實說，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本身，在我的心目中自然是一個中國的歷史文化過程或文化現象。這總不是為逝去的時代和陰靈“招魂”吧？一切發生與存在，總是有其必然性的，既是**必然**就有其規律性乃至合理性。讀遍第四

紀地質歷史，才能頓悟幾十年上百年自然振盪，讀過世界全史，方知幾十年尺度社會搏動的必然。縮至百年尺度，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中國歷史和國際共運歷史的必然。在幾代人為之奮鬥的主義與事業幾乎重新成為幽靈時，過來人和學人，總該做些“超度”的事，所謂“超度”就是科學地研究文革，探討社會與民族的發展。不論對要詛咒或是要發掘文革真諦，還是要加強我們黨的執政力量，都是必須的。

我在文化革命的熱潮或狂潮開始消退之後，在學習探討中國史、自然和科技史、西方歷史的時候，自忖退休以後，把自己見聞的文革片段，認真記錄下來，才對得起大家曾經付出了熱情和熱淚——乃至鮮血的歷史，才有助於後人瞭解這十分特殊的、改變了我們一生的真實的民族歷史。

編輯這本《東湖風雲錄》的嘗試，就基於此。

人們在談論文化革命時，興趣多集中在策源地的北京。其實，九衢交點的武漢，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文革的另一策源地。毛澤東在這裏度過了他策動、領導文革的許多歲月。武漢的文革，有許多具有自身特徵和意義的重大事件，在全國的文革過程裏發揮作用。比如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就是這樣一個影響著文革的重大轉折的歷史事件。人們在研討和書寫文革歷史時，興趣往往在於上層政治鬥爭，可能忽視了真正使文革成為廣泛群眾運動的物質力量——億萬群眾，忽視了參加運動的普通民眾的實際生活——他們的社會心理，他們的精神與作為，他們生動鮮活的話語。其實，在一個經歷過1920年代大革命工農運動，在工商業較為發達、市民社會較為成熟的這個大城市，文革的激進知識分子的表現、工人市民群眾的真誠參與，都與中央所

在北京，不盡相同，頗具地方色彩。在大家都可以年復一年地強調領袖左右了一切、譴責暴烈的群眾動亂弄糟了一切時，重申這點是必要的。

武漢東湖是長江畔著名的風景區。湖的南岸、東岸，是高校的文化區，文革裏最不安定的地方；湖西是行政區，湖北省直機關、武漢軍區所在地，文革運動不少衝突在群眾與領導之間展開，集會與活動，就在這兒發生。湖的北岸，是綠樹成蔭的東湖賓館，毛澤東從1965年到1974年，多次長時間住在這裏，是他運籌帷幄，決心與劉少奇——後來是林彪，分道揚鑣的地方。湖的周圍，有武鋼、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武昌造船廠等等積極參與武漢文革變動的國營大企業。武漢文革的一些重大事件，就發生在這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視歷史實際，本實錄直接命名為《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

1990年代關於意識形態的“主義”爭論，對於現實社會問題的辨析與化解途徑的歧義，都驅使中國人重新熱衷和關注文革的這段歷史。從文革的失敗開始的改革越往前走，越回避不了文革歷史所映射出的社會問題，以及他披露和遺留下的文化的沉重的包袱。這些都賦予文革研究以新的意義。

文革過去了幾十年，反思與批判文革進行了二十多年。但我們民族的文化悲喜劇，依然在重演。一些人認為不徹底拋棄文革政治文化，中國就前進不了；另些人認為恰恰是徹底拋棄了文革的理念，才使改革舉步維艱，屢屢入迷，社會對立激化，社會價值顛倒。看來，這個研究與反思還有從更深層次發掘和剖析的必要（不是簡單地用文革思維

定式去做價值判斷，也不是僅僅限於高層政治，而無視社會民間）。各種群體的群眾與領導（包括倡導文革與抵制文革）的實際意向和行為互動，對研究歷史的動因和過程有特別的意義；群眾性的推動與抵制，對歷史轉折與變化和真正知曉文革為什麼成為文革，也具有深刻的社會學的意義。這樣，當然應該留下群體的記憶。普通人在文革運動裏的遭遇，比體制內官員和知識分子的遭遇，往往更能深刻地反映一個社會歷史，更能打動平凡的多數民眾。

我從小最討厭的是影院裏小孩和大人喋喋不休的問答“好人還是壞人”，討厭臉譜分明的模式文化。我記錄和採訪的史實，很難作簡單的是非斷語。對於文革這一場我們都不由自主的運動，很難簡單地指出革命或反革命，正確或錯誤，去一一愛憎分明。我現在僅僅可以說的是，我心裏的群眾，絕大多數是真誠、熱情地投身這場後來被詬罵的政治運動，我心裏的領導幹部（上至八大、九大的黨中央、毛澤東，下至單位領導），都還是196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的人，他們探索新中國道路的艱難歷程，他們內心的酸甜苦辣也未必廣為人知，他們也都是平常之人，又是歷史中人。發生在中心城市政治大變動裏的中國的政治家、軍人、基層幹部和工人、學生群眾的所有遭遇及悲歡，都是值得客觀、科學地分析與思考的，我們民族及其精英付出昂貴代價的文革，是不能白白過去的。所以，我只有盡力平白無華，“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把白描和素材留給後人去研究評說吧。我希望這僅僅是一個歷史資料的整理。

1970年代，讀到英國進步歷史學家喬治·魯德（G·Rode）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我十分喜歡這本書，他從巴黎平民的生活、造反與犯罪記錄（來自街區派出所），

從民眾的語言，從他們的行為、逸聞，記載了大動盪的時代。法國年鉴學派的發展之一是心態史學的興起；心態史學的一個研究途徑，就是口述歷史的應用。1952年，著名的L·費弗爾指出：“歷史學是關於人的科學，我主張從口述史角度，從參與者的文化心理、從心態史學角度、從社會學角度，來整理歷史資料，來補充和研討歷史，要給後人一個完整的真實的歷史。”

口述歷史非新的史學分支。孔夫子的論著，就是先聖口述記錄。《紅旗飄飄》與《星火燎原》就是從平民到將軍的集體口述，他們啟迪了我們這一代人，投身爭取中國共產黨永葆革命黨的文革。我與他們的編者和《歐陽海之歌》的金敬邁說，不要簡單嘲笑當年自己的作品吧，也是他們把一代青年，送進文化革命的！

有悠久歷史研究傳統的中國，歷史變成為政治歷史、國家歷史，研究視角對準權力中央，對準精英群體。迄今為止，多數的歷史研究，是精英的文史研究，對文革的研討，也多是精英文革的表述。研究似乎只是機要檔案的解密，鉛印文字是根本的研究依據，芸芸眾生的民眾語言和行為，難登大雅之堂，更難成為根據。

本實錄要記載的，主要是這些在宮廷政治和歷史文獻裏難以呈現的民間真實言論與行為，以及政治與精英言行，在民眾心裏的某種記憶與真實折射。

“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

人文得以延存，記也。人若不能記，何以成人文？

不少的人不同意再來回憶和記載這段歷史，主張徹底忘懷與埋葬這“該死的”歷史。那十年的文革的確已經死了，可是又活著，活在億萬人民群眾的心裏和現實中國生活裏。

套用偉大作家雨果的文字“皇帝死了，皇帝萬歲”，我想說“文革死了，文革萬歲”！他死了，因為當年這一代人理想化的文革，早已經失敗，被否定。其各派的群眾活躍分子，或入囹圄，或下溷廁；世風巨變，他們早已經不入流。但是，文革又引發國人的普遍關注，形成永恆的話題，人們在進軍明天時，不得不回顧前天，驚悸昨日，文革的十年還在影響和昭示後文革時代，歷史不是還活著嗎？

《資本論》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引用了生動翔實的口述史料，對共運和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歷史學家L·麥考利的著作《英格蘭史（1848—1855）》是當時最暢銷的書。在《馬克思主義在美國：重新標示美國左翼歷史》中，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保羅·布爾（Paul Buhle）介紹與他合作的口述者說：“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們不會出現在歷史書中。在採訪中，他們以及其他幾百名不同輩分、出自不同激進派別的人和我進行了溝通。”他把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體自傳”寫成的、“包括了我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歷史”。

我從未企望自己對歷史研究有何大作為。但要整理這本歷史實錄，必須得到眾多的文革親歷者的理解與支持。他們提供給我許多細微的文字和個人回憶，與我討論、反復證實一些史實，讓我從涓涓溪流，試圖走近長江；有的人給我提供技術性的幫助。沒有他們，也許我自己也已將記憶抹去。與其說這是我來署名的文字記錄，不如說這是數萬人活動與數百人文字、回憶記載的結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想在此具名感謝他們對我的支持。但我深信他們知道我永遠記著他們，就像我永遠銘記當年這個歷史一樣。本記錄僅是武漢文革的一隅，集中於一，再反復

瀏覽，我才明白**當年我並不瞭解武漢文革，特別是並不真正瞭解文革參加者的個人心靈深處**。畢竟文革的初衷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脫離了心靈深境，就難以理解實體的歷史。我清楚至少還有十倍以上的親歷者需要訪問，還有更令人震撼的心靈活動和實際遭遇需要披露，特別是當年同樣是為了保衛紅色江山——確又悲劇性地成為文化革命反對派的所謂“保守派”的工人、學生和幹部，他們似乎並不如悲壯的革命造反派那樣直率地述說歷史，在目前我的文本中反映他們心聲很少——儘管文革已經被否定，他們以為他們早就否定過文革。我希望能夠儘早在這裏補充他們的話語，盡到自己的責任。

我們的群眾當然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對立的兩大派組織。

這 20 餘萬字遠不是武漢的全部，我期盼看到更多的當事人來冷靜地回憶歷史。

我能做的，僅是把真實的、屬於民眾的實踐與記憶，還歸民眾，還歸歷史。

我說了，我已拯救了自己。

埋葬文化愚昧，歷史屬於人民。

2005 年五一節 編著者自識

2008 年春節修改

目 錄

- 1/ 武漢“文革”的口碑歷史
10/ 《東湖風雲錄》書稿自序

- 1/ 寫在前面
6/ 7月13日
11/ 7月14日
16/ 7月15日
22/ 7月16日
28/ 7月17日
37/ 7月18日
54/ 7月19日
68/ 7月20日（一）
98/ 7月20日（二）
118/ 7月21日
132/ 7月22日
143/ 7月23日
151/ 7月24日
161/ 7月25日

- 171/ 7月26日
- 178/ 7月27日
- 188/ 7月28日
- 196/ 7月29日
- 198/ 7月30日
- 201/ 7月31日
- 204/ 武漢事件背景資料
- 256/ 周恩來處理武漢“7·20”事件
- 325/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
-
- 383/ 附錄1：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二八聲明）
- 389/ 附錄2：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嚴正聲明（二一八聲明）
- 391/ 附錄3：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通告（三二一通告）
- 397/ 附錄4：中共中央對河南軍區黨委《關於支左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的批示及兩個附件
- 403/ 附錄5：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
- 405/ 附錄6：在《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話
- 406/ 附錄7：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
- 409/ 附錄8：1967年陳再道同志的檢查
- 432/ 附錄9：1967年鍾漢華同志的檢查片段
- 435/ 人名索引
- 438/ 群眾組織索引

寫在前面

2005年，我編寫的《東湖風雲錄》，披露對於1967年震撼中外的武漢“7·20事件”親歷者採訪與調查記錄部分內容，我當時在編者按中說：“1967年武漢‘7·20事件’過去38年了，人們對事件的回顧、演繹樂此不疲；1980年代以來，一些出版物連篇累牘地發表、回憶其真相，這特殊階段歷史似已全部廓清，撥亂業已反正。其實，當時的全部真相至今尚未公開講明，更未由嚴肅的記載一一公開出版。特別是普通民衆眼裏、心裏的歷史真情，至今鮮爲披露。本資料力求回復歷史真實，以普通民衆口述歷史事實爲主，記載‘7·20’前後的半月大勢，聊補文革研究資料的不足。”之後，該採訪記錄盡可能地送到許多當事人或其遺孀和子女手中，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得到許多熱心讀者的補充、訂正。特別我採訪到一系列關鍵親歷者的口述、閱讀了一些相關人物與事件的回憶錄（諸如軍隊領導同志和原“百萬雄師”核心人物），對於發生1967年7月那些天的事情做了重要的補充，也補充了許多重要人物事後對那一事件的評述。現在，除了還健在的當事人汪東興不願接

受外界採訪，一些關鍵人物（如湖北省軍區獨立師主要領導）業已去世，大多數相關親歷者的回憶都已初步完善。誠然，汪至今尚未公開其回憶，也是一個遺憾，他在最高層參加了文化革命的全過程，他參與處理了一系列文革的最重要的事件與人物，他面對武漢事件“獨立師警衛不力……反革命分子已經衝進來了，快衝到主席住處”的危機，最先親自見到當年“百萬雄師”和“武漢公安”衝擊東湖賓館——那些他確實認為屬於反革命的行徑；許多尚不清楚和有爭議的問題，本應在他保守的奧秘中得到解密。我和我的同學，經歷了生平第一次驚天動地的政治大反覆後，在1967年底就曾經說過，如果毛主席去世以後文化革命整個被顛覆了，只要汪還活著，汪應該說清楚每一重大事件的真相。

從現在的許多全方位的研究來看，毛澤東在1967年自信親自發動的文化革命的完全必要與合法合理，相信自己的提出的政策方針的正確性，自己提出的理論感召力和精神權威作用，嚴重低估了體制性的反對力量對於文革的反彈，也低估了這些理論及其實踐的全部客觀後果。而當時與軍隊、幹部和群眾接觸的其他領導同志的體會，可能還要實際一些。所以在1967年的八月，毛澤東並不情願地接受和面對了文化革命的大轉折。

毛澤東和其他有關人——大到中央與武漢地區黨政軍領導，小到普通軍人、工人、學生群眾，當時和後來對於這個事件有不少非常有意思的話語，我們儘量實錄下來，留供後人研究。筆者希望給歷史留下一個全方位的、較為真實和公正的記錄。相信讀者，包括後來的讀者，可以憑藉自己的政治、文化素養，從原始的素材中，對歷史自行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

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向和他自己的理解，從1967年春親自處理一個又一個省（區）運動中發生的問題，接見群眾組織代表、黨政軍領導，貫徹文革司令部的指導精神，著手籌建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具體地和主導地解決武漢存在的問題。當年，對運動問題和人物是非，每個中央高層領導都在表態，但今天不能否認的是：僅僅是周恩來總理，有實際能力和權力去處理一切重大問題。他對於當時受到中央壓制的文革保守勢力的強力抵制與反彈，早在內蒙古地區和其他省問題處理進行過程中已經有所體驗。1967年7月4日他在第五次接見河南問題各方代表時，就專門談到：“現在就是解決那個省的問題，那個省的壞人，保字號頭頭，少數人帶領群眾起來都到這裏來，內蒙搞過。四川搞過，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線都斷了。東北那邊向你們學習，馬上成立三個小組，顯示你們的力量，說服嗎！不回去，……我要對你們負責，你們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訴軍委了，抓幾個頭頭。總有人在後面挑動，壓中央，內蒙開始地方上動員，八九千人到京說服回去了。又煽動軍隊來。最後幾個軍隊的壞頭頭，已暴露出來了” [1]（這次接見，從晚21：50至5日2：00，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出席中央領導有周總理、康生、戚本禹、葉群、曹軼歐、劉建勳。出席代表：河南二七公社、河造總、八大總部、省委領導幹部、河南軍區、開封駐軍負責同志）他對抵制中央推進文革的思潮和極端行為不是沒有實際體會與

[1] 5月下旬，內蒙軍區有幹部和戰士，抵制中央對問題處理的意見，組織人員到京請願、鬧事，在政協禮堂起哄，毆打軍區政委吳濤（在呼市還扣押、毆打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鼓噪要走。周恩來曾生氣地出現在主席臺上，厲聲說“把所有的門都打開，誰走就讓他走”！制止事端，並下令逮捕肇事者，與軍委領導商量處理內蒙軍區問題。

思想準備的。周恩來當晚進場即接著說：（鄭州）鐵路已經完全中斷了。十大總部要特別注意，說二七公社是革命組織，十大總部也沒有說解散，自己退的。**本來是群眾組織，這樣一搞會走到反面，對抗中央、壓中央是不行的。**（康生也說：這是很痛苦的教訓，如果幕後有指揮人，更要犯嚴重的錯誤。我們是再次愛護同志們，有的以為向中央施加壓力中央就會改變態度。軍區黨委也有問題。）周總理接著就說：“四川後邊有人”，他這是指四川兩派鬧，抵制中央決定，是後邊有人指使。

7月12日，就在毛澤東在中央宣佈去武漢的前一天，周恩來再接見河南軍區領導做思想工作時，還專門談到：“你們在討論過程中，你們和家裏打電話、通信，對錯誤是個逐步認識過程，這是許可的。你們來了一個多月了，有個認識過程，這是允許的。既然認識到錯誤，就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就要改。但是人的認識過程總是參差不齊的，這就要把工作做好。你們在這裏我們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電話上受到家裏的一些影響，在情緒上有所流露，就影響很大。內蒙就是這個問題，前面談的很好，背後又搞一套，來壓中央。地方的群眾勸說回去了，軍隊的又來了，結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類似情況。

“河南一定要注意反覆，你們認識多少就談多少，沒有想通的就講出來。我們告訴你們內蒙、四川的經驗教訓，就是免得反覆。你們認識多少，就向地方講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給我們，幫助你們解決。”

周恩來在武漢事件發生以前一再告誡大家的問題，反映出全國實際存在的對毛澤東主席倡導的文革路線與實際做法的困惑、抵制，如果全面地回顧當時許多省區與部隊

客觀存在和業已發生的問題，文革運動究竟如何走下去？思想認識和實際行為的嚴峻衝突、碰撞，就決不是偶然的了。不是四川、內蒙，就是江西或其他地方，問題遲早會在一處爆發。周擔心出現反覆的河南，具體的小反覆不少，思想問題也正在解決中，但是最大的反覆卻選擇了在河南軍區所屬的大軍區駐地武漢爆發。更重要的是，罕見的群體性反覆，在親赴武漢的全黨全軍的領袖毛澤東之前，在同去親自處理武漢問題的周恩來之前，當面爆發。

2010年春節

7月13日

是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和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宣佈南巡，坐鎮武漢解決當地文革運動問題。毛澤東、周恩來當夜先後離京出發。

參考一^[1]：下午，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蕭華、楊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開會，談了“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設想，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並對全國各地運動形勢進行了具體分析，然後提出要到湖南、長沙、武漢去看看，還說準備在武漢游泳。大多數與會者不贊成他去游泳。林彪說：“武漢的武鬥嚴重，安全沒有保障。”但毛執意要去。

參考二^[2]：中央文革碰頭會，毛澤東佈置南巡，去長沙、武漢。並說“‘百萬雄師’不能不要”。周恩來電謝富治（政

[1] 《楊成武將軍自述》，268—269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

《楊成武將軍訪談錄》，170—171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版。

[2] 王力，時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著《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68、39頁，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趕到武漢“負責主席安全”，謝請示要王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余立金（軍委空軍政委）和隨行的北航紅衛兵同行。

周當晚飛武漢打前站，安排毛澤東住處。王力並回憶當晚總理給重慶的謝富治打電話，說有緊急任務，要求次日趕到武漢。

王力後來回憶，毛澤東說：“南京街上鬧得很厲害，我越看越高興，鬧得三派那麼多人，反對內戰，反對武鬥！這很好嘛！”

參考三^[1]：下午，在會議上，毛澤東對在場的軍隊幹部講：不要怕鬧，鬧得越大、越長，越好。七鬧八鬧，總會鬧出名堂來的，可以鬧清楚。不管怎麼鬧，不要怕，越怕鬼越來。但也不要開槍，什麼時候開槍也是不好的。全國大鬧不可能。那裏有膿包，有細菌，總要爆發的。

戚本禹回憶^[2]：毛主席和周總理7月去武漢，行前，中央對武漢問題並沒有定性；13號主席主持會議，中央軍委和文革的主要成員都參加了；我記得會上就沒有具體談武漢的問題，沒給武漢運動做結論，主席只說去做調查。會上談了一些原則問題和人事安排。

警衛隊長陳長江回憶^[3]：那還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按：指13號會議）之前，我們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並就外出的警衛工作進行了一系列準備。

汪東興同志在向我們傳達佈置任務時就指出……這次

[1] 會議記錄、內部傳達，參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02年）。

[2] 戚本禹，時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2007年3月）。

[3]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P50-5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又是文革以來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夠的認識與準備，要有為了保證毛主席的安全不惜流血犧牲的充分準備，他還特別指出，要我多帶些部隊。

過去隨毛主席外出，他總是嫌去的人多，怕給地方上添麻煩，每次外出都有極嚴格的限制和要求，多去一人也是不允許的。而這一次還特別提出讓多去些人，足見這次任務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艱難和危險。看得出，毛主席是有這種估計的，而且也是做了準備的。

當事人張根成回憶^[1]：（在1967年6月，河南等省問題正在北京會談；下旬，中央準備派人去雲南、四川就地解決西南問題時）周總理對王力說，毛主席的意思，解決地方問題，可以到北京來談，也可以就地談就地解決；王力傳達毛主席建議，可以老、中、青三結合，帶上紅衛兵參加中央代表團的工作，也鍛煉鍛煉。於是，周恩來讓從幾個大學裏挑紅衛兵，政治上要絕對可靠，文革中表現好，有一定能力，身體要好，要嚴格保密。張根成建議，若從幾個學校裏挑，因有“天派”、“地派”，觀點不一致，若在中央代表團裏吵起來怎麼辦？不如就從一個學校裏挑。周總理說，那就從北航選，讓韓愛晶派人吧！我找到北航韓愛晶，研究決定派井崗山（北航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北航紅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胡慧娟（女）三人，加上北航被選派在《人民日報》工作的吳介之（研究生）和《文匯報》一個記者，參加中央代表團工作。

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在含等一行先去雲南，臨行，總理還專門安排就住在昆明軍用機場。6月底出行時，就

[1] 張根成，時為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人員（2004年6月）。

沒有去武漢的任務，中央文革沒有去解決武漢問題的準備，謝富治、王力並沒有攜帶與武漢問題有關的文件材料。一行人大約是7月5日左右到成都的，13日剛剛到重慶。當晚，總理打電話給謝富治，要謝務必14日趕到武漢，執行任務，也未說明是什麼任務。謝問中央代表團的人怎麼辦？總理說一塊來。王力與眾人議論剛到重慶，任務還沒有完成，怎麼又要趕到武漢？謝、王讓張根成給中央文革辦事組打個電話問問情況；關鋒接電，說：“去了就知道了，電話裏不能說，聽總理安排，沒有討價還價餘地。”

參考四^[1]：是日，在湖北省軍區獨立師（8201）黨委擴大會議上，師政治部副主任周忠說：“武漢部隊自介入文化大革命以來是支持左派的。批判了‘二·八聲明’，解散了‘工人總部’，抓了一些壞人，扭轉了大方向……我們8201部隊站出來支持‘紅衛兵’起來鬧革命。有人懷疑陳再道是三反分子，我說陳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一定要保。要就保對了，要就保錯了，錯了還有軍委頂著。”

參考五^[2]：為了確保毛澤東此行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並由毛親自點將的楊（成武）全權負責。……又打長途電話給謝（富治），要他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

王廣宇訪談^[3]：我記憶裏，在毛澤東去武漢之前，文革小組從來沒有專門研究過武漢運動的問題；只是要求軍區有效制止武鬥，楊成武和戚本禹商量草擬過“6·26”電文，

[1] 見（湖北）省直紅司省勞改局分部撰《七二〇反革命暴亂策劃記》（1967年8月）。

[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227頁，明鏡出版社，2003年。

[3] 王廣宇，時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2005年10月採訪；後採訪當時工作人員何天琦證實）。

由何天琦專門記錄打印了，陳伯達親自給陳再道打的電話。

綜述：

之前，中共中央對於武漢文革運動的問題並沒有討論和定性；在13日最高決策碰頭會上，沒有具體談武漢的問題，更沒對武漢問題做結論，毛澤東只說去武漢做調查研究。會上談了一些原則問題和人事安排。實際上，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此前也從來沒有對武漢問題進行過正式研究，只是在6月，武漢發生激烈的武鬥時，商議發一個文，制止極不正常的武鬥，由楊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擬了6月26日給武漢軍區的電話指示，周恩來、陳伯達知悉。

在13日前，毛、周已經商議南巡和解決武漢問題；據《周恩來年譜》，7月7日周恩來和毛澤東、林彪一起接見出席解放軍會議的代表，在6日和9日，周恩來連續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陳再道的回憶說，周在10日立即通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可以不到北京彙報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漢，在武漢解決問題。

7月14日

凌晨2時半，周恩來、李作鵬離京，飛抵漢口王家墩機場。武漢空軍劉豐副司令員、蕭前政委前往機場迎接總理一行。周抵武漢空軍司令部，叫劉豐通知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去空司，並指定劉豐負責保衛中央首長安全。陳再道事先不知道總理到來消息，由空軍搶了先，十分納悶，老大不高興。周恩來到東湖賓館親自佈置接待和保安工作。

晚間，毛澤東一行到達武漢，下榻東湖賓館。

王力回憶^[1]：總理連夜打電話，並先趕到武漢佈置，把賓館的人都換了。原來賓館的工作人員主要是“百萬雄師”的，現在換成另一派。同時不是讓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負責主席安全，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

陳再道回憶^[2]：總理親自為毛主席打前站，據說是想看看武漢的形勢，究竟是不是像中央文革說的那樣漆黑一團。

[1] 《王力反思錄》1005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

[2] 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載《中國老年》第1—5期；陳的口頭檢查（67年12月1日）。

另外，想通過武漢軍區，做好兩派群眾組織的工作，促進他們聯合起來，穩定武漢的局勢，為毛主席橫渡長江創造條件。總理還設想，利用毛主席在武漢的機會，把武漢問題解決好，這對於解決其他省的問題，對於穩定全國的形勢，會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總理一來，就說毛主席說，你們屁股不要坐在“百萬雄師”一邊。

回憶一^[1]：重慶街頭也不安定，坐車去飛機場難以保證時間；為趕時間，54軍調來直升機，謝富治、王力、余立金自54軍軍部搭乘直升機，直赴重慶白市驛機場，先搭乘伊爾—16回成都雙流機場，轉伊爾—18飛機（原自京赴川、滇乘坐），於中午抵漢口王家墩機場，李作鵬接機。一行人到達東湖客舍，周總理接見，並說正好是例行停電檢修，空調停了，眾人都拿著大蒲扇扇風；周總理要求賓館趕快檢修，恢復送電。

（按：據當年賓館管理工程技術的張林發同志介紹，賓館有多路網電供電與自備電源）

總理把8201部隊（獨立師）在賓館內梅嶺一、二號的警衛換成中央警衛團的了；大家一開始就發現獨立師蔡炳臣政委不滿意，幾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說把東湖客舍警衛換了，好像不相信他們。（按：客舍內原8201部隊仍在原駐，負責各大門和其他大院警衛）

晚上，總理正與三軍領導開會，汪東興、鄭維山走進東湖百花一號，一路走一路開玩笑說今天就只抓住一個扒車的是鄭維山……張報告汪東興到了，總理出來問汪：“到

[1] 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回憶。

了？”（按：指毛澤東到達了）汪東興答“到了”。周隨即宣佈散會，夾起皮包就去毛主席駐地。

（按：周恩來、軍委和中央文革來人住東湖賓館的百花客舍一、二號，武漢軍區領導住南山乙所，毛澤東住梅嶺一號，8341部隊住梅嶺二號，梅嶺與南山甲、乙所接近。）

回憶二^[1]：中午，謝富治帶領中央代表團到達東湖賓館後，周總理立即召見了他們，同大家一一握手，並特別詢問了北航“紅旗”四個人的名字、年齡、哪裏人等情況，然後說：“主席今晚到武漢，他老人家一定要來游長江，叫你們來主要是協助保衛主席安全。武漢駐軍過去是你謝富治指揮的部隊嘛！”謝富治說：“是嗎？我怎麼不知道？”總理哈哈大笑，後來一查，果然如此。當時，總理根本未說要就地解決武漢文革問題。……謝富治、王力他們一到，東湖賓館便停了電，據說是檢修電路。……謝富治一邊用大扇子扇風，一邊笑罵道：“熱死老子了，陳再道這傢伙真不夠朋友，一來就給我們一個下馬威。”

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等人到達東湖賓館時，見到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他們。楊成武、汪東興同謝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時，指著鄭維山開玩笑說：“我們抓來了一個扒火車的。”鄭維山笑著同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並互相開了一陣玩笑。

回憶記載^[2]：下午，為安排毛主席的行止，周恩來驅車來到東湖賓館，召集東湖警衛隊隊長、招待處處長和兩派群眾負責人開會，為確保主席的安全，處理好武漢問題，

[1] 見原北航學生戴維堤記述《逝者如斯》稿（2001年）。

[2] 張健（曾在武漢軍區服役），《七月流火》，P75，1998年，鄂省圖內字第57號。

向他們提出三點要求：

- 一、東湖賓館兩派群眾組織要求同存異，要聯合。
- 二、一律不得與外界來往，遵守紀律，保守秘密。
- 三、東湖招待處從現在起不准增加一個人，如果增加人，需經總理批准。

調查記載^[1]：當晚 22 點多鐘，王力、謝富治和北航紅衛兵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和造反派學生接觸。湖大學生樊斌在大門見謝、王一行。王拍著樊的鋼盔問“為什麼戴這個守門哪”，答“我們完全是為了自衛”，王力問“你們要這個（指長矛）幹什麼呢”？樊答“自衛，我們這樣搞是逼出來的。‘百匪’打我們，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再奪取大權”。謝、王問“為什麼叫它‘百匪’”？湖大“紅八月公社”學生說“‘百匪’是群眾給它取的名字，他們殺人、放火、放毒，無惡不作，群眾恨死它啦”！圍觀群眾說“他們比土匪還壞……真是百匪過江，百姓遭殃”。謝說“不要叫‘百匪’嘛”！

見了北京來人，在場群眾眼淚嘩嘩直下，終於認出來人是謝、王。消息迅速傳開，對門的湖北中醫學院紅三司也刷出標語表示歡迎。各學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來》。

回憶三^[2]：當時該校群眾組織（三司）就用高音喇叭廣播了，各派都貼出歡迎標語。我立即報告了總理。總理說“這也有好處，群眾正在亂猜為什麼東湖賓館的燈亮了，現在

[1] 參考《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門批改辦公室主編紀實性調查報告，1967年8月。

[2]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P39，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7月14日

就說謝、王、余來了，倒可以掩護主席”。總理並當即親自佈置正式通知軍區支左辦公室，請他們發通知。

7月15日

上午，毛澤東在東湖賓館聽取關於華北、中南、西南問題的彙報，並說他要坐鎮武漢，以解決武漢問題。下午，周恩來在百花一號召集武漢軍區領導和師以上幹部、支左單位負責人（近30人）會議，聽取彙報。有軍隊幹部在彙報中歸納了群眾組織“工人總部”的十大罪狀、“百萬雄師”的十大好處；謝富治、王力插話希望以兩條路線鬥爭為綱，要抓住事物的本質，提高路線覺悟。晚上，謝、王到華中工學院看“新華工”大字報，座談；要求群眾組織都離開據點回本單位，不許武鬥，並收繳武器。謝並表揚“新華工”在整整一年的過程中作了許多努力，作了很大的貢獻。

是日，“百萬雄師”組織了八百人橫渡長江。郊區農民造反派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舉行控訴殘酷鎮壓群眾運動大會。造反派數萬人在青山遊行，抗議“百萬雄師”迫害一冶公司革代會負責人。

“百萬雄師”與遊行的“新華工”造反派群眾在漢口武勝路一帶發生武裝衝突。

回憶^[1]：當日，“新華工”造反派以“粉碎劉少奇新反撲”名義組織遊行，並打出熱烈歡迎毛主席派來的親人謝、王、余的標語。“百萬雄師”礄口區三分站陳 XX 等候總站命令，12 時，礄口區站頭頭郭 XX 親到分站部署。在武勝路電車公司埋伏的“百萬雄師”衝擊遊行隊伍，發生武裝衝突；區站張 X 電話指揮專業武鬥隊“雷達兵”、“閃電兵”、“霸王鞭”、“翻江龍”、“鐵臂搖”等幾十車“百萬雄師”發起進攻，傷工人學生多人，“新華工”工人李長亮等傷重致死。學生扔出自製手榴彈，幸未傷人；新華工急於解圍，從學校調一大轎車持槍人員，但未過江投入衝突。

水院二系 6221 學生回憶：8 月初，被派赴礄口 3506 廠幫助維護生產秩序，晚間參加調查武鬥案件，青年工人 XXX 向調查人員交代了“7.15”武鬥刺殺李長亮事實與過程。

參考一^[2]：是日武鬥造反派死 10 人，37 人重傷，80 人輕傷。

參考二^[3]：總理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聽取彙報，參加的不到 30 人。從 15 日一直開到 18 日。總理的總結不是個人的，而是傳達中央的方針，以及根據在武漢瞭解的情況，提出了具體的指示。他的總結提綱是用毛筆手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總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講：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的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

[1] 某“新華工”組織當事人。

[2]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P132，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

[3] 王力回憶，《王力反思錄》，1006 頁。

檢查一^[1]：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由於我們反動的立場，就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的反革命決心不變，仍按原方案彙報。為了穩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

檢查二^[2]：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東湖，保衛科長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夠，需要增加人。他和孔慶德都建議調29師的人進去。我說29師和獨立師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揭發^[3]：是日軍區保衛科科長王振英提出多項建議加強保衛，如調8199部隊人來；鍾漢華政委一律不採納，並說“8199部隊與8201部隊之間有矛盾，還是不調8199好”。

在華中工學院（今華中科技大學）電影場，**謝富治**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們：

“首先讓我代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黨中央周恩來同志，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張春橋同志、王力同志、關鋒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代表他們，首先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在座的全體革命派同志們，以及武漢所有的革命派同志們，最熱烈地問好！……

“同志們、戰友們，我們臨行的時候，我們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身體健康，非常健康！毛主席非常關

[1] 鍾漢華政委在事件後檢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文獻,1967年12月。

[2] 鍾漢華檢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文獻,1967年12月。

[3] 軍區保衛科幹部(1967年7月)。

心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非常關心所有的革命小將。

“我們臨行的時候，也見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身體非常健康！”

“同志們，毛主席讓我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志，我們還有一個余立金同志是我們全軍文革的成員，空軍的政治委員，在一起還有我們北京紅代會、北航紅旗井崗山四位同志，也是毛主席叫他們和我們一起來的，還有記者也是原來北航紅旗的，吳介之同志，還有其他工作人員也是跟我們一起來的，這是我們文革小組的工作人員。”

“這次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叫我們來向同志們學習的，我們來學習的幾個同志是‘三結合’來的。首先從這幾個人就可以看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最關心革命小將的，是最信任革命小將的！我們和王力同志今天到新華工來，是看大字報，是來學習的，但大字報沒看成，因為你們沒有給我們看大字報的機會。但是要我們講什麼東西，我們要先當小學生，我們小學生還沒有當，所以我沒有發言權，我只是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你們關懷帶給你們了。”

“同志們，剛才我們在樓上，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志向你們領導人提了兩個建議。第一個建議就是要文鬥，不要武鬥。……”

“剛才王力同志提了第二個建議，我們坐下來學習，學習毛主席和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最近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階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別是學習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篇偉大的光輝著作……要運用這部光輝著作中提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評。我們今天

把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問候和關心帶給你們，同時帶來了兩點要求。我的話完了。”

接著，**王力**也講了話，他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是很好的！我們總起來說，我們所損失的是很小很小很小，我們收穫的成績是很大很大很大。這是林彪同志的一句著名的話，同志們記得嗎？”底下群眾應：“記得。”

王力又接下去道：“我們時時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麼，不能夠抓不住主流，不能讓支流牽著我們鼻子走。這就希望武漢地區現在的三派，同志們統統能夠接受我們的建議。第一條立即停止武鬥。根據中央的六條能夠達成一個協議，武漢地區人民解放軍應該保證執行這個六條。所有的群眾組織都應該達成這個六條的協議，停止武鬥，停止煽動人心的宣傳，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證四大民主能夠正常地進行！使得我們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前進！”

（按：根據當時錄音整理，未經本人修改）

楊道遠回憶^[1]：王步青是武漢軍區副參謀長，軍區支左辦公室負責人，解放戰爭時期，曾經在陳謝大軍中工作。“七·二〇”事件中，他站到中央一邊，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被結合進省革委會當了省革委會辦事組組長。王步青也曾經同我談過“七·二〇”時的一些情況。王步青說：總理來武漢後，首先要武漢部隊彙報武漢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我（王步青）彙報時，因意見與軍區不一致，牛懷龍（8201部隊

[1] 楊道遠，當時武漢“鋼二司”負責人，武漢測繪學院學生，黨員，後為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摘選自其回憶錄《奉獻》2008年稿。在此基礎上，2010年出版了回憶錄《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以下不再說明。

師長)朝我直瞪眼,阻止我發言,我說你(牛懷龍)瞪什麼眼,我講了你也可以講嘛!王步青還說,周總理批評軍區犯了錯誤,陳再道心裏不服,在下面埋怨信俊傑(武漢軍區某部部長,支左指揮部負責人)沒有彙報好,沒有把軍區整的材料交給周恩來總理,總理不瞭解情況。信俊傑說總理不收軍區的材料。陳再道說,你塞也要塞給他(周總理)。王步青還說,周總理當面批評陳再道支持“百萬雄師”,陳再道辯解說,我們沒有支持“百萬雄師”,我沒有接見過他們,是“百萬雄師”跟在我們後頭喊,支持我們。總理說,“百萬雄師”支持你們,那也是一個樣。

7月16日

上午，周恩來等人在東湖賓館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下令“工總”要平反，先把幾個頭頭釋放。對“百萬雄師”繼續保持名稱，三派達成協議。下午周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做軍區主要領導的思想工作，傳達毛的意見。周恩來起草在軍區二級部以上幹部會議上關於武漢形勢問題的原則講話提綱。

白天，武漢三鎮大街上氣氛突變，開始出現“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

當事人回憶^[1]：是日，造反派舉行紀念毛主席橫渡長江一週年活動。由於擔心發生武鬥，早上，約2萬武漢和外地造反派組織試探性渡江；當日市區未發生武鬥衝突，“百萬雄師”未組織渡江，也並未在造反派登岸的濱江公園（如造反派估計的）佈防阻擊。下午四、五點造反派大隊伍

[1] 當事人和目擊者多人（2004年6月）。

組織徒手渡江；鋼二司學生和部分工人從漢口濱江公園上岸，整隊遊行到六渡橋，集結，陸續乘車回武昌，沿途受到漢口市民簞食壺漿、夾道激情歡迎（按：6月下旬造反派學生被趕出漢口宣傳陣地，大隊伍未能回到漢口街頭）；市民見學生赤腳在熱融的瀝青馬路遊行，眼淚直下，紛紛脫下自己的鞋叫學生穿，或用水盆向馬路澆水降溫。中山大道水塔一帶“百萬雄師”據點的喇叭也高呼“向二司的革命小將學習、致敬”，“向紅水院的革命小將致敬”，以及“不許工總翻案”、“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口號。市民群眾向水塔廣播站喧嘩起哄、嘲笑。

這天，“百萬雄師”表現了異樣的政策水平。“7·20事件”以後，在調查武鬥問題時，有“百萬雄師”的區級聯絡站負責人說支左辦公室和總站對“7.15”武鬥提出批評，“百萬雄師”決定暫時停止武裝衝突，以創造氣氛對中央來人彙報情況，解決問題。也決定不趕在“7.16”這天組織渡江活動。而且在6月下旬武鬥階段，內部有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大學生將來是接班人，對學生還是不要往死裏打。黑“工總”是反革命，可以往死裏打。況且真正在武鬥裏亡命殺人的畢竟是少數。一個被裹挾參加6月武裝掃蕩漢口工藝大樓的老工人，還到醫院看望被他刺穿腿肚的紅水院學生嚴菊明（今福建某工程管理局任總經濟師），傷心和誠心地說當時是真不想戳人的，長矛朝地下，閉上眼戳……沒想到會這樣，直說對不起。

調查綜述^[1]：深夜，謝、王前往礪口區3506（軍需）工廠“百萬雄師”聯絡總站，進入“百萬雄師報”編輯部，介紹自己；

[1]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報，“百萬雄師”當事人回憶。

“百萬雄師”在場人員沒有反應，態度十分冷淡。謝勸誡頭頭們要好好學習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識，弄清文革是怎麼一回事；要求收繳武鬥器械，立即停止武鬥；停止煽動性宣傳，撤銷所有的工事，保證不同觀點的人有“四大”的權利。後女頭頭陳XX介紹了俞文斌、楊道安、劉敬勝等頭頭。謝富治要“百萬雄師”負責人開個頭頭們的名單，名單開好後，謝把名單裝進了口袋後一句話也不說了。王力批評說：“你們在據點裏，集中起來搞武鬥是錯誤的！”“百萬雄師”負責人向他解釋道：“我們有廠不能回，有家不能歸，是被逼得這樣的，一回去就挨打。現在中央代表團叫回去，‘百萬雄師’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團和武漢軍區召集兩派組織談談，訂幾條規矩，由中央派人監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擺擺手不耐煩地說：“你提這個問題就是錯誤的！你們管你們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們怎麼管得了人家呢？”那個血氣方剛的“百萬雄師”頭頭也不客氣地頂嘴道：“叫我們單方面回去，等於叫我們投降。舉手投降的事我們不幹！各群眾組織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團也平等對待！”王力態度強硬地說：“現在，首先要制止武鬥，我們要求你們必須做到幾點：1. 立即停止武鬥；2. 停止煽動性的宣傳；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產工具；5. 不准挑動農民進城；6. 不准攔車，所有崗哨必須撤除；7. 保證不同觀點有四大權利。”說完不歡而散，在場的“百萬雄師”頭頭和骨幹，對謝、王的態度與話語十分不滿。（“百萬雄師”內部傳達，這次謝、王的探訪，總共只有二十多分鐘）

回到賓館，謝還為武鬥隊集結在軍工廠的事，批評了陳、鍾，要求通知他們搬出工廠去。

“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回憶^[1]：在7月16日渡江的那一次，我們同造反派商量的，結果是二司負責渡江時漢口的安全，“百萬雄師”負責武昌方面的安全。

我們本來是想向中央反映情況的；謝、王到3506廠“百萬雄師”總站，謝富治不吭氣，王力言語橫蠻得很，我們講不上話，那一次沒有得到溝通。

謝富治是副總理，我們都希望他說話，他不說話，只是說“老俞呵，寫個頭頭的名單”，我寫後他就不說話了。接著王力說我們怎樣怎樣。這個人很糟糕，帶了派性觀點來的。如果王力不是這個態度，那天的事不會那樣。

回憶三^[2]：大概是在7月16號的濱江飯店會議上面，陳再道就不滿意了，周恩來在軍區大禮堂親自講過話。7月18號晚上召陳再道、鍾漢華去東湖賓館，毛主席親自跟他談話。陳再道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還拍過桌子。

檢查^[3]：在15、16兩日的彙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

[1] “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回憶（2005年11月、2006年5月、6月）。

[2] 陳再道生活副官陳秀森（2003年），轉業後在老家河南工作。在湖北省學習班批判鬥爭陳再道時，在11月23日上午的會上，軍區機關領導和群眾還指責16、18日陳頂撞總理、拍桌子。15軍軍長方銘後來也與造反派回憶起當時拍桌子和言語的衝突：陳說按中央的辦怕“百萬雄師”群眾不依，周說你不要用“百萬雄師”來壓我，不要說百萬，你就是“千萬雄師我也不怕”。

[3] 鍾漢華檢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1967年12月。

下面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鬥以後，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陳再道回憶^[1]：彙報會的第二天，我和鍾漢華同志商量，認為他們一定是帶著框框下來的，解決武漢問題的盤子早已經定好了，彙不彙報都是一個樣。決定起草檢討，反正早晚要用。

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回憶徹底平反“7·20”事件》：……為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俞文斌、李樹青、楊道安、紀登清、謝敏華、劉敬勝、孫德洲、章迪傑、汪士奇、湯忠雲 10 位同志平反昭雪。（按：以上為當年“百萬雄師”的主要負責人。俞文斌，後來任市外經委駐香港辦事處主任，楊任市電信局局長）

劉祖清回憶^[2]：在武漢市抗暴期間，“百萬雄師”圍攻過許多單位，殺死殺傷群眾無數，但是這些殺人血債從來就沒有被清算過。“7·20”之後“百萬雄師”江漢區作戰部長陳昌文起義過來，揭發了內部一些關鍵人物的罪行，“百萬雄師”的作戰部長名字叫湯忠雲，是武漢多起血案的策劃者和製造者，1967 年六渡橋“6.17 血案”，6.23 圍攻武漢水運學院，“6.24”血洗工造總司，都是他親自策劃和指揮的。他還把人民倉庫的戴鵬從家裏捉到“百萬雄師”的據點——武漢市委大院，親手殺害，殺後把屍體埋在市委大院裏。“7·20”之後陳昌文帶著公安機關和武漢警備區的人去市委大院的樹林裏，把屍首挖出來火化了。之後，湯忠雲還在準備

[1] 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刊於《中國老年》。

[2] 鐵路公安處幹警，當時為公安聯司和工人總部的造反派基層頭頭（2003 年）。

搞地下鬥爭，要搶奪糧食打持久戰，當時武漢市公安局請示武漢警備區同意，就由陳昌文帶路去捉拿湯忠雲。公安局9處彭海如處長下令把湯忠雲緝拿歸案，鐵路刑警隊長劉祖清，9處的警察王正友帶人去抓捕湯忠雲，湯忠雲逃跑過程曾經鳴槍示警，在快追上的時候，湯回身奪王正友的槍，這樣的情況下王正友和劉祖清都開了槍，湯忠雲中彈受重傷，送到武漢市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在清隊的時候，當權派在報紙上把湯忠雲樹為英雄，追認為烈士，還把他的兒子安排到鐵路上工作。最後當權派還把這三位執法警官送上法庭，說彭海如負有領導責任，被判3年有期徒刑，開槍自衛的警官劉祖清判了8年，王正友判處6年有期徒刑。在彭處長去世的時候，我們去送了花圈，挽詞中說他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事業，也因此留下了終生遺憾。

7月17日

毛澤東繼續聽取彙報，研究解決武漢問題。

下午，周恩來繼續主持彙報會，聽取部隊領導彙報武漢運動情況。

凌晨一時，謝、王前往位於武漢測繪學院的鋼二司司令部，與學生座談，要求收繳武鬥器械，製造和平氣氛，為解決問題創造條件；要坐下來學習，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參考一^[1]：上午，毛澤東聽取彙報，研究武漢問題。談到造反派要打倒陳再道時，毛說：“凡是有錯誤，不管是大錯誤還是小錯誤，只要承認了錯誤，統統不打倒。承認錯誤了，再打倒，那就是他們的錯誤了。陳再道只要承認錯誤，打倒也不行。我們是來給他保駕的。陳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萬雄師繼續保持名稱，要搞入正軌。三派要達成協議，發表個聲明，要做他們的工作。”“工人總部要

[1] 《毛澤東傳》，149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平反，抓的工總的幾個頭頭沒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處理。”“軍隊犯錯誤，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陳再道怎麼行呢？錯誤改了，他們還要打倒，那就是他們的不對。”

參考二^[1]：毛澤東說：“湖北的問題，我看不難。湖北有可能要先進些。‘三新’、‘二司’，你壓嗎？越壓越成鋼了。對工總那麼整，不商量，就是有問題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識搞的。”對於武漢軍區，毛說“起草一個稿子，發表一個聲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錯。有功是支農支工。軍訓怎麼樣……”。對百萬雄師“繼續保持名稱，做工作，進行教育，可以轉過來，搞入正規。它不像軍隊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達成協議，搞一個協議書”。

會上，毛要周恩來 18 日回京解決湖南問題。

參閱報道^[2]：在武測一號樓 201 室鋼二司參謀部辦公室，謝問你們有幾個勤務員同志，答有 5 個，王力叫把名字寫出來；問楊道遠是哪兒人，哪個學校；謝說“啊，又是河南人，我昨天遇見的（新華工郭保安）也是河南人”，答“（二司）前面三個勤務員都是河南人”。謝說“河南人都來我們湖北當官，我們湖北成了空架子了”！（大笑）又要求把工總、九一三的人找來，並問及“這棟樓都住的鋼二司嗎”，答“有三司的同志”，王力說“喔！你們兩個搞在一起，好！和平共處”。三司的許謙說，“首長來了很高興，我們都在準備歡迎，同志們都希望見到首長。我們明天召開一個批判劉少奇大會，請首長到會作指示……”，謝、王說“開大會我

[1] 《楊成武將軍訪談錄》，173-174 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 年。

[2] 《武漢鋼二司》報當年報道與記載。

們不能去，我們剛到武漢，還不瞭解情況，現在是在學習的，大會最好不要開”，“……不要開什麼大會，不要搞什麼遊行。我們到這裏來，就是要找大家解決問題。我們首先要求大家回原單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單位，原機關，都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要保證四大，哪怕只有一個人也行，要允許他們為一派”。

謝富治講：我們昨天到了“新華工”，今天來看望你們。

再說一遍，我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軍委文革來向武漢地區、湖北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問好，希望你們轉告全體戰士。毛主席很關心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武漢的問題怎樣分析，怎樣解決，怎樣向前推進，這個任務交給你們，依靠你們和人民解放軍戰士。你們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我們是來幫忙的，我們起的作用很小，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使毛澤東思想佔領整個世界、整個中國。你們要看到全國的形勢，全世界的形勢。武鬥只是一個支流，不要因為支流干擾了運動大方向。希望你們在武鬥方面採取措施，對解決武漢問題製造和平氣氛。你們都是紅衛兵小將，你們二司是有名的，我們是知道的。你們三司我們也知道。你們應該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堅持文鬥，不用武鬥。立即停止武鬥。我們希望你們根據中央六條達成協議，或單獨發表聲明。你們二司是武漢很有影響的革命派組織，要有風格，站得高，看得遠。你們三司不同意武鬥那也好。

我建議你們，第一，首先停止武鬥，能夠達成協議更好，不能，就單方面發表聲明。造成和平氣氛再來談。有原則路線問題要分析、解決。第二，就是坐下來學習，學習中

央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輝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許多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這次重新發表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你們要好好學習，學好了文件就有解決問題的銳利武器。你們在武鬥的問題上與“百萬雄師”達成協議，對工總的問題可以談談嘛，是可以解決的。

主席有個最新指示，“對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是反動組織，也要做深入細緻的工作”。這是最新的最高指示。堅決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就要團結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明白，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決自己。去年八月份毛主席給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小將一封信，高度評價他們，熱情支持和讚揚革命小將，這批人是老紅衛兵。但他們只記住毛主席前面的話，忘記了後面的話，罵人家狗崽子，所以走向反面。今年毛主席“三·七”指示，再次提醒我們。我們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團結大多數。

希望你們高姿態，否則低姿態就要輸一著。不要附加條件，要首先採取行動。我們來漢四天，就來你們這兒二次了，我們可不是“支保”了。我們是為你們好嘛。上次我來你們這兒，和你們辯論過，為什麼要在三司前面家個“康”字，罵“康三婊子”那就錯了。現在你們整天在考慮如何防守如何進攻（二司插話“我們不進攻”）你們不是有個“文攻”嗎？如何試驗“氫彈”？你們誰管作戰的？（二司答“我就是作戰部長”）你整天俯在地圖上研究什麼？是不是打仗？製造武器？（二司答“不，我主要管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會，批判大會，不過自衛性武鬥也管一些”）主要是這個問題，要集中精力解決這個問題。（二司插話“關於武鬥情況，我們多次與軍區交換意見，但毫無

效果。以前我們敢提，現在首長在這兒，我們更要提，血債我們一定要討還的”。九一三說“我們是工人，是個老粗，我只說直的。毛主席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並不是我們工人好鬥，而是為了自衛……我們認為現在不是一般的武鬥，而是陳大麻子挑起的反革命武鬥。鐵道四院、武機……都被砸了，8、9歲的孩子也不放過。如果我們不自衛，不行，我們武鋼戰士不少被趕出來，無家可歸。現在，他們搞綁架，711事件，我們損失很大”。工總“現在他們搞‘護廠隊’，實際上是把他們的力量集中起來搞武鬥。每次都是他們挑起的，他們守在門口不讓我們進”。)

什麼“護廠隊”，以後要取消崗哨。武鬥可能一方面主要的，但是也不能都怪他們。我到過成都、重慶、雲南等地，主要是靠大家解決。我們作了工作，關於“715”遊行，我們批評了軍區，沒有批評你們，以後武裝遊行、遊行，都不要搞了。（工總沈復禮說：“我們能回去的就一定回去，現在我們有廠不能歸，有家不能回，我們革命造反派從來就是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我們要求大家首先回原單位，你們（指“工總”、“九·一三”）不能回廠的，可以暫不回去，武鬥停下來再說。今天我就談到這裏，以後再談。

王力在講話中說：“我們是小學生，我們來武漢也是準備聽取不同意見的。希望你們在武鬥方面採取措施，對解決武漢問題創造和平氣氛和條件。你們是紅衛兵小將，是毛主席的紅小兵。你們二司是有名的，我們是知道的。你們三司我們也知道。你們應該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堅持文鬥，反對武鬥，立即制止武鬥。我們希望你們根據中央六條達成協議或者單獨發表聲明。你們二司是武漢很

有影響的革命派組織，要有風格，要站得高，看得遠。”三司代表插話道：“我們紅三司從來不同意武鬥。”“你們三司不同意武鬥，那也好。”王力繼續說下去，“我們提兩點建議：第一，首先要制止武鬥，要按中央六條達成協議最好，或者能達成幾條就達成幾條，實在達不成協議就單方面發表聲明嘛，造成和平氣氛再來談。有原則路線的分歧可以解決。……“第二，你們現在就要開始坐下來學習，學習中央文件，特別要學習毛主席的光輝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學好了文件，就有了解決問題的銳利武器，就能認清當前形勢掌握鬥爭大方向，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然後，檢查一下，取消一切錯誤的口號。例如，罵‘百匪’不利於他們的思想工作，也不能增加什麼，不能因為你們罵就得到了什麼。”

這時，謝富治笑了，他站起來插話道：“成都重慶罵的更難聽。要有一個高級的革命階段。你們都是大學生羅，你們要走向一個高級的階段，不能太低級，太庸俗了。罵什麼‘康老三’已不太好，更不要罵什麼‘康三婊子’了，罵是沒有用的。罵‘二癩子’也是錯誤的。這些話今後都不要用。口號要檢查一下，鬥爭的方式方法要正確處理，集中到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你們要號召所有的戰士，學習，研究，學好了就能很好地解決問題。”王力接著說：“今天我們來主要是向你們學習，帶來毛主席、林副主席對你們的關懷和希望，並提出這樣的兩點要求。……‘在對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是反動組織也要做細緻深入的工作’，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們要堅持按主席指示辦事，就是要團結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派應當明白，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去年八月

份，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高度熱情地支持他們，對他們做了高度評價，讚揚了革命小將，這一批人是老紅衛兵，但是他們只記住了主席前面的話，忘記了後面的話，罵別人是黑七類，狗崽子……所以走向了反面。今年，主席在‘三·七’指示中再次提醒了我們，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要牢記主席教導，團結大多數。希望你們馬上採取行動，按中央六條制止武鬥，發表聲明，要主動啊！……”

2點25分，王力說：“今天就談到這兒，以後再來找你們。”

（參加人員：工總沈復禮、三個戰鬥隊員，九一三陳滌，鋼二司方保林、魯性祥、楊運年、王駁清、朱振鐸、唐正國，三司許謙、李永金。鋼二司宣傳部根據回憶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陳再道檢查^[1]：開了幾天會，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是他（按，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裏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麼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裏表態，心裏總還是抵觸的，不願意堅決貫徹。所以，總理、謝副總理開會講了那麼多，自己總是在那裏陽奉陰違，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總認為還是要把情況講一講，材料還要他們（按指中央）看看。

軍區支左辦公室後來披露當時向總理彙報時的實情^[2]：“向總理彙報以前，鍾漢華就到陳再道那裏問他，我們怎麼彙報？誰講？陳再道說：‘你去講’。並且表示，還要堅決，

[1] 陳再道在中央軍委辦湖北省學習班的口頭檢查（67年12月1日）。

[2] 軍區支左辦公室在1967年7月底於軍區內部的批判會上的揭發。

不能動搖。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要繼續堅持錯誤……可是當總理講到工人總部的奪權和搞經濟主義的時候，陳再道很囂張的講‘你們調查嘛’！原來我們有些同志不瞭解這些情況，說謝副總理、王力來了三天就決定武漢問題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們，不是那樣子……彙報什麼問題人家拿出來，人家說的清清楚楚。我們有些首長說某某人被打了，怎麼怎麼樣。總理問你到現場沒有，叫什麼名字，根本答不上來……比如‘百萬雄師’調人，調人有個調令，這個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後總理拿出來了，總理說：是這個調令吧。人家清楚的很。”

回憶記載^[1]：周總理問巴方廷（市人武部政委）：“我想問你一句話。據說武漢市人武部有個通知，要求從廠礦抽工人訓練怎樣搞武鬥，有這個事情嗎？”巴坦誠回答：“有這個說法，5月份就有人這樣說，但沒有這個事……我們調查過，根本沒有這個事，純屬造謠……”周恩來從文件包拿出一份材料交給巴方廷：“這是一份文件，是你們人武部發的。這是真的嗎？”巴回答：“這個文件是假的。我們也查到了幾份，經鑒定是偽造的。這裏有一份鑒定報告……總理，我受黨的教育多年，政策水平再低，也不至於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調查^[2]：省勞改局軍管會代表（8201部隊）翁XX在下面散佈說“王力是知識分子，是相信知識分子的，是執行臭知識分子路線”；後又說“這次王力這樣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問題，‘百萬雄師’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時

[1] 張健（曾在武漢軍區服役），《七月流火》，P88，1998年，鄂省圖內字第57號。

[2] “省直紅司”勞改局造反派調查（1967年8月），載當年《武漢鋼二司》報。

候部隊才不管的”。

回憶^[1]：自是日起，各大專院校造反派按謝富治的要求，開始陸續集中和封存自製武器。

[1] 各大學眾當事人（1999年、2004年）。

7月18日

連續第四天由周恩來召集軍區師級以上幹部（軍區、武漢空軍、省軍區、8199、7250、7252、8201部隊等）會議。周分析了武漢文革的歷史過程。指出軍區支左有錯誤，甚至很嚴重，建議陳、鍾主動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給“工總”平反；要以“三鋼”、“三新”為核心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部隊要進行教育，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周希望改了錯就好；對主席的命令不理解也要執行。會議宣佈紀律，不錄音，不要上大字報，不要傳達。會後周恩來帶陳、鍾見毛澤東，毛澤東親自勸說軍區領導轉彎子。

在毛澤東接見陳、鍾之後，周恩來當晚回京。

8201師政委蔡炳臣要求傳達周恩來講話精神，鍾漢華政委同意。

周恩來在武漢軍區二級部部長以上幹部會議的講話：

這個會議接連召開四次，會議是由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這是中央的決定，還沒有來得及去群眾那裏走訪，僅僅看大字報，走訪幾個組織，我首先談談個人意見。

先談湖北形勢問題。湖北沒有實行軍管，但又軍管了，又沒有軍管。形勢表面穩定，群眾對立情緒很大，這個亂的現象很好，鄰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說問題解決了，又有反覆，唯有湖北沒有提，有意讓在湖北多耽一些時間，看看對鄰近省有什麼影響，這次解決湖北問題，估計還會有反覆。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覆，先要把軍區領導問題解決，深刻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就可以更好地領導湖北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個省的前面，過去，以王任重為首的當權；湖北問題解決對全國有意義，以兩條路線鬥爭開始分為兩段；奪權和奪權以後。中南地區的陶鑄是有影響的，解放後十六、七年的影響，湖北地區、廣東又是中南的模範省，有他的影響，這一重要責任在軍區，當然不能排除陶鑄的責任，當然不能叫陶鑄來解決問題。推遲時間來解決湖北問題，如解散工總時就來解決。不過現在，特別“百萬雄師”成立以來問題暴露的更清楚了，你們是打過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奪權奪得對不對？奪誰的權？奪權是從上海開始的，奪誰的權，當然是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了上海市委的權以後，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種措施，中央毛主席就發出號召，各地推廣都這樣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奪了北京市委的權（李雪峰），中央始終是支持的。奪了幾個月才成立革委會，初生兒不管怎樣打扮總是毛手毛腳，我們是贊成的、支持的，不能說他的大方向走錯的。一·二六奪權就奪權，二·八聲明出來，很多人支持的，二·八聲明儘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雖然這裏的錯誤是摘桃子……（按：不清）等都是北京發生過的，不管怎樣，以自己想想過去，但想到別人就不該把二·八

聲明看得那麼嚴重，因此就出現了“2·18”，“3·21”，由於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而接連出的錯誤，（對）工總的圖片是醜化工總，“1·26”，“2·8”是積極因素，你們應該幫助的。二司在“3·21”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這一工總“十大罪狀”發到農村，農民就說工總翻不了案，北京受衝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們看得那樣嚴重，軍委八條的擁軍不能像逢年過節，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老工人、黨員仍有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因而貴州、黑龍江、山西、山東都有反覆，八條出來後有了問題，江青同志講八條是擁軍，十條是愛民，八條出來後大家情緒都很高，十條以後大家情緒不愉快，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

“百萬雄師”是4月16開始醞釀，5月16日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空軍後勤政委提出的工總保王任重我感到驚訝！如果劉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會，就能說明謝富治保了劉少奇嗎？你們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你們的六·四公告出來就使“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發展。六·六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就有調整，所以百萬雄師是不是人武部的？（下答：抓辦搞的）在軍區開過會，六月八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軍事院校鬥羅籌備處的聲明有錯誤，但當中有幾句話是說出了當時的幾個問題，把這四個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夠了。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氣，加上河南問題的影響，

二七公社解決的方案有影響，這是坦白說的。

你們人武部、獨立師反映情況，不是第一手是道聽途說，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負責同志。

我們有幾個建議：

第一、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鍾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

第二、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

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

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

第五、紅三司是傾向保守派一邊的群眾組織。

第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

第七、軍區要承擔責任以外，要作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長期的影響，不作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改變對解放軍的看法，行為要澄清。

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說實在話，我們這些高級幹部對主席的話有時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擔。鍾漢華問題的處理有點不果斷，要勇於負責。

（根據與會人員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陳再道回憶^[1]：總理做了總結講話，大意是：軍區支左有錯誤，甚至很嚴重，但責任由軍區主要領導同志來承擔。建議陳再道、鍾漢華同志主動承認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給工總平反，迅速放掉朱鴻霞，支持造反派。工總起來之後，可能對百萬雄師進行報復，這個工作由中央來作。軍區要對部隊進行教育，群眾組織都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當時，我們沒有體諒總理的難處，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總理苦口婆心地說：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因此犯了錯誤。錯了就檢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為了打倒你們。總理為了消除我們的顧慮，在彙報會召開之前，就告訴鍾漢華同志說：主席臨動身時講了，要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

回憶一^[2]：周恩來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不知道毛澤東已到武漢處理問題，情緒極端激動，將支左辦公室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語直接衝撞周。甚至拍桌子說“周鬍子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

[1] 《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2] 王力、某與會者事後回憶。

周也（氣的）拍桌子對陳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

王力回憶^[1]：總理和主席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我都有原始的記錄，中紀委要我謄清過。他們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央的方針是說得明明白白。主席講話向來如此，把話講到頂點，又反過來講另一面。所以主席就講得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方針，主席一條也沒有改變。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總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開會時講的。總理聽完後才回去。總理臨行前又讓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蕭前絕對負責主席的安全。

王力向黨中央的正式申訴書（1988-8-30）在談到“7·20”事件問題時說：“這裏要說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門在預審中已宣佈關於武漢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責任了。那時中紀委要王力謄清兩份筆記，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的談話記錄全文，另一份是周總理同一天在武漢軍區高級幹部座談會上總結發言的要點。看了這兩份記錄之後，就知道王力的講話，正是毛主席、周總理講的話。例如：確定‘鋼派’等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當作‘團結對象’。周總理傳達的中央方針更厲害，把‘百萬雄師’定為‘保守組織’。這一點王力沒有說。第二，至於要各派群眾組織都‘撤除據點’，當時不但如此，還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給軍區保管，這是周總理為保衛毛主席安全而採取的

[1] 《王力反思錄》，P1006，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措施,並不是專門針對‘百萬雄師’一派的。這不能成為‘使矛盾激化’和爆發‘七·二〇’事件的原因……”。

綜合情況：

後來15軍王新政委揭發陳煽動下面幹部在會上給總理提意見,企圖壓中央改變態度。軍區王步青副參謀長揭發鍾漢華埋怨軍區整理的材料沒有及時送交總理和彙報。

會議結束時宣佈紀律：這次講話不要錄音,不要上大字報,不要傳達。

會後,20點周恩來帶陳、鍾見毛澤東,謝富治、楊成武、王力、余立金、李作鵬、鄭維山參加。接見畢,總理回到北京。

回憶記載^[1]：會上,總理講了十二點意見。總理的總結不是個人的,而是傳達毛主席和中央的具體指示,他的總結是用毛筆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

據當事人事後揭發^[2]：軍區會議精神由8201部隊的蔡政委回去立即傳達到該獨立師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和戰士,並把派出去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蔡說：“中央首長來了四天,聽了三天彙報,作了一天報告。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回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彙報。鍾政委在彙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鍾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彙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軍區後勤和其他單位觀點都是一致的,在彙報時也被頂回去了。我們彙報對新華工看法時,王力很反感,還說我們思想不通。

[1] 原北航學生戴維堤,2001年。

[2] 省軍區獨立師幹部揭發(1967年7月)。

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牛說“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樣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組織服從，個人意見保留”。會場吵吵嚷嚷，二人說“你們對外不要提總理說的”，意思要他們把矛頭指向王力。

蔡向 8201 機關幹部傳播謠言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的消息那麼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還是從公安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報告”。

參考一^[1]：毛澤東接見有關人員，宣佈中央對武漢的態度，對周、謝、王、余，李作鵬、汪東興、陳再道、鍾漢華等談到：為什麼工人階級分為兩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同時，也談到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該會明確了關於軍區支左、造反派、百萬雄師問題的三條基本方針。

主席在 7 月 18 日晚上說：“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

主席還誇獎鋼工總在水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自己要親自去看一看。更嚴重的是，主席 8 月 4 日的信對形勢的估計完全錯了。他認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又說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群眾專政，……這封信是在林彪

[1] 《王力反思錄》，1011 頁。

主持的軍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在7月18日的會上，我向主席說，主席還記得吧，第一個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漢的陳再道，而是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在一份快報上批示，對江西的一個大群眾組織要“採取專政措施”。……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發明權也不是陳再道，而是中央文革的江青。

周恩來在會後於23時半離開武漢回京，鄭維山隨同。

總理走後，楊成武與陳、鍾、李靜（總參作戰部副部長）談如何落實主席指示。

送走總理，謝富治對大家說“走，亮相去”！說去紅水院看看。王力一度表示猶疑。（按：這是實情，楊成武有關回憶也已證實）

檢查^[1]：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准蔡炳臣傳達了，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後，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由於我們長期的毒化群眾，當時已是處於乾柴澆汽油的景況，見火就要爆發。

回憶二^[2]：凌晨1點（按：已經是19日發生的事情，但文革運動回憶中習慣把後半夜凌晨發生的事情、接見作為前日記述），鋼二司紅水院廣播臺突然播放時興的歌曲《毛主席派人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空副司令劉豐、政委蕭前等人，來到武漢水院鋼二司總部，與在場學生見面，問好。在茶港去東湖濱的橋上，謝見到堵塞公路的鏟運機，

[1] 鍾漢華（1967年12月1日）。

[2] 徐海亮與其他見證者與目擊者回憶（1999、2004年）。

進大門就看到毛澤東說修得好的水院工事，看到佈設在教學大樓門口的高壓水泵、高壓電網，不禁張嘴吃驚。凌晨 1 時 30 分，一行人在水院頭頭丁家顯和其他工人學生造反派簇擁下，到水院體育館，在數千學生、工人的歡迎大會上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特別是王力，發表了激情講話，說武漢問題一定能夠解決，因為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激起臺上臺下鼓掌雷鳴。劉豐代表部隊講話表態，激動得流出眼淚。平時可以坐 3 千人的體育館，擠滿 6、7 千人（水院師生約 2 千多，其他是被武鬥驅趕到水院避難的工人、中學生），散會後，眾人從幾乎平腳踝的滿地汗水中淌出來。次日，謝、王和劉豐講話錄音被省直機關急不可耐的造反派拿到武漢三鎮反復播放。

謝富治講話：

親愛的同學們，同志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

首先，讓我代表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漢市的革命派同志們問好！（群眾激動，歡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讓我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向同志們問好！（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我代表黨中央、周恩來總理向同志們問好！（歡呼、熱烈掌聲）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張春橋同志、關鋒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們問好！（歡呼、熱烈掌聲）也向武漢的所有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志們致以無產階級最熱烈的敬禮！（熱烈掌聲、呼口號）

同志們，我們臨行的時候，我們見到了我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長時間歡呼：毛主席萬歲！）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非常關心武漢所有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志們（呼口號）非常關心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長時間歡呼，熱烈掌聲）我們臨行的時候，也見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身體非常健康。（歡呼，熱烈掌聲）

同志們、同學們，我們這次來武漢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還有一些革命小將同志是三結合，我們來武漢是向武漢所有的革命派同志們來學習的。是當小學生的。今天，我們到了水利電力學院，我們是來看大字報的，我們是來學習的，但是大字報沒有好好看，學習也還沒有開始呢，所以我們沒有什麼話可講，只是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向你們問好，向同志們的關心，我們帶來了。我們沒有什麼別的話好講，我們要從現在起，我們就開始向你們學習，先當小學生。（口號、掌聲）

同志們、同學們，我們可以告訴大家，毛主席、黨中央告訴了我們，武漢市、湖北省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勢，好的很，但是，也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武漢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們和人民解放軍同志們，你們自己來解決！（掌聲）毛主席告訴我們，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相信人民解放軍，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幹部的大多數，依靠幹部的大多數，首先是相信武漢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們！（熱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軍的同志們，（熱烈鼓掌，呼口號）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們，我們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們！（激動地長時間熱烈鼓掌、呼口號）同志們，我們沒有話講了，但是我們可以給你們提兩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們在你們的總部（按：實際上是鋼二司司令部），還有其他方面我們再三提過了，今天再一次向你們建議。第一條：所有的革命派同志們，所有的群眾組織，為了創造一個解決問題的良好氣氛和良好條件，停止一切武鬥。（鼓掌，呼口號）第二條：我們好好坐下來學習。我們掌握解決問題的思想武器，就是學習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最近以來一些重要指示，和報紙上的社論，特別是要學習我們偉大領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部偉大的光輝著作。（呼口號）拿這一個偉大的著作，作為我們解決當前武漢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許多矛盾，作為一銳利的武器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呼口號）同志們，這樣，我們就可以停止內戰，我們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們反對和進攻那些主要的敵人。（鼓掌，呼口號）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各方面去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陶鑄、打倒王任重。（高聲呼口號）

同志們，我們記住我們解決主要矛盾。同志們，這樣，我們還要團結多數，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幾次，在去年八月份，給清華附中的一封信非常熱情的歌頌當時紅衛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熱情的歌頌和評價，當時的這一件新生事物——紅衛兵，但是同時提出了，要當時的紅衛兵同志們要注意團結多數，只有無產階級，只有全人類解放了，無產階級自己才能夠得到解放。可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將同志們，把前半截都接受了，後半句沒有接受，只有什麼紅五類，把別人說成什麼黑七類、黑五類、狗崽子、狗孫子，後來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極少的就走到了反動組織聯動，

沒有聽毛主席的話。我們偉大領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這個口號，希望同志們好好學習，我們偉大領袖為什麼再三提出這個問題，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細細地考慮一下，想一想，（呼口號）我們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們，我們要支持你們團結多數，（鼓掌）我的話說完了，現在讓王力同志來講，（熱烈鼓掌）讓我們喊幾個口號：無產階級革命派萬歲！無產階級革命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呼口號）

王力講話：

親愛的同志們！戰友們！（口號，掌聲）

剛才謝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講話，他已經代表了我們，把我們的話都說完了，你們贊成嗎（大笑）。同志們是不是贊成謝富治同志說的那些話？（眾答：贊成！）

第一我不是首長，第二沒有指示，我們都是老百姓，我們是來……（大笑，眾口號聲）毛主席派我們來是當小學生的（掌聲），第一是來問候你們，第二是來向你們學習！（掌聲）。在武漢地區就地解決武漢問題（掌聲）。我們相信武漢的問題是一定能夠解決的！（掌聲）是一定能夠很好的解決的！（掌聲）中央解決武漢問題排隊是排到最後了，但是解決一定會解決得最好！（歡呼聲，口號聲）。為什麼一定能夠很好地解決呢？因為我們武漢地區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長時間的歡呼聲，掌聲，口號聲）我們堅定地相信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同志們一定能夠自己擔負起解決武漢問題的責任（掌聲）。同志們！（掌聲）同志們！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定不移地支持武漢地

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掌聲，口號：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受壓抑、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熱烈掌聲，歡呼聲，口號：毛主席萬歲！）這種現象叫它一去不復返了！（作掃開的手勢，熱烈掌聲，歡呼聲，“毛主席萬歲”！“我們想念毛主席”口號聲不斷）

同志們，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同志們提出要求（掌聲），就是要求同志們一定要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道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掌聲）。同志們，這不是策略問題，這不是一時的措施，這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證（口號聲）。這也是同志們能夠把毛主席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紅旗永遠高高舉起的一個最重要的保證（掌聲）。我們必須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我們受壓制、受打擊、受排斥，這種現象把它翻過來！（熱烈掌聲，歡呼聲，口號：“下定決心、為工總翻案，工總起來，武老譚完蛋！”……）但是，我們決不能夠對別的同志，對別人，對別的階級弟兄，對群眾來採取壓制，打擊報復，我們決不能採取這樣做法（掌聲、口號聲）。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受一點壓迫有好處（笑，掌聲）。我們不能夠因為個人受打擊，我們就動個人的情感，同志們，我們不能夠動個人情感，我們要動階級的情感！（掌聲）只要同志們牢牢地記住毛主席這樣的一個教導，我們武漢的問題就能解決得好！（掌聲）為了創造解決武漢問題的有利的氣氛和條件，剛才謝富治同志作了兩條建議：第一停止武鬥，第二坐下來學習！（掌聲、口號）冷靜下來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創造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最

新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我們要用毛主席這些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想一想，這一年多來的鬥爭，總結一下，檢查一下，正確的認識武漢的形勢，正確地抓住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的主要問題，緊緊地抓住主要矛盾，緊緊地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正確地認識和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檢查一下我們在這段時間內我們所提出的口號，那一些是正確的，那一些是不怎麼正確的，檢查一下，我們處理兩類矛盾的方法，特別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有沒有什麼不正確的地方，這叫做學習，學習就是鬥爭。（掌聲）。學習就必須聯繫實際，就必須帶著問題學，就必須找活思想，就必須解決我們武漢地區以及我們每一個團體當前正面臨著的主要問題，同志們，正確的態度對待人民解放軍（掌聲、口號）。同志們，我們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間強調地提出來的“擁軍愛民”的這個旗幟，這個口號舉起來，好不好（眾答：好！掌聲、口號）。同志們，毛主席提出來的“擁軍愛民”的口號不是在平時提的，不是每年春節那樣的一般的“擁軍愛民”，而是作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軍隊介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是作為一個重要戰略口號提出來的！（掌聲）。這個口號指導著我們正確地認識形勢，正確地認識矛盾的性質，正確地提出口號，正確地處理矛盾的問題。特別是人民解放軍和無產階級革命派之間的關係問題。

這一方面，軍隊的同志犯了錯誤，只要他檢討，改正就好啦！（掌聲）。檢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眾笑，熱烈掌聲）。我們相信，武漢地區的人民解放軍是不會辜負毛主席對他們的信任的（掌聲、口號）。至於武漢地區的問題

題究竟怎麼解決，我們還要專門找同志們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聽取同志們的意見，向同志們學習（掌聲）。今天，我們主要的是來向同志們問候問候。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根據水院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回憶三^[1]：下面接著劉豐、蕭前激動講話。

眾呼口號“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王力在1993年12月17日給中央領導人的信（鄧小平批示轉政治局全體同志閱），附了此講話，王力按：記錄整理錄音時刪去了兩句，“你們要擁軍，要真擁軍，不要假擁軍，要擁護軍隊，擁護陳司令員”；“要團結百萬雄師，他們是有群眾的組織，沒有一百萬，也有十幾萬人”。

據現在回憶、調查，在現場群眾記憶不同，不記得專門談到陳再道，王力可能記錯了。

回憶四^[2]：半夜，軍區通知中央代表團其他人員（張和井、尹等）：謝、王已經到水院，問他們去否。後一行人也趕到體育館，講話已經開始。

回憶五^[3]：1990年代，我出獄後以零售香煙、啤酒為生，一日，當地搞批發者（一下崗工人）問我，“我還不知道，

[1] 當事人徐海亮（2004年回憶並考證）。

[2] 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2004年6月）。

[3] 原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武漢測繪學院學生楊道遠（1998年12月）。

你就是楊道遠！你知道我是誰？我是‘百萬雄師’青山區聯絡站的XX。現在看，當時是你們對了，你們保衛毛主席路線對了。要再搞文化革命，我跟你們造反去”！

研究者交流^[1]：“百萬雄師”的工人們其實都很可愛。早在1986年，他們已說再來一次文革他們會當造反派，但他們認為當年的所作所為也是正確的。

8201部隊揭發^[2]：7月18日常委開會研究決定，19日上午各團團長、政委及司政科長參加傳達周總理、王力同志對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晚12點左右，周忠（按：該師政治部副主任）到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家開秘密會，第二天突然擴大了傳達範圍。是由周叫管理員閻保國同志通知機關排以上幹部、直屬分隊連以上幹部、部分支左人員也參加了會議。

[1] 對“百萬雄師”工人作過採訪的研究者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與筆者交流看法（2004年9月）。

[2] “反革命分子牛懷龍、蔡炳臣的忠實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對言行”，輯於《七月風暴》（增刊之二）鋼二司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1967年9月。

7月19日

謝富治、王力在軍區傳達周恩來講話。

是日，周恩來在軍區的講話精神已被洩露到部隊、地方部分幹部群眾中，部分軍人對透露的總理講話表示不理解和不滿；獨立師部分領導放任與煽動情緒，中午，少數指戰員到軍區大院造反，被煽動的指戰員到軍區質問和要求澄清總理指示。下午，“百萬雄師”認為王力在水院講話不公正，不能代表中央；“百萬雄師”主要領導人從獨立師領導得知毛、周在漢，試圖到東湖找周、毛說理。獨立師領導和群眾組織頭頭在鐵路局和軍區策劃揪鬥、質問王力，組織衝擊東湖賓館。

吳法憲回憶^[1]：(總理)回到北京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就主持召開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上，周恩來介紹了武漢的情況和毛澤東關於處理武漢問題

[1] 吳，時為空軍司令員，見《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P684-685，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的意見。會議決定，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發一個文件，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主要責任應當由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來負，但是中央並不追究責任，只是要求武漢軍區轉變立場。會議還決定，要陳再道、鍾漢華立即支持“三鋼”和“三新”，並且要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公開表態，像支持上海的“工總司”和王洪文那樣，支持武漢的造反派。同時，會議還要求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各自打電話給所轄的駐武漢部隊，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據會議上的決定，給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付傳作、政委蕭前和副司令員劉豐打電話，要求他們按照中央的決定辦。當時我想，中央的決定一定要執行，何況，作出這一佈置的是周恩來總理。

調查資料^[1]記載：上午，漢口某軍代表張 XX 對“百萬雄師”的“革命工人三司”講話，“說中央最近有個別人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其中有這樣兩條內容：河南省軍區支左方向錯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組織。毛主席看後，將這兩條劃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現在，中央把全權交給了武漢軍區，因為武漢軍區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過，運動至今還沒有開槍打死過人”。“江西軍區指戰員被迫轉入農村”；“中央某同志說產業軍是保守組織，與貧下中農相處很好。現在成都物資緊張，生活困難……關於成都問題，中央作出決定後，部隊不通，其中8個戰士徒步上北京，要將材料親手交給毛主席，對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1]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出版，1967年8月。

概括^[1]：下午，在軍區禮堂，謝、王在軍區二級部部長和師級以上幹部會議，傳達周總理代表中央所作的四點指示：三鋼、三新是革命造反組織；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為工總平反；“百萬雄師”是保守勢力，不能依靠他們，要做廣大群眾的工作。王力教訓軍隊幹部要從 ABC 開始認識文化革命。獨立師（8201）政委、師長相繼退出會議，回到師部，該師幹部群情激憤。武漢軍區連夜向在漢幹部、戰士傳達精神，部隊產生較大抵觸，形勢立即失控。下午和午夜，部分獨立師、29 師（8199 部隊）、“百萬雄師”人員衝擊軍區、東湖賓館，要找中央代表說理。

在軍區師、二級部長以上幹部會議上，**謝富治**說：“武漢的情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關心，都親自看了不少材料”；“對於幹部、戰士要教育，把他們的思想搞通，思想扭過來。特別在座的同志不能動搖。對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統帥所講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我們上面講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

1、武漢支左大方向錯了，錯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八條下來你們打擊造反派，十條下來了，你們卻不執行，我們等待你們兩個月了。

2、“百萬雄師”人多，隊伍要大到什麼範圍？你們連軍工廠都設聯絡站，軍工廠是保密單位，又是軍管單位，你們還要搞，不是穿一條褲子，也是穿一條褲子。打到現在造反派還是比你們人多，這點，我不用調查就曉得。

3、三新、二司大方向沒有錯，揪武老譚是把矛頭對當

[1] 《武漢鋼二司》報。

權派，是對的，有缺點是不可避免的，你們怎能抓住一些缺點打擊革命小將呢？你們要 180 度大轉彎；要不扭轉，你們自己考慮。

王力：

（先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後來講到軍區。）

謝副總理在北京講話，小將們誤會了，要揪他，在他房間裏裝了幾個喇叭，他還是向革命小將賠禮。現在人家寫了幾張大字報，罵了陳大麻子，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們打謝副總理，還不把人家槍斃了。

孟夫唐是什麼人，你們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當權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們就要打倒他，薛樸若你們也要打倒，這些人都是好幹部。

工人總部要徹底翻案，朱鴻霞沒有什麼錯，為什麼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錯誤搬到現在來。“二·八聲明”抓的人要放。

百萬雄師是個保守組織，你們起了很大作用，才發展到現在這麼多。你們現在要作工作。最擁護解放軍的是革命小將，不信，你們調過頭來，百萬雄師就要打你。

紅衛兵在初期還是積極的。但是他利用了劉少奇的血統論，沒有跟上毛主席，成為保守組織。紅三司是偏右的。

調查¹¹記載：王力講話時 8201 師長牛懷龍要求發言，被王力制止，蔡政委氣衝衝離開會場，牛相繼退出。回到洪山下的師作戰部，牛對部下大發怨氣，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 時左右，8201 部隊幾個戰士衝進軍區大院，軍區負責人做戰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們去作

[1]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印行，1967 年 8 月。

8201 的工作。後來 8201 副師長、副政委去到軍區大院做工作，對戰士說“你們不通，我們還不通呢，快回去”！19 時，又有 8201 的 49 人衝進軍區，硬要謝接見，回答問題。並質問軍區：王力憑什麼把擁有 120 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23 時半，8201 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其時，8201 部隊已經有 200 多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

當晚，“百萬雄師”以看戲名義集中了東湖地區和重型機床廠的大批“百萬雄師”群眾，到九點，東湖賓館附近方圓幾裏皆被控制，兩條通道（高家灣和博物館方向）被層層封鎖。圍用車輛上百。

與會者回憶^[1]：會議開了八、九個小時，謝講了二個小時，王講了三個小時，余立金講了半個小時，陳再道檢查了二個小時，鍾漢華檢查了一個半小時。會上決定放朱鴻霞。

會上，仍有不少幹部表示受教育很大，心情十分舒暢。一個空軍領導說：“過去咱們路線覺悟低，犯了錯誤，今後要堅決改正錯誤，支持工總。即使‘百萬雄師’的長矛對著我，我也要說工總好！”一些人還要求謝、王、余到下面部隊去作報告。其間，謝、王、余還兩次接見軍區大院警衛營、8199 部隊偵察連、六連、四連，以及大院的幹部戰士。

王力在軍區師長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了周總理四點指示。

參考一^[2]：衝進軍區的戰士質問軍區領導“軍區支左大方向明明沒有錯，陳再道、鍾漢華為什麼要承認犯了方向

[1] 軍區某與會者（1967 年 8 月），載當年《武漢鋼二司》報。

[2]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另參考陳再道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路線錯誤？”有人甚至把陳和鍾叫作“投降派”。

陳、鍾到曹家花園（軍區招待所）釋放了工總負責人朱鴻霞、胡厚民；朱流淚感謝寬大。

當事人回憶一^[1]：下午，我在號子裏吃了晚飯，才放出來（按：王係3月21日大逮捕被抓的）。他們放我的時候，非常匆忙，連褲帶都來不及還給我，我就那樣提著褲子出來。廠裏派保衛幹部徐勝才來接我，他對我說現在在外面階級鬥爭形勢很複雜，要我回廠之後好好搞抓革命促生產。

回來之後，在單身宿舍裏，許多同志就來送雞蛋，糖開水，來看望慰問。一個女同事看見我老是用手提著褲子，她馬上把自己的褲帶解開來給我，我也不避諱就接了。同志們在露天電影院開歡迎會，我簡單地做了個發言。會後就護送我去民族學院。因為被關了很長時間，外面的情況發展一無所知，看見石灰水刷的大標語“打倒康老三”，不知道這是指武漢大專院校第三司令部，還以為是指康生。我要二司的人拿些資料給我看，他們就拿了許多人民日報和小報給我，我當時是整整一夜沒有睡，看了一個晚上，完全是如饑似渴，一點睡意也沒有。

當事人回憶二^[2]：我們把（謝、王講話）錄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飯店，對著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這一下大概壞了事，當天晚上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的人，就衝到東湖賓館抓了王力和謝富治，這就是“七二〇”事件。由於局勢極度危險，我們都是在武漢大學住，不敢回家，到19日半夜的時候，大家都一起跑到武漢大學校內的珞珈山上去躲起

[1] 武漢鍋爐廠工人王光照（2003年）。

[2] 省直紅司一號勤務員鄭軍（後任省革命委員會常委）2003年。

來了，在武漢大學裏面睡覺也不安全了。

北航學生追記^[1]：下午3時到晚上，在軍區小禮堂召開軍區黨委擴大會，師以上幹部參加。謝富治傳達了總理講話精神。我（王力）講理論問題，從“文革”發展的歷史說起，說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講了你們這些師級以上領導幹部，對文化革命一點也不理解，像小學生一樣，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課，從ABC講起。這話他們不愛聽，說我太狂。我是受命協助總理、主席解決武漢問題，我的講話沒有出格，沒有原則錯誤，關鍵是不合他們口味。我講話時間長，謝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東湖賓館後，沒有睡，幫軍區修改檢查。我看了軍區的檢查，說軍區領導人“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認為陳再道言重了，錯誤沒有那麼嚴重，便改輕了。我叫醒謝富治看了以後退給了軍區。軍區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後反映說：“改輕了，軍區很滿意。”王力在百花二號為陳再道（武漢軍區）修改完檢查稿後，對隨行工作人員傳達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談話內容。之後，王力說：“陳再道說他們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這話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們來武漢是為了幫他擺脫困境的。主席說我們是保陳再道來了。陳再道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塗，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圖。”

張根成回憶^[2]：在軍區會議的講話當時，王力在水院講話錄音已經在軍區外播送，會場上皆可以聽見；我敏感地覺得情況不大對，提醒王（他的）講話錄音已經放了，王還糊裏糊塗反問“怎麼啊，有問題嗎”。其時，已經有軍人

[1] 原北航學生戴維堤記錄王力恢復自由後，對北航學生所言（2001年）。

[2] 張根成，原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人員（2004年）。

衝擊軍區機關，軍區正門被堵住。23點左右，謝一行從後門出來回東湖（謝、王又到楊成武處）。晚飯後，王力與北航紅旗學生為陳再道修改檢討大樣，還說“那裏有這麼嚴重，陷入‘不可自拔’呀”。但工作人員都感到武漢氣氛不對，要求部隊認識轉彎太急，對立情緒太重；井崗山甚至歎氣說“主席為什麼這個時候來武漢呀”？

參考概述^[1]：連日，“百萬雄師”的大標語逐漸上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下車伊始哇哩哇喇”以及“強烈要求王力、謝富治到工農群眾中去”、“強烈要求王、謝首長下連當兵”；並且出現“百萬雄師大、好、純，是個創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發現：“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紅衛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漢的‘百萬雄師’”的“最新最高指示”。

軍區秘書科回憶^[2]：下午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時，獨立師的戰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來造反，反對四點指示，但是機關同志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麼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19日夜12點多鐘，王巽琪副秘書長在政治部值班，聽“百萬雄師”的人往外打電話，叫派車到東湖去攔截和揪王力同志，當即彙報到政治部鍾文法副主任，又彙報到張顯揚副參謀長，張叫他們提高警惕。後張副參謀長說不僅將情況向領導反映了，以前聽到有這樣的跡象，也都給首長

[1]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出版，1967年8月。

[2] 武漢軍區秘書科揭發，輯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合編，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1967年9月。

那裏報了，還給葉副政委和他的秘書講過。

“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回憶^[1]：

△7月19日晚，“省直聯司”的頭頭開車接我到武昌東湖，非常神秘，告訴我毛澤東在武漢，原來周總理準備接見我們的……我主要想親自向毛主席彙報（武漢）情況……（訪者問：這麼說你們知道毛主席在武漢的情況？）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找找……沒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隊，他們把事情搞複雜了。（在東湖賓館）許多人爬上桌子，形勢失控了，有人打了王力，把他架走……當時造反派學生把王力在水院講話播放出來，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7月19日，我們在省委開會，“武漢公安”的衝亂了會議，我就回來了。“省直聯司”的頭頭楊以才本來是叫我過去一下，一起去見毛主席，聽說毛有個交代，要和“百萬雄師”的同志一起照個像，吃個飯。兩派一起去，兩個房；由總理陪“百萬雄師”的頭頭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按：周恩來18日已經回京，此傳說不知從何而來）楊以才，是他們派他來漢口找的我。

8201不那樣搞，本來是很好的事，一搞，就亂套了，會開不成了，我也呆不住了，我就回來了（按：指回到漢口的聯絡總站；俞不承認自己組織人員衝擊東湖賓館）。當晚，是在軍區飯堂吃的飯，但沒有參加深夜在軍區食堂開會商量揪鬥王力。

“百萬雄師”當事人回憶^[2]：

晚上10點左右，“百萬雄師”礄口區分站的宣傳部副

[1] “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回憶（2005年11月、2006年6月筆者採訪）。

[2] 汪洋，“‘七二〇’揪鬥王力錄音的回憶”，輯錄原“百萬雄師”回憶錄《波瀾歲月》，2002年印刷內傳。

部長汪洋，趕到聯絡總站，總站頭頭楊道安叫“快上來，去軍區”；到達軍區大院，在食堂召開會議，楊和頭頭孫德洲主持，楊說：“今晚中央來漢首長接見，我們與王力談判。……談判時要做好記錄”。

謝敏華回憶^[1]：“總站派楊道安、孫德洲、余均才到武漢軍區落實王力的四點指示，約晚上十點各分站的人和車都到了軍區，到處都是人，都是車。他們三人只好下車走到軍區院內。楊道安一看這陣勢，問怎麼辦？孫德洲說：軍區是軍事秘密機關，我們要維持秩序。……這時《紅旗雜誌》記者楊立功，在軍區值班室找到孫德洲，在出示證件後，楊立功問‘你們來的目的是什麼’，孫德洲答‘落實王力的四點指示。我們對王力信不過，沒有其他的目的’。記者走後，有個部隊幹部找孫，是個連指導員，他送情況給孫，是用紙抄寫的。情況稱：‘百萬雄師是反動組織，8201部隊是叛軍。’接著楊道安派人接孫德洲到軍區二號樓開會，由楊道安支持，有各分站的負責人和武鋼、一冶革命組織的負責人參加。會議討論了對王力的四點指示如何對待，大家一致認為：王力的‘四點指示’不公正，不符合武漢的客觀實際，不能代表黨中央，要王力解釋清楚。

“會議還決定：1、由楊道安負責組織‘百萬雄師’各分站和武鋼、一冶革命組織的負責人，成立一個代表團，負責與王力談判；2、由孫德洲負責組織和指揮遊行隊伍；3、由紅衛兵司令部負責聯繫揪王力。聯合代表團由楊道安任團長，一冶的郭文祥任中心發言人，武鋼周剛和另外兩個

[1] 時為“百萬雄師”政委、作戰部長，見“百萬雄師”常委、聯絡部長章迪傑撰《瘋狂歲月》（稿），P44-45，2004年。楊道安為二號頭頭、常委，孫德洲為常委、作戰部長。

人負責會議記錄。

某高層頭頭回憶^[1]：牛懷龍師長和獨立師杜憲章科長在鐵路局7樓（專揪王力指揮部）告訴我，“‘一號’在東湖”，我接著就告訴了東湖管理處的頭頭雷榮華。

俞文斌訪談^[2]：告訴我毛澤東在武漢的是省直聯司的一號頭頭楊以才（文革前為省監察廳辦事員，文革後為省冶金廳廳長、省司法廳廳長）。7月17日晚楊以才把我拉著就走，開車接我到東湖，他神秘地告訴我，毛澤東在武漢。你要去見見。還說毛主席也要見見你。楊以才還叫我找周總理談談。19日，我到了東湖、武漢軍區一號樓，未見成毛、周是因為省直聯司（省直機關幹部）和8201部隊的人衝擊武漢軍區，而且這些軍人都帶著槍支。楊以才對我說：看來今天這事辦不成了，你先回去，“百萬雄師”中知道毛在武漢的就我一個人。楊以才後來又告訴我，中央要我們兩派各派100人到北京去談。

章迪傑訪談^[3]：7月19日晚，我們在3506工廠吃過晚飯，我參加了常委會，當時決定派楊道安、孫德洲、余均才（“百萬雄師”總站工作人員）三人去武漢軍區大院落實“四點指示”。因為軍代表向各分站傳達“四點指示”後，各單位的人自發地湧到軍區大院。他們三人到達武漢軍區時，那裏已是人山人海，據當時統計，各分站到軍區的車輛有273輛，1萬3千餘人。他們是去落實究竟有無“四點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當時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漢軍區支左指

[1] 於2007年9月回憶陳述，榮根採訪記錄。東湖管理處的雷榮華即當年7月20日凌晨最先率人衝入東湖賓館的頭頭。

[2] 俞，時為“百萬雄師”一號頭頭；《“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榮根（2007年）。

[3] 《“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榮根（2007年）。

揮部和軍區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萬雄師”去揪的。

“專揪王力指揮部”指揮長是謝敏華，副指揮長是省直聯司的楊以才，指揮部地點就設在武漢軍區對面的武漢鐵路局大樓的七樓。封鎖機場、碼頭、火車站，當時總站有這個提法，但沒有行動，行動主要在軍區。“七·二〇”事件的發生，我們始終處於被動地位，上街遊行是8201部隊先搞起來的，“百萬雄師”是跟進的。

俞文斌^[1]：原來周總理準備接見我們，我主要想親自向毛主席彙報情況。關於“七·二〇”揪王力，8201部隊的人很壞，不聽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們幹的。有人打了王力，並把他架走，把事情搞複雜了。但“七·二〇”事件的責任主要怪毛澤東。

我們反對中央文革、“四人幫”，其實就是針對毛澤東。武漢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李良應該很清楚這些事情。你們可以去找他問問。

8201 部隊揭發^[2]：下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對副參謀長賀言生說：明天在機關勤雜人員和支書分隊傳達周總理指示……晚飯後周忠突然要提前傳達。地點是在鐵路局禮堂，首先由周忠傳達，未傳達完就哄起來了，然後反革命分子蔡炳臣接著傳達，受到了“熱烈歡迎”。22時，各團宣傳車集中到師部，周和蔡在食堂對宣傳人員進行動員，後講不下去，又到四樓動員。蔡還未講完，院裏就哄起來了，要去衝軍區。周下樓老到宣傳車前巡視了一遍，一句話未說，

[1] 2005年11月29日筆者採訪。

[2] “反革命分子牛懷龍、蔡炳臣的忠實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對言行”，輯於《七月風暴》(增刊之二)鋼二司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1967年9月。

若無其事的溜走了。這時宣傳人員上車一哄出，向軍區大院衝去。

8201 部隊鄒順駒回憶^[1]：晚上，(師 370) 醫院聽說軍區表態，要為工總翻案，(休委會主任，鄒的老鄉) 連打三次電話問師部，師部回電承認。於是大批工作人員便殺向軍區，要揪出王力和謝富治，湖北軍區後勤政委于某在夜 12 點帶領 3 個人到 370 醫院傳達軍區的四點指示，遭到全醫院工作人員的圍攻和毒打。許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萬雄師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殺光，上山打遊擊等等。

(鄒回憶到年中四好初評時) 又拉下了我的五好戰士，連長對我講，這些都算是對你客氣了，要不是看你是個戰士，你轟陳司令員，這是反革命事件，早把你抓起來了。平常他們利用堅持正面教育、貫徹兩條路線教育的機會，在各種場合下，向連隊的戰士們大量灌輸惡毒污衊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輿論，把三新二司的學校和他們所在的民眾樂園描寫成恐怖世界，人間的地獄，渣滓洞的宮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將說成混蛋流氓和殺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說 6.17 大血案，解放軍去制止武鬥的一個加強團的人被民眾樂園的牛鬼蛇神殺了一大半，邱少雲生前的英雄連隊死的只剩十幾個人，一個空軍女廣播員被三新二司拉進民眾樂園脫光了衣服，開腔破肚，割了腦袋，說他們殺人放火，搶友好商場，搶糧店等等。

陳再道的證言^[2]：(謝、王) “私自把總理關於解決武漢

[1] 鄒，原 8201 某部副班長，輯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合編，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1967 年 9 月。

[2] 1979 年 9 月 11 日，見中紀委審查謝富治問題的報告（中發[1980]77 號，1980 年 9 月）附件十一“謝富治參與制造武漢‘七·二〇事件’”。

問題的方針透露給‘三鋼’、‘三新’，把他們封為‘革命左派’，把‘百萬雄師’和其他群眾組織打成‘右派’和‘中間偏右’。他們這樣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北、武漢黨政軍民學數百萬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義憤。七月十九日深夜，一場百萬群眾自發地揪鬥王力，進行說理鬥爭的正義行動，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就是所謂的‘7.20事件’的真相”。

孔慶德副司令回憶^[1]：孔慶德和葉明、韓東山、閔學勝等軍區領導人帶著支左指揮部的人員，趕到軍區大院作工作。孔手執喇叭筒，大聲疾呼：“你們不能這樣幹，你們這樣幹是幫軍區的倒忙。你們有什麼意見，派代表來談，不能成千上萬的人擁進軍區機關，影響軍事機關的正常工作”。

……（但工作沒有效果）反而增了兵。軍區大院周圍的民主路、中南路、武珞路、大小東門以及武珞路至閱馬場橋頭，還有漢陽鍾家村、漢口接頭都出現了“百萬雄師”的遊行隊伍。另有一標人馬殺向東湖賓館！孔慶德對於這一威脅東湖賓館的行動並不知道。他只想調動兵力制止對軍區大院的威脅，可是手頭的兵，有的不聽使喚，有的參加了遊行。

綜合情況：

當晚，武漢空軍採取措施；部隊出現調動，空軍某部隊進一步加強機場警衛。在次日“百萬雄師”衝擊機場後，空軍又調動部隊進一步加強控制兩個機場。

[1] 鄭珠濱、屈德騫，《一代將星孔慶德》，P424-425，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

7月20日（一）

是日凌晨，8201部隊部分戰士和“百萬雄師”部分群眾衝擊東湖賓館，揪走王力，並在武漢軍區機關揪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要求澄清傳說中的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精神。該揪鬥行動擴大為全市性武裝示威遊行，顯示了對於傳說中的中央精神的極其不滿。

毛澤東得知消息，讓汪東興傳達指示叫軍區放人，並負責把挾持走的王力找回來。

在北京的中央領導人緊急商議穩定武漢局勢，以毛澤東的安全為重，周恩來趕赴武漢。

參考一^[1]：是日凌晨，“‘百萬雄師’2000多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分乘27輛卡車和8輛消防車，來到武漢軍區大院，和軍區機關、部隊部分幹部、戰士、家屬一起，高呼‘解散工總，鎮壓反革命’等口號。現場指揮者對中央文革小組派駐武漢的記者說：我們要當面向謝副總理、王力同志

[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質問‘百萬雄師是不是革命組織?’‘武漢軍區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等四個問題，如不答覆上述問題，有可能明天全市罷工，我們要在軍區呆一個月”。

8201 部隊幹部揭發一^[1]：零時三十分許，武昌公安局的“武漢公安”武昌分部，在軍管小組組長王福（我師六團政治處主任）的操縱、煽動下，由壞頭頭何某（刑警隊照相的）、肖某、劉某（肖劉二人均係東湖公安派出所的幹警，過去曾執行過東湖警衛任務，瞭解客舍情況）帶領十二名暴徒，分乘一輛轎車、二輛吉普車衝到客舍北門，被我哨兵阻攔門外。這夥暴徒說：“要見謝部長，謝部長是我們的頂頭上司，見謝部長是合情合理的。”哨兵回答：“謝副總理不在這裏住。”暴徒說：“我們通過各方面的偵察，謝部長肯定住在這裏。”問題發生後，警衛隊隊長秦堂春、政教張守本、師作戰科副科長徐福興、師作戰科參謀呂宗貴、師保衛幹事蔣建隆同志先後趕到現場，瞭解情況，處理問題。（按：以上涉及的均為獨立師的幹部）

暴徒們聲稱：軍管小組向我們傳達了王力的四點指示，工總要翻案，工總翻案我們就要人頭落地；軍管小組要我們明天就放人，工總的案是我們辦的，我們最瞭解情況，我們要問謝部長，要不要執行公安六條……等等。我們對他們講，謝副總理不住這裏，謝副總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來處理武漢文化大革命問題的代表，有意見應通過軍區支左指揮部反映，要見首長由軍區支左指揮部統一安排。這夥暴徒見陰謀不能得逞就揚言威脅說：“謝部長今天晚上

[1] 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聯合編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不見，天亮武漢公安將有三四千人來衝，暴露了這裏的目標，或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概不負責。”我們警告這夥暴徒：你們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過去還在這裏搞過警衛工作，知道這個目標的重要性。暴徒十分囂張地說：“中南海都衝了，這裏有什麼了不起！”

（從開始衝擊到三點）秦堂春同志分別向牛、蔡、中央警衛團衛兵隊丁隊長、武漢軍區負責保衛工作的王副秘書長報告了情況；蔣建隆同志向蔡並向武漢軍區王副秘書長、王科長報告了情況，徐福興向牛報告了情況，在我們反復多次的報告中，牛、蔡都是滿不在乎，哼哼哈哈地不作指示，只以“注意一下”和“有什麼變化再報告”搪塞過去。只有丁隊長傳達了汪東興主任的指示“請王力和謝富治同志出面處理”。我們當即將這個指示報告了武漢軍區王副秘書長。

二時四十分許，這夥暴徒乘車由小北大門衝進院內約五十公尺，被警衛隊的同志攔住，三時許，軍區王副秘書長、王科長在蔣建隆同志的再三要求下，來到現場；勸阻無效，僵持不下。

參考記載^[1]：零點三十分，武昌公安局 14 人，在頭頭何 XX、蕭 XX、劉 XX 帶領下，乘華沙小轎車和吉普、卡車衝擊東湖客舍北門（在省博物館邊的後門，靠近毛澤東下榻的梅嶺院落），高喊“我們要謝富治、王力接見”！軍區保衛科科長王振英等趕到北門，攔住 14 人。他們拿出武昌區公安局軍代表——8201 某團政治部主任王 X 開的介紹信，

[1] 根據《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印行，1967 年 8 月。

口氣十分強硬，“今天晚上來了14個人；來，就是準備闖禍的。要是天明還不接見，就要來幾千人！”“謝富治副總理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們要找他。告訴你們，謝副總理住哪個房子，我們都知道，這裏面我們熟得很，你不傳達，我們就衝！”進門後在離開大門100米處，雙方對峙，衝闖者被阻。

（另據張根成的回憶，當他趕到時，汪東興就站在離大門200米處靜靜關注局勢；另據軍區知情者回憶，佈置在梅嶺周圍的8341戰士，對事態發展業已做了最壞準備，持槍握彈潛伏戒備，事後覺得好險啊！）

王科長（軍區保衛科王振英）報告（梅嶺二號）中央警衛團的幹部，中央警衛團要他們提高警惕，（汪）並立即通知，要張根成到北門這邊來。王科長又電告鍾漢華，鍾已入睡秘書不想傳達，王強烈要求鍾立即採取措施，秘書才傳達，但石沉大海始終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給軍區值班的負責人報告，要他電告軍區領導，立即調8199部隊來。中央文革張根成向“武漢公安”來人解釋，說明天下午就準備接見你們和其他群眾組織的代表，你們先回去。但來人硬往裏面衝。凌晨3點左右，8199的張昭劍政委奉軍區之命帶了一個排戰士和秘書科長、偵察參謀趕到，手挽手攔住來人。“武漢公安”領頭的說，“你們不是8201部隊，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你們這是武裝鎮壓我們。是誰派的？交出幕後指揮！”並向8201衛兵說，“他們不相信你們，派另外的部隊來了”。相持之時，幾個8201戰士帶著武器從大院西門出去了。

到四點多，謝決定張叫軍區曾秘書叫陳、鍾來百花二號。陳一進門就說“靠你們做工作羅，我是無能力了”！五

點四十分，從西門衝進一群“百萬雄師”，徑直向二號樓謝王住房衝去。他們手持長矛、匕首、梭鏢，上身赤膊，下身短褲，有些人居然戴個大口罩蒙住臉。中央文革和北航紅衛兵工作人員被他們推到謝王門口。叫喊“我們要見謝富治、王力，叫他們出來”！謝出來，“我就是謝富治”，謝說“你們是哪裏的？來幹什麼？要綁架嗎？我們準備今天下午接見你們的代表，你們這種行為是非常錯誤的”。一些群眾自覺理虧，悄悄退出，還有5、6個仍在糾纏。陳、鍾卻躲在謝王身後，不敢出面做工作；後陳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談。謝回房穿好軍裝，走出房間，主動提出接見這些人，走出大廳後門在草坪上談話，氣氛變得較為融洽。王力也從另一房間換上軍裝向草坪走去，坐在謝身邊。陳也跟了去，鍾卻躲在群眾圈外。

眾人在百花二號後面草地上談話，從百花院的二道門又衝進端著衝鋒槍的8201軍人，槍口對著謝、王，接著又進來8車8201、8199軍人和軍事院校學員，由8201XXX副營長帶隊。有人直衝進王力房間翻箱倒櫃搶材料，又破窗而出竄到草坪。首先碰到陳，揮拳就毆打陳再道；陳大叫“我是陳再道，我不是王力”，被打倒在地。8201部某股長忙叫“這是我們的陳司令員！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錯了”！暴徒住手，扶起陳。王力見勢不好，跑回房裏；鍾漢華見出現打人，忙跑到一個地下室躲了起來。軍人將王力抓出來，激憤的軍人和群眾蜂擁謝、王，把謝推來推去，憤怒毆打王力。又毒打張根成、北航學生。

在北門做勸說工作的軍區王科長接到西門這邊電話，與張昭劍商量，留下秘書科長滕XX帶一排戰士守北門，其餘人直奔西門，半路見好多著警服的人在院裏亂竄，8201

的警衛在指指點點。他們從百花二號後門通過大廳趕到草坪，“百萬雄師”與8201的人已經打人。張昭劍等趕到用身體阻攔暴徒，張肋骨被打斷。北航學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車。張根成緊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來的，你們綁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錯誤。什麼人才綁架中央派來的代表！”一個人卡住張的脖子“你是什麼人”，張回答“我是中央文革派來的工作人員”，結果遭到狠狠毆打，軍人把張拉走；北航學生尹、胡被8201戰士和“百萬雄師”帶走。牛懷龍當時就在西門。王科長忙叫來了牛，牛到綁架王力的車前說：“不要搞得這麼凶嘛！搞這麼凶幹什麼？把機槍收起來！”說完轉身就走。張昭劍政委與王科長被眾多軍人阻攔，近不了車；車隊向軍區開去。

後來，謝要去救出王力，陳、鍾勸謝別去，由他們親自去處理。牛師長說“你們別去了，我去找他（謝）講”，結果牛並未去謝處，也徑直走了。

參考調查^[1]：19日夜裏，“百萬雄師”武昌指揮部就將所謂王力“四點指示”電告下屬的“武重紅聯”楊XX，當時武昌“百萬雄師”的八分部由東湖管理處、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中南金屬結構廠、濱湖機械廠、東風農業隊、東湖療養院、省博物館、省建六公司組成，負責東湖地區，指揮所在東湖屈原紀念館。武重的李XX又將情況通知東湖管理處的分部頭頭方元松。凌晨，武昌指揮部再次通知八分部楊XX處於“待令”狀態，說“部隊內部已經造反了”。與此同時，在軍區三號樓二樓會議室，由8201作戰部長孫

[1] 東湖園藝軍參加“720”事件調查總結，鋼工總東湖兵團、北京林學院“東方紅”“長江巨浪”戰鬥隊（1967年8月），並參考《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印行，1967年8月。

某召集召開會議，成立“專揪王力指揮部”，商議和組織了揪鬥王力事宜。“園藝軍”並受命控制南山賓館水路、碼頭，首先衝擊賓館西門（前門）和後門（北門）。在統一調度下，“百萬雄師”園藝軍東湖分部（屬於管理處）一號頭子雷榮華帶一車人（1、3、6班和偵察班共28人），從北門衝擊賓館，8201門衛不讓車隊進入，人群一衝，雷率人從小門就進入了。眾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沒有找到謝富治，雷就帶領賓館內的彭、唐、畢、王等十餘人，向西越過第二道崗，率先衝入百花院落。要見謝、王；謝說“我是謝富治，要綁架，要殺，由你們的便”。王力說“你們有沒有事，沒有事，就出去”！在謝、王指責下，有人說：“我們不是來揪你的，是請首長給我們解決問題的。”但劉賢寺叫“不出去”！雷也大叫：“謝富治、王力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揚言要揪王力去軍區，要與謝王拼到底。不久，重型廠又從西門衝進三車人，包圍了百花二號裏裏外外。陳再道聞訊趕到現場，對謝王說：“現在就看你們做工作了，我是沒有辦法啦！”隨後又到了幾車8201軍人，衝鋒槍和刺刀對準謝、王。

為避免雙方流血衝突，軍區保衛幹部和謝富治的警衛只好收起手槍。

當事人回憶^[1]：零點，3卡車百萬雄師開始衝擊東湖客舍，聲言要揪謝、王到軍區回答問題。

張根成回憶^[2]：前日，賓館服務員（屬於鋼工總組織）高興地說，毛主席已經接見我們了！

[1] 原北航學生井崗山（2004年7月）。

[2] 時為中央文革工作人員，（2004年6月回憶，並參考1967年7月28日張對新華社同志的講話記錄）。

北京來漢的一行人正在扯談，深夜1點多，突然汪東興急電住百花的張根成，“告訴王力謝富治，這邊門是不是有人在衝呀”！王力說去看看。我跑步一公里，去東（北）門（按：較接近南山乙所和梅嶺），汪站在離門200米處，平常封閉的後門外，汽車發動轟鳴，眾人喧囂“今天把腦袋別在腰上，非見謝富治不可”！軍區保衛處幹部（即保衛科長王振英）在勸說並稱謝不在這裏，找到謝也沒有用；來人不聽勸阻，說我們什麼事都知道了，不要瞞我們！似乎毛主席來了他們都知道了。張趕回去告訴王力，王力說：“不行呀，趕快打電話給軍區。”電話打來打去才找到葉明副政委，葉明答應派40名幹部來。不久，汪又去電催張根成：“不行啊，怎麼沒有見增加人啊。”王力忙叫叫醒謝，謝邊穿衣服，邊說趕快把賓館造反派頭頭叫來，先將內部造反派穩定住，叫大家不要亂，免得群眾發生衝突。

時天已濛濛亮，院子裏已經有人衝進來了。王力叫張快去通知住百花一號的楊成武，張從後門跑到一號（兩樓相距約200米），楊起身說：“那怎麼辦？那主席那邊？……”；按原來議定，張要求楊不要暴露身份，張說“主席那邊汪東興知道；你不要暴露”，楊成武道“那我們就不出去了”。很快人群衝進二號樓上，大叫“誰是謝富治”？謝走出走廊說“我就是謝富治”。人群蜂擁，秩序亂了，室內人都走出。張根成忙將室內皮包與文件收走藏到一配電間裏。軍人將王力架了出來；陳突然大叫我是陳再道，一邊說“我不行了”，往下一癱。王力與軍人在外面談，不遠就是軍人的汽車，亂中，把王力拉走架上汽車。張叫你們不要這樣，王力是毛主席派來的，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中央派的人你們這樣對待，什麼人才綁架中央派來的人？！一個海軍裝束的

狠狠推張一把，“犯什麼錯誤，你是幹什麼的”，並打倒在地；一聽說是中央文革的，就說“你也一塊來吧”，將張拉走遊街。王力則被拉進軍區大院。

張被扯掉帽徽領章遊街，親眼看見當日大街上混亂情景。車上軍人對他痛罵“中央文革都幹了些什麼事？把 80 萬人的產業軍打成反革命，在內蒙、河南幹了些什麼？把解放軍打成保皇派”！不過都是當兵的嘛，還拿車上的酸梅湯讓張解渴。

後來遊回軍區附近，15 點左右被帶進 8201 師部（靠近軍區的中南大道末端），門口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有人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蔡炳臣政委進來，對張根成說：“領導通了好辦，下邊不通，領導的話不聽，我也沒有辦法”；並問“你們那裏還有文件嗎（按指總理講話文件）”？張答“有啊”；蔡“呵”了一下，又叫把被撕下的領章帽徽還了張。這時，一個幹部（師政治部主任）進來問“那個人呢怎麼樣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講，那人不明就裏，還追問“那個人呢！？”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問那老頭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說“那誰知道呀”！張想怎麼這樣講，心裏咯噔一下，“這不是造反了嗎”？後來師作戰科長和幹部科長盤問張，並說：“你們中央帶著框框下來，不深入群眾，不調查研究；來到武漢就到知識分子窩裏鑽。你們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識分子，不要工農兵……你們中央奪軍權”！到 15 時左右，軍區保衛處找到師部，要將張送回東湖，牛懷龍同意了。

張回到東湖賓館，謝、楊、余在場議事，張問為什麼獨立師幹部這樣，還說什麼“游泳的人、那老頭子”那地方……謝說“你不知道呀，那就是王明的警衛員！這個事

就是他們搞的”！顯然，三軍領導認為出現了兵變，而其中還有歷史淵源。（按：謝這裏指的應是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曾係王明警衛員，張當時理解成指蔡政委了。）

歷史材料^[1]：凌晨3時多，29師突然接到“保衛中央首長安全”的指示，師政委張昭劍親率一個排來到東湖客舍。此時，百萬雄師一派的“公檢法”系統十幾人已進入“中央首長住所區”，29師部隊當即進行勸阻，事態稍為平息。

8201部隊幹部揭發二^[2]：5點40分左右，“百萬雄師”“武漢公安”在一小撮壞頭頭的帶領下，手持長矛、腰插匕首、頭戴安全帽，分乘五輛汽車，一輛同武昌公安局的一夥暴徒相結合，封鎖了北大門柳堤，其餘四輛衝進風光大門，這夥暴徒不僅不聽哨兵的勸阻和警告，反而包圍了哨兵，控制了電話機，然後衝入“百花”，包圍了謝副總理、王力同志的住房，張守本同志帶領警衛隊同志將衝進的暴徒組織好坐在一草坪上，謝副總理和王力同志出來接見和解答問題。

問題發生後，秦堂春、呂宗貴、蔣建隆同志分別打電話向牛、蔡報告，但卻找不到牛、蔡（經事後查實牛在宿舍不接電話），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報告並要求他們找牛、蔡到東湖處理問題。

當事人張林發回憶^[3]：我從1958年修造賓館各建築就

[1] 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與“8199”》所引29師整理《七二〇叛亂實況》（1967年8月4日）。

[2] 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聯合編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3] 東湖賓館工作人員張林發（2005年1月）；毛澤東在29日才決定由15軍抽一個營去接防東湖賓館，原警衛隊、部隊全部調出整訓；獨立師可以考慮調出整訓；機場到梅嶺通道要15軍或29師負責警衛。

在此工作。賓館的保衛和管理制度歷來是很嚴格的，67年賓館由8201軍管。當晚我在值班，管理電、水、製冷、通訊等事宜。園內尚無多少喧嘩聲，天亮才知道出事了。當時有意見可以給中央提，但是8201和“百萬雄師”衝進賓館並抓人打人；衝進來和放群眾進來，事情性質就變化了。那時賓館有百十號人，幹部約二十多人，事後全部調出整訓，再未回來，僅留下我堅持技術工作。據說毛澤東的專列原來停放徐家棚支線，但“百萬雄師”為了截住王力出走，把鐵路控制了並揚言要扒路軌，專列開到漢口機場支線去了。原來負責警衛賓館的8201戰士，在8月1日才撤出賓館。那天，他們會餐，打掃了營區，才痛哭和傷心地離開去整訓，而且沒有帶走槍械。空軍7212部隊來了幾車幹部戰士換防。

回憶記載^[1]：“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獨立師的許多人拿著槍支、長矛、大刀，乘坐吉普車和三輛大卡車衝進了東湖賓館，包圍了百花二號樓，又衝了進來，點名要謝富治、王力出來。代表團工作人員張根成、井崗山、吳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樓道，並指責來者的行為。工作人員們哪裏是“百萬雄師”們的對手，一個個被打倒在地。

謝富治、王力發現有人衝進賓館後，謝富治立即打電話通知了在南山乙所（距百花院落一里多地）值班的陳再道、鍾漢華，讓他們立即過來解圍。聽見外面“謝富治、王力滾出來！”的口號聲和吵鬧聲，謝富治讓王力待在屋裏，自己先走了出來，面對衝上來人群，喊道：“我就是謝富治，你們要幹什麼？”又對工作人員說：“讓他們上來！派代表上來！有什麼意見可以談。”“百萬雄師”群眾遲疑了一下，

[1] 原北航學生戴維堤，〈逝者如斯〉（2001年稿）。

停止了吵鬧和喊叫，讓幾個頭頭先上來。謝富治同“百萬雄師”的頭頭們一一握手，詢問他們姓名，寒暄了一陣後，氣氛一下子緩和了下來，謝富治請他們進會議室說話，人群一下子擠滿了會議室。

一個為首的客氣地說：“請問謝副總理，王力的‘四點指示’根據何在？憑什麼說我們是‘保守組織’？憑什麼說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但不等謝富治說話，人群中又喊叫了起來：“你把王力交出來！”“王力是破壞武漢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我們要批鬥他！”“對！把王力交出來！打倒王力！絞死王力！”現場頓時又亂了起來。

這時，王力突然從其他房間裏走了出來，說：“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決問題，那就請大家冷靜一點。我們歡迎大家提意見。”人們一下子把王力圍了起來，七嘴八舌地紛紛指責他，說什麼話的都有。井崗山等人看事不好，擠過來護住了王力。陳再道、鍾漢華聞訊趕來（他們住處離百花二號約10-20分鐘路程），陳再道一看這場面，大聲說：“大家不要吵，有話好好說，你們一個一個問題地問，讓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王力對眾人說：“今天太晚了，明天在軍區禮堂接見你們的代表。四點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決定，我們是代表中央講的。你們有意見可以提，但不准這樣胡鬧。”

群眾聽言，火氣上來：“什麼他媽的中央決定？純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嚇唬人。今天你必需跟我們走一趟，說不清問題不能回來！”“對！把他拉到軍區去，批鬥這個‘小爬蟲’，讓他嘗嘗革命群眾的厲害！”說著有人要動手。井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聲喊道：“你們要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同志們要警惕一小撮壞人乘機

搗亂！”這話惹火了“百萬雄師”的人。有人揮舞著拳頭，要上前抓人。

這時，突然湧進來一些手持武器的軍人，端起刺刀拉動槍栓，對準了王力，要王力回答問題。面對一個個槍口，王力嚴肅地說：“我希望我們的解放軍同志把槍拿開，因為它是對付敵人的，它可能會走火，那樣事情就會起變化，我們不願意看到那樣的局面。我再次告訴大家，我們明天在軍區接見你們的代表，那時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喧嘩又起：“不行！今天必須談，你不要耍滑頭！”“對！讓他馬上回答問題，否則我們決不答應。”見狀，陳再道司令員在場一直一言不發，謝富治氣極了，指著陳再道大聲呵斥道：“我叫你來是看熱鬧的嗎？你下令讓他們立即撤出去，馬上撤，聽見了沒有？”

陳再道看到謝富治氣得發抖，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張根成和北航紅旗的幾個紅衛兵那著急的樣子，不冷不熱地說：“事情是你們引起來的，我怎麼插手？這些人又不是我讓他們來的，我管不了他們。這回要靠你們做工作了，我們這些老傢伙們不中用了，無能為力了！”這話引起在場的“百萬雄師”群眾和軍區來人的大笑。……此時，在軍區大院裏等著批鬥王力的軍區官兵和“百萬雄師”的人們不耐煩了，又有更多的人開著卡車衝進了東湖賓館。

一個大高個衝了過來，對著陳再道頭頂就一下，又是幾拳頭對著他的後背和前胸砸來，陳再道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有人忙喊：“別打別打，這是陳司令員。”陳再道也大喊：“混蛋！亂彈琴！我是陳再道。哎呀，打死我了！”這個肇事的“百萬雄師”趕緊把陳再道抱在懷裏，不停地問：“陳司令員？對不起！打在哪兒了？疼不疼？”陳再道被扶起來，

罵著說：“誰他媽的再搞武鬥，我就槍斃了他。”說完，扎進謝富治的房間躲了起來，撒手不管。這個暴徒把陳再道當成了王力。

謝富治見陳再道被打，站出來說：“我是謝富治，是中央代表團的團長，是黨中央、毛主席派我們來處理武漢問題的。大家有意見可以提，但不能搞武鬥！誰搞武鬥誰就是對抗毛主席！”王力也接著說：“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的講話和‘四點指示’，不單是代表我們個人的意見，也不單單是‘中央文革’的意見，而是黨中央討論決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總理批准的。我已經把話說清楚了，有什麼問題明天派代表談。今天這麼晚了，我們不能跟你們到軍區去，你們不能強迫我們。”

這時，惱羞成怒的暴徒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腳並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許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圍了上來亂打一氣，現場又亂了起來。“百萬雄師”的指揮喊：“大家別跟他嚙蘇了，拉到軍區大院再說。一夥身強力壯的人們不顧王力的抗議、掙扎和代表團人員的阻攔，架起王力，把他抬到了一輛大卡車上，在謝富治、余立金等人眾目睽睽下，拉走了王力。代表團工作人員張根成、尹聚平、胡慧娟也被分別推上了幾輛車拉走。王力被抓走後，謝富治不顧阻攔，由吳介之陪同乘車去了武漢軍區大院找王力。到達門口時警衛不讓進。謝說：“我是謝富治！讓我進去！”對方回答：“你是謝富治？進來就把你宰了！”這時有幾個人認出了謝富治，大喊：“快拿刀子來！宰了這老東西！”吳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謝拖上汽車，逃走了。

尹聚平被推上卡車以後，並沒有人太刁難她。卡車上全是“百萬雄師”的人，他們興高采烈，把尹聚平忘了。

尹聚平將計就計，車上的人喊口號，她也跟著喊。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卡車停了一下，她迅速跳下了車，消失在人群中。尹聚平對剛才發生的事驚魂未定。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邊一戶人家，要了一點水喝，並打聽往水利學院（19日凌晨她曾隨眾人到過水院）怎麼走。女主人很熱情地給她畫了到水院的路線。尹到了水院“三鋼”總部，說自己是北京來串聯的學生，借電話一用。尹給北航韓愛晶打通了電話，報告了武漢發生的情況。水院總部的人一聽尹是中央代表團的人，驚喜交加，也緊急電告駐京聯絡站武漢情況；在會議室，尹向水院學生講述東湖客舍發生的事，不禁大哭。水院學生立即安慰她，把她保護起來，並與駐京聯絡站聯繫。第二天上午，胡慧娟也找到了水院，見到了尹聚平，二人在水院學生的護送下，趕回到湖對岸的賓館。尹、胡一見到周總理等人，立即拉著總理的手放聲哭了起來。

軍區支左辦公室揭發^[1]：這個事件“百萬雄師”是主力，但沒他這個獨立師也不行。在這個事件中陳再道、鍾漢華表現怎麼樣呢？一個就是19日的晚上，已經發現百萬雄師的人到了軍區，有的到了招待所駐地，他們沒有主動的出面作工作，當事件發生以後……當時陳再道卻在那個客室躺著不動，鍾漢華在一個小房裏躺著不動。

8201 部隊幹部揭發^[2]：5時50分左右，據說是在軍區的指示下，牛才勉強地驅車來到東湖。牛到東湖不到十分鐘，部隊的車輛接踵而來，我師五團五連兩卡車人打頭陣，車

[1] 支左辦公室在軍區揭發會議上的發言，1967年8月；輯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 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合編 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 1967年9月。

[2] 載《七月風暴》，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聯合編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子架著輕機槍、步槍、刺刀，隨後即有海軍一車、空軍一部分、“武漢公安”的一部消防車，師、團宣傳車六部、三零七醫院，“百萬雄師”共約千餘人，殺氣騰騰，反動氣焰不可一世，他們高呼：“解散工總、鎮壓反革命”“踏平工總、為民除害”“百萬雄師好、百萬雄師就是好”“王力在哪裏、老子要揪你、槍斃你、挑了你”等反動口號，衝入謝副總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衛戰士攔車時，他們大罵攔車的戰士是“老保”、“8201的叛徒”、“不躲開、老子用刺刀捅了你”，迫使攔車的戰士躲避不及而爬在汽車頭上。這些暴徒衝進“百花”後，謝副總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見第一批衝進的“百萬雄師”和“武漢公安”。他們像土匪一樣闖入會場，拖開警衛戰士，圍攻、推打謝副總理，並將反革命分子陳再道誤認為是王力，七手八腳把陳打了一頓，後有人說“打錯了，這是我們的陳司令員”才住手。暴徒們找到了王力同志就將其推上車綁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書張根成同志、北航紅旗的革命小將尹聚平（女）據理力爭，也遭到圍攻、打罵和綁架。王力同志被綁架的時間是七時二十分。

現行反革命分子牛懷龍到東湖後，既沒有向警衛人員作安全措施方面的指示，也沒有將部隊要挾衝擊的情況告訴任何人，只是東遛遛，西轉轉，看樣子很焦急，實際是應付差事。最可惡的是當暴徒們綁架王力同志，警衛戰士拖住王力不讓上車，車上的暴徒拉著王力的手往車上拖，雙方爭執不下，牛懷龍不僅沒有站在警衛戰士一邊制止暴徒綁架王力同志，反而勸說警衛戰士：“讓他上車。上了車就好了。”就這樣王力同志被暴徒拖上了車。為了不讓王力同志脫身，這個反革命分子牛懷龍還專門對宣傳車上的人作了佈置。為了保衛王力同志的安全，警衛隊派了三個戰

士隨車保護王力同志，又派三個同志乘坐其他車輛觀察王力同志的去向，以便隨時反應情況。

部隊、百萬雄師撤走後，武昌、漢陽公安分局的一夥暴徒，繼續圍攻謝副總理，經說服、勸阻于九時二十分左右離開。

謝富治回憶^[1]：我坐了一個小汽車去救王力，到了消防隊門口，消防隊兇惡得很，他們說：“謝富治來了，謝富治是個大壞蛋，抓住他，揍死他，趕快拿刀子！……”他們兇惡得很，可兇惡！不是群眾保護我們，他們就揍死我們了！我們沒有得罪他們，為什麼他們這樣兇狠？這是階級鬥爭，廣大的戰士，廣大的指戰員沒有責任，他們中劉鄧彭羅的毒很深。

鍾漢華檢查^[2]：當19日夜晚開完會，我從軍區大院回東湖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出亂子的徵候，可我這個反革命的立場促使著我，亂就亂吧，潑著幹，也不採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當“7·20”拂曉，暴徒衝進東湖的時候，我這個卑鄙無恥的東西，把謝副總理推到前面。我躲到地下室裏去了。就是“7·20”事件發生了，我如果是有一點解放軍的氣味，也還可以挽救。當時要是挺身而出，果斷處之，還是可以制止下來的。我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低聲下氣，作揖磕頭，這是更助長了暴徒的氣焰。

軍區陳秘書回憶^[3]：“7·20”那一天早上10點多鐘，我從漢口濱江飯店坐軍車去武昌的軍區大院，從武勝路漢水一橋開始，到長江大橋，沿途都是軍車，上百輛，車上都

[1] 1967年7月23日謝在公安部機關大會上的講話。

[2] 鍾漢華（1967年12月1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材料。

[3] 陳秀森，陳再道當時的生活副官（2004年）。

是“百萬雄師”的人，頭戴柳條帽，手拿鐵矛。8201部隊的人也都出來了，跟他們混在一起，有的車上還架著機槍，真是殺氣騰騰，整個街上看不到一個人，一派恐怖氣象。我到軍區大院之後，整個大院是人山人海，喊的口號都是“活捉王力、討個說法”、“消滅反革命組織工總二司”。中央當時給“7·20”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也不能說是假的。

我覺得陳再道他們有這個想法：我把造反派都消滅了，看你還支持誰？想以此對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施加壓力，根本問題就在這兒。

學生回憶^[1]：我早上9點鐘剛剛吃完早飯回來，正在湖北大學的報欄看報，就聽到狂呼亂叫從閱馬場那邊傳過來，接著就看到“百萬雄師”的人頭戴柳條帽、手執長矛過來，許多8201部隊的人也在他們的車上，手持衝鋒槍，向學校裏頭開槍，子彈打在地上塵土直冒，我當時正要跑，結果差一點被擊中。

“百萬雄師”的車隊在湖大門口停下來之後，許多人就湧進來，我就和人群一起跑，8201部隊開槍在後面趕我們。我連忙跑進設在3樓教室的指揮部，拿了兩本“毛選”，跑到下面的教室裏自習，當時教室裏只有很少幾個人，相互不認識，我就假裝在那裏看書。“百萬雄師”的人進來之後，逐個進行搜查，最後把我用衣服包住頭，帶到公交五場的“百萬雄師”據點，晚上又來審問我。我當時已經想好了對答，我說自己是……在審問我的時候，頭上還是始終包著衣服。最後他們自我吹噓了一通，說他們最講政策，只是要對造反派搞專政。然後仍然不去掉頭上的衣服，派了兩個人把

[1] 原武漢機械學院學生劉漢武（2003年）。

我送出去，走了一段之後還把我轉了幾個圈，然後送人的才偷偷走了。過了半天沒有動靜，我扒下頭上的衣服一看，原來就在火車站附近。我就從紫陽路進入湖大後門，11點多才回到原來我住的教室。屋子裏一派狼藉，什麼東西都砸得亂七八糟，帳子撕亂了，被子不見了，衣服都丟在地上。

第二天，我聽到街上人聲嘈雜，看見有人在邊上，我就問他“百萬雄師”走了沒有。這一下壞了，他們說我是造反派，當即就挨了他們一頓狠打，又用衣服包上我的頭架到他們的車上去，要我坐在車頂上，用長矛頂住我的腰，同時還用長矛撐起我的雙手，做投降狀，車子一直往前開，他們沿途呼喊口號要打倒王力，一直開到礄口公安學校。這個學校原來是監獄改的，把我關了一個晚上之後，7月22日早上來審問我，我仍然說我是水院的學生，頭天被你們抓到公汽五場去了。這次他們又吹噓了一通他們如何講政策，然後派人送我到門口放了。我上汽車後，發現人家都在看我，原來我已經被他們打得鼻青臉腫，面目全非……

工人回憶^[1]：“7·20”那一天早上我回到武鍋，我拿著飯盒準備去食堂吃飯，抬頭就看到廠辦公樓陽臺上，架著機槍，後來聽說也準備好了硫酸。幾個工總的戰鬥隊員從後面把我抱住，架著我轉身就走，護送到武大數學系。我去了武大之後，就成了武鍋流落到武大的難民們的主心骨。熊濟堂對我特別關照，他腰裏插著兩把匕首，好像就是我的貼身護衛。當時各種各樣的情況，源源不斷地彙總到我這裏來，因為我在監獄裏這一段時間的慘烈鎮壓沒有概念，對那樣一種氛圍感到很不適應。後來他們覺得在武

[1] 鍋爐廠工人王光照（2003年）。

大仍然不安全，就把我安排到武大邊上的風光村的一個農民家裏，或就躲東湖的荷葉底下去，夏天的蚊子多得要命，根本就無法入睡，算是過了幾天沙家浜的生活，直到“7.23”中央表態。當時是一夕數驚，最緊張的一次是說有幾車荷槍實彈的士兵，已經到了武大的周邊。在“7.23”北京表態之後，完全是一派漫捲詩書喜欲狂的心態，整個武漢簡直是沸騰起來了，說是公雞下蛋了，武漢天亮了。

學生回憶二^[1]：在7·20這一天，我經過洪山賓館去大堤口去看母親她們。在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百萬雄師”，感到寒氣逼人，喊的口號殺氣騰騰，許多軍人荷槍實彈，有時候他們隨意指著一個人說他是鋼工總的，就衝上去拳打腳踢。聽到受害者的慘叫，我當時真有一種想要流淚流不出來的感覺。

幹部回憶一^[2]：在“7·20”之前，團省委是有兩派，但是沒有蠻大的對立。當時省委內部主要是有工人保守派，打著鋼工總的牌子，與“百萬雄師”一起搞武鬥，“省直紅司”說是要疏散，我們睡覺的時候都要躲在桌子底下，後來我還跑回湖南老家去躲了幾天。

學生回憶三^[3]：“7·20”那天我們（新華工敢死隊）躲在湖北藝術學院整天不敢上街，外面太亂，形勢不明……好不容易捱過一夜，第二天形勢愈加嚴峻，“百萬雄師”在遊行示威中經過閱馬場時再次血洗了新湖大。新湖大校園的牆壁上滿佈彈痕，有五六個造反派群眾倒在“百萬雄師”的長矛之下，有二百多名學生被“百萬雄師”抓走。“百萬

[1] 原漢陽三中學生謝保安（2003年）。

[2] 原團省委幹部顏兵（2003年）。

[3] 原新華工學生魯禮安（1998年）。

雄師”還揚言要拿下造反派的最後據點新華工。而有消息說 8201 的一支工兵部隊已接到命令將前往華工掃雷，因為華工紅司司令部早已宣佈在校園大門內已佈置了“雷區”以阻擋“百匪”的進攻。據說華工正在堅壁清野，除留下一支數十人的基幹民兵死守大本營外，全體師生都將疏散出校以減少傷亡。

參考記載^[1]：凌晨 1 點 20 分，重型機床廠已經將武裝的“百萬雄師”集結，廣播高叫“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強烈要求中央首長深入下層瞭解情況”。2 點，成百卡車衝進軍區，在軍區食堂 8201 與百萬雄師開會成立“臨時聯合代表團”，組織與王力談判與辯論。軍區支左負責人答應調宣傳車，X 副參謀長與“代表團”的人去電信大樓發“給毛主席的急電”。5 點 10 分，8201 軍車 21 輛，宣傳車 6 輛，3 輛吉普，1 輛小轎，從前後門衝進賓館；緊接 41 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 3 輛大型救火車而來。“百萬雄師”，部分 8201 獨立師、8199 部隊、海校人員衝進賓館，高叫“把謝富治揪出來”。質問並抓走王力。謝富治回答群眾質問，說“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我們有足夠的材料，我們有發言權。我們的四點不是什麼指示，是我們的一些看法”。問百萬雄師是個什麼組織？“是個龐大的組織”；“為什麼要為工總翻案”？“受壓制的革命派的案就是要翻”！9 點左右，王力被“代表團”揪到四號樓，軍區支左指揮部派人找“代表團”參加旁聽，張 X 還提供了錄音機錄下批鬥圍攻實況。

上午，武漢三鎮陸續集結大量軍車、備戰車和民用卡車、消防車，獨立師（及部分其他單位幹部戰士）、“百萬

[1]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印行，1967 年 8 月。

雄師”組織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車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點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滾出中央文革小組”、“打倒王力”、“王力滾出武漢”等口號。百萬雄師的宣傳車在反復播放“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時，也播放起《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語錄歌。軍區大院敞開，失去控制；軍人、群眾、車輛進進出出。一些膽大的造反派學生，換上“百萬雄師”或“紅衛兵”袖章，混進軍區大院，目睹了現場和批鬥王力經過。軍區大門，一衛兵對旁人說“……我們的人打電話給‘百萬雄師’，‘百萬雄師’派了一千多人到東湖療養院，包圍了，捉到了王力，送到軍區，現在在四棟三樓”。人群與軍人在軍區大門外激憤議論：“謝富治算老幾？能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嗎？”“揪出謝富治”！在大東門，口腔醫院門口，兩個軍隊幹部說：“謝富治想跑，老子海陸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脫？”武漢測繪學院署名三司的標語寫“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在軍區二號樓3樓46房，眾圍攻王力，“要他回答四點指示有沒有”？一個人拿起話筒和紙條，照著紙條問：“王力，你到武漢也沒有幾天吧！你也沒有到群眾中去調查，就發出四點指示……我們提幾個問題要你回答！第一，你們四點指示到底有沒有？要沒有，就當面闢謠！第二，你到武漢這幾天，到三新二司裏幹了些什麼？要回答！第三……”眾亂。牛師長叫喊“靜一下，好錄音”！“百萬雄師”和部隊肇事人員在軍區大院公開批鬥並毆打王力，要王力對武漢形勢和“百萬雄師”組織的性質表態；鍾漢華、葉明政委急得哭啼制止，然而無效。鍾甚至作揖、磕頭勸阻，叫“你們這是幹什麼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們綁我好了”，但亂中無人理睬。

後來，眾人反剪著王力雙手，將他推到四號樓二樓平臺，8201 戰士和“百萬雄師”逼迫王力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王力再次代表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眾問好，說明到武漢來，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來向武漢地區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學習，是來當小學生的。解決武漢問題要靠武漢的革命派和武漢駐軍廣大指戰員共同努力。就要求回答“百萬雄師”是什麼組織，王力說：“‘百萬雄師’組織很大，是個什麼組織，我們還要看一看。”當問及“你們為什麼要為黑工總翻案”，王力說：“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壓制，那就是要翻案！”

8201 一位軍官拿起話筒說：“‘百萬雄師’的戰友們，現在讓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經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們已經決定了把王力交給 8201 部隊首長處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點以前重新表態，否則我們就造他的反！”命令兩個戰士將王力架進屋去。

在這個過程裏，鍾漢華抱頭坐在角落裏，捶著自己身子，叫“你們不能這樣幹哪，你們不能啊”！昏倒下去，軍人將他背走。在軍區其他領導指揮下，8199 張昭劍政委、趙奮副師長帶部隊與軍區警衛營、保衛科人員趕到，與群眾相持，保護王力，並控制了所有樓道、大門側門通道。警衛營、8199 偵察連、六連、四連戰士將百萬雄師群眾、8201 軍人與王力隔開。暴徒一次次向四號樓衝擊，謾罵解放軍戰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戰士用身體阻擋拳頭棍棒、長矛和衝鋒槍。警衛營營長欒慶祥用胸膛頂住衝鋒槍，卡住扣扳機的手喝道：“不准開槍，你要開槍，性質就變了”，保護了王力。

10 點後，除少數人仍在軍區圍攻王力外，大遊行開始。

有各種車輛 396 輛，其中消防車 27 輛，空軍軍車 15 輛，打 8201、8216 旗幟的車 83 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百萬雄師”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嘴銜匕首，軍人荷槍實彈、刺刀寒光逼人。軍人們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領章，拉開風紀扣，車頭架著輕重機槍，子彈帶搭拉在車上，就站在車門邊和坐在車頂上。車子開到湖北大學前，一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衝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一人。喇叭高叫“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三司有人貼出大字報“質問陳伯達”說陳是王力的後臺；甚至說“不管周 XX 資格有多老，職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馬”。支左辦公室門前守衛說“過去壓，壓得服，現在就不行了。我們解放軍的槍桿子是不好使喚的”，有人講“揪出謝富治的後臺”！一群眾對一個“百萬雄師”說“你們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說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來漢支持反革命”。一個軍人說“中央要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我們武漢海陸空三軍通過，就不成！”

軍區支左辦公室揭發^[1]：鍾是在總理指示以後才來的，來到以後沒有原則，沒有風格，向人家（指“百萬雄師”的人）磕頭下跪求饒。連“百萬雄師”的人都講“你簡直不象話”。

29師張昭劍政委回憶^[2]：武漢軍區葉明副政委命我帶29師一個連急速到東湖客舍，說公檢法有八、九個人闖進了

[1] 支左辦公室同志 1967 年 8 月在軍區會議上的揭發，輯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 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合編 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 1967 年 9 月。

[2] 當事人張昭劍時為陸軍 29 師政委，見張致楊先財、石仲泉的信(2002 年)。

東湖客舍，鬧著要見中央首長，要我去做勸阻工作，有何問題請到武漢軍區來談，不要在東湖客舍鬧，如果不聽，拉也要把這些人拉出來，並要軍區保衛部一個幹部隨我前往。當我們到東湖客舍門口時，警衛部隊問明瞭我們情況後，有人大喊，“啊，8199 部隊（29 師番號）進來了，不相信我們了！”這一下使我頓感事情難辦，但經耐心協商，還是允許我們進去共同作工作。可無論怎麼說，那幾個人就是要見中央首長論理，如果採取硬拉他們出來的手段，不僅辦不到，甚至有發生衝突的危險。最後他們終於答覆，今晚不去見中央首長了，就地休息。我請當時被派往東湖客舍的武漢軍區副秘書長王巽琪將情況電話報告葉明副政委。

待到 7 月 20 日拂曉，突然從外面洶湧衝進來一大群人，有的是從水面泅渡或乘木船、輪船進來的。把謝富治和陳再道司令員圍坐在院內的草坪上。隨即一群戰士衝進來，一陣槍托猛打陳再道司令員，我上前吼：“這是我們的陳司令員。”戰士們才知道把陳司令員當成王力誤打了。轉身看見王力剛從住室出來，立即把他架到汽車上，開赴武漢軍區大院，此時，鍾漢華政委從住室窗戶看到我在院裏，便要秘書曾江悄悄把我叫去，我向鍾政委講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建議他不要出去。鍾漢華政委便要我和他的秘書曾江，把廁所的門緊閉，將武漢軍區印製好的一大摺檢討在支左中犯了嚴重方向路線錯誤的佈告，放在澡盆裏全部燒掉。然後帶我一同進了陳再道司令員的住室，我向二位首長彙報了我帶 29 師部隊進來的情况，首長說將部隊留下待命。我便向跟我一起執行任務的 29 師秘書科長騰昭幹作了具體交代，要他把部隊管好，決不能與兄弟部隊鬧磨擦。隨後，二位首長爭著要去武漢軍區大院做解救王力的工作，最後

決定，陳再道司令員留下，鍾漢華政委回軍區大院，並要我隨同也趕回軍區大院陪同做工作。

在軍區大院葉明副政委反復指示我做設在大院內的“火線指揮部”頭頭的工作，要他們放了王力，有什麼問題與武漢軍區一起商談。但那些頭頭們個個滿腔義憤，以不向王力討回公道決不罷休的怒氣，怎能聽得進我的話。鍾漢華政委在軍區大院四號樓二樓會議室一直陪著王力，也叫我去一起做說服群眾的工作。大約中午已過的時間，軍區一位老首長也趕來了，他態度很堅決，口氣很硬，對在場的群眾說，“這樣搞怎麼行，反革命，給我抓起來。”當即引起群眾齊喊，“打倒XXX”的口號聲。不一會兒，這位老首長便離開了。此時葉明副政委指示，要我向那些揪鬥王力的頭頭傳達周總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談解決武漢問題。”其中一個頭頭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我一聽此話，內心大吃一驚。此前，鍾漢華政委心臟病突發，已抬到二號樓首長辦公室去了，我便到二號樓向鍾政委報告了揪鬥王力的頭頭給我講的這句話，並問鍾政委是否屬實，只見鍾政委躺在床上，淚流滿面的連聲口呼：“毛主席呀！毛主席呀！”我領會，這實際上就是鍾政委對我所問的回答（鍾政委的秘書沈瑛和軍區門診部姓平的保健醫生和姓曲的護士始終都在鍾政委身邊）。

大約下午三點鐘左右，孔慶德副司令員等與揪鬥王力的頭頭們達成了一個臨時協議：先要王力吃個飯，休息休息再說。趁此機會，孔副司令員即令我立即組織29師87團住在軍區大院的二個連和師偵察連及軍區警衛營駐軍區大院的連隊，從四號樓的二樓到軍區大院側門，手拉手排成

兩行人牆，中間留出空隙，掩護王力到大院側門上了吉普車，直奔 29 師師部。當王力一走後，葉明副政委立即指示我留在軍區大院堅守，並不時站到四號樓二樓陽臺“亮相”，以迷惑要揪鬥王力的群眾。我認真照辦了。

陳再道回憶^[1]：上午，主席叫我們把王力找回來，我因有傷，又考慮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東湖，鍾漢華同志趕到軍區大院，和葉明、孔慶德等軍區領導同志一起做“百萬雄師”和部隊的工作，要他們放掉王力，同時又不能講出毛主席在武漢，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

日記^[2]：謝富治要北航紅旗的井崗山同學給造反派組織打電話，囑咐大家保持冷靜沉著，不要向軍區衝擊，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萬雄師”發生衝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會妥善安排處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總部緊急傳達此精神，要求堅信黨中央，命令不得啟動已在 17 號封存的長矛、匕首。（按：井崗山現在回憶當日親自與一個個學校造反派打電話，逐個落實）

《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記者楊立功、高天堂、都元恒等人，也受到圍攻，強迫站在凳子上示眾，強令交出採訪“黑材料”。後有兩人被 8201 戰士和“百萬雄師”群眾帶走。

井崗山回憶^[3]：謝富治叫井崗山去百花一號楊成武處辦事，井崗山見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鄭維山等人正在議論事件，並談到從河南、湖北調動部隊來，某部乘火車，某部乘汽車什麼時候到達，某部乘飛機什麼時候到達何處。

[1] 見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2] 某高校當事人（1967 年）。

[3] 原北航學生井崗山回憶（2004 年 7 月）。

當時真以為 8201 部隊嘩變了。

軍區大院幹部回憶^[1]：當時，軍區大院一些幹部和戰士對於在軍區批鬥和混亂不堪也十分不滿，認為有問題談問題，不能抓人打人，戰士和群眾不能衝擊軍隊機關，要求軍區領導制止。有的“百萬雄師”群眾談及儘管不滿意四下傳播的王力講話與指示，但也不滿意軍人和群眾衝擊賓館抓人，在軍區批鬥中央來人。儘管在極度的狂熱中，有的人第二天就悄悄退場了。

軍區秘書科揭發^[2]：當時，機關大多數同志都十分氣憤，堅決反對這種反革命行為，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非常焦急。但是軍區常委都跑了，軍區大院失去了統一指揮，致使“7·20”事件一直持續了一天之久。

8201 部隊幹部揭發四^[3]：上午 11 時左右，師軍務科副科長熊兆明同志在軍區四號樓看見王力同志被鬥，情況非常緊急，熊急忙回師部找首長，途中碰見周（忠），熊將此情況告訴了周，周就和熊到了軍區四號樓三層樓上向下看見了王力同志，熊對周說：情況十分危急，必須馬上採取措施。周說：沒關係，死不了的。

毛澤東的警衛隊長回憶^[4]：他們這麼一鬧，可把我們緊張壞了。在北京雖然也見過許多遊行的群眾在中南海門前

[1] “7.20”後對軍區幹部和“百萬雄師”群眾的調查。

[2] 輯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 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分編 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 1967 年 9 月。

[3] “反革命分子牛懷龍、蔡炳臣的忠實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動言行”，輯於《七月風暴》（增刊之二）鋼二司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1967 年 9 月。

[4]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P6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年。

或示威，或靜坐，有的甚至不聽勸阻衝進中南海講道理的。那些人，不是學生，也是手無寸鐵的工人、市民群眾，但從來也沒有見過解放軍戰士也上街鬧事，而且荷槍實彈，全副武裝。更為可慮的是，這群荷槍實彈的戰士和群眾處在一種心態失衡的非常狀況之下，在行動上沒有了指揮，他們誰的話也不相信，也聽不進去。……

我把僅能組織起來的數十名警衛戰士進行戰鬥部署，重新編組，實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隨時準備投入戰鬥，決心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的安全。

武漢公安局金文駿科長（負責賓館保衛工作）回憶^[1]：當晚我不值班，從夢中被人叫起，“百萬雄師”已經衝進賓館，甚至就在接近主席住的梅嶺的路上喧嘩，要毛主席接見。不久，我被叫到毛主席住處，主席親自問明事態。匆忙中我當時還穿著短褲頭……

“百萬雄師”的章迪傑記述^[2]：“20號，總站再派謝敏華，到武漢軍區找楊道安、孫德洲、余均才，成立‘專揪王力指揮部’。謝敏華到軍區後，見到省直聯司的楊以才、武昌分站的劉喜春，以及其他分站的一些人，便成立了揪王力火線指揮部。指揮部設在鐵路大樓的七樓。並決定謝敏華任指揮長，楊以才任副指揮長，俞桂芳任秘書。指揮部成立以後，組織了黃石、沙市、宜昌等地來漢人員約20人找武漢軍區的孔慶德、葉明等領導，瞭解王力的四點指示。孔慶德接見了謝敏華等人，在軍區5號樓會議室，孔慶德說：‘中央首長已到武漢，希望你們派代表’。謝敏華問：‘派多

[1] 作家馬社香採訪，2007年。

[2] 章迪傑，時為“百萬雄師”常委、聯絡部長，見其撰《瘋狂歲月》（稿），P46，2004年。

少人’？孔答‘100人，中央領導和你們同乘一架飛機到北京談判’。謝又問：‘何時走？’孔答：‘今天晚上就走……’話音剛落，會議就被衝了……”

綜合情況：

毛澤東得知消息，讓汪東興傳達指示叫軍區放人，並負責把挾持走的王力找回來。

有心人統計，是日“百萬雄師”共出動車輛482輛；消防車拉響警報，淒厲的警報聲響徹三鎮上空。

上午，“百萬雄師”的“園藝軍”頭頭雷榮華從軍區大院回到東湖的集結地，說：“總說‘百萬雄師’沒有‘造勁’，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以8201部隊名義印製散發的《特急呼籲》宣稱：“黑工總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縱的組織。我們要踏平工總，為民除害。百萬雄師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蕩蕩的、硬邦邦的、響噹噹的革命左派組織……誰敢妄動‘百萬雄師’一根毫毛，我們將毫不留情地殺他個片甲不留。”《呼籲》頂頭是毛澤東語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百萬雄師”發出“緊急聲明”：“我百萬雄師全體戰士堅決與8201全體指戰員同生死、共存亡。我百萬雄師對黑工總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須鎮壓。‘三新’‘二司’大小知識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廣大工農兵來鑒別決定，不能由‘欽差大臣’來封。我們已經作好犧牲一切的準備，不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死不瞑目。”

事後，8201被調出武漢整訓，武漢軍區調查落實參加“7·20”事件的幹部戰士共計二千餘人，當時8201全師共有官兵九千餘人，在武漢有師直和4個團。

7月20日（二）

周恩來與文革小組碰頭商議，到林彪處開會。

下午飛赴武漢，與毛澤東商議轉飛上海，並指揮安排轉移、飛行等安全事宜。

15點左右，8199部隊偵察連、六連、四連設法將王力轉移出軍區，進入8199駐地。

半夜，空15軍“上甘嶺特功八連”緊急調至武昌護衛毛澤東到漢口王家墩機場。

戚本禹回憶^[1]：7月20日清晨，我還在睡覺，被王廣宇叫醒，說武漢出事了，最先情況可能是北京學生知道的。我馬上起來，召集小組開會。江青決定給林彪彙報，找總理來。大家聚齊開會，已是九點多。當時北京街頭已經有一些大字報消息。會上主要談主席的安全問題，要主席離開武漢。決定派東海艦隊軍艦行動，空軍做準備；林彪同意，總理去佈置落實的。

[1] 戚本禹，當時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2007年3月。

參考一^[1]：下午，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後來還有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商議，林、江寫信給毛，要毛轉移。周總理立即趕回武漢，勸毛轉移。林彪定調“7·20”是反革命暴亂。

得知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林彪給毛澤東寫信，信由陳伯達、戚本禹、關鋒等修改後，江青也簽了名，林、江署名的信由邱會作親自帶著飛抵武漢，交毛澤東“親啟”，信中稱武漢形勢不好，毛的安全受到威脅，應及早轉移。毛即決定馬上離開武漢去上海。

邱會作回憶^[2]：汪東興他們要求毛離開武漢，毛不同意。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周恩來知道後，從北京勸毛馬上離開武漢。在北京的江青哭哭啼啼來找葉群，說：“反革命分子已經快衝到主席住處，高喊‘抓住那個胖子！打死那個胖子’！他們喊的那個胖子就是主席……”江青要死要活求林彪、葉群親自去武漢保證毛的安全。總理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提議林出面給主席寫封信，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會議決定空15軍派部隊趕赴現場。

葉群開會回來告訴林：“陳再道只會打仗，腦子簡單，在武漢支持保守派，助長了保守派氣焰，你趕快給主席寫一封信，勸他離開武漢，不然，很快就會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葉群還說，“謝富治、王力這些中央文革的傢伙到處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是他們自找的麻煩，主席的安全保證不了，會賴到軍隊頭上來……總理和鄧大姐決定都親自去武漢。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麼辦？”林彪說：“鬧

[1] 參閱《楊成武將軍自述》，P284。

[2] 該回憶由多次採訪時任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的軍史研究者劉家駒記錄整理。

這麼大的亂子，我就不去，也沒有本事處理。總理心臟不好，勸總理也不要。江青自己為什麼不能去？”葉群答：“現在群眾恨死中央文革了，她要去了，群眾照樣揍她。”林彪說：“你立即告訴吳法憲、余立金，要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絕對保證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接著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和總理磋商，立即寫了一封短信，勸毛速離武漢，並派我帶上信立即乘飛機去了武漢。

我到武漢，當時，東湖賓館被造反派（按：指造反的“百萬雄師”）圍堵住了。陳再道親自指揮部隊勸阻群眾。余立金、劉豐和當時 15 軍參謀長蕭前（按：邱的記憶出錯，蕭係武空政委）等具體負責部隊指揮。群眾確實不知道主席在那裏。周總理為了引開群眾注意力，把陳再道找來反復做工作（聽說前天總理做工作，陳和總理爭吵，陳還拍了桌子）。趁此機會，蕭前挑選幾個非常機敏、非常熟悉地形的司機（按：係武漢空司的司機），讓他們駕車先行開路，余立金等護送著毛澤東從賓館庭院的小後門出來，穿過小街小巷，安全把毛護送到漢口王家墩機場的專列上。我去送信時，是（21 日）早上八時，毛正在洗漱。我把林的關心告訴了主席就離開了。10 時，毛上了飛機，我又上機去看毛，機上有楊成武、余立金，和他們說了幾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我一下飛機，飛機就起飛了。

邱會作記述：（他到了大會堂）葉群說：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說：“軍區獨立師警衛不力，二十號凌晨反革命分子已經衝進來了，快衝到主席住處。”總理召開緊急會議，提議林出面給主席寫封信，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會議決定空 15 軍做好戰鬥準備。上午總理來和林總商量決定，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總理已經又回武漢了。

過了一會葉群帶我去見林總。林總說，你到武漢去一趟很好。我先說一下你的任務：一、向主席報告全國的形勢；二、建議主席轉移一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黨的安全”，你就說這句話是我說的；三、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陳再道又不聽指揮，圍困了主席，就設法告訴總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著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說，如你無法和總理靠攏就在王家墩機場建立指揮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聯繫。武漢附近的二十九師和空降軍已經做了戰鬥準備。林彪說：“你要告訴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要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絕對保證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臨走時，葉群交給我一個牛皮紙大信封，叮囑我帶好。

當天晚六時左右，我帶著秘書吳瑞雲、警衛員蔣平安從總後出發，路過“三〇一”醫院時帶上了外科主任陸維善和一個有工作經驗的護士，到了西郊機場，吳法憲還為我們派了空軍門診部主任和兩名護士，我們乘伊爾—18專機夜航，於二十日晚十一時左右達到了王家墩機場。我到了之後，來接我們到場部的竟是一輛帆布篷有多處彈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總理打通了電話，總理高興地說：“好！你在機場待命，過一會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間的沙發上抽煙待命。大約二十一日的凌晨三點多點鐘，楊成武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我聽到楊成武的話後，估計主席已經安全轉移出來了，我心裏也很高興！我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車，開向主席在機場的專列。毛主席在火車上召見了我。主席見到我時，心情還平靜，他同以前一樣，首先就說：“‘興國佬’來了。你那個總後勤部的人現在聽你的話嗎？文革是個好

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去表演的。”接著，我把林總的信，把林總要我轉告主席的關心話向主席做了簡要彙報。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聽我說。待我說完之後，主席說：“我要先睡一會覺了，待一會給他們寫幾個字。”我即回到機場宿舍休息去了。

天剛濛濛亮，汪東興又來了，說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專列，他正在洗漱。

主席見到我就說：“太疲勞了，又睡不著，我也沒有寫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說，我完全同意他對全國形勢的看法。有一點他沒有提到的就是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談完話，楊成武來到主席房間，記得他們在商量去主席那裏，正在給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給主席敬了禮，回到機場住處。這時，我即向林辦彙報了情況，並給吳法憲打了一個電話。

謝靜宜回憶^[1]：聽到當時緊急情況，主席一再表示：我不相信他們是衝我來的。

參考二^[2]：當日下午，“江青來到人民大會堂，十萬火急地要見林彪……在江青之後，陳伯達、康生、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也陸續到了林彪住的大會堂浙江廳，最後，總理也來了。……大約一小時左右，會議散了。葉群來到秘書值班室……作應急式的佈置。”“……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總理決定親自去武漢，保護主席趕快向上海轉移。中央文革決定，要藉這次武漢事件大作一下

[1] 謝靜宜，當時為毛澤東身邊機要人員；由清華大學吳焯煜教授多次專門採訪（2008、2009年）。

[2] 林彪秘書張雲生，《毛家灣紀實》；另參閱《“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公司，2003。但張秘書據他所聞後來給研究者何蜀表示，並不贊同所謂林彪當時曾給武漢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說法。

文章，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文化大革命，把當前這種反動逆流打下去。”周恩來于三時五十四分起飛離開北京。

吳法憲回憶^[1]：周恩來當時在北京也很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他決定再一次去武漢。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飛機專門送他去武漢。……在飛往武漢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劉豐的電話，說有幾十輛汽車衝進了周恩來的飛機預定降落的王家墩機場。這突如其來的情況讓我緊張起來，為了保證周恩來的安全，我要飛機臨時改為降落在離武漢大約 60 公里的山坡機場。山坡機場的條件遠不如王家墩機場，在那裏降落有一定的風險，但我當時別無辦法。

參考調查^[2]：14 點左右，有百餘 8201 戰士和“百萬雄師”卡車衝擊王家墩機場，來人帶著武器，大叫“我們要見周總理！要向周總理告狀”！直衝塔臺，機場空軍同志講“總理不在這裏”。一個 8201 的人說：“我們知道，周總理下午要來，中央文革來電說，三點鐘從北京起飛。”駐軍問“我們沒有接到總理要來的預報”“誰要你們來的”，回答是“我們蔡政委要我們來的，政委還在電話旁邊等我們的情況呢”！機場空軍立即向空軍司令部與劉豐報告，轉告北京，通知總理的飛機轉場降落。又出來做群眾的工作，指出“衝擊軍用機場是錯誤的，要防止被階級敵人利用。你們應該立即撤出去”。到 17 點，人群方撤走。（當時總理專機已改落山坡機場）

粟裕根據揭發傳達^[3]：周總理親自帶兩架飛機（一架周

[1] 《吳法憲回憶錄》，P687，北星出版社，2006 年。

[2]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出版，1967 年 8 月。

[3] 1967 年 7 月 27 日粟裕在中央軍委傳達的原話。

總理坐，另一架準備接謝、王等人）周總理秘密通知軍區，別人是不知道的。但在周總理專機離武漢 100 公里時，陳再道派了 25 輛汽車，載著“百萬雄師”的人和戰士，親自到了機場，當時空軍發現情況不對，馬上給總理拍電報，改降在另一機場，另一架空機降在原機場。陳再道一看沒有總理，他說要“歡迎”，實是想扣留總理。陳的秘書說，陳再道得知周總理要來武漢，就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陳再道真是囂張之極。

總理衛士高振普回憶^[1]：（起飛約 40 多分鐘，約在信陽空境）機長報告武漢市已經貼出歡迎標語，而王家墩機場跑道停有滿載“紅衛兵”的卡車，無法著陸，只好改降備用的山坡機場。到達山坡後，周首先要通劉豐電話問訊情況，劉後從王家墩趕來，商量進城辦法；後飛還王家墩，天黑後由空司作戰科長帶路進城。

邱會作的警衛員回憶^[2]：我當年僅有 22 歲。7 月 20 號那天下午，我在大會堂跟隨首長等候，只見邱會作部長很興奮地把一封信捧在胸前，出了新疆廳。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只是在晚飯以後，隨首長一起登機，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飛機，同機還有 301 的陸維善主任和一個護士，乘客就我們四人。記得那天晚上月亮好圓好亮，我一直在窗邊欣賞美景；很晚才到了武漢，我也不知道是到了武漢、武漢發生了什麼。空軍的小車把我們帶到機場招待所，車棚都被匕首劃破了。大概在天亮之時，楊成武來到，徑直走進首長房間，他們談了半個多鐘頭，一起出來。過來一輛

[1] 衛士高振普回憶，見《苦撐危局》，325-327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

[2] 蔣平安，當年為邱會作警衛員，退伍後在鄭州工作，2008 年 4 月訪問。

伏爾加小車，把我們一起帶到機場專列邊，他們上了專列，我在車下見一些男女軍人好像剛剛起來，下車在活動身體。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看見我在車下，還叫我上車去和他們一起吃了早餐。後來只見首長很高興地出來，我們一起到了機場跑道邊，只見一批 8341 部隊的指戰員，手提像小提琴盒子一樣的槍盒，很高興地（輕鬆地）魚貫登機。大約九點鐘左右，毛主席在楊總長陪同下來到飛機旁，向大家問候，也很快登上飛機。不久，飛機就起飛了。中飯以後，首長與“東湖首長”接通電話，我們又乘飛機回京。第二天，我隨邱會作在西郊機場迎接了從武漢回來的總理，以及謝富治、王力。

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我看到的“武漢事件”的一角，所謂“東湖首長”就是周總理。

張根成回憶^[1]：下午，賓館仍被幾萬人圍住，謝、余打電話給陳再道，說“如果你們再這樣搞，你要負完全責任”！陳的秘書就打電話給“百萬雄師”說：“現在你們該撤了。”結果“百萬雄師”就撤了。為防萬一再來衝擊，百花院的有關人員全部集結百花一號樓，警衛人員將一些沙發和桌子堵塞了一些通道，佈置了三道防線；幹部、戰士通宵警戒。黃昏，一吉普車進來，走下來一個戴黑眼鏡穿軍裝的人，走近才看出是周恩來總理，周與楊、謝、汪、余商量後，穿過走廊就去主席處。半夜後，總理從主席處回來，吃過飯躺下睡了。不久周起來，問張那裏有安靜點的電話可以用，張答在樓下有電話，帶周找到電話。周接通孔慶德，問“到了沒有”，孔回答“早就到了”，周生氣的說：“我跟你交代

[1] 原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人員張根成回憶（2004年6月、10月）。

什麼啊！為什麼不告訴我！我這個人這時到這裏幹什麼來了！”孔在作解釋，與周彙報軍區安排。周說“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電話，一拍手說“到了就好了，睡覺”！（按：指毛澤東安全抵達漢口機場，可以休息了）

總理從主席處回來，帶過來（梅嶺）約一個排的 8341 指戰員，我明白毛主席已經走了。

參考三^[1]：當日：周恩來就由京重返武漢，他一到武漢就叫孔慶德副司令和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找回王力，未找到。第二天，周恩來又叫陳再道去找王力，也未尋著。王力究竟到哪裏去了呢？原來，7月20日下午，軍區領導葉明擔心從群眾手中勸放回來的王力再次被抓走，不好交差，就叫 29 師政委張昭劍將王力帶走。

目擊者回憶^[2]：“百萬雄師”寫出標語：“王力、謝富治從武漢滾出去”，“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甚至有人提出“揪出謝富治的黑後臺周恩來”，“中央文革也會犯錯誤”，“說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來漢支持反革命”。

“百萬雄師”拋出大字報“王力究竟是人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之一，是反革命綱領‘二月彙報提綱’的起草人，是推行蘇修教育路線的舊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以前是劉少奇重用的紅人，是孟夫唐的學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後，搖身一變以極左的面貌出現。他在哪兒插手，哪兒就出現武鬥。”

[1] 王志民，《武漢 720 事件真相》（網文）。

[2] 當事人和目擊者（1967年7月），載調查資料《武漢事件》。

在武漢三鎮震耳欲聾的消防車警報聲和“‘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口號聲下，部分遊行的“百萬雄師”圍攻和衝擊武鋼、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一附中，掃蕩和抓捕留守的造反派學生、教師。在遊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馬路和單位裏的群眾，一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怒氣衝衝的“百萬雄師”毒打，怕事的人紛紛躲避。

對武鋼的圍攻于凌晨2時開始，由百餘輛卡車、十多輛消防車，包圍了33街坊的新一冶、業餘大學、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闖進工人宿舍和造反派辦公室，見人就捆，抓捕100多人。

目擊者敘述^[1]：我戴上一個“紅衛兵”袖章混進軍區大院，門口站崗的衛兵和“百萬雄師”也不管了，院裏人山人海，亂成一團。但混進去的造反派一旦被認出，就會拖出去痛打。在三號樓下，我見到王力站在陽臺上，只穿件白汗衫，被軍人和“百萬雄師”擁著批鬥。他說武漢的問題要相信武漢的革命群眾來解決，沒有回答“百萬雄師”質問的“四條指示”，只說“百萬雄師”是一個很大的組織。

一些謠言迅速散佈全武漢：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發現：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紅衛兵；三、上海的一月風暴；四、百萬雄師。

毛主席對百萬雄師的批示：“大、好、純，要愛護它。”

中央文革來電：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關於武漢問題的表態，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將派周總理和

[1] 李文元，時為筆者同學（1967年7月20日下午）。

陳伯達同志來武漢解決問題；三、謝副總理和王力是來武漢瞭解情況的，不是來處理武漢問題的。

中央軍委來電：一、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二、為了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萬雄師好，陳再道好。

章迪傑訪談^[1]：“百萬雄師”的標語口號都是政參部蔡俊善等人草擬的，由各個基層組織照此去刷標語。編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軍委來電的是武漢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幹部。當時“6·26”中央文革、中央軍委來電指責“百萬雄師”對若干院校的圍攻，編造（來電）的目的是為了穩定軍心。

幹部訪談^[2]：省直機關的保守組織發表聲明公開參加遊行，但也有不少思想保守的中層幹部，對“百萬雄師”和部隊的暴烈造反行動表示猶疑，擔心這樣是炮打中共中央，沒有上街歡呼與贊同。省報一記者，儘管贊成“百萬雄師”口號，起先參加街頭遊行，但也認為有問題通過組織解決，不要群眾上街為好，王力有問題也不是你群眾說打倒就打倒的。

調查資料^[3]：下午，8199 將王力轉移到小洪山，“百萬雄師”與 8201 戰士先後用 30 多輛車衝擊 8199 部隊的師部（從付家坡上洪山），逼迫師機關同志交出王力。張等帶王力到山上隱蔽。在山裏周旋了一夜。山下正廣播 8201 的特急呼籲，

[1] 章迪傑，時為“百萬雄師”常委，聯絡部長；《“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榮根（2007年）。

[2] 省直機關當事人章某（1967年、2004年10月採訪）。

[3]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紅水院宣傳部編輯印行，1967年8月。

王力聽了說：“這是反革命宣言書。這回獨立師可真是獨立了，向毛主席獨立，向解放軍獨立！”

周總理的隨身醫生^[1]：毛主席可能有危險，不然怎麼叫周總理親自去武漢還帶了部隊！周恩來再次趕飛武漢是為毛澤東解圍，救出王力和謝富治。專機在王家墩低空盤旋時，“見到機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見機長走到周恩來身邊說了些什麼，飛機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飛去”（按：回憶有渲染出入，據專機師人言，在信陽得到北京調度，此機就未去漢口盤旋）。五點到山坡機場。是日專機再從山坡機場飛回王家墩機場，天黑以後，“周恩來換上便服，戴上墨鏡”，留下兩個中隊的中央警衛團戰士，輕車簡從趕赴東湖賓館。

7333 部隊回憶^[2]：20日下午，部隊同志在山坡機場接到武漢空司電話“中央首長來了”，5點多周總理走下飛機。第一句話就問“你們這兒有電話嗎”，隨後說“中央很關心武漢情況，要去武漢瞭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在候機室，周電話詢問軍區和賓館：“謝副總理、王力在那裏？他們現在安全怎樣了？”

專機師回憶記載^[3]：下午4點，專機師100團李（克修）副大隊長聽外面連聲音大喊：“李副大隊長！有緊急任務，馬上起飛！”“航行資料包已經給你直接送到飛機上了，請你直接上機場！要求30分鐘以內起飛。”

[1]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空軍7333部隊幹部回憶（1967年8月），載《武漢鋼二司》報。

[3] 木辛《“720事件”專機組》回憶稿，該作者潘庭梓1971年曾系專機師256號機潘景寅的副駕駛員，此段是他後來採訪專機師在“720”時有關親歷人員的撰寫，文中涉及事實和有個別出入地方，筆者于2006年採訪作者並交換意見。參考李克菲、彭東海，《絕密飛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

他直奔北京西郊機場，等他趕到飛機停機坪時，發現有 5 輛解放牌軍用卡車停在飛機旁邊，車後面用綠色帆布封閉得嚴嚴實實。到此，李副大隊長還不知道執行什麼任務，飛到什麼地方，只見地勤工作人員風風火火地正在向飛機跑去。機艙門剛打開，就見卡車後面的帆布掀開一角，一個個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從車上跳下，在 1 名指揮官的帶領下，秩序井然地迅速登上飛機。此刻，李副大隊長發現，自己的直接領導、100 團王（進忠）團長也帶領 1 個機組同時趕到機場。經瞭解才知道，上級要求專機師派出 2 架伊爾—18 飛機，帶上 200 名全副武裝的 8341 部隊指戰員（按：周總理帶了兩個中隊 8341 戰士），在最短的時間內飛向武漢。

與此同時，周恩來總理從（按：東郊）首都機場乘坐民航的飛機（按：張瑞藹為機長）直飛武漢。看來，武漢的形勢已經發展到十萬火急的程度，否則，不到萬不得已，周恩來絕不會親自帶著中央警衛團的武裝人員奔赴現場。

王團長、李副大隊長的 2 架飛機在山坡機場落地之後，看到周恩來總理已經在停機坪等候。周恩來朝他們點點頭，算是打了招呼，然後示意大家圍在他的身邊。他沒有像平時那樣與大家握手問候，臉上也沒有笑容，氣氛顯得有些緊張，看到全副武裝的戰士，眾人都意識到武漢發生了重大事件。

“你們就在飛機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隨時準備起飛！”周恩來說完話轉身要離去，又回頭補充道：“已經通知，晚飯送到飛機上來。”

周恩來先是乘車，後又改乘船，來到武漢東湖賓館毛澤東下榻的地方，隨後機組接到命令，3 架伊爾—18 飛機

立即飛至王家墩機場。……

空軍政委的秘書向機組傳達命令：“機組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就在機場招待所和衣而眠，迷糊了一覺。21日凌晨4點，隨著房門“吱呀”一聲，命令下達：“準備馬上起飛！”僅用20分鐘的時間，專機師的3架飛機就準備就緒，待命起飛。

這時，一個人快步流星走到王團長（機長）身邊，原來是潘景寅（副團長，機長）。他上氣不接下氣地激動地說：“主……主席……毛主席來了！”

王團長愣愣地在那裏，什麼話也沒有說，

同機組所有人員一樣，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了。

其實，毛澤東在夜裏2點鐘的時候就已經從東湖賓館梅嶺1號秘密轉移到王家墩機場。不僅機場工作人員對這件事一無所知，更是出乎機組的意料之外。

……余立金來到機場，徑直登上王團長駕駛的那架飛機，當發現飛機上全是座位沒有包間也沒有床位的時候又急忙離開這架飛機，朝著副團長潘景寅駕駛的232號飛機跑去。

此刻，毛澤東乘坐的小車來到機場，正在待命的潘景寅看到之後手足無措，忙不迭地跑到王團長身邊報告，然後，回到自己駕駛的232號飛機上，緊接著毛澤東登上了232號飛機。

（按：由於臨時確定232號執行任務，副團長潘景寅任機長，王進忠團長任專機副機長）

專機師回憶輯錄^[1]：當日載滿 8341 戰士的專機在山坡機場降落後，周恩來命令“你們就在飛機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隨時準備起飛”；“晚飯已經通知送到飛機上來”。

為了穩妥起見，周恩來總理從山坡機場到漢口的短短路途中，幾易車船。先坐汽車，後轉換小船，由長江進入漢江，然後上岸，又換乘汽車，神不知鬼不覺到了東湖賓館……（天黑後，專機起飛在王家墩著陸，見從雲南飛回的潘景寅的專機）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書到了機場，秘書向我們傳達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姚克強^[2]：我當時是總理的聯絡員。7月，大批武漢學生進京反映情況，總理動員上訪學生回漢鬧革命，成立個聯絡組專門負責有關事宜，我是其成員之一，總理再派來一人，我們一起到武漢學生中作工作，當時地質學院住的同學比較集中。14日專門開了大會，王道明和我都講了話（按：王道明，65年全軍的刺殺標兵、學毛著積極分子，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支部書記，當晚他在地質學院會上講明中央已經派人去武漢，馬上就在當地解決問題，動員群眾回原地參加運動）。我是19日回到武漢的，當晚就發生了事件，氣氛很緊張，他們到記者站住處抓人；20日，我去到你們水院，水院學生把我保護到你們土力學馮××老師家裏（隱蔽），他愛人馮××負責照護我；後來接上電話，我向北京緊急彙報了武漢發生的情況。事件之後，我在武漢工作了一段時間。總理陪阿爾巴尼亞客人來，我始終跟著總理，

[1] 李克菲 彭東海，《絕密飛行》輯錄專機機長王進忠回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 海軍北海艦隊幹部，時為中央文革記者站駐漢記者，總理聯絡員（2010年9月）。

在測繪學院的大會我參加了，總理作造反派群眾頭頭工作，促進大聯合，在東湖公園的長天樓國宴後，總理和頭頭們談話到深夜。總理和阿爾巴尼亞客人走後，我留下來繼續做大聯合、籌備革命委員會的工作，1968年，到省市革委會成立後，我才結束武漢的工作，回到了北京。

8201 部隊幹部揭發五^[1]：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時左右，徐福興同志前往軍區瞭解情況時，聽到部隊和“百萬雄師”呼喊“周恩來來武漢，王力靠邊站”，“我們要見周總理”等口號，分析有再次衝擊客舍的可能，徐福興即回師部將情況報告給蔡炳臣，說明了再次衝擊的嚴重性，並要求採取措施。蔡答應：“給百萬雄師打個電話，叫他們不要再衝東湖。”徐說行，徐繼續補充說：“你還要給公檢法軍管會打電話，要他們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衝。”蔡也說“可以”。並假惺惺地說：“回去走還要提高警惕，不要認為打了電話就不去了。”徐見牛懷龍，牛小聲告訴徐，“今天晚上‘百萬雄師漢陽聯絡站’要衝東湖”，沒有作指示。徐回到東湖，即同秦堂春同志交換了意見，研究了警衛佈置，並同秦一起找衛兵丁隊長報告了“百萬雄師”要衝東湖的情況，建議首長轉移。

二十日晚十時許，周總理到。徐福興同志向牛報告：“總理到”，牛說“我去”。徐十時許問牛為什麼沒有來？牛答“不舒服，等一會就去”。下兩點（即二十一日二時）又問牛怎麼沒有來？牛說“有事，等一會就到”。以後根本就沒有去東湖。

[1] 載《七月風暴》，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聯合編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

8201 部隊指戰員揭發六^[1]：從二十日零時三十分左右起，“百萬雄師”、“武漢公安”和一些部隊人員先後衝擊了中央首長住地。在中央首長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緊急關頭，我師執行警衛人員曾陸續多次向牛蔡報告過衝擊情況，而牛蔡無動於衷，不向軍區報告，也不積極設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時許，牛才到現場。牛到時，暴徒們正在圍攻謝副總理和王力同志，並不採取果斷措施營救中央首長，只向執行警衛的人員說，“我們的宣傳車和部隊馬上就到”。不到十分鐘果然到了。到後，便夥同其他部隊和“百萬雄師”、“武漢公安”的人員去圍攻、綁架王力同志。當一些暴徒將王力同志綁架上車時，我師警衛人員竭力營救，而牛卻說：“讓王力上車吧，上了車還好些！”這時警衛人員向牛說：“王力同志被綁架走了怎麼辦？”牛回答說“我自有安排”，就這樣，王力同志被一群暴徒綁架到了武漢軍區大院，可見，綁架王力同志是陳、鍾、牛、蔡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已安排好的。

“百萬雄師”批鬥和錄音者回憶^[2]：20日上午九時左右，王力被漢陽“百萬雄師”的同志們關照在三樓會議室，大樓內外保衛森嚴。我印象是王力40多歲，中等身材，體形白胖……這就是“四人幫”的爪牙，反黨亂軍的頭目，武漢造反派的親人……

軍區大院內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號喊聲震天，此

[1] 1967年7月底，載《七月風暴》，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聯合編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2] “百萬雄師”當事人汪洋，《波瀾歲月》，P126，2002年內部印刷傳閱；該回憶文字撰於2001年10月16日。

起彼伏……根據當時軍民的要求，由“百萬雄師”的劉敬勝同志陪同王力，並保護他到四樓樓梯邊的房間陽臺上示眾！……王力面對憤怒的軍民表態說：“武漢‘百萬雄師’是龐大的群眾組織，湖北武漢的問題沒有‘百萬雄師’參加是辦不成的。武漢軍區有錯誤、有缺點需要改進”等等……。這間房子裏擺著乒乓球臺，錄音機就放在上面不停地轉動著，記錄下了這一段真實的歷史。

……

1967年7月20日，迄今已34年過去了，歲月沖淡不了這一偉大的革命壯舉。回憶武漢工人階級……敢與“四人幫”一夥作殊死鬥爭的偉大革命精神，將記入黨史和武漢工運史冊，“百萬雄師”的功勳業跡，永放光芒。

調查資料^[1]：當晚，抓革命促生產委員會副主任紀輝召集會議，擬出一個行動綱領：一、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不能出面，他們不方便。“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他們不能怎麼樣。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必須保證每天有20萬以上的人上街遊行，迫使中央不能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跑出武漢。三、全面奪省市黨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晚上，百萬雄師、“公檢法”、8201、三司兩次衝進8199部隊，脅迫交出王力，並要求搜查。

[1] 《武漢事件》。

事件調查彙報^[1]：《百萬雄師》還成立了“專揪王力指揮部”，我把他們的計劃念給大家聽聽（大意）：“專揪王力指揮部計劃：

一、派代表去軍區談判，其內容：1、王力留在武漢解決問題，未解決問題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誰交誰負責，工總不能翻案；2、王力的安全由武漢軍區負責；3、不上北京，在武漢解決問題，要中央首長來武漢。

二、各交通要道，如飛機、輪船、火車……嚴加控制，以免王力開溜。

三、組織批鬥王力指揮部。

四、發出通電：為什麼要揪王力告全國人民書。

五、通告各革命組織暫不派隊伍來軍區，關於鬥王力的問題，均由專揪王力指揮部負責……。”

一共七點，這是手稿。

總指揮名額分配：“百萬雄師”五人，“公檢法”一人，“紅旗聯委”一人，省直聯司一人，……。

“百萬雄師”頭頭與骨幹分子訪談^[2]：

章迪傑：“四點指示”是從部隊傳出來的，“百萬雄師”的各個分站都是軍代表傳達的。而且都說是王力講的。

王少榮：上街武裝遊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錯誤路線。因為“百萬雄師”當時在黨內、黨外都是大多數，承擔著“抓革命，促生產”的重擔，中央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大轉彎，“（7·20）”這麼做既是反彈，也是叛逆。當時如果知道（“四點指示”）是毛主席說的，“百萬雄師”是會絕對服從的。

[1] “公安聯司”調查審訊彙報，載《七月風暴》第4卷，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編印，1967年10月28日。

[2] 《“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榮根（2007年）。

沈邦安：我認為當時中央的表態（指“四點指示”）是錯誤的。

親歷者曾慶裕回憶^[1]：我參加了“百萬雄師”“七·二〇”奪權會議。到會單位有“省直聯司”“革聯”、市人委“聯合指揮部”、“武漢公安”、“農業聯合籌備處”等……經討論，認為尚未大聯合，條件不成熟，不能奪權。後又討論發表告人民書，草稿出來後，各單位討論不同意，又準備改為呼籲書。

當晚，陳再道仍住在東湖賓館的南山乙所。鍾漢華從軍區大院出來後，到街對過駐何家壟的部隊機關休息。

[1] 曾慶裕，當年市直群眾組織“革聯”駐“百萬雄師”聯絡員，此為1967年在批判會上的發言，載“市直紅司”編《“百萬雄師”內幕》，67年9月6日。

7月21日

周恩來安排，凌晨，毛澤東在武漢空軍護送下到達漢口王家墩機場；上午，在楊成武、余立金一行護送下離漢飛滬。毛澤東一度很氣憤，在上海說陳是個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認為這是反革命兵諫，自己住到賊窩去了。

吳法憲回憶^[1]：我深知這次飛行任務非同小可。為了保證毛澤東的絕對安全，我立即命令空軍34師對飛機進行仔細檢查，並進行試飛，待確保一切正常以後，我才在7月20日晚上9點多鐘批准飛機從北京起飛，降落在武漢的王家墩機場。

在武漢那邊，負責送毛澤東等人到機場的是劉豐。7月21日凌晨一點多鐘，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劉豐找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用一輛吉普車把毛澤東和汪東興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機場。與此同時，楊成武和李作鵬則走另外一條小路，差不多同時也到達了機場。凌晨兩點，毛澤東等人

[1] 《吳法憲回憶錄》，P699，北星出版社，2006年。

乘坐的飛機從王家墩機場起飛（按：作為空軍總指揮的吳司令記錯了，232號專機是次日上午飛上海的）。當時，我一直在指揮所裏坐鎮指揮，直到毛澤東等人乘坐的專機在上海虹橋機場安全落地，我才鬆了一口氣，離開指揮所。

8341 警衛隊長回憶^[1]：實際已是7月21日凌晨2時許，毛主席的轉移開始了。毛主席乘坐一輛普通的軍用吉普車，我們隨行的警衛部隊乘坐兩輛大卡車，從東湖賓館出發。……

……周恩來總理已將專機從山坡機場調來，停在王家墩機場等候了。

毛主席登上了一架飛機，我帶20餘人和毛主席乘坐同一架飛機，其餘人登上了另一架飛機，當夜直飛上海。（按：記憶有錯，可能受楊成武口述的影響；起飛是次日上午）

飛機飛離地面之後，就增加了幾分安全感，我那懸著的心也才落了下來。多日來提心吊膽、寢食不安的我們總算有了幾分平靜，一時顯得十分疲憊。

楊成武回憶^[2]：毛澤東對當時的局勢作了異常嚴重的估計，認為已進了“賊窩子”，右派正在進行反撲，現在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

專機師駕駛員王進忠回憶^[3]：凌晨4點，（飛行員）房門被人推開……“準備馬上起飛”，一聲令下，僅用了二十來

[1] 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P64-6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P230，1987年秋採訪楊記錄；明鏡出版社，2003年。

[3] 《絕密飛行》輯錄當時專機師100團團長、駕駛員王進忠回憶，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4年。另據王進忠告，他看見毛澤東約在早上七點多；後來，毛身著一件醬色中山裝上衣乘坐的飛機，2006年12月。

分鐘，3架飛機就全部準備就緒。

(232號專機機長潘景寅匆匆走來)說：“主……主席……毛主席來了”！

毛澤東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經登上了原由潘景寅駕駛的那架客機等候，情況不容我再耽擱，便急慌慌奔向等待著的主席座機。……我幾乎是跪著登上駕駛艙的，在機長座位上坐定，還不等調勻急促的呼吸，邊下達了開車的命令。

……領航員……高聲質問：“我們要飛到哪裏去呀？”

緊急中，我們沒有經過任何有關部門的批准，沒有辦理任何必要的手續，甚至沒有航線，沒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行動。

正在大家為難之際，余立金政委推開前艙門進來。

“到虹橋機場！”

回憶記載^[1]：總理一到武漢，就叫孔慶德和牛懷龍同志（獨立師師長）把王力找回來。並讓孔慶德通知“百萬雄師”，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談判，軍隊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飛機，而由於林彪插手，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這時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卻失蹤了。王力在哪裏呢？

孔慶德回憶^[2]：(周恩來安排毛離開東湖以後)周對孔慶德、葉明做工作，孔表示已經救出王力，但天黑後卻不見了蹤影，周幾乎是怒吼地說：“不行！你們設法把他找回來。”接著，周恩來又對孔說“你立即通知‘百萬雄師’派100名代表赴京談判，軍隊也派出代表和他們乘飛機前往，具體

[1] 董保存，《政治旋渦中的楊成武》，系轉引自陳再道和孔慶德副司令員的回憶。

[2] 鄭珠濱、屈德騫，《一代將星孔慶德》，P434，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

時間，明天再定。讓他們先作好準備”。

李作鵬回憶^[1]：周恩來親自組織平息事端，由李作鵬、余立金出面分別與海軍、空軍單位做工作，穩定局勢；周與陳再道談話，要求他配合處理問題，找到王力，陳再道怨氣不消，仍然表示無能為力；周恩來看到陳的消極態度，生氣地一拍桌子，說：你這是什麼態度？你不要以為你有“百萬雄師”，“百萬雄師”算得了什麼？你明白嗎？你對抗了中央的決定，威脅了主席的安全，綁走了中央文革人員，要是把你的行動通報全國，全國八億人民都會反對你的！陳再道無言可對，低著頭走了。

“百萬雄師”親歷者回憶^[2]：中午，我隨“百萬雄師”總站孫德洲……參加了“百萬雄師”頭頭謝敏華主持的……準備到軍區揪王力的會議，下午5點35分到軍區找孔慶德談判，要他把王力交出辯論。孔慶德說：“周總理說，武漢問題要到北京解決，每個大組織派50—100名代表，周總理親自帶隊，還說他同‘百萬雄師’的代表坐一個飛機去北京。毛主席、黨中央給周總理的任務是要保證王力的安全，王力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們不能揪，你們說王力有四點指示，不管有沒有，有，你們也不要追查，沒有，我們也不關謠。你們代表到北京不能揪王力，貼王力的大字報，你們要貼孟夫唐的大字報，揪孟夫唐。你們“揪王力指揮部”自己成立自己撤消，這樣才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們解放軍和你們在一起拿著槍遊行，別人會抓我們辮子的，說我們拿著槍打他們……”。會議開了個把小時，被8201、“公

[1] 在場者李作鵬回憶，20世紀九十年代。

[2] 曾慶裕，當年市直“革聯”駐“百萬雄師”聯絡員，67年在批判會上的發言，載市直紅司編《“百萬雄師”內幕》，67年9月6日。

檢法”、“百萬雄師”的人衝散了，把孔慶德打了幾下就散了會。

調查記載^[1]：送走毛澤東，周親自組織平息武漢事端，由李作鵬、余立金出面分別與海軍、空軍單位做工作，穩定局勢；周與陳再道談話，要求他配合處理問題，找到王力，陳仍表示無能為力；周又通過武漢軍區其他領導（孔、葉）做軍區工作。周、謝、李、余調動部隊，一支支在武漢周圍的部隊，開始調派入城。下午，謝與鍾商談平息事端，再去陳處商量。周總理三次要求軍區設法找人，到黎明前，仍無王力消息。早上，總理決定要劉豐去找到王力。劉帶領空軍司令部王惠民、葉錫洪出車，他們商量決定先去 8199 部隊，再找 8201 或“百萬雄師”。……

九點多，8199 張昭劍政委下山，找到兄弟部隊（工程兵）某連和 8199 某團七連，王力被轉移到 8199 部隊七連休息。下午二點，劉豐一行找到 8199 師部，張緒師長說“王力同志在我們這裏，我們正盼著中央首長的指示，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案。這一下可盼來了”。劉派王惠民驅車去向總理彙報。當時決定蕭前政委回空軍司令部，組織兩個連兵力接應，8199 出一個連護送王力到漢口機場。但去總理處彙報回來，大家商量，認為 8199 部隊外面情況複雜，中南路口到大橋頭遊行隊伍不斷，道路封鎖，決定直接轉移空司。七連在張緒師長和解參謀率領下，全副武裝掩護，劉豐、王力等坐司機郭景元開的小車，從科學院、武漢大學之間，到街道口，轉移到武漢空軍司令部。

劉豐又去東湖向周、謝彙報。周當即決定，東湖賓館

[1]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調查編輯，1967 年 8 月。

和空司的人，深夜分兩個車隊，在山坡機場匯合。

北航學生回憶^[1]：毛主席順利到達上海。而且在周總理的追逼下，總算把王力和張根成找了回來，周恩來和謝富治等人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當時周恩來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一切安排停當，周恩來放鬆下來，高興地同中央代表團全體成員一塊吃了晚飯，點名讓井崗山一個人陪著他去湖邊散步半小時。井崗山受寵若驚，很不好意思，把同伴吳介之拉著，兩個人陪著總理散步，聊天。總理說：“武漢發生的事，是我們的家醜，回去要保密，不要亂說，一切聽中央的口徑。”“出了這麼大的事，我是有責任的。王力同志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

總理又詢問了北航的一些情況，談到了武光。井崗山趕緊問武光有問題沒有。總理說：“武光好像沒有什麼問題。我聽康老講，入黨時間可能有點問題，記不清了……”

周總理決定中央代表團（按：謝、王和其他工作人員）立即返京。

於是，周總理讓大家經過簡單地“化妝”，一律穿上空軍軍裝，分乘吉普車和大卡車，讓軍區的車輛護送，打著“百萬雄師”的大旗，喊著“百萬雄師必勝！”的口號直奔機場。大卡車上竟貼著大標語：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一路上，“百萬雄師”的歡呼聲、掌聲不斷，一路“綠

[1] 原北航學生戴維堤記述（2001年）、已經當事人井崗山本人證實（2004年7月）。

燈”，順利到達了山坡機場。在機場與王力等匯合，再一起飛王家墩機場。

回憶一^[1]：東海艦隊過境部隊發表《嚴正聲明》，指出：“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從中央軍委到每一個戰鬥單位全體指戰員組成的人民武裝力量，一個軍區、一個單位、一個部隊決不是全軍，只有中央軍委國防部才能代表全軍。二、8201 部隊是不開展四大的單位，昨天參與‘百萬雄師’的武裝遊行是違反紀律的行為，特此提出強烈譴責和嚴正警告。三、謝副總理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負責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許任何人製造藉口攻擊和威脅他們。四、8201 部隊的所謂‘特急呼籲’是一小撮人盜用該部隊名義公開宣揚高、饒反黨集團的軍黨論……必須徹底識破和揭露並展開鬥爭。五、我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亂！……”

武漢市民眼見艦隊海軍指戰員上街用攝像機拍下市內武裝遊行與混亂鏡頭。

連日來，武漢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發表聲明和宣言支持“百萬雄師”對王力的造反。

回憶二^[2]：後來我和工總的沈復禮，別的人一起去警司、東海艦隊，向他們講述百萬雄師殘酷屠殺學生的暴行，他們也有許多人淚流滿面，此外也去過其他的地方宣講。這根本不是什麼武鬥，而是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殘酷的鎮壓，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這樣慘無人道的暴行。

[1] 某目擊者（1967年7月）。

[2] 武鋼工人楊玉珍（女，“鋼913”主要頭頭，後結合任省革命委員會常委，2003年）。

調查記載^[1]：上午，“百萬雄師”在3506工廠召開奪權大會，俞文斌說：“今天請大家來商量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很秘密，‘在百萬雄師’的勤務員中，也只有四個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市的權……”

下午，百萬雄師開會，將“臨時聯合代表團”改為“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訂出計劃：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王力問題由“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負責批鬥；堅決不准為工總翻案，誰翻案誰負責；關於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

15點40分，“百萬雄師”漢陽分站蔡XX帶領上千人，26輛車衝擊山坡機場抓王力。仍然負責警衛的8201部隊戰士，出來勸說鬧事群眾：“王力同志昨天被你們抓走，在什麼地方我們不知道。你們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今天又來衝就錯上加錯了。你們不是說三新、二司、工總壞嗎？可是文化革命搞了一年多，他們從來沒有衝過。你們兩天內衝了兩次，這是什麼問題？”得知機場消息，謝、余打電話給陳再道，說“如果你們再這樣搞，你要負完全責任”！陳讓秘書打電話，說“你們應該撤了”。16、17點，眾人撤走。

晚上，紀登清向8201師部打電話，負責與“百萬雄師”聯絡的郭XX在走廊休息，到辦公室接電話，紀說“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結合’奪權問題”，郭說“你給我談談不行？”紀說不行，要蔡政委。把蔡找來，蔡炳臣進入辦公室

[1] 《武漢事件》，武漢鋼二司宣傳部編輯。

關了燈輕輕商量奪權問題。次日，蔡與周忠到6團，對團副政委張某說：“這次起了帶頭作用，這樣，‘三結合’還是以我們8201為核心。”

回憶三^[1]：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下午，8201衝擊湖北大學，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長矛下，200餘人被關押。新一中、29中、20中受到洗劫。由於懷疑王力在8199部隊，8201部隊武力搜查8199某部七連。是日“百萬雄師”和8201部隊出動卡車約900餘輛。武漢全市主要交通幹道猶如流動的節日狂宴，遊行的群眾和軍人欣喜若狂，將汽水雪糕、麵包點心、袖章任意饋贈沿街觀看、歡呼的人群。

造反派學生聚集在學校內，議論兩天來武漢形勢發展，一方面擔心局勢進一步惡化，武裝遊行和掃蕩會威脅到所有學校；另一方面，也笑話“百萬雄師”和獨立師部分戰士把鬥爭矛頭直指中央，在中央領導面前徹底暴露了他們的兇惡與錯誤，認為解決武漢問題將不太遙遠了。連日，武漢造反派紛紛離開單位外出避難。或選擇陸路坐汽車火車，或坐船東下，一路氣氛極為緊張。深夜，不知來由的“百萬雄師”威脅電話不斷打到紅水院總機和位於測繪學院的鋼二司司令部：“二癩子，今天晚上血洗你們學校！”

半夜，陳、鍾才回到茶港家裏休息。

在北京，中央文革戚本禹給北航“紅旗”戰鬥隊電話，要求標語上街：

- 一、打倒反革命劊子手陳再道！
- 二、打倒反動組織“百萬雄師”！

[1] 某目擊者（1967年7月）。

三、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

四、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

五、把 8201 部隊中的一小撮反黨叛亂分子揪出來示眾！

六、以血還血，還我戰友！以命抵命，血債要用血來還！

七、堅決打倒劉鄧的猖狂反撲！

戚本禹又給北京工代會電話：從現在開始，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馬上開始遊行，聲援（武漢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打倒‘百萬雄師’！”，“打倒陳再道！”自己編些類似的口號。大會、小會、聲討會，從今天開始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會到天安門活動，搞二至三天。

參考一^[1]：保守派的遊行繼續進行，該市仍處於騷亂之中。由於懼怕“百萬雄師”的巨大力量，有些隊伍所到之處，造反派都倉皇逃竄。在遇到抵抗時，“百萬雄師”的部隊不費吹灰之力就掃除了障礙。至少有一打造反派的最後據點被這股風暴席捲而去。

粟裕傳達^[2]：陳再道還派保衛科長和兩連戰士監視謝、王，後來謝、王對保衛科長做了工作，他覺醒了。綁架王力的一個營長也覺悟了。他們表示要用生命保衛首長。東海艦隊聞訊調了十艘軍艦開進武漢。這時楊代總長交待陳再道，必須絕對保證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

回憶四^[3]：我們（新華工）敢死隊在湖藝分析了已收集

[1]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說。

[2] 7月27日粟裕同志在軍委機關傳達揭發。

[3] 原新華工學生魯禮安回憶（1998年），其文字已輯入回憶錄《仰天長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到的各種情報，認為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收集取證“叛亂”的第一手材料，然後彙總設法直接報告中央。而就在我們連夜籌劃時，駐紮在隔壁的一支屬於消防中隊的“百萬雄師”的小頭頭突然派人來請我們去幾個人跟他們談談形勢。這個消防中隊是“老保”的一個窩子，作為近鄰與我們倒也一向彼此相安無事……我和馮天艾等權衡一番之後，還是決定去談。為防不測也作了些應變的準備。為保證我們的安全，同住在湖藝的吳昌青的造反派頭頭腰中暗插了一把匕首陪同我們前往。等我們一行四、五個人來到消防隊的頭頭的辦公室時，對方幾名頭頭已在恭候。客氣一番後便開談，我們自然是向對方“曉以大義”：說王、謝是中央派來的解決武漢問題的當然就是代表中央，將矛頭指向王謝也就是指向總理、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至於想用武裝遊行示威的方式來逼迫中央改變對武漢問題的表態那更是癡人說夢。歷史上的張國燾曾經擁有重兵也未能鬥得過中央，“百萬雄師”這樣的烏和之眾又怎麼可能逼中央就範。現在武漢問題既然鬧得這樣驚天動地，中央必然很快就會公開表態。像“百萬雄師”這樣矛頭直指中央的武裝遊行示威，文革以來全國都尚未有過，性質極為嚴重，定為武裝叛亂也絕不過分……消防隊的“老保”們目瞪口呆，連連點頭。我們最後奉勸他們趕緊懸崖勒馬、反戈一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敢死隊按計劃全體出動上了街，我自己也帶上長征時用過的照相機在兩位附中學生的保護下深入一線抓拍“百匪叛亂”的實況。我們先後在大東門、閱馬場、司門口一帶躲在馬路邊的建築物旁或通過臨街的窗子攝下一張張百萬雄師武裝遊行特別是武裝攻打湖北大學的照片，將成百上千的“百萬雄師”武鬥隊

員頭戴柳藤帽、手持長矛吶喊著在改裝的裝甲車的掩護下衝向湖大的鐵門，刀光劍影中忽地又殺向湖大對門的湖北圖書館等等血腥場景一一攝進鏡頭；……又和附中學生一起轉移到武昌橋頭，拍攝“百萬雄師”車隊開過引橋的“浩蕩場面”：一輛接一輛的卡車緩慢地行進著，手持長矛的“百萬雄師”們站在車上一面高呼口號一面揮舞著部隊發給的槍支耀武揚威。一些掛有軍牌的軍車上則擠滿了全副武裝的8201部隊的士兵，好些士兵胳膊上還佩戴著“百萬雄師”的袖標。

8201 部隊幹部揭發^[1]：周（忠）在宣傳隊人員會議上說：我說幾句心裏話，你們的行動我感到高興和害怕。高興的是頂住了陳、鍾的檢討，推遲了軍區公告的發表，創造了到北京談判的條件。害怕的是我們部隊要集訓。

20 日周總理親派赴漢記者回憶^[2]：

20日周恩來臨赴武漢前夕，在京親命中央文革記者站派5名記者趕赴武漢調查事件情況，新華社的張春亭、郭遠發等去軍區，郭昌琪與張廣友于21日深入測繪學院、水院和武大調查，並向北京緊急反映了造反派的處境與要求。張春亭與機要通訊等4人先到漢口，住新華分社，分社講，“百萬雄師”對分社記者還是比較信任的。但也發現周圍有人監視他們行動，經常有人在對面窺視。後在空軍幫助下轉到部隊安全處所，到武昌區、軍區展開工作。

[1] “反革命分子牛懷龍、蔡炳臣的忠實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對言行”，輯於《七月風暴》（增刊之二）鋼二司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1967年9月。

[2] 見李近川，“回憶中央文革記者站”，載“百年潮”，2002年第5期。主要綜合原中央文革記者站有關負責同志與被派赴漢記者親自回憶、記述（2005年7月信訪郭昌琦，2006年3月31日採訪張春亭）。

“(我們)以新華社記者的名義，帶領新華社兩名報務員攜帶發報機飛抵武漢……車進武場市區，到處可見手持長矛、臂戴橙黃色袖章的‘百萬雄師’的隊伍。出乎意料的是，當我們的汽車穿過他們的人群時，他們都鼓掌表示歡迎呢……剛到武漢採訪，還真有一點出生入死的味道。次日我到湖北大學採訪，適逢‘百萬雄師’攻打湖大。只見他們用推土機把該校的院牆推倒一個大缺口，接著便是‘百萬雄師’的隊伍手持長矛，潮水般湧入校園，喊叫著追趕湖大的學生……”(張春亭手稿“我與‘中央文革記者站’”，04-12)

“我是在武漢發生‘7·20事件’後被派的5人小組之一，組長是新華社軍事部記者張春亭，有內參部張廣友和我，還有另外兩位同志。臨行前，當時記者站負責人徐學增同志還特別向我們交待說：‘武漢情況緊急，也很複雜，你們遇到困難，不要去找王力，要及時、如實的反映情況，直接向記者站彙報’。……我們到武漢後，形勢很亂，為瞭解實況，我和張廣友分別深入到水院和武漢大學，張春亭到軍區和空軍……我只向記者站進行了一次電話聯繫，反映了水利學院學生造反派的一些要求和他們的處境情況，過不兩天，‘百萬雄師’等組織就解體了，收繳了他們的武器，嚴重的‘武漢事件’就算平息了”(郭昌琦信，05-08-12)。

“據分社掌握的情況介紹和我們採訪所得，一致認為武漢的鬥爭形式，越來越緊張，武鬥越來越嚴重了。漢口的各革命派據點，已先後被佔領，湖大和機院等革命派的據點，也於21日被突破。現在，武漢三鎮唯一的‘革命根據地’——紅水院、武測、武大、華師等學校聯防的一小塊地方，也正處於被包圍之中。在這萬分火急的情況下，我們五人

小組決定：派張廣友和我深入到包圍圈內，與‘鋼二司’、‘鋼工總’取得密切聯繫。並要求與他們戰鬥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其他三人立即離開分社，在外圍瞭解事態的發展變化，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與總社取得聯繫，把情況及時如實地反映上去”。（郭昌琦手稿《顆顆都是純真滾燙的心——記武漢“7·20事件”》片段；93-03-05）

楊道遠回憶^[1]：方銘（十五軍軍長）因“七·二〇”事件調進武漢，後來擔任武漢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七·二〇”以後，我同方銘接觸很多，方銘曾經對我說，“七·二〇”8201部隊同百萬雄師上了街，武漢大亂，周恩來要陳再道控制局勢，陳再道說，我管不了啦，那是“百萬雄師”啊！周總理很生氣，對陳再道拍了桌子，說：我從黃埔（軍校）到現在，怕過誰！別說百萬雄師，千萬雄師我也不怕。

方銘還對我說，“七·二〇”時總理離開武漢前，要上飛機了又回頭對方銘他們說：小將們有難，快去保護他們！方銘說他們得了部隊進城的命令後，正在待命的部隊立即向城內開進，用卡車運送部隊，人多車少，沒能上車的人跑步向武漢市區進發，卡車送達第一批人後再回頭去接後續部隊。部隊要求輕裝，要戰士只帶水壺和步兵武器，很快就進駐了武測、水院、武大、華工等校。

[1] 楊道遠，當時武漢“鋼二司”負責人，後為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摘選自其回憶錄《奉獻》（2008年12月稿）。

7月22日

是日，王力被營救回到北京。周恩來先行回京，在西郊機場組織較大的儀式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歸來。

調查^[1] 講，總理決定護送王力的車隊由劉豐帶領，劉帶領4輛車，一號車由某部作戰科長楊國光帶，劉、王第二輛；後二輛坐空軍某部三分隊戰士，一點鐘從武漢空軍司令部出發，一路通過“百萬雄師”的崗哨盤查，其間，空司也一次次搪塞了“百萬雄師”的追問與威脅。三點到達山坡機場。7212部隊的6輛車，由空軍某部科長王根富帶領，出發時間由總理臨時確定；由該部特功八連護送周、謝一行，於三點半鐘到達山坡機場。

回憶一^[2]：凌晨2點半鐘，武漢空軍司令部命令機場部隊迎接專機，3點半鐘，李作鵬、余立金、王力、劉豐乘車從8199部隊經五里界、紙坊、鄭家店到紙坊機場，王力艱

[1] 《武漢事件》。

[2] 7333部隊同志（1967年8月）。

難地下車被攙扶上招待所。不久，兩架直升飛機著陸，周總理一下飛機就直奔招待所（按：此處回憶者有誤會），還未上樓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裏？”趕到屋裏，總理緊緊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抱了又抱，親了又親，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參考《武漢事件》：空軍幹部才聽說總理已經幾天沒有進餐和洗腳了，鬍子也沒有刮；幹部和飛行員、醫生護士忙著打水送飯。總理又出去接見了護送的空軍三分隊、7212特功八連等四個連的戰士。）……

《武漢事件》云：凌晨5點，載有中央來人的專機從山坡機場飛到王家墩機場；在機場，周恩來馬上召集軍區、空軍，和8199負責人開會，部署和調動部隊，穩定武漢局勢。並決定馬上派空軍進駐紅水院、紅武測、新華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學校和武鋼，當晚，部隊已經進入幾個預定單位和位置。下午兩點多，周、謝、王、李等分頭登機回京。

參閱^[1]：凌晨，毛向汪東興指示：陳是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離開以後，北京採取的措施是對的；軍隊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北京的措施係林彪主持制定，第一步，以中央名義調陳、鍾進京，試探是否兵變，第二步，起草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開百萬人大會歡迎謝、王，全國各地集會、遊行聲援。）

上午，8點多，總理通知在上海的楊成武“我們都到了”。上午8時20分，周恩來從武漢打電話給在上海的楊成武，說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後再請示毛澤東。並說，武漢發生的事對外報道，要含蓄點，不點名，還建議，他

[1] 《楊成武將軍自述》286—287頁。

回北京後把陳再道等四人保護起來，以免受到傷害。毛作了許多考慮，主張周恩來等人“還是早點離開（武漢）好”。

毛對楊成武談，這類事情已改了幾個軍區——青海、內蒙、四川。同時還有許多軍區處於湖北的狀態——江西、湖南、河南。如果在武漢內部解決，是最好的了。軍隊要來一個分化，“百萬雄師”也要他分化，不然他就會調動農民，佔領學校。毛澤東感到武漢的事牽扯問題相當大，影響到南京軍區、福州軍區。武漢的問題，當作錯誤處理。如果他（陳）有什麼決心，毛、周、王力也出不來。可見徐（海東）、陳並沒有下個死命令。毛傾向慢解決，先解決幾個省軍區的問題。後又與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汪東興談，若總理、軍區負責人、群眾代表談，談不成可能被包圍，還是早離開好。談不攏，會提什麼條件？人扣在那裏強迫簽字讓承認他是革命組織。現在不僅是武漢的問題，是全國的問題。

陳再道回憶^[1]：早上，我想請示一下總理……總理住處負責接待工作的同志說：主席已經走了，總理也離開了東湖。

回憶二^[2]：三凌晨，8199軍人（劉豐帶領），喊著8201的口號進入賓館，接走謝、余、張一行，繞到山坡機場，見到王力。在山坡機場候機時，周就在籐椅上假寐。到了王家墩機場，北京來人先歇在停放在機場支線的主席專列上（14日到漢共三列專車，後來停武昌南站和徐家棚車庫的列車，均轉到王家墩；毛主席乘機飛上海，專列暫留漢，

[1] 《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2] 時為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人員張根成回憶（2004年6月）。

再赴華東)，列車上也有“百萬雄師”的工人；張還想糟了，他們怎麼也有人在這裏工作。回到機場見總理秘書周家鼎，發現周還在開會部署武漢事宜；周總理叫謝、王等先走，說我要把陳再道叫來，把抓走的兩個記者放了就走。

參考^[1]：周恩來在機場召集葉明、孔慶德、李作鵬、劉豐開會，要孔暫時主持武漢軍區工作。並囑轉告陳、鍾要迅速表態，爭取主動。下午飛回北京。參加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會上，林彪把“七·二〇”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

（按：1968年6月11日總理等接見武漢軍區的曾思玉、劉豐、方銘、蕭前、孔慶德、姚喆、葉明、韓東山、閔學勝、畢占雲、張廣才時，黃永勝對武漢軍區問題代表中央軍委表態，總理插話：葉明、孔慶德在“7·20”做了些事，有功嘛，我可以作證。）

陳再道回憶^[2]：上午，總理在王家墩機場召集葉明、孔慶德同志和李作鵬、劉豐等人開會，總理讓葉明、孔慶德同志住到29師，暫時主持軍區工作……總理在談話中沒有責備軍區。

孔慶德回憶^[3]：下午，周恩來在臨離開武漢時，在王家墩機場召集孔慶德、葉明以及李作鵬、劉豐等人開會。周恩來說：“孔慶德和葉明同志住到29師去，暫時在那裏主持軍區的工作。你們轉告陳再道和鍾漢華同志，趕快表態，爭取主動，這樣我才好說話。”此話，他已向陳、鍾交代過，只是在臨登機前，再給孔、葉囑咐幾句。

[1] 《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2] 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3] 鄭珠濱、屈德騫，《一代將星孔慶德》，P436，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

回憶三^[1]：平時所謂的《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記者，實際就是中央文革派駐武漢的，當時他們有幾種記者證。“7·20”時，他們住在省委三招，高天堂是站長，原北海艦隊海岸炮兵團政委；都元恒，原是東海艦隊的監察科科長，楊立功是海軍大院的一個宣傳科科長；此三人均為1966年文革初期調到中央文革記者站工作的，未參加當時的海軍機關運動，“7·20”事件時三人被“百萬雄師”抓走和批鬥。直到24、25號他們才專門乘車到學校找我，幾天不見，有如隔世，我見到他們就哭了。從水院鄧子政大字報後，我就與記者站姚克強一起跑農村運動動態調研，姚是北海艦隊潛水支隊的青年科科長；但“7·20”時他好像不在武漢，我沒有見到他。武漢事件期間，我找不到這些記者了，一些社會動態信息是直接報送中央文革的。當時武漢群眾組織僅僅派了我一人參加記者站工作。後來我在北京工作了數月，參加辦事組的活動，住在花園村一號（李達上將住宅），信箱是811#。這幾個來自海軍的團級政工幹部，都是參加過抗戰和解放戰爭，穩重和熱情的中年人，對我如大哥哥一樣，後來陸續回到原來部隊。

8201 部隊幹部揭發一^[2]：為了緊緊控制宣傳隊為牛、蔡反革命目的效勞，於22日上午，藉做思想工作為名，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全師六臺宣傳車約五十餘人到師部四樓會議室開會，在會上，蔡對宣傳隊員大點反革命之火大加讚揚，還作了新佈置，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大意是：（1）這兩天他們做了一個大好事，把群眾發動起來了，火已經點起

[1] 中央文革武漢記者站原群眾通訊員龔解放回憶（2004年8月13日）。

[2] 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聯合編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來了，迫使武漢軍區作檢查的公告不能發表，創造了去北京談判的條件。中央已經通知，軍隊和“百萬雄師”為一方，“三新”“二司”為另一方去北京談判；(2) 火已經點起來了，現在要求大家穩定下來，準備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來整理材料。到北京談判沒有材料是不行的。你們能不能在五天之內，最好三天搞一個響噹噹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這個任務並不比前兩天發動群眾的任務輕；(3) 你們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員，處處都要起好作用，今後大家搞什麼事，最好先告訴我一下，我不會領著同志們去犯錯誤的，你們應當相信我的話。在講這些話的過程中，還不斷激起大家鼓掌叫好。周忠這個牛蔡的忠實爪牙，在這個會上也鸚鵡學舌地重複了主子蔡炳臣講話的主要內容，還大言不慚地說：“我談我的看法，你們的行動我是支持的，並為此感到高興。”還進一步拉到會人員跟牛蔡反革命到底。說：“要跟他們幹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壞也壞到一起”，很清楚，根本不是做什麼思想工作，明明是為他們一手策劃的反革命叛變事件大唱讚歌，評功擺好，上弦打氣，繼續欺騙和煽動宣傳隊員執行他們的黑指示，替他們的反革命罪惡勾當賣力。

20日晚和22日上午，蔡炳臣還多次催促支左辦公室秘書組儘快地重新準備材料，遭到秘書組成員抵制後，蔡很高興地說：“寫材料哪有那麼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況又符合你們的想法，你們老是這來那去，什麼時候才能寫出來。”還頑固地提出，仍按原來的觀點寫，越快越好。

8201 部隊幹部揭發^[1]：周忠和蔡到六團某連，有的戰士問周，我們上街開槍可不可以？周說，少打幾槍可以，不要多打。周對六團副政委張楓說：這次起了帶頭作用，現在急剎車也要起帶頭作用，這樣三結合還是以我們 8201 為核心。

武漢水院幹部回憶^[2]：深夜，持傘兵折疊式衝鋒槍的百餘空軍戰士進駐紅水院（姓姚的團長帶了一營傘兵，控制附近高校），另有部隊進駐武漢大學、測繪學院，宣稱是接受中央命令前來支持造反派、保護造反派。留守這些學校的學生、工人熱淚盈眶，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北航學生韓愛晶回憶^[3]：“7·20”後，文革辦事組即通知北航“抓”在京的張體學，查與事件有無關聯。韓單獨與張在北航談話，張表示自己脫離運動多時，與武漢或北京的徐海東實無關係，並云自己的苦出身，對毛和黨的感情。韓出主意讓張上書明志，承認錯誤，爭取解放，可代轉總理。張說不知道北京造反派都是幹部子弟，而外地造反派出身不好；否則，把權移交幹部子弟造反派也早就放心了。幾日後，張呈毛澤東信擬就，八一建軍節晚宴後，韓就將信送呈周恩來了。

水院學生回憶^[4]：7月22日晚，突然接到學校通知，除留下極少數人堅守工作崗位，其他的人通通撤退，我們當即決定總機留下三個人，即 62 級的肖尊華、64 級的彭鳳碧，

[1] “反革命分子牛懷龍、蔡炳臣的忠實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對言行”，輯於《七月風暴》（增刊之二）鋼二司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1967年9月。

[2] 當夜留守護校的目擊者張建成回憶（時為水院團委書記，2004年）。

[3] 原北航學生韓愛晶回憶（2004年6、10月）

[4] 原武漢水院學生蔣繼清回憶，時在總機房工作（2005年6月，2006年9月）。

第三個就是我。晚上，送走撤退的人以後，我們就作最後的準備，各自把自己的“紅衛兵證”拿出來，塞到地板底下。然後我跟肖尊華兩人就開始巡視整個行政大樓。這時候，除四樓廣播臺仍留有兩人〔三系64級的單志俊（機務）和一系63級的楊次華（播音員）〕堅守崗位，大樓已經全部走空。於是我們兩人一個個辦公室地檢查房門鎖好沒有，沒鎖門的辦公室，就進去把室內的東西大體檢好，然後把辦公室房門鎖好。

還好，百萬雄師始終沒有進入水院。

姚克強當時就在我們學校。7月19日晚，學校團委的王紹良老師來到總機，給我們一個電信局長途值班員的號，再給我們一個北京的電話號碼，要我們每兩個小時就找長途局這個號的值班員，通過這位值班員要通北京的電話（按：中央文革辦事組聯繫電話），轉接到教工六舍馮笑梅老師的家，《解放軍報》的姚記者要通過這個電話向北京彙報。

從這個時候起，到7月2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支持武漢造反派大會，這個電話就一直沒有斷，成為武漢極少幾個直接向北京彙報的電話之一。任務完成之後，姚記者來到總機，跟我們說“現在，你們必須把這個電話號碼忘掉”。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按：回憶者記錯，是清查“516反革命分子”運動），關押我的人曾經反復多次要我交代這個電話號碼，但是我早已經把它給忘掉了，問的人始終也沒有達到的目的。

（按：以上龔、蔣同學回憶的中央文革小組的軍人記者，均較早回到了海軍部隊；據原記者站李近川聯繫瞭解，所有記者在後來的一系列審查與整黨中，均正常通過。關於記者站的情況，可見即將出版的當年記者回憶文集。）

記者郭昌琪回憶^[1]：我和老張、《人民日報》社的李洪玉同志到達武大時，武大的同學已撤退到紅水院和武測去了……據說，從各方面情報證實，今晚“百萬雄師”決心消滅這塊最後的“根據地”，並且從武大方向攻入。空氣越來越緊張了。在武測院外的公路上，不時傳來隆隆的汽車聲，前沿放哨的同學說，這是滿載“百萬雄師”的汽車，正向這小小的根據地圍攏。但是，鋼二司的同學非常鎮定。他們不說話，都很有秩序地在進行各種防禦準備工作。他們雖然手無寸鐵，但他們說，我們有一顆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中央的火熱的心……我作為一個人民的記者，如何把當前的鬥爭情況，最迅速地反映上去呢？……一位武漢軍區軍樂隊的同志幫助想出辦法，他以軍樂隊電話號碼和負責人名義，通過軍區長途臺發往北京。果然，電話接通了，我們順利地向總社發出了最緊急的，要求中央立即採取有效措施的电话稿。這時，已是23日凌晨一點鐘了。我們當時都在想：即使被“百萬雄師”的人抓去也值得了，反正中央首長已聽到了革命派的呼聲，首長一定會來營救的。

市委部分領導幹部反應^[2]：市監委一個張姓副處長說：“毛主席受了蒙蔽，現在有人懷疑林彪和周總理有問題。”組織部韓姓處長說：“他（按：指毛澤東）還在穩坐釣魚臺哩！”農委書記冀某說：“中央現在已被幾個筆桿子控制了。”李某說：“揪王力當然是大快人心，但問題不要想的那麼簡單。據辛甫（按：市委書記，當時傳說係市裏‘百萬雄師’後臺領導人物）說，‘武漢支左大方向錯了’，這一套是謝

[1] 郭昌琪手稿，《顆顆都是純真滾燙的心——記武漢‘720事件’》片段，1993年3月。

[2] 市機關紅司《人民勤務員》編印《“百萬雄師”之內幕十一》，67年9月9日。

富治講的，那就不是王力個人的意見，說明中央文革對武漢問題有框框。”

楊道遠回憶^[1]：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武漢問題還不准上街，不准貼標語，不准貼大字報。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通知說武漢問題可以上街了，到了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開始了對武漢問題的滾動廣播。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通知我們到機場歡迎。那天去歡迎的人很多，有中央首長及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指戰員和首都各界革命群眾及武漢赴京革命造反派數萬人，把整個機場都圍住了。謝富治由周恩來陪著，在外圈；王力由江青和康生攙扶著，在內圈，他們的身後都跟著中央的許多人，繞場一周和群眾見面。我們的隊伍扛了一面武漢鋼二司的大旗，中央首長看到武漢的旗幟，走到跟前停下來同我們講話。我給周恩來和謝富治戴上了武漢鋼二司的袖章，鋼二司駐京聯絡站的其他人同時也給中央其他首長戴上了鋼二司的袖章。我本想去給江青、王力戴袖章，但他們身邊人太多不好過去，周恩來要我不要過去，周恩來說：你把袖章給我，我一定替你轉給江青同志。

綜合情況：

全市“百萬雄師”繼續遊行，出動車輛約1500輛。

上午，蔡炳臣接見省直頭頭，要求準備材料到北京談判，特別是所謂工人總部保王任重的材料。

下午5點左右，周總理和謝、王一行返京西苑機場。載謝、

[1] 楊，時為武漢鋼二司司令。

王的飛機曾在空中滯留，待後起飛的總理座機先行抵達，周恩來遂率在京黨政軍領導、群眾代表隆重歡迎謝、王一行。

下午，為避免軍人和群眾的衝擊，陳、鍾從軍區機關轉移到 8199 部隊師部，陳住進 6 號樓（即王力前日住過的），鍾住 1 號樓。直到次日 3 點，接到中央電報要求他們進京。

晚上，“專揪王力指揮部”有人提出計劃，準備啟用人武部掌管的槍支彈藥，裝備 60 萬人抵抗；組織 10 萬人徒步進京告狀。

7月23日

凌晨，周恩來到林彪處開會；並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指示以中央名義召陳、鍾，軍區部分首長，武漢空軍、空15軍部分首長、省軍區獨立師師長、政委和武漢市人武部政委進京。周以中央名義起草給武漢部隊的電報。

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謝、王一行回京消息。

中央給武漢軍區的電報：

武漢軍區黨委並武漢軍區空司黨委：

周、謝、王、李四同志回京後面報一切。中央考慮到“百萬雄師”派代表來京事，一時不易談成，而武漢局面又急需穩定，擬先約軍區和有關方面同志來京一商，請陳再道、鍾漢華、傅傳作、劉豐、吳世安、周志剛、趙蘭田、溫錫、張緒、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來京。中央已令空軍派機往接，何時動身，望告。

戚本禹回憶^[1]：總理去武漢回來後，講到他見主席勸說

[1] 2007年3月5日。

離開武漢時，主席講沒有想到住到賊窩子去了；但也說，有這麼嚴重嗎？我看他們還沒有下決心要扣留我。

謝富治在公安部歡迎大會上說：這次我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志和中央工作人員張根成同志及北航紅旗的同學，是按照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與周總理、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組成了一個“三結合”的班子，我們這是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向各地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瞭解情況，進行一些調查研究，做些工作。我們到外地，受到了各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歡迎，所有的造反派對我們感情很深，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央文革很有感情，這一點一見面就知道了。

……看到公檢法受彭、羅、徐（子榮）的毒很深，大多數人都是保字號的。在公檢法系統中，必須進行大批判，特別是要徹底肅清彭、羅、徐的影響，從各個地方、各個角落剷除餘毒，用毛澤東思想去武裝，把他們徹底打倒，讓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陣地。

知情者回憶^[1]：謝富治 22 日回京，受到熱烈歡迎，謝與去西郊機場迎接的公安部李震等人回部，路上與李談武漢見聞和武漢公安存在的問題，隨即商議 23 日部裏開大會，決定傳達毛澤東數次講過的“公檢法要徹底革命”精神。

施義之回憶^[2]：（當日）會後部領導一起從禮堂後門走出，在路上謝富治對李震講：“我講話別的不要傳下去，我講的毛主席說：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這句話

[1] 知情者李某（2005 年 10 月）。

[2] 施當時為公安部政治部主任，見陳楓主編，《血與火的歷練——施義之紀念文集》，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

要捅下去，用什麼方法，你們研究。”謝還說“我聽毛主席說‘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

群眾回憶一^[1]：中央臺一早就廣播謝、王回到北京和北京歡迎的消息。武漢全城輿論大嘩。造反派奔走相告，紛紛從逃避處所回到單位，“百萬雄師”與8201部隊戰士思想出現混亂。空軍15軍的部分部隊和8199部隊開始控制城市主要交通要口，與8201部隊換防，逐漸控制市內重要制高點。部隊的進入和撤離十分井然有序，未有發生口角與衝突；一些空軍小分隊進駐武昌一些大專院校，宣稱支持造反派，保護造反派。

測繪學院和武漢大學鋼二司與三司革聯學生，分別造反查抄了位於該校的三司總部。

乘船逃離武漢去上海者，原來在船上面面相覷，不敢做聲，聽罷廣播，眾人均歡呼起來，原來滿船盡是造反派。是日仍有部分“百萬雄師”群眾遊行，聲勢已微。

參考一^[2]：當武漢的保守派初次從收音機中得知王力在北京機場受到歡迎的消息後，他們大為吃驚。對他們而言，這無異於晴天霹靂。在隨後幾天裏，在北京的權威們明確譴責“百萬雄師”，並支持“工總”及其同盟者時，消息就更加確實了。

群眾回憶二^[3]：7月23日早上一大早起來，就聽到武測的廣播，說王力回北京了。我在武大看大字報，說“公雞下蛋了，工總翻案了”。洪山區給我們提供一輛汽車，我把“人民勤務員”的旗幟一插，參加全市大遊行。那個情景真

[1] 武漢市目擊者多人（1967、2004年）。

[2] 王紹光採訪記載，《理性與瘋狂》，P143。

[3] 原武漢市委幹部造反派頭頭魏繩武（2003年）。

是感人，到處都是人山人海，老百姓直送西瓜冰棒。在過長江大橋的時候，看到 8201 部隊的人在那裏請罪，低頭彎腰，把槍橫著拿在腰下，像是打敗仗的兵，我們看了心裏確實也不好過，把解放軍弄成這樣，其實都是當官的在背後操縱的結果，他們沒有什麼過錯。一進武勝路，就是一片歡騰的氣氛，走到消防隊的瞭望臺附近，部隊動員我們轉彎走，說“百萬雄師”的人在前面有埋伏。

參考二^[1]：劉豐從吳法憲那裏聽到消息，馬上打電話給張昭劍說：“武漢軍區問題大了，不是一個陳、鍾問題，‘七·二〇’是林彪派邱會作來處理的，武漢軍區有鬼！”

張昭劍聽了這話，立即宣佈二十九師脫離武漢軍區，並且揚言要把軍區領導同志“統統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張昭劍對抗總理的指示，把葉明、孔慶德同志趕出二十九師，以致葉明同志幾乎被打死！

張昭劍申述^[2]：武漢軍區經過長達十一年（1971 年至 1982 年）的反復調查、審議、核實，對我在“7·20”時臨危受命，圓滿完成保護王力的任務是肯定的。在“7·20”過後兩天，即 7 月 23 日，葉明副政委把我找去交待任務時，還拿出記錄本，把周總理對 29 師說的話向我念了一遍：總理說，“張昭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29 師這個班子好，但部隊不行，也上了街。”（按：當時上街遊行的戰士，也有一些打著 8199 的旗號）

自劉豐把王力帶走後，到 8 月 1 日到武漢任武漢軍區政委為止，劉豐總共給我打過三個電話。一是說送他和王

[1] 董保存《政治漩渦中的楊成武》說，其他類似傳說見諸有關回憶文章。

[2] 原陸軍 29 師政委張昭劍致楊先財、石仲泉的申述信（2002 年）。

力到山坡機場的 29 師小車司機小郭同志表現很靈活，受到周總理表揚，並說周總理很擔心 29 師受衝擊，特意指示要司機小郭換上空軍的服裝，這部吉普車的車牌也換成空軍的了。二是 7 月 22 日晚打電話說，他和我們師長張緒一起到北京去，要我好好掌握部隊，武空蕭前政委晚些時候要打電話給我，要我接受任務。三是從北京打過一個電話，說準備出個佈告在武漢市張貼。佈告署名武空排第一名，29 師排第二位，其它單位如何排，由武空蕭前政委找我前去面談。其餘再無打過電話。我在被專案審查時，受不過車輪戰的“逼供”，曾交待劉豐還從北京打過電話說，“武漢的問題大了，‘7. 20’時林彪派邱會作來處理的。”事實是，劉豐到武漢任職後，有一次在軍區曹家花園招待所開會時，曾對我說過前面的話。此事應如實於以更正。至於你們文章中說我聞聽此話後，便立即聲明，“脫離武漢軍區”，這是別人強加給我的不實之詞。

群眾回憶^[1]：“七二〇”之前從北京回來，武漢形勢日趨嚴重，我們當時住到武漢大學圖書館去了，跟學生們在一起。當時 8201 部隊的人手裏拿著衝鋒槍，嘴裏銜著匕首，圍著武漢大學轉，當時謝富治說這是兵變，要我們避一避。這樣我們當時和武漢大學的學生一起開始逃跑，先是從武昌坐火車到黃石，再從黃石轉船到上海。船到安徽蕪湖聽到廣播說，王力謝富治回北京受到隆重歡迎。船到上海之後，在碼頭上受到極為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哪怕是船上的普通旅客，也一樣受到隆重接待。後來全國人民聲援武漢造反派，整個全國的運動形勢為之一變。

[1] 方斌，原武昌客車配製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2003 年）。

歷史材料^[1]：三司革聯發表《奪權公告》，指出三司在陳再道之流和右傾頭頭的操縱下完全變成了地地道道的保守組織。宣佈：1、三司的一切權力歸三司革聯；2、正式宣佈解散所謂“紅三司”司令部。

8201 部隊幹部揭發^[2]：（聽到中央廣播）我師廣大指戰員，識破了他們的反革命陰謀，紛紛要求上街表態，承認錯誤。宣傳車已經開出，但周（按：周忠，8201 部隊師政治部副主任）這時卻跳出來，拼命的阻攔，不准出去，並說，你們誰負責，誰敢保證不出問題。（……後來）在 8 月 1 號動員整訓大會上說：中央表態，只打倒陳、鍾、牛、蔡、巴，不要喊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我周忠不需要打，下個命令撤職就倒了嘛。

章迪傑^[3]：“七·二〇”前後那幾天，我一直在寶豐路的五一俱樂部二樓，我們聯絡部在那裏辦公。我們的消息來源主要是從武漢軍區來的。我們與中央文革沒有往來。當時我們與中共中央中南組，好像是國務院系統的，每天保持聯繫，每天晚上向他們彙報情況。他們跟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我那幾天的任務主要是收各地來的電報，接待各地來漢聲援揪王力的。當時黃石的鋼城雄師開了 6 輛消防車來武漢聲援。其他專縣也派人來漢聲援。我們每天忙得只能吃一餐飯，有時拿著電話都睡著了。每天接到的電報大約有三、四十封。我記得支持我們的電報有：上海交

[1] 武漢鋼二司紅武測《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 年 8 月）。

[2] “反革命分子牛懷龍、蔡炳臣的忠實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對言行”，輯於《七月風暴》（增刊之二）鋼二司新水運宣傳部、市紅司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七月風暴》編輯部，1967 年 9 月。

[3] 見《“百萬雄師”頭頭翁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榮根（2007 年）。

通大學、南京石油學院、甘肅天水市財貿學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河南十大總部、四川產業軍、廣西聯指。……

支持的電報上有“百萬雄師萬歲！”的口號，每天也收到不少各地造反派組織反對、聲討“百萬雄師”的電報，上面有“打倒百萬雄師”口號。來電到“7.23”中央表態後停止。

俞文斌：我認為這件事是不應該發生的，“七·二〇”事件是毛澤東搞的，江青後來又把這件事推給林彪，林彪是聽他們指揮的。毛是罪魁禍首，帳要記在毛澤東身上。

記載^[1]：是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軍機關帶直屬隊和空降兵第44師（欠炮團）赴武漢地區執行“三支兩軍”任務。軍部駐武昌空軍東湖療養院（8月17日，遷至漢口原高級步校營房）。武漢地區原由獨立師控制的要害部門、要害位置，轉由空降兵第15軍及陸29師所控制。

記者郭昌琪回憶^[2]：凌晨兩點多鐘，戰鬥氣氛籠罩著武測，大家都準備著為革命而獻身。突然，從武測大門外駛近來一輛軍車，原來是8199部隊首長派偵察科長來與鋼二司小將取得聯繫的，大家都有說不出的高興。只聽見這位偵察科長說：“根據你們和我們的情報，都證實今晚上‘百萬雄師’是要攻打武大、武測這塊‘根據地’的。根據這一緊急情況，我們師首長的意見是：一、鋼二司和其他革命組織在這裏的頭頭，迅速換上軍裝，到我們部隊去；二、其他同學立即疏散；三、天明後，我們立即發表生命，支

[1] 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與“8199”》，根據湖北省軍區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中國共產黨湖北省軍區組織史資料》（湖北省軍區政治部，1988），空15軍組織史資料。

[2] 記者郭昌琪手稿“顆顆都是純真滾燙的心——記武漢‘720事件’片段”，根據當年的日記整理，1993年3月。

持你們。”……四點十五分，空軍駐武漢某部一個連，全副武裝開進武測院內，明確表態支持“三鋼”、“三新”。鋼二司的革命小將們聽了，都非常高興，信心百倍地說：“毛主席派空軍來支持我們，有親人解放軍保護我們，我們什麼也不怕了。”他們把空軍的支持，作為特好消息，立即在廣播裏響亮地播出去。消息傳出後，給革命派極大鼓舞。據說，原準備攻打武大、武測的“百萬雄師”，迫於這一形勢的變化，就不得不撤退了。

23日清晨，一則振奮人心的重要消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出來了。“百萬雄師”被取締，武器被收繳，大長了革命派派的志氣。同學們從四面八方奔向武測的廣場，放聲高呼：“天亮了！”“公雞下蛋了！”“武漢解放了！”“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和小張、小李也忘記了疲勞，和同學們一起手挽著手，喊啊，跳啊，分享著這勝利的喜悅。

如今，26年過去了……“百萬雄師”早已得到平反，昔日的紅衛兵小將，今已大多數年近半百。過去的都已過去，歷史事件的功過是非，自有後人可以評說。但對當年同學們的那種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和對待同志純潔、真摯、火熱的心，都始終久久地、久久地使我難以忘懷。

周建平回憶^[1]：到上海後，主席住在西郊賓館。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汪東興也都在那裏，以後看到邱會作也來了。我們就打電話找江騰蛟，江馬上就來了。當時這是很秘密的，王洪文、馬天水他們都不知道。

[1] 周時任駐上海的空4軍政委；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P135，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

7月24日

凌晨，陳、鍾一行飛抵北京，在京西賓館受到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衝擊。三軍“無革派”並在大街刷出反徐向前的大標語。

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次日北京召開大會支持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歡迎謝、王回京；康生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中央同意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的提法。

周恩來到林彪處開會。

武漢造反派和“百萬雄師”各聯絡分站，分頭組織開會，商討局勢和緊急對策。

參考^[1]：楊成武 23 日飛回北京，下午 3 點到中央文革辦公地參加了周恩來主持的會議，向到會人員詳細彙報了毛澤東對處理武漢問題的指示。

楊成武飛返上海向毛澤東彙報後，剛給周恩來打完電

[1] 《楊成武將軍自述》289、291 頁。

話，毛澤東又找汪東興談武漢問題，說陳再道“頭腦簡單”，“毛澤東還說，他同意北京採取的措施。也就是說，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間，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七·二〇’事件上所採取的一切措施。”“晚飯以後，毛澤東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第二次進京的任務，然後問我：‘你過去認識不認識陳再道？這個人怎樣？’……‘你對武漢的事情有什麼看法？他會反對我嗎？’……‘是啊！我也是這樣想啊！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如果陳、鍾要整我，我們從武漢也出不來啊。’……‘陳再道在哪裏，還有鍾漢華、牛師長、蔡政委都在什麼地方？’‘你去告訴周總理，把陳再道、鍾漢華……都接到京西賓館去。你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查，二是注意學習，三是注意安全。’”

戚本禹回憶：總理去武漢回來後，講到他見主席勸說離開武漢時，主席講沒有想到住到賊窩子去了；但也說，有這麼嚴重嗎？我看他們還沒有下決心要扣留我。

碰頭會準備開7月25日大會支持武漢革命派，王力只是謙虛了一下，並沒有反對開會。發生“7·20事件”，是王力把事情搞僵了，他要負很大的責任。王力說是謝富治闖禍了，說的不對。就在王力還是英雄的時候，總理就給我們說，王力講了一些不該講的話，闖了大禍。本來是要先作陳再道的工作，再到群眾中去，結果王力不聽總理的去群眾中講話了。我們那時開玩笑，說王力是馬謖，喜歡出風頭亂講話，諸葛亮拿他沒辦法。有一張畫畫有馬謖，我們老開玩笑說王力走路的樣子都像馬謖。

謝富治對首都紅代會講：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文革，有個方針要解決武漢問題，好人壞人都請來了，小將多，北京的革命派要緊跟中央作工作，這些天

大規模遊行，明天開大會，表明我們支持，這件事不能只看成謝富治、王力，特別是謝富治，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把矛頭針對武漢一小撮，百萬雄師一小撮、軍內更是一小撮，不要面很大，要懂政策，明天下午五點要開一百萬人的大會，學生、工人、農民、兵中央首長出席，井崗山也講話。在天安門支持武漢革命造反派，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但有一件事告訴同志們，壞人來了很多，再厲害也沒關係，但不要抓。將來開了會，需要的話作面對面的鬥爭。需要的不打就不錯，但要有組織的找幾個學校，“百萬雄師”不要講“百匪”。聽說北京有，要集中起來，軍隊由陸空解決，中學、工人不要去，紅代會組織一下。矛頭對準陳再道、牛師長、蔡政委、王任重，將來把兇手搞出來。

歷史材料^[1]：8199 部隊從“百萬雄師”手裏解救出被抓的“新潮大臨委會”負責人張維榮、謝邦柱、彭勳。

回憶一^[2]：“百萬雄師”一萬多人前來攻打體院，攻擊隊伍的前頭已經到達了體院，尾部還在漢陽。“百萬雄師”的人攻進來的時候，正是黃昏的時候，我們在行政大樓堅守，當時樓上有許多學生和教授。我們為了威嚇“百萬雄師”的人，就把教練用的假手榴彈擺在窗臺上給他們看，還有當時我們手上有 38 支（小口徑步）槍，也分發下去了。天黑的時候，許多教授都不敢住在家裏，躲在水塘裏，這個水塘裏有比較茂密的荷葉，可以掩護他們，這個水塘裏螞蝗也很多，許多人後來一身都是螞蝗。由於“百萬雄師”的人一直進攻，因為樓上人非常多，如果讓他們攻上來，後

[1] 武漢鋼二司紅武測《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2] 趙子強，當時武漢體育學院學生，後任院革命委員會主任（2003年）

果不堪設想。最後就被逼開槍了，有一個體院三字兵的頭頭，名字叫做徐臘生的被擊斃。這個人是為“百萬雄師”帶路來進攻體院的，當時他頭上紮著白毛巾，坐在“百萬雄師”的汽車上。當時大概有幾個人手上的槍都開了火，到底是誰命中他的也完全不清楚，恐怕開槍者自己也不清楚，平時練習都不可能這樣準，命中他也純粹是偶然。因為擔心“百萬雄師”的人再來圍攻，第二天我們趕緊去請 8199 部隊派人過來，他們就派了兩個連隊過來駐紮在體院。

軍區幹部記載回憶^[1]：“突然，響起幾聲沉悶的小口徑步槍聲。槍聲響處，遊行隊伍中發出‘哎呀’一聲慘叫，倒下的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左肩冒出殷紅的鮮血……他叫李連銀，初中三年級學生，是武漢軍區司令部一位部長的兒子。戰士憤怒了……”

歷史材料^[2]：晚上，18 車暴徒包圍體院大樓，駐測繪學院和新華工解放軍前去制止武鬥；次日凌晨 5 時，暴徒出動 38 輛卡車、3 輛消防車、一輛裝甲車攻打體院，並刺傷制止武鬥的解放軍數十人。同時數十輛車暴徒包圍測繪學院，直到次日上午 11 時周恩來來電制止，車輛才散去。

回憶二^[3]：上海工總司在交大設了一個接待站，接待落難的武漢造反派。我和葉銘水一起，在上海音樂學院設立了一個武漢工人總部聯絡站，幫助逃難的人，同時也用電話跟武漢保持聯繫，在上海就跟工總司的人聯繫，工總司承認我們是唯一代表武漢工總的。在 7·20 晚上，我跟武漢

[1] 張健，《七月流火》，P130，鄂省圖內字第 57 號。

[2] 武漢鋼二司紅武測《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 年 8 月）。

[3] 李向陽，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2004 年）

水院聯繫，接電話的是陳明，她說百萬雄師把造反派趕得走投無路，晚上大家都跑到武大珞珈山上去躲起來了。後來上海工總司召開了一個大會，聲援武漢的造反派，王洪文主持這個會議，通知我去參加，我代表武漢造反派發言。這個會議還拍了錄相。在那個會上，王洪文很熱情，跟我握手，還熱烈擁抱，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和“四人幫”中的人物接觸的經歷……

參加“百萬雄師”的大學生薛建楓回憶^[1]：7月中旬，軍區就通知我要我準備渡江活動，計劃在20日左右。那時，我和一些大學生集中在漢陽皮革廠，為“百萬雄師”準備和整理談判的材料。謝、王去了幾個學校以後，我們對給謝彙報已經不報太多希望了，他們在各處都是支持造反派的。19日下午，“四點指示”在大街上散佈，也有了大標語，我們不相信。大約在晚飯後7點左右，打電話到中央文革，接電話人答覆說沒有這個指示（按：按照事態情理，接電人的確在當時不會知道在武漢周恩來24小時前講了什麼，也不會知道8201部隊與“百萬雄師”在街上宣揚的“四點指示”內容根據如何，武漢發生什麼事變），大家認為這是假消息。其實我們都被中央文革欺騙了，這個回答也是假的，挑動群眾鬥爭。他們故意挑動群眾不滿。你們不知道，我們有向中央文革送材料的渠道，你認識的司鳳（按：水院學生，北京人，幹部子弟）在北京專門負責。

後來，8201和“百萬雄師”衝了軍區和賓館，我們還去武昌街上看了；當時我們整理材料的學生還是不贊成他

[1] 薛建楓，當時是水院學生幹部、黨員，系筆者同大班好友，在“百萬雄師”總站服務；2006年3月與筆者交流文革研究問題時，專門回憶。

們這樣做的。我們請示軍區怎麼辦，軍區答覆說還是不要出去參與，要繼續準備材料。中央廣播王力回到北京消息後，在 24 日我們又請示，答覆說武漢形勢已經不可能談判，要準備材料上北京。26 號廣播北京大會，林彪上了天安門，我們知道一切已經晚了，於是放棄了彙報。“百萬雄師”也都說一切聽毛主席的指示，放棄了行動。

我也就隨一些人跑到隨縣農村呆了十來天……

歷史材料^[1]：“百萬雄師”頭頭召開會議還決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同時，“百萬雄師”出動了百餘輛卡車遊行，呼喊“打倒陳再道”的口號和“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

參考記載^[2]：“百萬雄師”對陳再道個人的命運並不大關心，但他們不能理解，北京當局為什麼要如此嚴厲地對待由大多數“純潔”、“可靠”的人民組成的武漢最大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他們能夠想到的唯一解釋就是毛和林受到了矇騙。開始，“百萬雄師”總部決定，只要毛和（或）林沒有公開表明其觀點，該組織就不投降。然而，林彪在 7 月 25 日出席天安門大會使他們的幻想破滅。雖然仍有少數人猜測毛肯定已被林軟禁，並發誓，除非毛親自責難“百萬雄師”，否則就要戰鬥到底。但大多數人現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態發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下面是“百萬雄師”一個分部開會的會議記錄摘要，它反映了保守派們的情感在那些日子是多麼的矛盾：

有人說：我始終不相信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就是

[1] 武漢鋼二司紅武測《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 年 8 月）。

[2]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P143-144。

劉鄧的人，他們所謂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態，我們也有罪，不表態也跑不脫。……另一個人說，如果我們明天參加了明天的會議，我們就是承認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動。我們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就是砍腦袋，我們也不表態。……

結論：不管通不通應該立即貫徹中央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百萬雄師”頭頭訪談^[1]：

章迪傑：40年後看“七·二〇”，我們認為這是反對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的壯舉，為鄧小平復出創造了條件。是我們一生中做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們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重大的犧牲。我家庭是妻離子散的，到現在淪為城市貧民。我們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屬企業退休待遇，經濟條件我最差，老俞退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現在住的建築面積57平方的一室一廳的房子是1995年單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萬多元買斷產權，還在每月交房租。老幹部工資高，還有許多東西不要錢，老百姓拿的錢少，任何東西都要錢。現在社會分配不公，“百萬雄師”基層的群眾都在企業，最遭孽。他們把我們當了利用品，當了奴隸。“百萬雄師”的老職工病死的不少。武漢輕型汽車廠廠辦主任周萬清，醫生要他檢查身體，要交600元檢查費，他找廠裏借600元，廠裏沒錢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條繩子，吊死在廠門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園醫院，武鍋的工程師吊死在職工醫院。

章迪傑：我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1] 見《“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榮根（2007年）。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為了解放廣大的勞動人民，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社會。檢驗社會主義國家的唯一標準是看廣大勞動人民的基本生存條件。我們認為劉少奇、鄧小平確實是搞修正主義的，毛澤東用組織程序很容易解決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問題，不應該把全國人民都捲入這場大災難。我認為文革中兩派都是受害者。

新華社記者張春亭回憶^[1]：中央電臺即廣播了中央勒令解散“百萬雄師”的消息，我和分社的一位記者還專程到“百萬雄師”總部觀察了他們撤離的情況，並隨訪了他們執行中央命令的態度。聽說我們是新華社記者，“百萬雄師”群眾的態度還都比較友好。但大多數有抵觸情緒，想不通為什麼要解散他們，並希望我們能幫助他們向中央反映。

楊道遠回憶^[2]：鋼二司司令部給我的信息——七月十五日晚，我與武漢通電話，鋼二司司令部告訴我：中央來人了，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七月十八日，武漢鋼二司司令部在電話裏對我說：昨天中央首長到了鋼二司司令部，做了重要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造反派要在制止武鬥方面做貢獻，要帶頭上交武器，拆除工事。今天鋼二司司令部及各總部都上交了武器，拆除防禦工事。七月十九日，鋼二司司令部在電話裏對我說：今日凌晨，謝副總理、王力、余立金等首長到了鋼二司紅水院，接見了三鋼、三司革聯、軍內造反派及其他造反派。中央首長大會講話說，武漢有一支鋼鐵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七月二十一日，鋼二司

[1] 張春亭回憶稿，《我與“中央文革記者站”》，2004年12月。

[2] 楊道遠，當年武漢“鋼二司”負責人，後為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此系其回憶錄《奉獻》片段。

給我的電話中說：百萬雄師和 8201 的一些人上街武裝遊行。王力被抓到武漢軍區大院揪鬥。謝副總理派人給鋼二司司令部下指示：中央能夠解決，你們不要參與。“不論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與百萬雄師發生衝突，都不要把人拉到軍區去。堅決！堅決！！堅決！！！”七月二十一日，鋼二司司令部給我的另一消息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東海艦隊開進了武漢，發表了聲明，並派人到了鋼二司，表示堅決支持鋼二司，還給鋼二司送來了東海艦隊的《聲明》：“……東海艦隊過境部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反革命暴亂。”七月二十四日，鋼二司司令部來電說，解放軍進駐了武測，保護鋼二司。凌晨“百萬雄師”進攻鋼二司（武測），解放軍排在武測校門口，阻擋百萬雄師，百萬雄師沒能攻進來，但傷了很多戰士，謝師長累倒在現場。

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旬，周恩來總理陪同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到武漢訪問，我們武漢造反派“三鋼、三新、三司革聯”的負責人到機場迎接他們。周恩來的專機先到達，我們一同在機場等待謝胡到來的時間裏，周恩來同歡迎他的造反派負責人在機場休息室做了長時間的談話。

周恩來談到“七·二〇”事件時說，七月十三日，毛主席突然決定要去武漢，中央其他人都說武漢武鬥厲害，不安全，要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堅持要去。於是周恩來立即著手準備，通知在四川的謝富治和王力趕緊去武漢，周恩來本人也於七月十四日趕赴武漢打前站。周恩來說，毛主席原來打算橫渡長江，七月十四日是三司組織渡江，十五日是“百萬雄師”組織渡江，十六日是造反派組織渡江，毛主席都沒下水，因為考慮到這裏邊有個群眾問題，如果毛主席參加了某一派的渡江活動，另一派的人就會因此受

壓。周恩來要我們體會、學習毛主席對待群眾的慎重態度。

一九六九年五月，解決武漢反復舊問題時，周恩來又提及了“七·二〇”。在人民大會堂中央首長接見武漢群眾代表時，周恩來說：我們是戰友嘛，“七·二〇”我們一起戰鬥過。

群眾代表反映武漢造反派受壓的不正常現象時說：現在武漢人們的印象中，好像當了“百萬雄師”還光榮些。周恩來說：當“百萬雄師”還光榮？那怎麼看待“七·二〇”事件呢？

7月25日

毛澤東就中央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作批示，並做其他批示。

全天，解放軍三軍指戰員佩帶造反派袖章，分別乘坐數百輛軍車在武漢三鎮舉行遊行，戰士高舉毛主席語錄向熱情歡迎的群眾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鋼、三新、三聯學習”！“向三鋼、三新、三聯致敬”！“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陳再道”！

下午，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集會，歡迎謝、王回京，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林、周，中央文革、軍委辦公室成員出席。北航學生井崗山在會上講話。林彪對蒯大富、韓愛晶說：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做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計最近一個月，將是全國矛盾激化的一個時期。

晚上，武漢三鋼、三司革聯和外地來漢造反派群眾和解放軍指戰員3萬餘人，在武漢測繪學院操場集會，憤怒聲討陳再道。

周恩來為次日召開的中常委擴大會召集預備會；並接見河南的軍隊幹部。

毛澤東就中央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組及中央各同志：代擬復電如下，請討論酌定。”毛代擬的復電稱：“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時十分來電並所附武漢部隊公告全文已經收到。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一）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二）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機報復。（五）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1]

得到毛批准的武漢部隊《公告》中將“七·二〇事件”稱為“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並稱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宣稱“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

毛澤東又對中央《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稿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建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P380-381，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毛加的一小段是：“黨中央號召：犯錯誤的人們覺醒過來，只要他們能夠認真改正錯誤，取得革命群眾諒解，這種人還是好的。”在毛加的這一小段之前的一段文字是：“黨中央號召：一切受蒙蔽的群眾應該迅速覺醒，改正錯誤，回到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革命群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徹底揭露‘百萬雄師’‘公檢法’中一小撮壞頭頭和武漢軍區內個別壞人的陰謀活動。”

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稿中被加上了“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後追查係王力所為。

周恩來講話^[1]：“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工總，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件……”

吳法憲回憶^[2]：(為次日召開的中常委擴大會)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召集我們開了一個預備會議。他在這個會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軟，要狠狠地揭發批判。周恩來講完話，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也相繼講了幾句。在這些人的講話中，數江青的調子最高，她說：“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陳伯達也說：“這不是一個一般的會議，而是一個場保衛毛主席的鬥爭”。

[1] 當日在接見河南軍隊幹部時的講話。

[2] 《吳法憲回憶錄》，P690，北星出版社，2006年。

“北航紅旗”的井崗山同學在首都百萬軍民大會上的講話：

……

我代表北航紅旗全體戰士向黨中央，毛主席親自派往武漢解決武漢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謝副總理，王力同志，表示最親切的慰問！最熱烈的歡迎！

同志們，七月二十日，在光榮的城市武漢，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年以來，也是建國十七年以來空前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事件！“七·二〇”反革命事件，完全是以陳再道為首的武漢軍區中一小撮混蛋，和武漢“百萬雄師”中一小撮人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一手策劃的！

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土地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土地上，在建國十七年後的今天，在武漢，為什麼革命左派被鎮壓，被屠殺？！為什麼中央首長被毒打？！為什麼黨中央，毛主席政策的陽光被遮蓋？！這到底是為什麼？！事實教育了我們：決不能以善良的願望，幼稚的心理去對待殘酷的階級鬥爭現實。

現在，我要以無比憤怒的心情，揭發和控訴陳再道之流和“百萬雄師”一小撮混蛋圍攻，綁架，游鬥中央首長的法西斯野蠻暴行。

我們敬愛的謝副總理，王力同志等中央首長，一片赤膽忠心，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支持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一到武漢，不顧休息，立即就深入到群眾中去，看大字報，和群眾見面，旗幟鮮明。他們向軍區的負責人指出：把一·二六奪權說成是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的說法是錯誤的；二·八聲明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工總必須翻案，因工總問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

平反；被捕的，一律釋放；他們還指出，軍區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這一切，都是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完全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的一切活動和工作給了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以極大的支持和鼓舞，大長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大滅了武漢地區以陳再道為代表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氣焰。這必然受到陳大麻子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百萬雄師”中的一小撮混蛋咬牙切齒的仇恨和瘋狂的反對。

七月二十日零點，三卡車“百萬雄師”的暴徒開始衝擊中央首長駐地——東湖客舍，聲言要揪謝、王到軍區回答問題；同時軍區門口開始集結成千上萬全副武裝的8201部隊，集結手持大刀、長矛的“百萬雄師”的隊伍。這時中央首長把陳再道，鍾漢華找了來。可是，反革命分子，老混蛋陳再道一見面就地對首長幸災樂禍地說：“這回可要靠你們做工作羅！我們無能為力呀！”

同志們！這是什麼話？！這兩句混帳話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陳再道的狼子野心！打倒陳再道！清晨六點，全副武裝的人突然出現在首長住的二號樓走廊上！他們殺氣騰騰，東鑽西竄，直奔首長的住房而來！在這樣緊急情況下，謝副總理和王力同志毫不畏懼，把門一開，挺身而出，厲聲責問道：你們要幹什麼？我就是謝富治！我就是王力！有什麼問題下午接見你們的代表！我們不去軍區！但是他們立即被越來越多手持長矛大刀的暴徒層層包圍起來，並湧到外面草地上大肆圍攻。

當時謝副總理和王力同志耐心地做工作，群眾的情況開始緩和下來。然而就在這時候，8201部隊及公檢法的大

隊人馬，端著衝鋒槍和上了刺刀的步槍，子彈上膛，打開機頭，湧了過來！一場大規模的圍攻，毆打開始了！跟在首長身邊保護首長安全的工作人員加上我們幾個同學，一共只有七個人，全部遭到圍攻毒打，他們用拳頭，旗杆，藤帽，沒頭沒腦地打，甚至拔出匕首！與此同時，他們把謝副總理推進房內，把王力同志連推帶打，綁架上車，帶到軍區去了！他們還抄了王力同志的房間，搶走了王力同志房間的全部文件，不停地狂叫：“王力被我們抓到了。”同時，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張根成同志，紅旗戰士尹聚平同志，也被他們抓走了！王力同志被他們一拉上車，就被撕掉了領章、帽徽，把軍裝的鈕扣全部撕開，內衣全部撕破，拉到軍區遊鬥，毆打，渾身多處受傷，一隻眼睛被打腫，左腳踩成骨折，對王力同志的圍攻竟長達十多個小時，一直繼續到下午三、四點鐘。同志們！這筆血債我們永遠忘不了！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

王力同志被他們抓去毒打，遊鬥以後，由於中央首長的嚴厲命令，軍區中某些人才不得不把王力同志送到 29 師師部，然後由 29 師政委陪同，在兩個半連的保護下轉移到山上。剛剛轉移一分鐘，29 師就被 8201 包圍了。然後他們又大肆搜山，王力同志險些再次落入毒手。後來，經過幾番危險的曲折，王力同志才到達安全地帶。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黨中央，中央文革的親切關懷下，在空軍部隊的大力協助下，毛主席派到武漢去的謝副總理、王力同志以及隨行人員，全部平安地回到毛主席身邊來了！讓我們一千遍，一萬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七·二〇”事件難道是偶然然的嗎？不！列寧說過：“只要過渡時期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的希望，

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七·二〇”事件的發生就是現實的階級鬥爭！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一刻也不能忘記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繼續革命！

……

綜合：

毛澤東通過飛抵北京的楊成武向周恩來傳達，對陳再道“保護起來”，請周向陳轉達“有錯誤就檢查。注意學習。注意安全”。毛並在次日將召開常委碰頭會的通知上批示五條：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且得到群眾諒解了以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人員和百萬雄師群眾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機報復；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在提及陳再道處，毛專門加了“同志”二字。（《微行》）

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回到北京大會。林彪主持，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及有關黨政軍領導人等出席。楊成武在上海聽毛澤東讓汪東興給周恩來打電話說：百萬人大會，楊成武、汪東興都不在北京，發表消息時要寫上他們的名字（目的是怕引起人們懷疑毛澤東不在北京）。（《楊成武將軍自述》292頁）林彪本未打算出席會議，會前臨時改變決定，打電話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

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葉永烈《陳伯達傳》436頁）此後，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全國各地駐軍及造反派群眾組織均舉行了歡呼謝富治、王力勝利回到北京，憤怒聲討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和“百萬雄師”的示威遊行。

在天安門廣場百萬人大會前，肖力把《解放軍報》社以她為首的造反組織的成員一一介紹給林彪。林彪問肖力，你們的組織叫什麼名字。肖答：叫造反突擊隊。林說：“對，要造反，要突擊，要徹底砸爛總政閻王殿！”（見王年一《關於軍委辦事組的一些資料》）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還對蒯大富、韓愛晶等紅衛兵頭頭表示，在軍隊問題上“要大作文章”。蒯大富馬上找到王力探詢“大作文章”的底細，一一點著軍隊領導人的名字看王力態度，認定是徐向前有問題。蒯大富連夜召開清華井岡山總部會議，傳達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講話及王力態度，對形勢的發展作出分析，提出“打倒徐向前”口號。

（按：2003、2004年筆者採訪蒯，蒯大富確認有關文章披露他當時言行的描述屬實）

吳德回憶^[1]：中央決定北京組織一萬人到西郊的西苑機場歡迎謝富治、王力。這時，我才知道謝富治和王力去向。因為是臨時通知，到機場的人不足一萬。都是陸陸續續去的……然後通知北京市組織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大會，說要由林彪講話。我記得天安門城樓上沒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還打著繃帶，說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講話中提到軍

[1] 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P52，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隊一小撮走資派問題。

北航當事人回憶^[1]：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全市整天示威遊行，聲討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的“反革命暴亂”。作為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北航紅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紅旗直接有人在“七·二〇”事件中挨了打，紅旗戰士們氣不打一處來。當時中央按照偉大領袖“武裝左派”的最高批示，武裝了北航紅旗（按：其實，25日天安門城樓上，韓愛晶就找周恩來要求武裝北航紅旗，隨後，北京衛戍區就給北航發槍與組織軍訓）。

韓愛晶等人決定北航紅旗持槍武裝遊行，由我負責領隊，要求絕對不能出事。我嚴格地挑選了持槍人員，檢查了每一枝槍，不准有一發子彈。韓愛晶說，帶槍為了嚇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腦袋。我問是否向衛戍區打個招呼，韓說算了，打了招呼反而麻煩。

我帶領荷槍無彈的數千名北航紅旗武裝部隊戰士，後面跟著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很快到達了新街口北口。

……

隊伍長驅南下，趕到西單，又遇上了麻煩。只見一排排警察組成多道人牆，足有上千人，不准隊伍前進。

沒有功夫扯皮了。我用高音喇叭大喊：“警察同志們閃開，保衛毛主席的請參加我們的隊伍，北航紅旗武裝部隊奉命保衛毛主席，誰膽敢阻攔誰就是反革命，同志們，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數千名持槍的紅旗戰士高喊著口號，正步向天安門方向挺進，後面跟著幾十萬大軍的遊行隊伍，警察們被衝了

[1] 當時“北航紅旗”負責保衛工作的戴維堤回憶，《逝者如斯》手稿（2001年）。

個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遊行大軍很快到達了天安門廣場。

武漢記者劉素珍回憶^[1]：“7·20事件”前後，我在北京辦《武漢烈火》小報，報道武漢的運動形勢；與《人民日報》記者，以及文革小組都有來往。7月25日，有人專門通知我，並帶我登上天安門城樓，作為武漢的革命群眾，參加了大會。記得下樓時，在樓梯上碰見總理，總理認出我來，我們停下來，總理問我：“你也造反了？”又問我是哪一派的；我說是“新派”的。他笑著說“新派、鋼派都好”。我問武漢情況怎樣了，最擔心主席的安全。他說：你們放心。我們已經從外面調了某某、某某部隊，把武漢包圍住了，陳再道他們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漢是安全的，是萬無一失的。

[1] 劉素珍口述（2007年3月）。劉為紡紗女童工成長起來的工會幹部、工人記者，時為《湖北日報》記者；1955-57年于全總幹校學習，曾參加北京的國慶聯歡活動，與周總理交談。參閱《往事如歌——武漢老新聞工作者軼事》，武漢出版社，2006年；劉素珍，《周總理教我跳舞》，《書市週刊》，2006年1月30日。

7月26日

下午，周恩來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晚上在林彪處開會。碰頭會內容是批判陳再道等武漢部隊領導人。

擴大的中共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中央給武漢軍區常委復電。會上批判了陳再道。周恩來、康生發言，謝富治定調“7·20”是陳再道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吳法憲辱罵陳再道，扇其耳光；要追究徐向前的責任。徐憤而離場。

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7·20”事件，批鬥陳再道。葉劍英不瞭解實情，持保留態度，沒有發言。陳伯達、康生、江青逼他表態。葉遂於29日寫書面發言，表示擁護中央處理的態度，還表示從這一事件應當吸取的重要教訓。

陳再道回憶^[1]：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召開。名

[1] 《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義上是討論問題，實際上是鬥爭我們……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成員、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和各大軍區、省軍區在京的負責人。……

總理在休息室聽了秘書周家鼎同志報告，氣憤地說：“真是荒唐！”並且跑著趕了過來，想制止他們，但這時人已經溜掉了。總理後來批評吳法憲搞武鬥不對，而江青卻表揚吳法憲，說“吳法憲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精神”。

《七月流火》記載^[1]：吳法憲說，“陳再道同賀龍、陶鑄、劉志堅關係密切，是中國的蘇哈托，是現在的張國燾，是鑽進革命隊伍裏的蔣介石，是解放軍的敗類”。

陳再道說了似是而非的話：“錯了，搞錯了，完全搞錯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搞錯的。”

當事人譚吉安回憶^[2]：作為中央文革記者站在京負責歸納中南地區報道的，我參加了7月26號批判陳的中央常委擴大會。總理主持會議。首先說“7·20事件”是“叛逆行為”的，是周總理；我記得，頓時陳、鍾害怕的快癱倒下去。此後康生和其他人才上綱的。我在場的擴大會上沒有發生武鬥，我沒見到，總理在場的。可能是在會下，其他工作人員，和軍委內部的小範圍會上動手動粗的，當時總理也不在場。

事件前，我在北京負責中南地區，歸納記者報道，看了報告情況，我本人認識還是傾向於軍區的；武漢的幾位記者的確對軍區支左工作有看法，但他們也從未專門指責

[1] 張健（曾在武漢軍區服役）撰，《七月流火》，P172-173，1998年，鄂省內圖字第57號。

[2] 譚吉安（原某大軍區政工幹部，曾借調中央文革記者站負責中南地區綜合工作，現已離休），2005年8月電話採訪。

陳再道做錯什麼（就如說支持武鬥呀，他們也沒有指責），他們的反映是客觀的。文革以後，陳再道回憶指責“快報”的意見不恰當，情況不是他說的那樣。當時我的感覺，不是武漢的記者受人影響說假話和傾向於造反派了，問題並非這個，我是感到他們的工作還不夠得力，一些事也說了，說得也不錯，但不一定抓住了中心問題。所以我們記者站對武漢的認識、快報反映的情況，與中央的認識還有距離，中央對武漢的表態，說明我們記者的認識還右了。

我認為陳再道作為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去支持一派搞武鬥，就不對了，所以事情發展到“7·20”這一步。當然，這些事後來的說法不一樣了，陳自己又翻過來認為他自己什麼都對了，那是很不妥當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理解當時的背景，沒有去錯怪他也諒解他，但作為一個老軍人，他的一些作法並不對。

吳法憲回憶^[1]：正式會議的第一天……周恩來讓大家開始批判陳再道和鍾漢華。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語，沒有一個人系統地發言。陳再道和鍾漢華則站在那裏，一言不發。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主席臺上，看著大家亂轟一氣，也是有點無可奈何。

中間稍事休息以後，江青和楊成武組織了一幫秘書來到會場。這些秘書一個個手持《毛主席語錄》，衝到陳再道、鍾漢華面前示威，責問他們為什麼要趕走毛澤東，為什麼要搞“七·二〇事件”。在責問過程中，就有人對陳、鍾二人推推搡搡，並打了陳再道。

到了下午再開會時，會議的氣憤就更凶了……我當時

[1] 《吳法憲回憶錄》，P691，北星出版社，2006年。

想如果飛機降落時發生了什麼意外，我就將成為黨和國家的最大罪人。一氣之下，我就衝到了陳再道的面前，訓斥他說：“你弄來那麼多的群眾，佔領了機場，結果總理的飛機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腦袋，你知道嗎？”我越說越氣，一時衝動之下，就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

空4軍第二政委姬應五回憶^[1]：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飛到上海，“張春橋從北京趕到上海，只有他的秘書知道，一到上海，他就直接到主席那裏去了。毛主席說：假如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們都去賣酒。他出了一個題目：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會不會成功？讓張春橋當組長，要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他們討論。後來張春橋回答說，會成功。因為群眾擁護文化大革命”。

武漢軍區上報“公告”，說“7·20”事件是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的叛變行動，王任重和陳再道是罪魁禍首；軍區領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以至發展到“7·20”叛變事件，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打到陳再道。“公告”報審文本已得到毛批准。

黃春光回憶^[2]：“七·二〇事件，”我對吳（法憲）叔叔非常遺憾，當時我在場，反正那時候各大軍區的頭兒都在京西賓館，那天批鬥的時候我們是去看熱鬧，因為我後來知道了是楊成武出面讓管理局組織了一幫秘書先衝上去，肢體接觸，但是我非常非常沒想到吳叔叔會上去動手打人，吳叔叔在這本書上（按：指吳的回憶錄）提了一句，但是提的非常不夠，沒有自己具體內容，沒有從自己內心有一

[1] 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P135，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

[2] 黃春光，當時為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學生，黃永勝之子；2007年元月。

種改過。當時我非常不理解，回去後我問我父親，我說為什麼總理坐在臺上，中央文革的坐在臺上，這麼高級幹部的會議上還搞武鬥？而且那還是三個老同志，當時鍾漢華身體已經不行了，就趴在桌子那兒，身體都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會議也不讓他們坐著，會議也不停止，當時我心裏非常的難過。……這個事情回來以後我問我父親，我說為什麼當時他們都不管？總理當時一直是陰沉著個臉，什麼話都沒有說。我問我父親，我說為什麼這麼多高級幹部都不管，怎麼能在這裏發生武鬥？後來我父親說：“個人有個人的態度，有人是唯恐天下不亂。”我就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了，當時我是很不理解。

綜合：

武漢造反派連日遊行聲討陳再道，8201與“百萬雄師”。大幅標語與漫畫顯示：武漢的天亮了，公雞下蛋了，工總翻案了！遊行人們高呼：“下定決心，為工總翻案；工總起來，武老譚完蛋！”

“百萬雄師”中的骨幹人員和武鬥分子害怕報復，撤至郊區、東西湖，再逃避到地縣。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北京支持你們》，《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你們》。

連日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各大報紙連續報道全國各地群眾和部隊上街遊行，譴責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的行徑，表示支持武漢革命造反派。武漢群眾議論，中央通過對武漢事件的反映報道，集中地點名支持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確認的各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

蒯大富在清華大學團派總部擴大會議傳達林彪、王力的談話。團派頭頭認為，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原四方面軍的人。他們人多、力量大。武漢7·20事件就是原四方面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要把反他的力量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後團派總部就武漢事件發表“嚴正聲明”，說“武漢事件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嚴重事件，它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縱的，這只黑手就是混進軍內走資派徐向前，武漢事件是全國問題的一個集合點”。團派50多人衝進徐向前的家，查抄其住室和辦公室，帶走一些文件和圖書（5鐵櫃）。周恩來及時指示制止。

對蒯大富的起訴書^[1]：根據林彪的旨意和王力的示意，蒯大富分析斷定林、王要把矛頭指向……徐向前等人。於是，蒯大富從當晚到二十六日，連續兩次主持召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會議，以及“井岡山兵團”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兩總部”會議，傳達林彪的旨意和王力的示意，並按照他自己的判斷，作了所謂形勢分析，具體提出“打倒徐向前”的口號。二十七日，蒯大富便指使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軍事動態組”在軍委領導機關附近貼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標語。二十八日，又親自坐車上街窺測動向。二十九日，進而又發表了“井岡山兵團”所謂“打倒徐向前”的“嚴正聲明”，指使清華大學學生、“井岡山兵團總部”成員鮑長康帶人去抄徐向前的住所和辦公室，並綁架徐向前。……三十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又召開了有全國大部分省市和一些軍事單位“造反”頭頭參加的所

[1]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起訴書（82）京檢分審字第157號。

謂“全國形勢討論會”，蒯大富在會上進一步煽動“打倒徐向前”。蒯大富還指派清華大學學生“井岡山兵團總部”成員任傳種，於七月二十九——八月八日，先後向二十三個省、市、地區派出近二百人，攜帶有調查徐向前內容的調查提綱，進一步搜集材料。蒯大富通過上述一系列煽動活動，把“打倒徐向前”推向全國。

蒯大富^[1]：“七·二〇事件”大不大？應該說很大很大……當時文章做得大不大？應該說很大，很大。天安門廣場召開五十萬人大會，全北京市大遊行，大示威，《人民日報》通欄大標題，中央電臺向全世界廣播，不能說這文章做得不夠大。我們必須承認，當時文章做得這麼大，肯定是得到毛主席批准的，至少是知道的、默許的。做這麼大的文章，難道僅僅是為了反對陳再道嗎？不是，顯然是衝著徐向前同志去的。……在“7·25”大會以後，我夜以繼日，連續搞了許多反對徐向前同志的行動。……在文革初期，我確實搞過反對劉少奇同志、徐向前同志的活動，並且造成嚴重後果。

[1] 蒯在1983年3月二審時的“辯護詞”。

7月27日

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在武漢傳達。稱“你們為著保衛毛主席親自領導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出非常巨大的業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

中央繼續召開揭批陳再道會議，周恩來因有事，安排楊成武參加主持。（《楊成武將軍自述》292頁）

周恩來接見湖南省軍區負責人和群眾代表，批評造反派搶軍火。談到武漢事件時說：他們有個好處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萬雄師”和獨立師都帶有臂章。“百萬雄師”犯了錯誤，它一個群眾組織，可以教育。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乘勝前進》。

回憶^[1]：林彪主持會議，決定先在內部撤銷陳再道和鍾漢華的職務。“在這關鍵時刻，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提出‘我們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粟裕傳達講話^[2]：武漢白色恐怖由來已久，陳再道大批抓人，已抓起來 500 多人，並竭力散佈對中央的不滿，他們反對毛主席發動和支持的奪權鬥爭，軍委十條也不傳達，惡毒地攻擊總理，他支持組織“百萬雄師”，這個組織共九個頭頭……他們從 1 月開始就和無產階級革命派對立。就是在中央的“六·六”通令下達後，他們還大肆挑起武鬥，陳再道提出的以武鬥制止武鬥，徹底消滅革命，六、七月份武鬥最厲害。

陳的秘書揭發說，陳再道得知周總理要來武漢，就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陳再道真是囂張之極。

參考記載^[3]：是日，“百萬雄師”最後解體。在最後關頭，總部告誡各分部頭頭及活動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勢，他們必定會對保守派進行報復，因此，“百萬雄師”成員有必要暫時離開武漢。因此，有許多人跑回老家的親朋好友家避難。……幾天後，“百萬雄師”的 13 名主要頭目被捕，其中 8 人一直被關押到 1972 年，一人死於獄中。

“百萬雄師”頭頭回憶^[4]：七·二〇後，我帶了 7、8 個

[1] 《楊成武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 年，P294。

[2] 1967 年 7 月 27 日粟裕在軍委會會議傳達。

[3]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P145。

[4] 俞文斌（“百萬雄師”一號頭頭，2006 年 4 月）。

人去“新華工”，張立國卻把“公安聯司”的搞來了，把我抓走了。同去的7、8個人全都是“百萬雄師”的高層人員。這一關就是4年另8個月。……他們在道路旁邊佈滿了荷槍實彈的造反派，氣氛相當驚人。反正是“新華工”的把“公安聯司”的人搞來把我們全部抓了。

歷史材料^[1]：這天，8201部隊的千多名指戰員乘坐40多輛卡車在武漢三鎮和大專院校舉行遊行，高音喇叭呼喊出“8201部隊堅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等口號。

晚上，陳伯達和謝富治等中央首長接見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鋼二司楊道遠、新華工聶年生講話，大專院校革命幹部聯絡站的毛遠耀（測繪學院第一書記）也參加接見。

張昭劍申述^[2]：“武漢軍區經過長達十一年（1971年至1982年）的反復調查、審議、核實，對我在‘7·20’時臨危受命，圓滿完成保護王力的任務是肯定的。

“關於以老首長陳再道的名義連續發表在《中國老年》雜誌，其中有一篇以老首長陳再道署名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的文章。我看過後大惑不解，明明武漢軍區黨委對我長達三年的審查，又經過八年的復查復議，已對我的問題作出結論並上報中央軍委和總政，（我想武漢軍區對我的審查報告，事先也會徵求陳、鍾首長的意見）怎麼陳司令員又發表與武漢軍區黨委對我的審查報告大相徑庭的文章呢？當時，整黨剛剛開始，但已有人拿著該文章串聯。在這種突遭‘滅頂之災’的情況下，我便打電話

[1] 武漢鋼二司紅武測《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2] 原29師政委張昭劍“楊先財、石仲泉二位同志”信中的申述，（2002年）。

向武漢軍區黨委書記、政治委員嚴政詢問，嚴政委的答覆很乾脆，說他（指陳）那是錯誤的，由他自己負責，我們黨委不知道。我又詢問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謝鏗忠，開始他說未看到這篇文章，過了幾天，又答覆說，已借閱了一本。第一，確與事實嚴重不符；第二，確與軍區黨委的審查報告大不相同；第三，整篇文章的口吻是謾罵式的。我曾對此給陳再道司令員寫過申訴說明真相的信（附上一份，請閱），過了一段時間，有人告訴我說，陳司令員否認是他授意寫我的，他並不知道對我的如此評說。後經瞭解，原來是他的秘書（某領導幹部的兒子），拿著稿件到中共武漢市委，要市委指示《長江日報》發表，被市委婉拒，但市委一位老領導批示可打印一百份，供內部傳閱。（有人悄悄送我一份打印件，並說明上述情況）。該文以後又陸續出現在《南方週末》和《武漢文化報》上連載。經武漢軍區善後辦黨委（武漢軍區撤消後的留守機構）反映給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後，由省委宣傳部責令《武漢文化報》停止轉載，而《南方週末》僅把我的名字去掉，重新登了一遍。之後，北京‘6·4’風波的頭面人物嚴家其、高舉也將該文彙入其編寫的《中國文革十年史》一書，當有人給嚴家其去信質詢時，嚴妻高舉曾回信致歉。”

“今年，原武漢軍區一位老首長出了一本自傳，其中把‘七·二〇’事件做為一個專題來寫，這是很有必要的，但卻對我進行謾罵和凌辱，尤其令人難以想像的是竟大編謊言，說假話欺人。而這位老首長也是參加了武漢軍區黨委對我的審查報告的審議，雖然自傳中把我的名字代之以‘某師政委’，但這和點名並無二致。”

某中間派教師的反思^[1]：在武漢事件前，我是紅三司的高校教師，我們的觀點是中間偏逍遙，既不贊成三鋼三新在社會上公開揪軍區領導人，也不同意“百萬雄師”用武裝圍剿來鎮壓文革中的不同觀點，反對攻打學校、工廠。造反派罵我們是“康老三”。三司到事件前已經沒有自己獨立的觀點，三司革聯造反以後，三司頭頭實際上已經倒向“百萬雄師”，我們少數教工成為散兵游勇，自嘲是“空降兵”。中央來人，我們內心是歡迎的，希望中央出面制止武鬥，促進各派聯合。19號傳出他們在水院講話，顯示了中央偏袒造反派，後來“百萬雄師”又在大街上刷出所謂“四點指示”，我感到中央這樣並不利於解決實際問題。但是，7月20日上午我知道“百萬雄師”——特別是8201部隊衝擊軍區，大鬧軍區，又到東湖賓館打人抓人，我到軍區大院去看到那混亂不堪的局面，在湖北大學前看到軍人、群眾遊行，衝擊學校的場面。我覺得這種用武裝向中央施壓，用暴力強行壓制和蕩平不同觀點的群眾，是完全錯誤的，違背文革當時的政策，也違背了起碼的黨紀軍紀與國法。儘管三司司令部發聲明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我們當時不同意鋼二司的造反言行，但他們也從未衝進軍區、機場，堵斷鐵路呀，他們還沒有這麼極端的暴烈行為。現在為事件平反，是否定“反革命暴亂”“兵變”這些錯誤的過頭說法，撇開林彪、“四人幫”的干擾。但我和一個學法律的老同學每每談到當年的悲劇，仍然認為武漢事件本身，反映出肇事者違背法理，與現代政治文明精神不符合。今天難道會允許部隊的某一個部分，以及群眾的某一群體，用暴力公

[1] 武昌某高校教師王某（2005年6月）。

開反對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某一具體決策（哪怕是你認為中央錯了的決策），衝擊軍區和政府要地嗎？

比如 89 年北京戒嚴，若有一個師的長官不同意鄧小平的做法，違背中央軍委調令，甚至唆使部分士兵去衝擊中南海，用武力抵制戒嚴部署，那會是什麼後果呀！難怪陳再道和一些高級將領當時也不贊同軍隊入城了。說明他至少從武漢事件，內心反省到軍隊貿然捲入政治鬥爭的可能悲劇。別看他在武漢事件平反後處處以英雄自居，他就不懂得軍人在政治上抗令是玩火嗎？這裏有文革當時的歷史背景、黨內鬥爭的事實、法理和倫理、軍隊問題多個層面的道理，現在都攪在一起了。解決一個傾向的問題，另一傾向就沒人說了，大家還以為陳再道在毛、周面前撂挑子、放手失控的嚴重失職行為，全部都對了呢！

當事人回憶^[1]：1972 年陳再道去福州當副司令員，給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有過一封信，省市革命委員會在委員中傳達；信中說雖然他現在解放了，但不認為當年武漢事件時他就對了，他保證不會翻這個毛主席和周總理已經定了的案。

毛澤東後來的反思^[2]：“在武漢，我同你們談話時，當時王力的態度就很凶。我們有個錯誤，第一天到武漢就應找陳再道做工作”；“（王力）沒有先做好部隊的工作，然後再去做好兩派的工作。沒有好好進行調查研究，下車伊始就哇裏哇啦地叫，這種人沒有不犯錯誤的”。“前一次王力他們解決百萬雄師就是不聽我的，不先同部隊講好，做好工作，

[1] 柳英發，原武漢實驗中學學生（2005 年 3 月）。

[2] 毛澤東 67 年 9 月與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與曾思玉、劉豐談話。《毛澤東傳》，P1498，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而急急忙忙到群眾中去表態，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個馬蜂窩，著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們搞得太凶了”。

戚本禹回憶：查事件後臺的問題，當時有彙報說：王任重、張體學有問題，支持了軍區和事件；於是佈置了北航去抓張。叫學生去西山示威和抄徐海東家，是江青和葉群決定的，好像葉群對徐海東的意見比較大，認為他有問題。於是我才安排叫北航學生去西山。在審查我時我承擔了自己佈置學生行動的責任，並說不要去追究學生了。

王廣宇、韓愛晶等追憶^[1]：戚本禹叫通知北航趕快去西山，去查徐海東與武漢事件的牽連問題，急的說“他們再不動就叫別人去了”；王廣宇緊急通知“北航紅旗”將原湖北省長張體學（在京）“抓”回來查證徐海東（是否與武漢事件有關）。張體學與北航的韓愛晶言談，溝通得十分融洽，張動情大哭，韓授意張給毛澤東寫信表態，爭取中央和造反派諒解；次日，張即隨同北航學生去徐海東的家（原北航紅旗“紅一連”學生證實）。7月29日，周要求衛戍區要回北航揪去的張體學等領導。周也曾指示所有進入抄徐向前家的清華大學人員全部撤走，保證徐及其家屬、工作人員安全、徐家的東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搶走的要全部向清華大學追回。後又命文革辦事組通知“北航紅旗”退回在徐海東家抄走的物件。

王廣宇^[2]：關於參與策劃“武漢事件”的後臺，中央文革小組通過各種途徑獲悉，徐海東和張體學有重大嫌疑。據掌握的情報，在“武漢事件”前，原湖北省長張體學頻

[1] 王，時任中央文革辦事組負責人，韓，時為北航紅旗戰鬥隊負責人；2004年6月、2005年10月訪談。

[2] 王廣宇，《“七二〇”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組激起的波瀾》。

頻和北京的徐海東接觸，張曾去徐家七八次之多。於是，中央文革主管辦事組的小組成員戚本禹受命追查“武漢事件”後臺。首選造聲勢，佈置北航“紅旗”紅衛兵到西山軍委負責人駐地遊行示威，喊“打倒陳再道”的口號。隨後又讓北航“紅旗”紅衛兵去揪正在中直招待所保護性學習反省的張體學，讓張體學交代他和徐海東的關係，每次去徐海東家都談了什麼問題？中央文革還讓北航“紅旗”去徐海東家查抄策劃“武漢事件”的黑材料。

雖然採取了上述措施，中央文革小組追查“武漢事件”後臺的收穫不大，沒搞到什麼材料。張體學的交代和“武漢事件”不沾邊，抄徐海東家也沒抄出什麼黑材料。揪張體學、抄徐海東家兩件事，後來周總理曾派聯絡員去北航，要他們放回張體學，還讓查抄人員歸還從徐家抄出的文件、物品。

王力回憶^[1]：“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

“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第一，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

“七·二〇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佈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佈置。”

[1] 見《王力反思錄》，P1011，P1027。

章迪傑訪談^[1]：7月26日深夜，“百萬雄師”聯絡總站舉行了最後一次常委會議。會議決定：“俞文斌、楊道安、孫德洲、章迪傑、李本富與武漢軍區領導交涉處理善後事宜。其餘常委幫忙指導群眾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親靠友，儘量避免遭受重大打擊。

7月27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楊道安開車，乘坐一輛蘇式吉普，跟著造反派慶祝勝利大遊行的車隊，從漢口3506工廠到達武昌洪山賓館的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當晚葉明副政委、杜憲章、夏奎部長等領導在洪山賓館接見了我們五人。俞文斌提出，請武漢軍區幫助我們印發一個聲明，“百萬雄師”的責任由全體常委承擔，聽候處理。我們要求對“百萬雄師”的廣大成員不要打擊報復，應該讓他們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當夜，我們住宿在洪山賓館。次日，因軍區沒能幫助我們印刷聲明，我們決定留下孫德洲、李本富等人告訴我們的去向。然後我們三人開車直奔新華工，希望新華工郭保安等人起調停的作用。我們一向認為新華工與其他造反派不一樣，他們是大學生，理解中央的政策要好一些，同時也希望新華工能幫我們將聲明印發出去。我們被安排在一棟樓房的三樓，我們吃飯、洗澡都有人跟著。7月31日凌晨兩點，公安聯司一號頭頭田學群等人來到我們的住地，向我們宣佈：“你們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亂集團的首犯，現在對你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說完就將我們三人（俞文斌、楊道安、章迪傑）押送到漢口老法院（當年市公安局十三處）的看守所牢房。在此處關押一個星期後，8月6日晚，我們被戴上手銬，轉

[1] 見《“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傑等採訪記》，榮根（2007年）。

往寶豐路湖北省第二監獄，其他幾名“百萬雄師”負責人也先後入獄，集中關押在寶豐路監獄，直到1972年3月才解除監禁，被關押的時間長達4年零8個月。

7月28日

《人民日報》社論《向武漢的廣大革命群眾致敬》。《解放軍報》社論《受蒙蔽無罪 反戈一擊有功》。

毛澤東說：“一年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有點亂，這裏亂，那裏亂，沒有什麼關係。像武漢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來，就好解決。”

王力回憶^[1]：毛在上海決定武漢駐軍的有關調動，獨立師調出整訓。並說一年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有點亂……沒有甚麼關係。像武漢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來，就好解決。

謝富治接見武漢造反派講話：今天來找你們談一件事，你們比我們還清楚，就是殺回武漢去。武漢現在來了三千多人。希望你們統統殺回去。武漢的形勢是好的，希望大家打回去，回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要給大家講幾句話，希望大家按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政策辦事：

[1]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

第一件事，革命派本身要大聯合，第二件事對少數壞分子要恨、要鬥爭，像劉鄧陶王陳牛蔡這些人。革命造反派內部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對保守組織我們要做工作，武漢形勢雖然很好，但保守組織並沒有垮，你們應該聯合起來，不要為這個事，那個問題爭論不休。過去的事都過去了，當然對走資派要算總帳。我是湖北人，是真的又是假的，我生在湖北，但什麼也不知道。我們都有毛病，缺點，錯誤。二·八聲明的大方向是對的，罵了託派、投機商，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是託派，那不算錯誤，不要抓小辮子。

陳再道專門收集什麼工總十大罪狀，“百萬雄師”十大好處，全是造謠。你們對一小撮要狠狠地批判，聯合起來做好保守組織的思想工作。我今天將北大、清華、北航、地院、師大、礦院叫來了一些，你們按照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教導，幫助武漢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只要是革命派就聯合起來，合乎毛澤東思想的就支持，北京的同志千萬千萬要注意。

革命的大聯合、三結合、革命的大團結，這都是偉大領袖提出來了，革命派最聽毛主席的話，如果在北京就幹上了，那怎麼得了呢？雲南、四川的造反派分為兩派，保守派還沒有打完，你們就打起來了。希望武漢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分為典型的幾派不太好。要讀毛主席的書《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是不要武鬥，二是所有造反派讀這本書。武漢造反派受了相當時間的壓力，特別是工總，九·一三，你們剛剛還沒有翻身，還要做很多工作，對百萬雄師也要作工作。把武鬥停下來，認真讀毛主席的書，團結左派，同陳、王鬥爭，作“百萬雄師”的工作要擺事

實講道理，奪“私”字的權。我們不是個人，一個小團體，而是一個整體。我的歡迎詞講完了。

毛澤東在上海指示：“那條驅逐艦可以留在武漢支持左派，再看幾天。”

繼而，決定：

“武漢由15軍或2個師（指44、45師）抽一個營去接梅嶺、百花的任務，原警衛隊、部隊全部調出來整訓。

獨立師可以考慮調出整訓，過去已有這個計劃。

原梅嶺、百花的原工作人員態度不好，沒有轉變的一律調出來（包括園林工等）。

飛機場到梅嶺的通道要15軍部隊或29師擔任，通道警衛控制起來。

碼頭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萬雄師的人態度沒有轉變，態度不好的調出來，調換。

游泳船由海軍調，木船由空軍調，人員不好的調換”。^[1]

回憶一^[2]：在“七二〇”之後，“百萬雄師”的暴行也沒有受到追究，在公安局有一個下令追查“百萬雄師”罪行的彭處長，後來還判了四年徒刑，進過牢房。

回憶二^[3]：“7·20”以後“百萬雄師”只是表面上垮臺了，實際上總是壓造反派，軍隊支左也壓，說的是支左，主要還是支持幹部掌權。三結合以後，保守派的人有人抬，不行也行，我們總是被人盯著抓辮子。

[1] 見楊成武回憶《徵行》，P141。

[2] 原工造總司頭頭吳焱金，武漢無線電廠技術幹部（2003年）。

[3] 謝望春，女，童工出身，勞模，共產黨員；工造總司成員，九大、十大中央候補委員，曾任武漢市紡織局黨委副書記。1977年後，在學習班裏被審查兩年多（2003年）。

回憶三^[1]：“723”中央表態之後，大家才揚眉吐氣了。從心底感到解放，許多人歡欣鼓舞，說武漢的公雞下蛋了，武漢的工總翻案了。那個時候“百萬雄師”都作鳥獸散，回漢陽之後已經沒有對手了，我也感覺到非常疲勞。這個時候已經是一邊倒，“百萬雄師”和“三字兵”都蜂擁而來找我們，有的還寫了血書，要跟著我們革命。那簡直是勢不可擋，那些從前的保守派惟恐別人說他們自己不革命，“三字兵”都搞了一個組織，來造他們自己的反。

調查彙報^[2]：黨中央一聲廣播，嚇得他們丟盔卸甲，7月26日他們坐上八輛公共汽車狼狽逃竄，先跑東西湖，東西湖有廣播。又跑到肉聯，肉聯也有廣播，最後跑到姑嫂樹黃家大小灣一帶。在逃跑之前，他們曾經開了緊急會，說中央已經表態，壞頭頭要打倒，於是就把原來出頭露面的人物作為一線，其他的作為二線潛伏下來，伺機活動，主要任務有三條：(1) 派人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家鄉去發動貧下中農鬧事，向北京遞告狀材料，這個手段很毒辣；(2) 派人立即去北京告狀；(3) 如果上兩條不能實現，就繼續蒙蔽欺騙郊區的農民，採取農村包圍城市，對革命造反派進行反撲。

他們逃跑的過程很狼狽，跑到黃家大灣一個地方就丟下十九部話機，三匹綢子的袖章、長矛、槍支等，有些匪徒半路溜掉了。第二線的人由8201把他們轉移到安全地點。作戰部長在漢陽十里鋪進行秘密活動，計劃成立“江城飛虎隊”，準備搞槍。他們的罪惡計劃很快被發現，經過武漢

[1] 原漢陽三中學生謝保安（2003年）。

[2] “公安聯司”調查彙報，1967年10月28日，載“七月風暴”第4卷，市委“人民勤務員”總部編印。

警備區同意，我們去到那裏抓了他們，在回來的路上，這位作戰部長不老實，想搶槍，我們的戰士發現開槍，身上中了四彈，送到醫院後這個壞蛋自作自受了。還有三、五個人一起偷偷活動，這些人都在我們的視線之內。他們再一個鬥爭方法就是寫反動標語，向報社電臺寫匿名信，矛頭對準我們偉大領袖和我們的副統帥，這些反動傳單在東西湖發現多一些。

這個組織現在是基本上已土崩瓦解分崩離析了，有個別頑固的跑到東西湖、黃陂等地，也有的跑到通縣、通城等地。絕大多數已陸續回來，在外面的寥寥無幾。二線的頭頭大部分已經向我們自首。

百萬雄師頭頭回憶^[1]：我們反對了中央文革、“四人幫”，其實就是針對了毛澤東。的確，當時實質上就是反對了毛澤東，但是毛的文革全錯了呀……

“七·二〇”這個事，王力要負責，謝富治始終不講話。江青要負最大的責任。

難道我真的就是殺人惡魔嗎？肯定地說，“百萬雄師”裏有壞人，造反派裏也有壞人。那時我本來想將那些壞人清除出去，但我已經被包圍了，清除不了，只得留著慢慢教育；後來情況失控，很多事情我就不一定清楚，事後才知道。武鬥、殺人，很亂。我這個人像個殺人者嗎？我的像是不是很惡？

上海造反派頭頭潘國平追憶^[2]：毛主席從武漢到上海不幾天，我被叫到他的住處，在上海工總司頭頭中他單獨接

[1] “百萬雄師”一號頭頭俞文斌（2005年11月、2006年5月、3月採訪）。

[2] 潘國平，時為上海工總司主要負責人之一，現居海外；2006年5月在紐約文革研討會上與筆者回憶、討論。

見了我一人。看起來他心事很重，我記得他談到武漢的保守派工人不理解 and 抵制文革運動，專門問到上海是如何做保守派工人的工作，群眾是如何團結起來的。我講了上海的作法和自己的認識，他若有所思，像自言一樣說：是啊，為什麼工人階級內部就一定要分成兩大派組織呢？！我體會他還是在說武漢事件後他在思考的問題，他看見有些工人群眾跟不上文革，心裏是沉重的。

空 15 軍王精忠追憶^[1]：武漢事件發生時，我正在北京，沒有見到過程；事後，即被通知回到部隊駐地，並隨 45 師進城支左，也採訪過有關事件，8 月又到警司做秘書工作。我原來在上甘嶺特功八連工作過，這次見了老戰友，聽大家講到有關事情。7 月 20 日凌晨，該連在三營的杜教導員的率領下，被緊急調到武昌，配合護送毛澤東一行轉移到漢口機場，當時還有 8341 和武漢空司的警衛部隊。到機場以後，該連參加了機場警戒，指戰員知道毛主席是從賓館的後門走的。

其實這個師的部隊，在《二·八聲明》以後，奉軍區的命令，也曾經進城參加數日的環市武裝遊行，並協助其他單位逮捕造反派工人頭頭。

原省委副秘書長劉真回憶^[2]：記得還是 1967 年 4 月多，我寫信批評軍區支左工作犯了錯誤，陳再道他們就恨我了，社會上一派說我是造反派《二·八聲明》的黑後臺，弄些小中學生來威脅我，軍區也這樣看我；任愛生被他們關起

[1] 時為空 15 軍 45 師部和軍部的政治和文化幹部，後參加武漢支左工作，2005 年 5 月、2006 年 3 月回憶。

[2] 劉真，時為湖北省委副秘書長，運動初派往水利電力學院任工作隊長，曾亮相於三鋼群眾組織，參加湖北省“高幹聯”組織（1967 年 8 月，2005 年 6 月）。

來。到6月份武鬥起來，他們又說王任重是《二·八聲明》的黑手，要抓造反派保王任重的理由，十分荒唐。

“7·20”前後的幾天，省委、東湖、水院這邊形勢都很緊張，茶港一帶省直的家屬區，也有“百萬雄師”和軍人遊行的，並揚言要抓人，在傾向於三鋼造反派的幹部和家屬心裏，說實話還是恐怖的。文化革命弄成了這個樣子！

鋼二司駐京聯絡站張濤回憶^[1]：“7·20”時我在北京，剛發生事件時，我們消息也是從二司司令部傳來的，並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消息也是混亂的。甚至還有林辦的秘書，慌裏慌張的居然打電話找到我們聯絡站，竟問“你們知道毛主席在哪裏”？！

1967年春夏，我們送文革小組的材料，開始通過解放軍報記者姚克強的多（有說他是總理聯絡員的），後來通過學部的吳傳啟轉林傑交的多，是哲學系老師給聯繫上的。但4、5月後，很難找到他們。我不知道開始查吳的歷史問題了。後來抓“516分子”，說武漢的“516”，是我從吳傳啟牽過去的，我是總根子。

王力反思^[2]：1. “武漢事件”是黨中央、毛主席的錯誤決策引起的。即武漢軍區支左犯了方向性錯誤、百萬雄師是保守派組織。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群眾性大規模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很了不起。這說明只要是違背了廣大群眾意願的錯誤決策，無論是打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旗號，還是偉大領袖親自坐鎮都沒用，都會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可惜當時黨中央，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沒

[1] 張濤，時為武漢大學學生，鋼二司駐京聯絡站負責人（2006年11月）。

[2] 王力1988、1993年反思，見《王力反思錄》“再版後記”（未刊稿），2003年12月。

有認識到這一點，毛主席到晚年也沒認識到。更可惜的是，至今人們包括研究黨史的人也沒認識到這一點。還在糾纏“武漢事件”是不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策劃的。其實，當時兩個反革命集團都還未形成，他們之間當時不過是既互相勾心鬥角，又互相利用而已。

2. 總理一到武漢就撤換了百萬雄師的服務員，並把東湖賓館的警衛任務由軍區改為武空的措施也是不妥的。這引起百萬雄師群眾不滿，也引起軍區和陳再道同志的不滿。

3. 作為陳再道將軍是沒有什麼錯誤的。作為軍區和地方負責人對中央決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而且在得知這個決策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後，馬上表示接受和支持。要說陳再道將軍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不應該當眾頂撞總理，這讓林彪抓住了把柄。因為林彪早就認為：“全國只有北京、武漢、成都三個大軍區不聽中央的。”林彪也正是抓住陳再道當面頂撞總理的事，說成陳再道武漢軍區要搞兵變，使局勢更加複雜緊張。

4. 人們都忽略了“武漢事件”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即時任武漢軍區政委的鍾漢華老將軍。鍾漢華同志經歷了整個事件的全過程，主席、總理傳達中央指示精神他全在場，清楚瞭解整個事件的過程和內幕。但鍾漢華將軍始終抱著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態度，從沒有做過什麼回憶錄。在病危去世前還特意囑咐家屬和辦公室給王力發訃告，請王力同志參加追悼會。

5. “武漢事件”的嚴重後果，林彪、江青利用“武漢事件”煽風點火，掀起“抓軍內一小撮”的風波。特別是林彪藉機在全國範圍內各地到處抓陳再道，達到在軍內排除異己，扶植親信，為逐步形成的“林彪集團”奠定了基礎。

7月29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乘勝前進》。《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決同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戰鬥在一起》。

《紅旗》發表1967年第12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

△清華大學團派總部就武漢事件發表“嚴正聲明”，說“武漢事件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嚴重事件，它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縱的，這只黑手就是混進軍內走資派徐向前，武漢事件是全國問題的一個集合點”。團派50多人衝進徐向前的家，企圖綁架徐，未遂；結果查抄其住室和辦公室，帶走一些文件和圖書（5鐵櫃）。

周恩來得知抄徐家事情，指示制止：（一）所有進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員全部撤走。（二）保證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屬子女和工作人員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東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責成北京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

徐向前回憶^[1]：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一些“造反派”無中生有，說徐向前是武漢事件的“黑後臺”，是陳再道的“黑後臺”。於是北京城裏和全國各地，到處是“打倒陳再道、鍾漢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聲和大幅標語。在首都所謂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批鬥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的同時，大街上遊行的人不斷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號。許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對打倒徐向前。葉群公開出面，對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負責人說：“徐向前還有什麼值得保的嘛！”於是，7月29日夜，清華大學蒯大富一派數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們翻牆進入院內，竄入臥室和辦公室，把整個樓內翻騰得亂七八糟，又強行拿走了徐向前親自保存文件的五屜鐵皮櫃。書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們還在住處的牆壁上、走道的地板上、檯曆上、茶几上，到處寫上“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和標語。

徐向前的秘書，立即將上述情況報告總理值班室。總理指示：（一）所進人員全部撤走；（二）保證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屬子女和工作人員的安全；（三）東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責成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由於總理這三條指示，徐向前的家屬和工作人員才從危難中得到解脫，被抄走的文件、資料和信件，才陸續找了回來。

[1]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2章，P837，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7月30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專政最堅強的支柱》。

《紅旗》發表1967年第12期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連日來，“兩報一刊”和新華社通過各種媒介，報道全國軍民支持武漢問題解決，並對全國的群眾組織，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傾向性表態。

毛澤東指示，宣佈曾思玉、劉豐的任命，對陳鍾的宣佈可以晚一點；獨立師分編到44師、45師、29師，不離湖北，集中整訓。陳再道可在武漢報紙點名，王任重可在全國點名。軍區的公告，可在全國張貼，但不登大報，中央復電發到縣團級。中央辦公廳批准武漢軍區“公告”。

清晨，周恩來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我已派飛機去瀋陽接你，你立即乘機來北京，調你去武漢軍區工作”；當日旋接見曾思玉、劉豐，代表中央宣佈了武漢軍區新領導的任命。

上午9時，周恩來在釣魚臺5號樓他的辦公處召集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武漢問題的指示，其中包括：曾思玉、劉豐到武漢任職，軍隊內部可以宣佈。對陳再道、鍾漢華的

職務如何宣佈，可以下一步辦；陳再道可以在武漢報紙點名，全國報紙暫不點名；武漢軍區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報，可以在全國各地張貼，但不登報，中央電報可以發到縣團級，縣人武部可以傳達。

周恩來將葉劍英關於 26 日擴大會議的書面發言，批示印發到參加會議的同志。後來，又命文革辦事組通知“北航紅旗”退回在徐海東家抄走的物件（張體學同志帶路）。

△ 中央辦公廳關於傳達 7·26 復電的決定：

中央決定，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復電可內部傳達到連隊和公社武裝幹事（地方上可傳達到與部隊相應的幹部），但不要對外張貼，現將復電全文發去，請即遵照辦理。

曾思玉回憶^[1]：聽到周總理電話後，向總理報告，瀋陽正在下大暴雨，飛機暫時不能降落和起飛。總理回答，那你抓緊時間，雨停後立即起飛來北京釣魚臺接受任務。暴雨停後，曾思玉乘機起飛，於上午 10 點鐘抵達北京西郊機場，周總理派車在機場等候，下飛機後直奔釣魚臺。周總理說：“曾思玉同志，調你去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武漢軍區空軍劉豐副司令員任軍區政治委員。當前主要的任務是掌握軍隊，調整部署，穩定武漢局勢，做大聯合的工作。軍委空軍政治委員余立金同志和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李真同志正在武漢王家墩機場等候你，武漢的情況由他們向你作詳細介紹。飛機在西郊機場等候你，馬上起飛去武漢。”

[1] 參見康永保，《親切教誨終生不忘——曾思玉面謁毛主席紀實》，大連出版社，2003 年，P86-87。筆者 2009 年 7 月到大連採訪曾思玉將軍並證實。

曾思玉和劉豐一起乘機於下午 13 點抵達武漢王家墩機場。

周恩來第八次接見河南代表，講話中提到武漢：“對於武漢‘百萬雄師’，不要叫他們‘百匪’。他還是一個組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還要爭取教育這個組織中的群眾，啟發他們覺悟，揭露他們的壞頭頭。他們的壞頭頭還是依靠他們來揭。比如河造總、十大總部也有這樣的壞頭頭，也要他們組織中的群眾起來揭發，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來，那樣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犯了嚴重錯誤，幹部和群眾組織的壞頭頭要到群眾中去考驗，一要承認錯誤，二要堅決改正，認真改正，三要得到群眾的諒解。群眾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認錯誤，認真改正錯誤，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要通過群眾來證明。四要給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要幫助受蒙蔽的群眾提高覺悟，使他們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五不允許壞人鑽空子，破壞我們的社會秩序。如果壞人操縱、工人散了，威脅無產階級專政，威脅革命領導，不怕，那有廣大群眾支持。在武漢證明了這一點，陳再道那樣掌握一個大軍區的兵權，現在他一叛變，最後暴露了，那個地方的問題可以解決的最徹底。‘百萬雄師’好像了不起，實際沒有什麼了不起。”

△ 兩日來，周恩來三次同謝富治、楊成武、王力、劉豐開會討論武漢問題。（《周恩來年譜》）

7月31日

毛澤東指示，建軍節招待會，各軍委副主席都要出席，各軍區在京同志都要參加。

△ 周恩來就林彪、江青等反對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出席慶祝“八一”建軍節招待會事請示在外地的毛澤東，毛批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衝擊的老帥都要出席。（《周恩來年譜》）

周積極安排受到批判衝擊的老帥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親自通知徐向前，佈置行車路線，及時阻止了因追查“7·20問題”衝擊原四方面軍老同志。當晚招待會上，韓愛晶把張體學給毛澤東的信送呈周恩來。周對張印象本來就不錯，一直在設法保護和選擇可供湖北“三結合”的革命幹部，很快中央即讓張回到武漢，準備恢復工作。

△ 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發佈緊急通告。

提出：

……為了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的

指示，為了掀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產的新高潮，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更加偉大的新勝利，特發出緊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立即掀起一個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的代理人 and “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的大批判、大鬥爭的高潮，把他們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鬥倒、鬥垮、鬥臭。

二、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積極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把革命和生產兩副重擔勇敢地挑起來，作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作“節約鬧革命”的模範。

三、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最愛解放軍，我們要積極響應毛主席“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作擁軍愛民的模範，要和人民解放軍廣大指戰員一起，共同擔負起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擔，一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四、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牢記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偉大教導。要有膽略、有氣魄解放受蒙蔽的群眾。受蒙蔽的一般群眾，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對他們決不能採取諷刺謾罵、打擊報復的態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武器，對他們進行耐心、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爭取、教育、團結他們，熱情地歡迎他們起來造反，歡迎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基礎上，逐步達到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鬥爭矛頭狠狠集中對準黨內最大的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的代理人
和“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

五、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從來都是把“百萬雄師”中
受蒙蔽的群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嚴
格區別開來的。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我們熱情地
歡迎“百萬雄師”中受蒙蔽的群眾迅速猛醒，起來造武漢
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百萬雄師”
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的反，儘快地回
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
促生產。

六、對於那些犯有嚴重罪行的“百萬雄師”中的壞頭頭，
只要他們不再為武漢地區黨內、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賣力，改邪歸正，我們同樣給予出路。如果繼續與人民為敵，
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將給予嚴厲的打擊，並積極協助
有關部門依法懲處。

武漢事件背景資料

(1967年1月至7月12日)

1月01日、02、04日

武漢數十萬造反學生、工人在新華路體育場連續鬥爭王任重，並給他戴高帽子，省委第一書記、省長張體學、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修等陪鬥。數千保守的“革命職工聯合會”工人包圍省委，要求收回中南局書記李一清表態（批評該組織一些言行）；其主要頭目赴穗揪李一清，未果。

1月03日

中央文革接見北京大學代表，江青說：“你們內部左派都應拆開，不能搞自由結合。王任重就主張自由結合，這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宗派主義。”“中央文革沒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聯繫，王任重是作為北京市委的顧問，那些聯絡員，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實際上是包打天下。清華也是這樣，他想拖我們犯錯誤，關於北大停止鬥黑幫，搞選舉，王任重沒告訴我們。”“王任重不是一般執行反動路線的錯誤，而是耍手法，耍兩面派。”

1月04日

中央文革主要成員接見武漢“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

赴京人員，陳伯達指責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是中南問題的後臺老闆；“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係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後來變本加厲”。“打倒陶鑄”標語立即貼遍京、漢和全國。

△ 該日毛澤東問周恩來，江青說陶鎮壓群眾是怎麼回事，周答，不是鎮壓，是陶的態度有些不好。

1月03—05日

武漢地區“革命職工聯合會”的部分基層組織工人數千，停工北上告狀，圍堵車站、機場，到省委造反。造反派紅衛兵斥之為“保皇派”“資反路線”的新反撲。並與造反的工人、幹部組織一起，批判保省市的大專院校紅衛兵與“職工聯合會”。5日，“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人總部”“工總”）組織抓有關“聯合會”成員，多達三千餘人。

1月09日

“工人總部”領導改組；改選勤務員為：朱鴻霞、胡厚民、周光傑、李洪榮、郭紅兵、姜詩臣、胡崇元、侯良正、余光順九人。胡崇元任黨小組組長。

△ 造反派接管《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湖北報接管委員會與《人民日報》編輯部通電話，人民日報總編輯部表示堅決支持。

1月10日

“三司”（武漢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中學生衝進教堂，搶出所謂“三反”罪狀以及窩藏的整理群眾的材料。

1月11日

毛澤東出席政治局會議。徐向前說：“軍隊不同於地方，

不同於學校、工廠、農村，不能和一般單位那樣搞大民主，否則就會搞亂，搞癱瘓，要定下來這麼一個方針。”葉劍英說：“軍隊要穩定，地方越亂，軍隊越要穩。”

△ 省委副秘書長劉真致信省委第一書記、省長張體學，批評張在對待“職工聯合會”、省報和王任重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的錯誤。其前，省農村工作部主任任愛生寫大字報揭發王任重、張體學的問題。

1月14日

“工總”發起，13個組織起草“告武漢全市人民書”，實際參加單位40多個，提出省市奪權問題。因造反派組織內部衝突，這次大聯合沒有成功。

△ 《解放軍報》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中說：“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還必須繼續放手發動群眾，還要經過激烈的鬥爭，衝破重重阻力。”“這種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在我們軍隊裏，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當面是人，背後是鬼……”

1月15日

省軍區對省市電臺進行軍管，造反派抵制軍管，自己奪權。

1月16日

“工人總部”電信分部接管電信局。

1月17日

“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井岡山兵團奪市機電局權。造反工人組織“工總”、“工造”的聯合指揮部出現分歧。

市銀行“紅尖兵”等造反組織接管市銀行系統。

△造反派繼續公開批鬥王任重。中旬始，王任重和省委主要領導被武漢造反派學生扣押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

1月18日

新華工“紅色造反團”配合公安廳造反派奪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二司”）等駐廳造反派指責是假奪權，抵制和反對。

△晚上，張體學派出省委副秘書長張華和呂漢榮到武昌紅樓，與5個造反群眾組織商談奪權和聯合辦公問題。

1月19日

武漢地區學生、工人造反組織聯合發佈“告全省人民書”，提出“一切權力歸造反派”口號。深夜，“職工聯合會”千餘成員衝擊位於武昌的“工人總部”等造反組織辦公室。造反派面對已處於潰散的省市保守派群眾組織，提出“聯合會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的極端口號。

1月上中旬

造反派連續批鬥省市領導幹部，各級黨政組織相繼癱瘓，學校、工廠、機關已出現奪權先例。

1月20日

各造反派派20多個組織50多萬人在各區集會遊行；捉了一批幹部戴高帽遊行。晚上由“工人總部”發起，“工造”、“紅工兵”、“紅教工”、“二司”、“新華工”、“新湖大”、“北航紅旗”、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西軍電（臨委會）、“南下造反大隊”11個組織，在紅樓開會，商討成立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問題。

△湖北省軍區說按中央命令，從20日起全國電臺實行軍管，不得播送地方爭執問題，試圖再度接管電臺，造反

派堅決抵制。22日軍區負責人對此承認造假，並作了檢討。

1月21日

毛澤東在安徽省軍區請示報告上批示：“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又及。”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方針，全軍必須堅決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向前、劍英同志迅將主席批示轉發全軍照辦。”

△ 是日，南京軍區黨委向林彪並中央軍委報告：首都“三司”駐安徽聯絡站等單位向安徽省軍區提出，22日到23日在合肥召開15萬到20萬人大會，要軍區派部隊警衛會場，否則就是不支持文革……。

△ 武漢11個組織繼續開會，決定增加“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軍”、“三司”等共商聯合事宜，決定“工人總部”派員為籌備委員會臨時負責人，“工造總司”派員為辦公室主任，決定成立抓革命促生產小組及省市委奪權小組。

△ 華中工學院各造反派學生、教師、工人組織實現聯合，成立“紅色造反司令部”，簡稱“紅司（新華工）”。

△ 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唐金龍及政治部呂炳安副主任，在軍區討論揭發賀龍問題的會議後突然自殺身亡，新華工、二司與軍事院校造反派組織調查組調查，社會傳軍區上層有問題。

△ 王力回憶：“周總理說：‘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呢？現在看來，不能細分，

應該奪過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以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一定後期再判斷。’”

1月22日

毛澤東同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談話：“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並批評造反派對幹部武鬥，“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幹什麼？”“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對群眾我們不能潑冷水，但要說服。”“張體學、江渭清這些人過去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錯誤，要給他們改的時間，錯了就批。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

△ 各群眾組織繼續開會，落實籌建中的總司令部工作人員，討論起草《宣言》等事宜。

1月2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下午，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林彪和幾位常委，葉劍英、徐向前，江青、王力、蕭華、楊成武參加。毛澤東指示：“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我們這個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數幹部和下面大多數留用人員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農民起來鬧革命奪得來的政府。這就很容易產生、保留封建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

軍委碰頭會就軍以上機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的名義向毛澤東提出建議。

△ 武漢軍區成立支左指揮部，孔慶德^[1] 副司令任辦公室主任。

△ 是日，武漢造反派熱烈歡呼人民日報 22 日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其後，全市絕大多數基層單位迅速奪權。

各組織通過成立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及司令部《宣言》；之後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省、市奪權小組和辦公室分別開會。工造代表提出辦公室是最高權力機構，相當於常委，並透露出他們在漢口另外成立了一個總司令部，對工人總部有看法。深夜，工造在新湖大召集有關奪權的會議，排斥了工總、二司、紅教工等。

1 月 24 日

徐向前向林彪反映軍隊混亂情況，提出：軍隊要穩定，這樣亂下去不行，要搞幾條規定，如不能成立戰鬥組織、不能隨意揪鬥領導幹部、不准奪權等。林彪連連點頭，說：是的，軍隊不能亂，我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當即口述，秘書記錄，整理了七條。接著提出請葉劍英、聶榮臻來研究一下。葉、聶來後，都贊成七條，確定由葉、聶、徐去徵求中央文革意見，去後，中央文革把周恩來也請來了。反復討論通過了七條。

[1] 孔慶德（1911-）山東省曲阜縣人。一九三〇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四軍第十二師三十五團排長，第十師三十團副連長、連長、營長、副團長、團長，獨立第十師師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教導團團長，三八五旅七六九團團長、十四團團長，冀南軍區和三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二縱隊四旅旅長，第十縱隊副司令員兼桐柏軍區副司令員，河南軍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五十八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河南軍區副司令員，中南軍區炮兵代司令員，武漢軍區副司令員，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 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討論聯合奪權問題，工造代表放風，工人總部當領導我們不同意，就不參加大聯合。分裂局面一觸即發。

1月25日

華中師範學院三司內部造反，二司學生配合砸華師的三司總部；三司與二司群眾矛盾公開。

△ 上午，各組織代表開會，選出籌備委員會常委七人，工總、工造、九一三、紅工兵、二司、新華工、三司各一人。工造散發以其為主體，不包括工總、二司、九一三等的《公告》，受到抵制批評，不得不作出檢討。晚上，由於工造堅持要將在漢口成立的總司令部與武昌的總司令部並列，簽字問題未有解決。

1月26日

毛澤東對草擬中的七條批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衝擊領導機關問題。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制，左派衝擊，要歡迎。”……毛澤東對《關於奪權的若干情況和問題》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眾提出，究竟哪些機關可以奪權，哪些不能奪權；奪了權的人們對待不同意見的群眾應取什麼態度（應爭取多數，不能排斥）。請加以研究。”

△ 上午，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開會，商討奪權事宜，通過《奪權公告》、《致敬電》等。工造代表不到會，後趕到武昌會場，進門說“工人總部的頭頭修了”“二司我們信不過”，“有他無我，我們是水火不相容的”。為保證下午奪權會議的召開，根據多數代表意見，二司代表宣佈暫時退出常委，聲明保留參加的權利。

△ 武漢在各造反組織權力分配上意見分歧而分裂的情況下，一部分造反組織奪了省市權力。下午6時，3千人在洪山禮堂展開奪省委權大會，工總代表任執行主席，會上宣讀《奪權公告》等文件；張體學、宋侃夫被拉出示眾，會後遊行。

△ 武漢局勢緊張，“職工聯合會”下屬組織在漢陽豬鬃廠圍攻造反派，挑起武鬥，造反派出動幾十輛汽車援助。23時，工總、二司通令省報、電臺不准發《奪權公告》消息。深夜，二司學生冒雨搶回三顆省委印鑒。二司司令部將所奪得印鑒送軍區機要保存。

△ 事後張體學致信地市縣，要各地承認造反派的奪權。

人民日報社論《用實際行動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報道了哈爾濱軍隊支持造反派的事蹟。

1月27日

葉劍英傳達毛澤東關於軍隊文革的意見。

△ 凌晨，工造等奪市委的權，發表公告，搶去市委大印。武漢二司和工人總部、“9·13戰鬥兵團”（武漢鋼鐵公司的造反派工人、幹部）、紅工兵（高校工人）、紅教工（學校教工）五個造反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宣佈“1·26奪權無效”，至此，這些群眾組織與工人造反司令部、紅司（新華工）、新湖大等的矛盾公開。

1月28日

毛澤東對擬訂的8條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林彪拿到批示後，對毛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

△ 市人民武裝部策劃正式成立“紅武兵”組織，該組織以各單位原基幹民兵和復員軍人為主；思想傾向與瓦解中的“聯合會”基本一致。

△ 武漢鋼鐵公司幾個造反派組織實現聯合，奪取公司黨政財權，挑起革命、生產擔子。

1月29日

經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聯絡，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武漢鬥爭王任重指揮部”赴京代表團，聽取彙報，並講話：

“王任重又吹又寫報告，說武漢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健康……吹抓了一些人，有三、四百人，主要是學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漢是全國的一面紅旗一樣，我們懷疑文化大革命的紅旗為什麼抓那麼多的人？當時北京沒有抓，實際上武漢情況沒有揭穿，所以是一個‘先進紅旗’，到北京來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插手北大、清華……”

“實際上武漢的革命派受苦最深，七月下旬北大趕走了工作組，八月初我親自去北大，清華鬧起來了，但武漢十月份才動起來，才收到你們的材料，可是陶鑄王任重又把你們哄回去了。以前陶鑄包庇王任重，武漢大學五月下旬就搞文化大革命……張體學主要是王任重搞壞的，王任重到北京來搞了幾個小阿飛非常惡劣，你們武漢很受影響……中央工作會議上我點了張體學一下，他太不象話了。……你們到北京找陶鑄訴苦，陶鑄大發脾氣。……你們進行批判鬥爭，剛剛開始一個月，你們就爭論，鬧意氣了。為什麼要分開呢？大聯合搞嗎，鬥了幾次？武大門了沒有？要大小會結合。批判材料要準備充分些。趕快回去聯合行動。……當前，面對面鬥爭把陶鑄揪出來中央不同意，我們不能違背中央指示，我還應服從黨的紀律，但我不能保他。

要根據形勢發展再看看。”

1月30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浙江問題的決定；指出浙江黨政軍當局壓制群眾，“而且引起多次群眾鬥群眾惡例，特別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軍委上述的決定發表之後，更加不能容許……”

△ 工總等組織在體育場批鬥張體學、宋侃夫（市委書記）。

1月31日

晚上，工總等組織主要負責人會議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二司以司令部名義致工人總部的公開信，堅決不同意社會上公開揚言搞臭群眾組織的輿論，同時認為要堅決清除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群眾組織內部存在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堅決和你們站在一起”。

△《紅旗》雜誌編輯林傑接見二司司令部駐京人員，問：“這次開槍殺死了幾個人？打死了保守派吧？”同學答：“因為他們要奪軍區的槍。”

△ 中央發出關於石河子問題的通知。

△ 陳再道回憶：元月各大軍區領導人在京東賓館開會是討論了擬議中的7條，“有一天，毛主席出席會議（按：可能是22日那一次），並作了重要講話。從他的講話中可以聽出，他對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是反感的，他認為這樣做，裏邊“一定有壞人”。在講話中他告訴大家，如果碰到這種情況，要退避三舍、使壞人暴露出來……當時我是這樣理解的，毛主席講話的意思是要我們以退為進，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如果退避二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來

硬一點的辦法，就要執行“軍委八條命令”，追究衝擊軍事機關的壞人。

2月01日

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恩來同志：最近以來，許多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起不了教育人的目的。這裏我順便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堅持文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才能達到教育人的目的。應當分析武鬥的大多數是黨內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起的，他們有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黨的政策，降低黨的威信。凡動手打人應依法處之。請你轉告給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 省直工交、財貿系統 30 多個組織和新華工、新湖大等在新湖大召開“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反革命經濟主義大會。工總等 2 個組織發佈“關於加強市場管理的緊急通告”。

△ “新華工”主持批鬥張體學，“九一三”、“新華農”東方紅、“三司”等參加。

2月02日

毛澤東在王任重的妻子（給毛的）信上批語“我意應說服紅衛兵，讓他就醫；紅衛兵有事，視王病情許可，隨叫隨到”。

2月04日

全軍文革傳達中央文革文件的批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的頭目，應當立即採取專政措施，

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眾。這個意見並電告廣州軍區。”

△連日來，工人總部等造反群眾組織發出號召，出動3千多人，數百輛卡車連續3天在車站、碼頭、倉庫貨場突擊搬運積壓物資。

△《長江日報》公佈王任重材料，並刊登戴高帽的照片。

2月05日

工總等組織負責人討論會。武字151部隊張智華提出：目前出現一股批判你們反對你們的風氣，在這個時候大搞左派是極錯誤的。……你們面臨四大敵人：黑省委、軍區內一小撮、保皇派、機會主義（託派）；引起與會者共鳴，“九一三”和“工總”表示不再整風，會議決定發表聲明。

2月07日

武漢“二司”紅衛兵起草，有“工人總部”、“9.13戰鬥兵團”、後勤學院“紅色造反野戰軍”、“紅衛軍”、“紅工兵”、“紅教工”、《長江日報》“毛主席路線戰鬥兵團”以及“北航紅旗”、“西軍電（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駐漢聯絡機構簽名的“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形勢的聲明”（後簡稱“二·八聲明”），分析運動形勢，指責一些造反組織向革命派鬧分裂，號召掌握大方向，向王任重為首的“黑省委”開火；擬在次日發表。

2月08日

毛澤東會見卡博、巴盧庫，講：“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裏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

要洗刷幾百萬，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什麼辦法？毫無辦法。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不聽。”“如果中國天黑了，地也黑了，你們也不要怕，要相信一點，全黑也不會的……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

△ 部分造反派“二·八聲明”在“長江日報”發表。“工造總司”等組織包圍報社，阻止“聲明”散發。自此，全市圍繞“聲明”是否毒草展開大辯論。造反派分裂，矛盾開始激化。

△ 是日陰曆除夕，造反派在武漢水院鬥爭王任重。

△ 軍區副司令韓東山、副政委葉明商議批判“二·八聲明”。

△ 軍委發佈對衝擊廣州軍區的軍事院校、文藝團體的命令，希望他們分清是非，立即離開軍區機關營區；對於地方各革命組織和革命師生，請不要介入，自覺捍衛毛主席批發的軍委八項命令，立即離開軍隊營區。

2月9日（春節）

毛澤東對林彪7日送審的《關於軍隊在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中不准任意開槍的規定》稿作了一些修改，並批示：“關於支持真正左派廣大群眾問題，現在出現許多搞錯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於被動。此事應總結經驗，寫出幾條指示。請速辦。”

△ 葉劍英把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稿送林彪審閱，報告稱：“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會上的指示，起草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今天上午召集三十二人參加的會議，進行討論和修改。特

呈上請審查批示。”林彪 10 日轉報毛澤東。毛批示“照辦”後軍委於 11 日發出。

△ 二司“革命造反報”發表觀察員文章《迎頭痛擊湖北黑省委的更大反撲》，直接批判省委，同時涉及原來保守組織，特別是造反派內部分歧鬥爭。

△ “工總”等 7 個組織揭批王、張經濟主義，將王任重、張體學拉出示眾。

2 月 10 日

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就公開點名打倒陶鑄問題嚴厲批評陳伯達。

△ 由於展出內容的分歧，“三司”、“新華工”部分學生砸了武漢展覽館展出的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展覽；“二司”與“三司”、“新華工”矛盾進一步激化。

2 月 11 日

周總理接見西安代表講話：王任重病的很厲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來，休養一個時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見，昨天我才給軍區下命令，限時間，今天才把人交出來。你看，連我都不相信了，這是什麼問題？無政府主義。（講古田會議決議）現在你們重複四十多年前的錯誤，我心裏很難過。你們只能比我們更好，如果你們比我們當初作得還差一點，那是我們犯罪。

△ 武漢部隊批評“二·八聲明”的嚴正聲明稿內容，已經在軍區內部討論，並透露給各個組織，在全市流傳。部分軍事院校發表聲明，說軍區聲明是毒草。

△ 個別群眾造反派衝擊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

△ 中央發出關於新疆建設兵團文革的規定。

2月13日

軍區保衛科趕走軍區大院造反派，停止軍區機關文化革命，宣佈王任重軍區保護下在總醫院休養。徐向前在京召集陳再道、鍾漢華、李迎希（副司令員）、張廣才（省軍區政委）開會，說軍區7條不是黑7條，指示穩定軍隊內部；要陳鍾趕快行動起來抓人。

△ 省委、省人委造反派鬥爭張體學，王樹成、張旺午陪鬥。

△ 得知軍區將發表聲明，“二司”勤務員楊道遠對軍區聯絡員表示，軍區有權發表聲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必須由軍區負責；同時司令部向全體戰士發出“關於不准衝擊軍事機關”的命令。

2月14日

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會議批評陳伯達。

2月16日

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碰頭會，以老帥、副總理為一方，中央文革為一方，就文革做法問題發生激烈爭論。

△ 中央軍委作出《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

△ 軍區黨委命令機關造反派交出李迎希、張廣才揭發陳再道的錄音；後抄走該錄音。

△ 8201部隊（省軍區獨立師）政委蔡炳臣與師長牛懷龍以8201黨委名義致信中央軍委（送在京開會的陳再道司令、鍾漢華政委），說武漢地區局勢緊張，有一個地下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組織；軍區情況複雜，唐、呂身死，李迎希副司令等有接管兩級軍區的計劃；張體學幕後指揮搞假奪權，造反派組織互相打砸搶。據說軍區將29師8199部

隊)調市內,卻未與獨立師通氣。“社會上流傳‘血染武漢’的謠言,說有兵變的危險”。“這些跡象表明,可能有一個大的陰謀”。

牛懷龍、蔡炳臣在陳、鍾進京開會時,在部隊內散佈“李、張想奪軍權”,“兩級軍區都有問題,不能信任,時刻有兵變的可能”。“武漢市有民兵武器××萬多支,落到了不可靠的人手裏”。“武漢軍區調了部隊,他們崗哨謹嚴,雷達學校爛掉,高級步校領導失靈,軍內造反派已到連隊串聯,情況複雜,可能發生兵變”。“在兩級軍區癱瘓的情況下,我們師的擔子很重,不能按常規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防止反革命暴亂和兵變”。

2月17日

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專職武裝幹部參加文化大革命問題通知》。

2月18日

在《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送審稿上毛澤東批“退總理:同意你的意見,討論後再發表,並把三結合的思想寫進去。再則,以後重要社論都應這樣做”。2月22日送審稿毛批“照發”。

△經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同意,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指出武漢軍區派部隊進駐紅旗大樓意在維持秩序,防止武鬥;軍隊內造反組織在《二·八聲明》上簽字,不能代表武漢部隊,更不能代表解放軍;武漢軍區不支持《二·八聲明》;認定其大方向錯誤,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大方向的。表示部隊將對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該聲明用宣傳車、直升飛機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單

位散發。

△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決粉碎反革命逆流》：“在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階級敵人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這絕不是偶然的。”

2月19日

毛澤東對成立西安革命造反委員會做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排斥交通大學一派，支持極左派的主張，值得研究。應當繼續做調查工作，不必急於公開表態。破壞工廠，極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張破壞工廠。以上請酌。並告文革小組。

△ 葉劍英簽發了批復成都軍區妥善處理萬縣“主力軍”的電報。

△ 武漢部隊發佈公告，指責部分造反派把鬥爭鋒芒指向解放軍和領導幹部，是反革命逆流。

△ “二司”首屆紅代會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召開。

△ 軍內外傳說徐向前在武漢對張廣才說陳不是三反分子，後於19日離漢。

2月21日

中央關於軍委8條的說明：中共中央認為，中央軍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條命令很好。這個命令，除第七條關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

△ 武漢軍區兩位副司令帶隊，武裝解散漢口高級步校和後勤學院（後字248）、通訊學院（總字423）、軍區衛生學校（武字202）、空軍護士學校等軍內造反組織，派出武裝工作組進行整風。對武漢地區軍事院校、文藝團體等10個單位4300餘造反派，逮捕拘留190多人，行政看管56人，

批鬥 700 餘人，監督檢查的 200 多人。引起地方造反派同情與反對。

2 月 22 日

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在京接見 8201 部隊給軍委送信的人，表揚 8201，表示軍區姚、孔、楊、葉是可信的，李迎希、張廣才是來交代問題的，徐帥已找他們談話，他們已承認腦子發熱，起來奪權。“湖北省軍區對 8201 的領導要拿過來”。後任命牛懷龍、蔡炳臣分別為武漢警備區司令與政委，將公檢法和其他要害部門軍管任務全部交 8201，將軍事院校的部隊交 8201 領導。要求加強社會調查，摸清各組織頭頭是誰，大方向對不對，對“二司”的情況搞個材料送黨委辦公室，不要報支左辦公室。

2 月 23 日

青海發生“《青海日報》事件”（駐軍對造反派奪權的《青海日報》社強行實行軍事管制，與佔據報社的造反派“青海八一八紅衛隊”衝突，開槍打死打傷 300 餘人，其中群眾亡 169 人，傷 178 人，部隊亡 4 人，傷 26 人）。青海省軍區向軍委報告後，葉劍英回電。

2 月 25 日

林彪將《關於執行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的補充規定》稿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批示“照發”後軍委於 27 日下發。

△ 是日，“工人總部”、“二司”等造反組織舉行數十萬人遊行，高呼“我們想念毛主席”。武漢部隊向遊行隊伍散發“粉碎反革命逆流”傳單。

2 月 27 日

中央文革辦事人員閻長貴向“二司”在京聯絡代表指

出“二·八聲明”是錯誤的，並嚴禁把矛頭指向解放軍。

△ 根據閻長貴的批評，“武漢工人總部”部分頭目前往軍區司令部請罪，承認自己支持“二·八聲明”的錯誤。

月底

周恩來與陳再道、鍾漢華談話，要求恢復武漢秩序，要注意工業生產、大聯合、恢復學校中的班級建制。要求集中力抓好3件事，抓革命、促生產；抓好按行業、按系統的革命大聯合；抓好大、中學生的復課鬧革命。

3月01日

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反映青海問題的信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 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對待幹部》。

△ 湖北軍區組織“三級幹部抓革命促生產會議”，陳再道、鍾漢華參加並講話。

△ 武漢部隊接管市電信局，對工人總部電信分部宣佈罪狀予以解散，並逮捕十餘人。軍區發表《給革命群眾組織的公開信》，譴責一部分造反派“把鬥爭矛頭指向解放軍”，號召廣大受蒙蔽的群眾同少數頭頭劃清界線。

3月02日

王任重致信陳再道：“現在應當爭取迅速把省一級、縣一級的‘三結合’的權力機構搞起來，以改變目前的無政府狀態，不然對於革命和生產都是不利的。”其後，連續寫了三份材料：《對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計》，《十七年來我在湖北省工作的情況》，《我的歷史》。

3月03日

毛澤東對瀋陽軍區組織機關幹部到工廠宣傳抓革命促生產情況的簡報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可印發軍級會議各同志。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總之，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04日

《湖北日報》發表社論《粉碎秋後算帳派的反攻倒算》，指責保守派藉批“二·八聲明”向造反派反攻。

3月05日

陳再道在家裏接見省直某組織負責人，說原省委副秘書長張華等人以極左面貌出現，要注意；“二·八聲明”肯定錯了。不要以為解放軍內有個別壞人就對解放軍產生懷疑。

△ 支左指揮部辦公室發表對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五點看法，認為其在歷史上有偉大功勳，二司是群眾組織，原多數派紅衛兵可以恢復組織活動。

3月07日

毛澤東對鐵道兵黨委轉發渡口駐軍支左經驗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文革小組：此件似可轉發全國全軍，參照執行。請酌處。”

△ 陳再道在省直機關幹部大會上講話。認為必須徹底批判“二·八聲明”，把幕後策劃者和炮製者揪出來。要認真貫徹“三結合”的方針。

△ 陳再道在軍區接見“三新”“三司”的代表，表示堅決支持左派群眾組織。

3月09日

毛澤東修改紅旗雜誌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加上“從

上至下，凡要奪權的單位，都要有軍隊或民兵參加，組成‘三結合’。不論工廠、農村、財貿、文教（大、中、小學）、黨政機關及民眾團體都要這樣做。縣以上都派軍隊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這是非常之好的。軍隊代表不足，可以暫缺，將來再派。”

3月10日

毛澤東對成立革命委員會程序的批語說：各省、市亦宜照此（指周恩來當日給毛的報告，）辦理。凡條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條件成熟，然後舉行。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管。

上旬

武漢軍隊出面清除掉造反派在紅旗大樓、井岡山大樓、中南旅社、民眾樂園、紅樓的組織活動根據地。大中學生干預社會的活動得到一定程度限制。

3月11日

王任重再寫信給陳再道、韓東山、姜一。

3月13日

陳再道在體育館做報告，指責工人總部是一個反革命組織，幹了很多壞事。在此前後，支左辦公室向華中工學院、湖北大學、武漢大學派出軍訓團，並向“新一中”等中學派出工作組。

3月15日

“湖北省抓革命促生產大會”召開，陳再道講當前右派組織正在土崩瓦解，並對有人蓄意破壞生產的行徑進行譴責。陳再道對“紅武兵”負責人講，對工人總部，在寫文章作報告時，不明顯提反革命組織，但群眾可以說；有了輿論之後，我們再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

人總部”還要壞的組織。牛、蔡拿出名單，命令 8201 部隊軍管的市公安局動手抓人。

△ 應南下革命造反大隊的要求，陳、鍾在送南下學生儘快離開武漢前夕，接見其成員。南下學生要求軍區善待犯錯的“工總”、“二司”，陳要北京學生放心，軍區會支持、善待他們的。

3 月 16 日

陳、鍾接見“二司”負責人楊道遠，說“二司”犯了嚴重錯誤，希望通過整風把“二司”整好；軍隊還是會支持的。說你不要走，如果走了的話，問題就說不清了，問題的性質就嚴重了。支左辦公室闢謠，說沒有這樣講。當日，“二司”整風辦公室召開開門整風大會。

3 月 17 日

武漢軍區發佈通告，宣佈工人總部是反革命組織，立即予以解散；拘捕 485 人。同日，對市公檢法實行軍管。市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成立，在市人武部黨黨委直接領導下，作為全市“領導權力機構”負責指揮各條戰線工作。各區也建立相應機構。“二司”頭頭列隊去軍區、支左辦公室表明請求寬恕錯誤。“二司”司令部開始自我整風。

3 月 19 日

北京“紅代會”調查組到武漢，就武漢運動形勢展開調查。

3 月 21 日

武漢軍區發佈通告，全省 300 多群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傳說有 6 千多人被逮捕、拘留。

3 月 22 日

水院學生鄧子政寫出大字報，為劉少奇鳴不平，並與

同班同學辯論，認為毛是搞宗派鬥爭；引起造反派憤怒，將其拖到校內批鬥，並向武漢社會宣傳造勢；“二司”系統的學生紛紛遊行到水院，聲討為劉鄧翻案。軍區認為這是轉移批判大方向的反革命逆流。

3月24日

武漢軍區向各工廠企業派出大批軍代表，組織革命和生產活動。

△ 中央發出《關於處理青海問題的決定》，認為“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

3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於2月26日至3月25日在北京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談階級觀點、主流和支流、支左問題。要求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觀察、對待“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所有事情。

△ 在解決青海問題會議上，林彪講：“青海問題是一個大案件，是實行法西斯的大鎮壓。”

3月26日

“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公開宣稱，武漢有一股反動復辟逆流，其部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到“二司”院校，聲援“二司”，傾訴革命造反情誼。“二司”頭頭開會，號召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起來反資本主義復辟逆流。

3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

△“新華工”慶祝《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40週年，會後遊行到“二司”的院校進行串聯；高呼“一切權力歸農會”，“痞子要掌權”。兩月來造反派內對立情緒業已舒緩、和解。

3月28日

原市長劉惠農（市抓辦副主任）在有關幹部會議上說：你們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緊。現在牛鬼蛇神都跳出來了，要一網打盡。

3月30日

毛澤東對林彪20日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紀錄稿作修改後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請交文革小組加以斟酌，然後印成小冊發給黨、政、軍、民的基層。我作少許幾處修改，是否妥當，請酌定。”

本月

△部分“二司”人員組織了“二·八聲明”消毒隊，針對“毒草派”在三鎮進行消毒。主要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二·八聲明”背後沒有黑手，聲明是在紅旗大樓寫的，與劉真沒有接觸；二是說明這個聲明的目的還是要造反派團結起來對付走資派。

△某軍區副司令員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現在就是要報，不是秋後算帳，而是春前算帳。

△軍區支左辦公室負責人說：這次運動就是要整你們這些牛鬼蛇神……你們現在表演夠了，該我們表演了。如果你們不老老實實，就殺了你們的頭肥田，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現在是專你們政的時候了！

4月01日

毛澤東在關於安徽問題的文件上添加：許多外地學生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了。

△“三新”、“二司”召開大會，舉行遊行；表示要團結起來打倒“武漢的譚震林”。軍區邀“新華工”、“新湖大”、“三司”座談，研究幫助“二司”整風；“新華工”、“新湖大”後來決定不派人參加“二司”整風，相信“二司”自己能夠整頓思想作風。

4月02日

《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發表，批判了普遍存在的否定文化革命和紅衛兵小將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

△據陳再道回憶：三月中旬，我和鍾漢華又奉命赴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會議開始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了《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矛頭直接指向武漢、成都等地的軍隊領導，意在反對壓制造反派和紅衛兵。隨後，林彪、關鋒、戚本禹等人，又針對“軍委八條命令”，炮製出“軍委十條命令”。這樣一來，武漢地區的形勢出現了反覆，前一段抓的壞頭頭和骨幹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來。造反派公開貼出大字報向軍區“挑戰”。他們違反中央規定搞“串連遊行”、“殺向社會”，聲稱要粉碎武漢地區的“二月黑風”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這個“武老譚”（即武漢的譚震林），把矛頭直接對準武漢軍區。這時，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外造反派時又公開講，“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

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江青的公開表態，使武漢地區的局勢更加激化。

4月04日

“二司”、“三新”、“三司”革聯等學生組織集會聲討劉、鄧，並事先與支左辦辦公室協議，不讓保守派以組織名義參加。“三新”與“三司”決裂，部分“三司”學生退出該組織在體育場的會場，加入“三新”、“二司”行動，後組織了“三司革聯”。

△是日，毛澤東對林彪2日送審的軍委十條命令稿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數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適當，請酌定。建議以草稿形式印發軍區會議各同志，徵求意見，修改後，即可發出。”6日毛又對林彪5日送審的修改稿批示：“林彪同志：已閱。請再送中央常委碰頭會議討論批准，即可發出。”中央軍委當日發出。

△北航“紅旗”戰鬥隊發表“打倒徐向前，炮轟葉劍英、陳毅”的《嚴正聲明》。

△“新湖大紅八月公社”組織到水院進行串聯遊行，並召開集會。

4月06日

中央軍委十條發出。

△華中工學院魯禮安組織一群造反派中學生，以“新華工敢死隊”名義，貼出敢死隊“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中的一小撮混蛋挑戰”的大字報。大字報歷數了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支保不支左”、“鎮壓革命造反派”的大量“事實”之後指其“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打支左之名、行支保之實”、“為武漢譚震林張目”。

4月07日

新湖大召開首屆紅代會。

4月08日

“二司”、“三新”、“三司”部分學生數萬人集會，慶祝16條發表8週月。“三司”與解放軍一起召開慶祝會。原多數派紅衛兵也集會慶祝。

△“工人總部”武漢鍋爐廠分部工人，用袖章拼成紅旗，在武昌舉行火炬遊行；次日重新樹旗。“二司”整風辦公室調查確認：“二司”頭頭“沒有修”，決定其全部上班，粉碎反革命逆流。到10日宣佈解散該辦公室。

4月09日

駐“新華工”、“新湖大”、“新武大”軍訓團撤走。

4月11日

孔慶德副司令員傳達陳再道從北京來電“三新二司是左派組織，我們依靠你們是不會動搖的”。

△是日，造反派一些學生成立“專揪武漢譚震林戰鬥隊”。

△一中學生向市抓辦提出要求被拒，旋舉行絕食。

4月12日

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解放軍要立新功。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

△“新一中革司”學生向市“抓辦”提出四點要求，被拒；一中學生宣佈絕食，得到造反派聲援。

4月12日

北航“紅旗”再次發表“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的《嚴正聲明》。

4月13日

外地高校造反派發表《關於強烈要求釋放朱鴻霞、胡厚民等同志的聯合聲明》，要求為工總平反。

4月14日

軍委擴大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迫使葉劍英等做檢討。為青海、成都軍區問題承擔責任。後於4月19日寫報告給毛澤東，檢查對中央文革不尊重，不冷靜。

△“工總”的一些基層群眾宣佈成立工人總部聯絡中心。

4月15日

軍區副司令孔慶德到一中學生絕食現場，代表軍區答應學生的四點要求；群眾高呼“打倒陳再道”、“打倒孔慶德”，孔憤怒而去，當日就否認了四條協議。次日部分學生重新佔領紅旗大樓的報社。

△是日，王任重寫出書面檢查（一）關於一首詩的問題。（二）關於資治通鑒讀書筆記的問題。（三）關於龔同文的問題。

4月16日

造反派學生在紅山禮堂面對面批判孔慶德，孔氣憤拒絕，退場。

傳說江青與軍內造反派談話時指出成都和武漢形勢比較複雜和嚴重，要衝一衝；也傳江青聽說武漢學生有5萬絕食，多人暈倒，情緒衝動而流淚。

4月18日

“二司”第二屆紅代會在洪山禮堂召開。武漢部隊代表講話表示“二司”是革命造反組織，也希望二司發揚優點，克服缺點，建立新功勳。會議主題是“粉碎資本主義復辟

的反革命逆流”，工人問題調查團作專題報告，司令部發表文章，號召造反派的團結，向武漢的譚震林和走資派鬥爭。會議開幕詞說劉鄧路線對革命路線瘋狂反撲，“勒令解散武漢地區最早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組織工人總部。殘酷打擊我二司和其他革命造反派，耍盡各種手段，妄圖置我於死地而後快”；號召“揪出武漢大大小小的譚震林，把這幫壞蛋顛倒過去的歷史再翻過來”。

武漢部隊代表發言肯定“二司”是革命造反組織，建立了功勳。而“革命小將由於缺乏鬥爭經驗，受到社會上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難免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正如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曾經在談話中指出：你們這個組織所存在的缺點、錯誤一定能夠通過整風，求得解決”。“我們支持你們，跟你們擡腰，作你們的後盾”。清華“井岡山”代表強調了“武漢的譚震林在大力扶植保守勢力的同時，百般壓制‘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三新”與首都南下聯合調查團發言，則強調了“我們絕不允許武漢的譚震林及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來挑撥我們革命造反派之間的關係”。

紅代會以後，所謂“鋼”的二司的稱謂逐漸傳開，“鋼二司”成為“二司”正式稱呼。

△ 副省長孟夫唐^[1]致信陳鍾並軍區黨委，指出軍區對待群眾組織的錯誤和三條建議。

之前，劉真、（副秘書長）張華（副秘書長）、任愛生也公開批評軍區的支左工作。這些幹部得到造反派學生的支持。

[1] 孟夫唐（1895-1980），河北永豐人。1937年12月參加革命，1942年10月入黨。曾任武漢市文教部部長、武漢市副市長、省體委主任、省委文教部部長、副省長，一屆人大代表。

中旬左右

黃石中學生批判韓東山副司令在黃石講話，“新華工”拉出隊伍和黃石中學紅衛兵“揪韓敢死隊”進駐支左辦公室裏所在地洪山賓館，和韓東山本人面對面的就“造個屁反”的問題一連辯論了整整十天。韓被辯論攪得疲憊不堪，終於承認在黃石的講話有錯誤，並寫下了一張承認錯誤的字條。武漢軍區黨委聲明，稱韓東山的表態未經黨組同意，是無效的。

4月19日

周總理召集中央文革、武漢軍區領導，聽取彙報。

△ 武漢盛傳，中央文革召開會議聽取軍區彙報情況，認為：保守派紅衛兵不應解散，中央軍委十條指示前解散的“工總”不應恢復，武漢階級鬥爭複雜，軍區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軍區也傳出“中央電話指示”，江青表示武漢軍區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也不是帶槍的劉鄧路線，並向陳再道道歉，“聽信了假情況，闖了大禍”；“工總”不能翻案。中等學校紅衛兵不能解散；武漢軍區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決定21日有戚本禹接見武漢造反組織代表，將勸告停止把鬥爭矛頭指向軍區。

4月20日

毛澤東指出：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是對的。左派起來了，對立面也起來了，這也不要緊，有點反覆有好處。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要走向反面。

下午，江青從軍報記者的“快報”得知，軍區傳回19日會議消息並在武漢廣為傳播，大怒；陳、鍾被令交出會議記錄，並被警告不許再提。

4月22日

“二司”、“新華工”、“新湖大”學生就釋放漢軋工人夏邦銀問題與公安局軍代表談判。後在漢陽公安局前設立火線指揮部，靜坐示威。

△軍區成立專案小組重新審查了“工人總部”案件。後來兩月，形成三大卷材料維持原結論，並準備向中央報告。

△“工人總部”人員成立全市聯絡站，重新樹旗。支左辦公室不予承認。該聯絡站和武鋼“九一三戰鬥兵團”在漢口體育場召開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師大會。下旬，“紅武兵”和近郊農民民兵開始集訓。

△林彪電話口授蕭華，要正確對待群眾：“在這次會議上，我本來想講一講群眾路線的問題，加強大家對於群眾的作用的認識，能夠正確地對待群眾。解放以後，我軍部隊住在營房，幹部住在機關，同群眾的聯繫大大地減少了。這次突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碰到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對待群眾的態度如果不正確，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的任務。這次發的十條命令，就是為了保證搞好軍隊同群眾的關係。”

4月23日

毛澤東對四川放人問題報告的批語：“加印發給軍委擴大會議各同志。犯錯誤是難免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臺，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地公開向群眾承認

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

毛澤東另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河南問題爭得厲害，請商陳再道、鍾漢華、劉建勳諸同志，是否將兩派領導人調來談一次，省軍區只保一個趙文甫，將劉建勳、文敏生、紀登奎、戴蘇理、楊蔚屏都不要，這種看法是否適當，值得研究。又湖北問題也很大，幾乎省委大都是壞人，也應快點研究為宜。”

4月25日

武漢部隊兩萬人武裝遊行，高呼“鎮壓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口號。有部分原多數派紅衛兵登軍車參加遊行，造反派強把他們拉下車，遂與解放軍戰士發生衝突；另一派宣傳造反派毆打解放軍，衝擊解放軍遊行。

4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打倒無政府主義》。

4月27日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陳再道、鍾漢華接到軍委通知“沒事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二司”代表自上旬陸續到京，要求約見陳再道，辯論“2.18聲明”、“3.21通告”，工總是否反革命組織、劉真是否“二·八聲明”後臺問題。“二司”學生在26日進入京西賓館，向軍區李良部長要求辯論，並揚言陳不出來，將用大字報在京公開事實真相。下午，陳再道接見“二司”學生，“三新”、“三司革聯”及軍校造反多人派參加。學生擺出武漢實情，陳無以解答，說“我們正在調查嘛！大家

都在調查嘛！現在材料還不充分”；氣氛緊張，辯論沒有解決分歧。

4月28日

陳、鍾回到武漢。是日，軍區將王任重交“三司”批鬥，“新湖大”、“二司”學生衝擊會場，搶走王在湖大批鬥，又到華工、武機、水院、武鋼巡迴批鬥。“三司”宣傳造反派打傷百餘戰士，死保走資派王任重。

△“特動”（中學生“武漢地區特別行動委員會”，部分軍隊幹部子弟的組織）給任愛生寫恐嚇信；後軍代表對任說“你若改變觀點，可以參加‘抓辦’”，否則“後果就很嚴重”。

4月29日

武漢棉織廠“紅武兵”與貼大字報的“二司”、“新華工”學生衝突。漢橋區農民千餘衝擊造反派在區公安局設置的火線指揮部。造反學生公開宣傳，揪出武漢譚震林就是揪陳再道。

△中南汽車製造廠發生武鬥，新華工糧食學校聯絡站被砸。製瓶廠、漢口電池廠武鬥。

4月30日

陳伯達、戚本禹對中央接待站人員講各地形勢。

△中共中央關於福建問題的意見發出。認為：“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為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也不能作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嶺。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嚴重了，是不對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應當立即釋放，其中確有個別現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處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都應當立即平反”。

5月01日

毛澤東對常委、文革小組和政治局講搞三結合，要使青年參加各方面的領導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

毛澤東與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談話。

毛澤東接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代表團。

△ 武漢全市造反派冒雨舉行五一遊行；任愛生參加遊行，並貼出為工總翻案的詩歌。

5月02日

毛與王力談話，認為：“團結和服從都是有條件的。”又講到：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5月03日

中央軍委發出兩個文件：《關於捕人權限的規定》、《關於處理軍內錯拘捕和取締，解散組織問題的通知》。

△ 長江水利委員會“造委”毆打造反幹部。武漢中學紅衛兵“特別行動委員會”抄了任、劉的家，扣押任愛生，任跳樓逃跑。

5月04日

漢陽農民向新華工遞交抗議信。

5月06日

孟夫唐寫出大字報《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對待武漢地區工人運動》，並致信陳伯達和中央文革。

△ 清華“井岡山”中南調查組5人被冷凍機廠、通風機廠紅武兵毆打。

△ 成都132廠發生大規模武鬥，死亡48人，傷127人。

5月0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認為：“成都軍區在反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頑固追隨者黃新挺、郭林祥的鬥爭中，表現是好的。成都軍區在支援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支工、支農方面，是有成績的。但是，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從二月下旬以來，支持了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操縱的保守組織，把革命群眾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兵團’和‘川大八·二六戰鬥團’等，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大量逮捕革命群眾……”

5月08日

毛澤東對劉伯承4月30日轉報署名為濟南軍區、支左人員來信批語。

△是日，發佈“二司”紅代會決議開展擁軍愛民月活動。

△楊成武回憶：5月初，《紅旗》雜誌社的林傑和戚本禹的秘書先後說：“武漢的問題主要是同軍內一小撮的鬥爭”，“這是一場更加複雜尖銳的鬥爭”，“需要把全國的老造反派統一組織起來”。“武漢的譚震林是陳再道、孔慶德、韓東山，後臺是徐向前”。“中央5月16日要發文件點軍內的問題，這是支持你們的，你們要藉東風，要激化矛盾。口號要明確，一定要打倒陳再道，要為工人總部翻案”。

5月10日

江漢公安分局百餘幹警赴公安學校，與新公校紅司學生衝突並毆打學生；造反派學生發起“新公校絕食”。各校造反學生前往靜坐聲援。北大聶梓、清華蒯大富、北航韓愛晶發電報聲援，首都紅代會各學校也發表聲明。巴中友協（馬列）秘書長果索伊女士親臨聲援。

5月11日

《革命造反報》社論再次強調，必須把矛頭牢牢對準走資派和譚氏人物，要絕對相信廣大指戰員，不能發生懷疑，甚至感情對立。造反派在公安局絕食抗議。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濟南、山東兩軍區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很值得一閱，是山東兩軍（區）的同志寫的。”“同樣情況在全軍內，在許多同志身上都存在。當然不是多數。”

5月14日

毛澤東關於廣州、湖南支左報告批語：（一）現將廣州軍區、湖南省軍區報告兩件發給你們，望參照執行。（二）凡犯了錯誤的必須堅決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得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前更高。（三）不要動搖搖搖，遊移不決。聽信老婆孩子從保字號那裏帶來的錯話，信以為真。（四）要受得住工人、農民、學生、戰士、幹部的批評，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擱下，將來再說。（五）要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樣一想，就什麼都通了。

中央批發廣東軍管會、湖南省軍區報告。

5月15日

三司批鬥王任重。

△王力戚本禹接見湖北造反派群眾代表。提到：“軍區在支工、支農、支左中是有成績的，但也有缺點錯誤，這主要是在支左上。現在他們正在改正這些缺點錯誤，我們和你們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點錯誤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見可以說，方式要適當。（指軍區）

希望你們回去根據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況形勢鬥爭制定鬥爭方案、政策”。

△ 近日，軍區經甄別後，釋放部分“工總”被捕人員。

5月16日

由“紅武兵”（23萬）、“革命造反大軍”、“紅城公社”、“紅衛兵”（26萬）、“紅星軍”（7.2萬）“紅旗聯委”、“野戰兵團”（4.2萬）、“紅色造反兵”（4萬）、“紅色尖刀”（4萬）、“革命工人三司”（3萬）等50多個組織聯合的“百萬雄師聯絡總站”成立，並舉行盛大遊行。號稱全部成員超過120萬。在漢口利濟路，“紅武兵”拿出事先準備的木鋤把對路邊受造反派影響的兒童、市民進行毆打（市民嘲笑遊行）。

△ 市委組織部長辛甫、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林立組織了“百萬雄師參謀顧問組”。8201部隊派出一個團參謀帶隊的“調查組”進駐總站。

5月17日

漢陽“紅武兵”衝擊在公安局靜坐的“新公校”學生。“中學紅聯”組織全市數區大絕食，指使受造反派影響的小孩滿街高喊“支持新公校，打倒陳再道”，“陳大麻子算老幾，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打倒你的後臺劉少奇”，“下定決心，為工總翻案；工總起來，武老譚完蛋”。5月以來，中學華師一附中、一中、東湖中學等非二司系統的“紅聯”學校影響增大。二司中學以武昌實驗中學、水果湖中學等為代表，組織多次大型活動。

△ 百萬雄師籌建初期，蔡炳臣、牛懷龍就派該師五團參謀長方某去瞭解掌握“百萬雄師”的情況。接著，又派三團王參謀長，率領一個調查組進駐“百萬雄師”，出發前蔡、牛讓師參謀長郝文德向說：“去‘百萬雄師’，是幫助籌建，

出謀獻策……”並規定百萬雄師的活動，單線與牛、蔡直接聯繫。

5月18日

毛澤東為《偉大的歷史文件》做的修改：“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 第27期《革命造反報》刊登5月8日的開展擁軍愛民月活動的決議。《革命造反報》文章號召堅決為“工人總部”翻案。17所高等學校革命幹部聯絡站成立，表示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為工人總部翻案，打倒武老譚。

5月19日

初，軍區派楊秀山處理新公校絕食問題，未果。再由鍾出面談判。新湖大學生扣留鍾，經過8小時討價還價，鍾漢華政委被迫宣佈答應新公校提出的7點要求，在協議上簽字。湖大學生梅子惠認為扣人不好，私自放了鍾，遂被同學毆打；造反派公開宣佈鬥爭勝利。但軍區通過支左辦公室表態認為沒有作出任何讓步。軍區大力宣傳造反派“綁架鍾漢華政委”。

5月20日

陳再道否定鍾漢華與造反派簽定的協議；指出劉、孟要公開點名批判，這是逆流。

5月21日

支左指揮部發表《關於當前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中的

幾個問題》，指責造反派揪武漢譚震林是轉移鬥爭大方向。中學生“特動”分子抄孟夫唐家。鍾漢華信告大中學校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負責人，說對事實真相不瞭解，否定已簽字的協議。

△“百萬雄師”組織遊行，抗議港英當局，汽車裏已備有棍棒；沿途對嘲笑、反對保守派的圍觀市民群眾、小孩出手毆打。

△解放軍報社論《及時總結經驗把支左鬥爭提到新的水平》。

△總字127部隊出現“周總理四點指示”謠言傳單，說“三新”、“二司”大方向錯了，孟夫唐、張華操縱了反革命逆流。

5月23日

毛澤東對黃永勝與廣州“工聯”造反派談話批語。

△“中學紅衛兵革命造反派聯絡站”成立，與造反派一起行動。

5月25日

“百萬雄師”區以上頭頭在六機部安裝公司聚會，組織全市壓制造反派的武鬥。各區加緊集訓武鬥隊。

5月28日

“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申耿生、蔡俊善研究行動計劃。訂出鎮壓造反派的計劃：1 認清形勢，整頓組織，由於武鬥不力，指揮不靈，決定抽調各組織一號頭頭組成權力機構；2 今後任務：1) 集中全力掃平障礙，全面血洗造反派，2) 鎮壓造反派之後，搞大聯合，3) 最後進行奪權。時間上，6月1—15日第一階段，16日—6月底第二階段，7月1—15日奪權完畢。

△ 下旬，陳再道、鍾漢華接見“百萬雄師”代表，鍾說：“你們是左派，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就靠你們！你們應該怎麼作，你們可以考慮。有些事我們不好出面作，有些話我們不好說，你們是群眾組織嘛，你們可以起作用。軍區要採取行動，發動攻勢，你們可以配合。”陳說“現在不是促生產的時候，而是橫掃牛鬼蛇神的時候”。後來軍區進一步調度指揮，江岸分站由×××負責，漢陽分站由8201部隊負責，東西湖分站由市人民武裝部負責。

5月29日

“二司”華師總部召開陳一新（原省政法委書記）問題辯論會，調查組彙報指出省委拋出陳一新的目的；陳一新發言，揭發王任重、張體學。

5月

毛澤東對江西省軍區問題做批示：林彪、恩來、文革小組同志：江西軍區與群眾對立情緒為什麼越來越激烈？江西軍區某些負責同志對群眾的態度是否正確，值得研究。還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指示：這次雙方都有經驗，這股風不會刮得很大，我們要遵守“八條”，解放軍得遵守“十條”。

6月01日

武昌街道口發生交通事故，公交車與戰士摩托相撞，戰士被燒傷。社會盛傳反革命“政治事件”之說；抗議造反派工人總部謀害解放軍戰士。

△ 造反派在漢口體育場集會慶祝北京大學大字報發表一週年；並成立武漢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

6月03日

“百萬雄師”聯絡下的52個成員組織決定整編成立統

一的司令部，在各區組織分部、聯絡站，統一了宣傳和社會行動。

6月04日

軍區發佈《六四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確和重申不得為工總翻案的同時，《公告》檢討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希望各群眾組織在新的形勢下，求大同存小異，實行大聯合。分析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趁火打劫”的嚴峻形勢。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不得把矛頭指向解放軍。

△當日，牛、蔡在8201作戰室召集“百萬雄師”頭頭開會，蔡俊善、紀登樹、楊克定認為軍區公告力度還不夠，要造反。軍區副政委說這個公告不出，將來軍區要被動，其實你們想想，公告已經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點是個工總問題，公告出了說工總不能翻案外，還寫著它的五條罪狀嘛！有這五條它們就翻不了。牛表態“原來咱們打交道還少，有的還不認識，我是堅決支持你們的”！

△陳再道回憶：“根據當時的形勢，軍區發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同時，檢討了支左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希望各群眾組織在新的形勢下，求大同，存小異，儘快實現大聯合”。“然而，這個《公告》發表後，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造反派們認為，軍區是‘假檢討，真反撲’，鬧得更凶了。‘百萬雄師’則認為，軍區這個《公告》太軟弱了，扶不了正，壓不了邪，也對軍區不滿。我們的努力是徒勞的。”

△是日，“百萬雄師”砸毀造反派在武漢市委聯絡站，並建立全市性的聯絡總站；新華工、二司學生被趕走。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

組批發山東省軍區黨委《關於向革命群眾公開檢討支左工作中的錯誤的情況報告》中發〔67〕175號。

6月05日

“百萬雄師”武裝圍攻國棉二廠、漢陽軋鋼廠。公檢法保守組織分乘70輛卡車遊行，擁護《六四公告》。

6月0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通令（中發〔67〕178號），嚴禁武鬥。

△“紅武兵”攻佔造反派的漢陽中心聯絡站。漢陽武鬥，8201宣傳車高呼“要用無產階級的鐵拳頭對付流氓阿飛”。

6月07日

“百萬雄師”打傷659部隊64人，事後去認錯，有人說“自己人打錯就算了”。在洪山賓館前毆打三軍“鬥羅籌備處”赴漢調查組戰士。

6月08日

《革命造反報》將《3.21通告》比擬成《二月提綱》。刊登6月3日《“二司”司令部關於〈3.21通告〉的嚴正聲明》。

△中學原“紅衛兵”成立武漢地區司令部，部隊上千人戴其袖章一起遊行。

△“百萬雄師”總部發佈《反逆流緊急動員令》。宣稱“從即日起，立即展開全面反擊，狠狠打擊來犯的階級敵人，堅決、徹底、全部、乾淨消滅敵人”！

6月09日

“百萬雄師”武力圍攻居仁門中學學生。造反派自發提出“文攻武守”的口號，張貼各個據點。百萬雄師圍攻民眾樂園和工藝大樓，8201部隊的宣傳車在旁高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 武漢軍區發佈關於制止武鬥的《六九通知》。

△ 其時，鍾漢華約見“二司”楊道遠，試圖調停武鬥。楊開口就指出“你們什麼時候停止武鬥”！鍾委屈反問“怎麼是我們武鬥”，楊答“就是你們組織指揮的百萬雄師大搞武鬥”。雙方非常不快而散。

△ 其間，清華“井岡山”兵團撤走駐漢人員。

6月10日

三千農民武力襲擊“新華農”校區。中央文革曾指示叫“百萬雄師”撤兵。

（按：陳7月被批鬥時承認在10日左右中央文革有電，傳達陳伯達在“百萬雄師”關於武鬥的“動員令”上的批示：陳再道同志要設法制止重新武鬥。秘書提出要提交軍區常委討論，陳說“你陳伯達呀，在北京還不是沒有制止武鬥”，不同意研究）。

6月11日

支左辦公室的信部長與“鋼二司”負責人座談有關制止武鬥問題，要求放下武器。

△ 六月中旬，武漢軍區黨委決定，將對“百萬雄師”的領導權從人武部交給8201部隊掌握。蔡炳臣政委在8201黨委會上說：“這是武漢軍區黨委對我們的信任，雖然有困難，也要接受這個任務。”

6月12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批發《濟南軍區黨委給山東省革命群眾的一封信》（中發〔67〕182號）。

6月13日

武漢部隊發出《關於制止武鬥的緊急呼籲》。

△ “百萬雄師” 武裝圍攻汽車配件廠。

△ 近郊農民夜襲華中師範學院。“百萬雄師” 和農民路伏，襲擊華中農學院學生。

6月14日

陳、鍾與新華工“紅色造反團” 聶年生談判，鍾漢華政委指責造反派要奪軍權。

6月15日

中央發出關於內蒙軍區問題的通報，指出：“內蒙古軍區少數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特別嚴重的是中央作出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八條決定以後，黃厚，王良太等人陽奉陰違，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和戰士，頑固地抗拒中央的決定，這是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違反黨紀軍紀和國法的犯罪行為。”“軍區少數領導人……他們甚至公然反對和圍鬥中央軍委派到內蒙軍區工作的代司令員滕海清同志，散佈流言蜚語，挑撥兄弟部隊之間的關係，繼續擴大事態。五月初，他們竟然指使和鼓動二千五百多幹部戰士，擅自離開戰鬥崗位和工作崗位，到北京鬧事，製造聲勢，給中央施加壓力，妄圖迫使中央改變八條決定。”“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負責同志接見的大會上，他們無理取鬧，不聽總理講話，多次高呼對抗中央決定的反動口號。還當場打傷了一位擁護中央決定的內蒙同志。在五月廿日的大會上，他們反抗中央的活動愈演愈烈。他們在大會上拍桌子，跺腳，起哄，搶奪擴音器，大喊大叫，衝上主席臺，將內蒙軍區政治委員吳濤同志毒打致傷，還毆打了軍委辦公廳工作人員和會場服務人員，甚至公然在會場上宣讀事先準備好的反對中央的五條反動要求，至此內蒙軍區少數領導人所策劃的反對毛主席，

反對黨中央的罪惡活動達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 蔡炳臣、牛懷龍於六月十五日在三團會議室親自召見了“百萬雄師”總站、分站以上頭頭蔡俊善等 20 餘人。蔡炳臣表明 8201 部隊堅決支持“百萬雄師”。在這次召見時，蔡，牛還將派往“百萬雄師”的幹部帶去，向百萬雄師介紹姓名，作了分工，由兩個團的參謀長方×，王××負責“百萬雄師聯絡總站”，“江漢分站”，“二七分站”，後勤部副部長張××負責礪口分站；師部管理科長郭××負責“武昌分站”，副教導員杜××負責“漢陽分站”。分工後，蔡交代“你們和我們是單線聯繫彙報”。

6月17日

13 時數千武裝“百萬雄師”開始攻擊中南旅社，與造反派工人、學生、市民，在漢口六渡橋發生大型武鬥，延至次日。5 時半造反派傷員赴醫學院于中山公園被攔截，死兩軍人，傷員被殺。造反派說延至次日晨的武鬥致使 93 人死。300 重傷。8201 部隊五團參謀長方 X，坐鎮江漢區委，與“百萬雄師”頭目史天玉直接指揮這場大屠殺。蔡炳臣徹夜未眠，連續三次電話給現場的紀樹彬，指示“你們要注意，在政治上要爭取主動，鬥爭上要講策略，要提高警惕，作到不受損失，不失戰機”。後表示“我對你們的勝利撤出現場，表示祝賀！並向你們的負傷人員，表示慰問”！是日，襄樊地區丹江口工地武鬥，造反派傷亡慘重；工地被迫停工。

△ 造反派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體育館辯論“文攻武守”口號，認為必須徹底為工總翻案，必須殺向社會。

6月18日

“百萬雄師”武裝圍攻鐵四院。上午，蔡炳臣電話通知“百萬雄師”到 8201 師部，開會三個小時，商量掩蓋“6.17”

大慘案的血腥實情，試圖轉嫁罪責。

6月19日

中央發出宣傳、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通知。

6月20日

武測、華師、體院、二中、建校召開形勢辯論會，辯論“文攻武守”。

6月22日

《革命造反報》改名為《武漢鋼二司》。是日，“二司”司令部關於《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週年，給毛主席的致敬信，公開提到：“近來，這個竊據軍權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狗急跳牆，竟動用專政工具來大舉鎮壓我們屠殺我們。他開獄放鬼，責令一群勞改犯毒打我們；他停工訓練武鬥班子，指令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毆打我們。”

△“百萬雄師”數千人圍攻曙光大隊造反派。

6月23—24日

數千武裝“百萬雄師”圍攻並血洗無線電廠“工造總司”司令部，攻打水運工程學院、漢陽軋鋼廠、武昌險峰大樓、鐵四院。

△陳伯達電告陳再道，敦促進一步制止武鬥暴力。

6月25日

“二司”學院區舉行武裝遊行，高呼“抗暴無罪，自衛有理”。

△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編者按傳達毛澤東最新指示：“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

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 鑒於形勢極端危急，長辦造反派要求發放單位槍支，長辦聯司頭頭想不出辦法壓服下面，給周總理發電報，說長辦現在的形勢危急，已經被四面包圍，許多人要求武器啟封，請總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動。當天夜裏一點多總理回電：“那個東西不能動。”

6月26日

△ “百萬雄師”包圍“新湖大”，圍攻機械學院、鋼鐵學院、“長辦聯司”。

△ 中央文革、軍委文革電武漢軍區：“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極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該電文由楊成武、戚本禹商議，形成文字，周恩來、陳伯達同意。

△ “百萬雄師”公開宣稱電報是中央文革對其的最大關心，私下抱怨中央文革對下面事情不太瞭解。

△ 洪山禮堂門口有許多軍區的人在那裏議論，說怎麼我們支左又錯了，都猜測和傳說那個6—26電報是江青的表態。……哈軍工和北航紅旗的人，把宣傳車開到省軍區警戒線外停下來，把喇叭對準軍區大院廣播中央文革來電。

6月27日

“百萬雄師”的“漢陽公檢法”給毛澤東、林彪寫信，正式提出：中央文革對武漢運動瞭解很不全面，來電是支持一方，打擊壓制另一方，助長造反派殺向社會，進行打砸搶抓殺，脫離了武漢二百萬群眾和軍區廣大指戰員。

6月28日

周恩來關於不准佔領鄭州郵電大樓發出電話指示。

△ 8201 某部以全體戰士名義給“百萬雄師”寫公開信，讚揚他們殺革命造反派是給“孟夫唐之流，二司、三新、黑工總、九一三等一小撮壞蛋以沉重的打擊，真是大快人心”。

6月29日

王力在昆明兩級軍區黨委會上講：文化大革命中每一個重要口號都是毛主席提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有沒有，毛主席也講過，從上到下都有這樣一種反革命復辟逆流，那時是二、三月。四月二十日江青……根據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擁軍愛民的口號，這在全國形勢是一個轉折，不再是青海問題、內蒙問題、四川問題……那樣的形勢了，擁軍愛民是在新形勢下的戰略口號。紅衛兵小將沒有看到形勢變化，所以還扭住什麼“趙永夫”、“譚式人物”、“帶槍的劉鄧路線”。這不是一般的口號，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的口號。擁軍是使革命小將懂得如何處理好對待軍隊的問題，採取什麼態度，什麼方法對待軍隊，推動文化大革命前進。

6月30日

“百萬雄師”出動改焊的武鬥裝甲車 8 輛、卡車 30 多輛，攻打新湖大校區，撞倒圍牆；包圍、衝擊漢口工藝大樓和民眾樂園。8199 部隊出動干預後，武鬥隊撤離湖大。

7月01日

造反派聯合舉行遊行，紀念“七一”。任愛生擔任名譽主席。後字 248 等 5 個軍事院校造反派發言，首都紅代會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農機東方紅、郵電東方紅、工院紅旗、新人大公社發賀電。

7月06日

毛澤東把江西赴京控告團、江西贛州赴京控告團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隊制止贛州武鬥的電話彙報批示給林彪和周恩來，提出“是否可從廣州軍區調一個師，至少一個團進駐贛州”制止武鬥，“此事請先考慮，待面商”。

7月07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接見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

7月6—9日

周恩來連續到毛澤東處議事；毛澤東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

△ 廣東省軍區守備部隊某團，在深圳沙頭角武力支援抗議港英的本地民兵，痛擊邊界英軍。

7月10日

周恩來通知陳再道，談判就在武漢進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來了，毛主席要到武漢去，在武漢解決問題，並且可能要到長江游泳。後來陳得知，毛主席此行，要視察大江南北，第一站選在武漢。

△ 周恩來接見江西軍區和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指出：革命群眾裏頭可以有激進、有緩進，不能都是激進的，不能把保守和反動、反革命劃到一塊。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思想保守、看事情看得遲一點，一般的保守是這個意思。群眾組織裏有的造反精神旺，有的造反精神弱一點，偏於保守，這個允許存在。都是造反的，就走到極左、偏激方面去了。

△ 武重的工人頭頭在北京見到張體學，張說陳大麻子抓人肯定不對。周恩來的聯絡員和秘書，與武漢上京告狀

的造反工人接觸。

△ 陳再道在師以上幹部會議上講“以前我們支持他們，現在天天搞我們部隊，這算什麼雞巴革命派！”“三新二司大方向錯了，對他們不能糊裏糊塗無原則的支持，如果堅持錯誤，垮了自己負責。‘百萬雄師’是客觀存在的，是革命的群眾組織，我們支持這個組織”。

△ 中央發出《關於河南省軍區支左工作錯誤報告》的批示，指出：河南省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造成了部隊同群眾、群眾同群眾之間的對立。這個錯誤主要應由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同志負責。這次，河南省軍區黨委所作的關於支左錯誤的檢查比較好。我們相信，在省軍區作了認真檢查以後，廣大革命群眾是會擁護解放軍，會歡迎並支持軍區改正錯誤的……中央決定著手成立以劉建勳同志為首的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隊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參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全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河南各群眾組織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鬥等問題達成了六項協議，中央認為這六條協議是好的，希望各群眾組織認真貫徹執行這些協議。

7月12日

《革命造反報》編輯部文章《堅決打倒陳再道》，指出陳是王任重倒臺後湖北河南的反革命勢力總代表。提出警惕出現反革命暴亂。統計自6月下旬以來，全國有160多個單位和組織發電聲明支持武漢造反派抗暴鬥爭。

△ 周恩來、戚本禹與赴京彙報的河南部隊領導同志談話。“你們在這裏我們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電話上受到家裏的一些影響，在情緒上有所流露，就影響很大。

內蒙就是這個問題，前面談的很好，背後又搞一套，來壓中央。地方的群眾勸說回去了，軍隊的又來了，結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類似情況。河南一定要注意反覆，你們認識多少就談多少，沒有想通的就講出來。我們告訴你們內蒙、四川的經驗教訓，就是免得反覆。你們認識多少，就向地方講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給我們，幫助你們解決”。“你們也要估計到部分地區出問題，你們要把錯誤引向自己。內蒙就有這個問題，不僅兩派在鬥，一派出來打吳濤，而另一派很高興，沒人出來制止，正好暴露了他們自己，結果只好那樣處理”。

周恩來處理武漢“7·20”事件

長期以來，人們議論、探討 1967 年 7 月的“武漢事件”^[1]，囿於一些場面性活動與事件的描述，也受到某些刻意的所謂回憶誤導，缺乏對當年代表中共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周恩來總理實際和關鍵作用的瞭解。

1980 年代，當事人陳再道將軍以回憶錄形式披露了一些史實和個人遭遇、心理活動；1990 年代，楊成武將軍也以系列訪談形式，出版了對 1967 年的回憶。後來，《周恩來年譜》和一系列周恩來研究回憶問世，也提供了一些參考

[1] 1967 年 7 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省軍區獨立師部分指戰員，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衝擊武漢軍區和東湖賓館，揪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形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〇事件”。當時中共中央對此做出嚴肅處理，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提出：“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稱此事件為“嚴重的政治事件”，並且改組了武漢軍區黨委。197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批復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報告，為該事件平反；該報告稱：“‘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黨亂軍，挑動群眾鬥群眾，以達到其破壞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親手策劃挑起的一個重大事件”。

其簡要介紹參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背景。2001、2003年，海外更是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王力反思錄》和《晚年周恩來》。不過，許多專門澄清或涉及“武漢事件”的回憶、專著，談到周恩來多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特別對周恩來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軍區的重要講話，又語焉不詳乃至絕口不提。筆者收集現場實錄性和口述史的文字《親歷者的口述——民眾心裏的武漢“7·20”事件》^[1]，該資料從當事人群體性口述角度，首次披露了民眾心中周恩來的一些活動、言論，引用了周恩來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軍區師級與二級部長會議上的講話。對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以及當事人王力後來的回憶^[2]、給黨中央的申述書，認真對比楊、陳將軍的回憶，也對照了當時和後來流傳出的傳達、記錄，認為現流傳周氏“7·18”講話內容精神，是比較真實可靠的。在王力給中紀委**釐清的當時講話記錄**公開給史學界前，我們暫時運用這些材料來探討有關歷史。筆者就此具體問題，述說周恩來配合毛澤東處理武漢問題的史實，並認為，應回到歷史環境理解當時中共中央和周的本意，這是弄清該事件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周恩來代表中央到武漢

“武漢事件”的“英雄”與“罪魁”王力，在秦城受審

[1] 輯于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2] 《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王力反思錄》北星出版社，2001年。

和重獲自由以後，一再說明周恩來的“7·18”講話是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澤東的，這一方面也許是想減少對他本人責任的追究，另一方面客觀上也是實話。因為周恩來的講話稿在東湖擬就，此親筆（毛筆）稿，據權延赤記錄楊成武回憶的《微行—楊成武在1967》，是1967年7月17日深夜“（楊）剛從周恩來那邊過來”，“將幾頁紙交毛澤東”，並說“……總理有個總結講話，這是總理擬的講話提綱，請主席審閱”。由於事關重大，時間也緊迫，“毛澤東破例地沒有留下處理，當即看一遍，還給楊成武說：‘同意，他講吧。史無前例麼，沒有經驗，錯了就檢查，就改正，改了就好。’”^[1]

王力《向黨中央的正式申訴書》^[2]在談到“7·20”事件問題時是這樣說的：“這裏要說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門在預審中已宣佈關於武漢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責任了。**那時中紀委要王力謄清兩份筆記，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的談話記錄全文，另一份是周總理同一天在武漢軍區高級幹部座談會上總結發言的要點。看了這兩份記錄之後，就知道王力的講話，正是毛主席、周總理講的話。例如：確定‘鋼派’等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當作‘團結對象’。周總理傳達的中央方針更厲害，把‘百萬雄師’定為‘保守組織’。這一點王力沒有說。第二，至於要各派群眾組織都‘撤除據點’，當時不但如此，還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給軍區保管，這是周總理為保衛毛主席安全而採取的措施，並不是專門針對‘百萬雄師’一派的。這不能成為‘使

[1]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P68，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2] 王力親撰，1988年8月30日，現尚未公開。

矛盾激化’和爆發七·二〇事件的原因……”。

在公開出版物中，王力也申辯說^[1]：“主席和總理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我都有原始記錄，後來中紀委要我謄清過，他們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總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指出，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它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中央的方針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講得就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主席一條也未改變。這是主席18日晚召集總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開會時講的。”

當時，中共中央指導湖北武漢文革運動的精神，與當年其他省市問題的處理原則無二，都是批評部隊的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造反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團結對象”。大聯合奪權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漢“7·20”事件發生前夕，中央決策高層內部思考討論的和公開的表態、宣傳都是如此。

周恩來在7月10日前，並未下決心去武漢就地解決問題，但是7月6日以後他與毛頻頻接觸：7日和毛澤東、林彪一起接見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1967年文革三巨頭一起接見軍隊代表機會並不是太多），在6、7日和9日，周恩來連續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提出要

[1] 見《周恩來年譜》。

南方走一走。^[1]實際上他與毛澤東已經商議、統一了行止去向，甚至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陳再道：**可以不到北京彙報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漢，在武漢解決問題。**在13日會上，儘管他還和林彪、中央文革成員一起勸阻毛，以至勸說“我們已經商定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彙報，解決問題，不一定非去不可”；但他很快就不再做無效的說勸，還果斷地當場佈置當夜就出發的一切要事。

即便如此，毛澤東並未明確解決武漢問題的具體辦法，13日會議也僅僅是商議去不去，毛堅持要去，又就全國形勢和軍隊講了一些大道理，沒有時間談武漢具體事宜。所以，在6-9日前，周還持和中央文革商定的在京解決的意見（即與文革小組“6·26電話”精神完全一致），並未起草什麼解決方案；在10—13日，也無具體要求和精力，起草處理武漢問題提綱。甚至，周離開北京前夕，還信告李富春、李先念、陳毅“我有任務離京**兩三日……**”，並未準備久留**武漢**。看來，7月17日深夜楊成武拿給毛澤東的講話稿，大致是16、17日周恩來思考、草擬的。其基本背景，來自於“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數月來周對武漢情況的調查掌握，來自對其他省市問題解決的原則和經驗，至於毛澤東的精神，具體來自6至9日他倆的議論（至今沒有披露），也來自到東湖後大家討論、毛澤東指示的（毛對武漢問題成熟的原則意見，王、楊回憶多有披露，本文暫不展開研究）。

在13日人民大會堂的高層會議上，宣佈毛澤東一行南下武漢，三軍領導人層面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打前站，當然並非單去武漢做前站、後勤，也

[1] 見《周恩來年譜》下卷168頁。

不需要周事必躬親地去安排毛澤東的安全保衛。1967年異乎尋常出現黨政軍高層大隊伍隨同毛澤東南巡去武漢（毛、周共赴東湖，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次；毛澤東“御駕親征”解決一個地方的問題，在文革裏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來的關鍵任務，就是配合毛澤東，出面解決武漢問題，而不在僅僅保護毛澤東安全的層面上。在文革的1967年，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按《楊成武將軍自述》《楊成武將軍訪談錄》^[1]所說，是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蕭華、楊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開會，談了“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設想，……然後提出要到湖南、長沙、武漢去看看，還說準備在武漢游泳。大多數與會者不贊成他去游泳。林彪說：“武漢的武鬥嚴重，安全沒有保障。”但毛執意要去。《微行》談到周恩來不再勸阻，輕拍楊成武的手背，說：“**成武同志，你的任務兩個。一個任務，作為主席和我的聯絡員。傳達主席的指示；凡是我向主席的報告，由你轉報主席。**”他轉向全體與會者，重新宣佈一遍：“楊成武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聯絡員。”他第二次輕拍楊成武的手背：“**第二項任務，保證主席安全……要保證主席的絕對安全。**”毛澤東的南下，帶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軍委工作的班子，留守北京的中央領導調整了任務，在13日下午的會議上，周恩來對於留守北京和武漢之行的人事分工，已有非常成熟和明確的要求，只是楊代總長的回憶沒有一一述說。總的看來，當日大家並無時間講武漢問題解決的具體事宜，周、楊的準備也十分緊迫。不到12個小時，人馬均已上路。

[1]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版。

王力回憶在7月15日那天^[1]：“主席表示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總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著急，向主席請示：**總理不能走，中央討論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我們都不知道，幫助主席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把握**。主席先問總理的意見，總理同意留下，主席說好。**主席提出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可見，開初，周並未主動請纓，由自己在武漢主持解決問題，至少到7月15日，周才決定參加和主持解決武漢問題。寫提綱則是之後的事。毛澤東關於武漢問題的原則認識和決策，要先從部隊解決，《微行》和《王力反思錄》都有大段披露，本文不再贅述，其他尚未解密。……

必須強調的是，毛、周空前絕後共赴一地處理問題，毛澤東親自**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文革運動問題**，可見武漢問題在毛心目中的非常位置。

7月10日周恩來對他的秘書們說：“主席對我講，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又（根據陳再道前些日對周的彙報）說：“近二十多天，武漢沒有發生什麼事，兩派之間的武鬥已經停止，武鬥器械也陸續上交。這說明什麼？說明陳再道和鍾漢華可以控制武漢局勢。解決武漢問題，依靠力量還是武漢軍區……”（《微行》P11）筆者以為，這裏沒有披露周恩來秘書們講述的全部情況，僅僅話音一轉，似乎給人留下周似不同意毛去武漢、也不同意說軍區無力控制局勢的說法和印象。實際上，武漢的大規模武鬥在6月27日以後基本停止（26日凌晨周還給造反派回電，制止動民兵武器），截至7月10日僅僅13天；小規模衝突延續到7月

[1] 《王力反思錄》P1006-1007，北星出版社，2001年。

上旬始終不斷，不過兩派主要精力放在準備材料進京彙報上；即便如此，周、毛到達後，漢口與武昌還發生大型衝突，死了人。至於武器，造反派是在謝富治要求他們集中封存，周恩來起草講話提綱時，才開始集中封存；“百萬雄師”派的，完全沒有上交，到20日的武裝示威就公開出示了數萬件。問題是陳司令報喜不報憂，要麼是周恩來有意不講武漢局勢極不穩定，反流露出一點他對處理武漢辦法有自己的保留。但是這些統統在真要去武漢前後發生了改變，否則他為什麼把武鬥、武器可能威脅毛的安全，始終放在至關重要的地位。這對於理解他在“7·20”後的認識與行為是有參考價值的。

另外，當時周恩來也並不反對就地解決地方問題的方式。據當時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回憶^[1]：在1967年6月下旬準備去雲南、四川就地解決問題時，周對王力說，**毛主席的意思，解決地方問題，可以到北京來談，也可以就地談就地解決。並傳達毛的建議，可以老、中、青三結合，帶上紅衛兵參加中央代表團的工作，也鍛煉鍛煉。**周恩來才讓從幾個大學裏挑紅衛兵，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上要絕對可靠，文革中表現好，有一定能力，身體要好，要嚴格保密。還明確指示：“那就從北航選，讓韓愛晶派人吧！”選派的北航“紅旗”的學生到了雲南、川渝，後來參與處理武漢事宜，也恰恰是根據總理指示才確定的。（為弄清回憶的真實性，筆者專訪“7·20”的見證者張根成取得證實，毛、周的這個意圖，是張去具體落實的。）平心而

[1] 中央文革辦事組張根成本人回憶，2004年6月、10月；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177，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論，這些北京學生原來對武漢並不瞭解，謝、王、余也並未領受處理武漢問題的任務。不過，周恩來不會不知——他從各個信息渠道——包括北航“紅旗”，得到了一大批武漢社會實情的（誠然，也是有傾向的）彙報，而4月2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恰恰是在北航紅旗駐漢聯絡站站長徐鵬飛提供的材料基礎上修改形成的，修改、審批社論者，除總編唐平鑄外，就是隨謝、王到武漢的北航紅旗的吳介之（研究生），周恩來不會不知他的名門家世。周清楚謝、王並沒有攜帶與武漢問題有關的任何材料，中央也並無要謝、王主持處理武漢問題的意圖。周恩來親自擬定的講話，只能是他數月——特別是7月裏來準備的，代表了那時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意圖。

於是，周13日晚即飛武漢打前站，安排毛澤東住處。按高文謙的說法^[1]，“為了確保毛澤東此行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並由毛親自點將的楊全權負責。……又打長途電話給謝，要他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武漢之行如此盡心竭力……還有兩個不便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於‘伍豪啟事’懸而未決，周氏當時在政治上還背有黑鍋，精神負擔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夠對他高抬貴手，因而有意以實際行動來處處表現自己對毛的盡忠盡職。其二，他當時已經看出武漢問題的背後是林彪、江青兩大勢力蓄意插手的結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遏阻林彪、江青聯手整垮武漢軍區、打倒陳再道的企圖。”高文這裏的“**周恩來決定**”的確說對了，林彪並不主張南下，也沒有這個決定，

[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P227，明鏡出版社，2003年。

似乎更沒有說“派”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武漢。周在會上宣佈楊的使命和身份，不論是事關重大也好，還是楊說的為了提醒文革小組也好，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周恩來在這次武漢之行中，舉足輕重的位置。至於高的“其一”，可惜是研究周恩來多年，居然終究脫不出俗套的不在其時的書生之見；“其二”，或許是林彪、江青相繼出問題以後的“事後孔明”，並附和政治鬥爭的非學術之言。從爆發武漢“7·20事件”前周恩來的所有言行舉止看，我們似乎還看不到他**已經覺察**有林彪和江青兩大異常勾結的勢力，而且他們在“聯手整垮武漢軍區”（從現今官方黨史概念的意義上看，所謂的林彪集團和“四人幫”，在當時還未形成，如果周在1967年與他們有分歧，還屬於是黨內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正常分歧），否則他決不會輕易寫出一個批評者稱為“助毛、林、江為虐”的“7·18”講話稿來。

如果說周真正反省和發現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問題，可能是在獨立師與“百萬雄師”鬧事之後。如果是抵制“左”的干擾，從4月到7月，他都在竭力去做，畢竟是他主持絕大多數的（外地問題）接見、談話、決策、起草文件，並非林、江。他和毛澤東一樣自信：到武漢是可以既排除來自右的、抵制文革的干擾，又能夠排除來自“左”的、無政府主義的干擾的。對武漢問題，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對歷史的搭檔親自商量、實地處理，從7月13日到20日，遠在京城林彪和江青實在是鞭長莫及的。

二、事件前的周恩來

7月14日凌晨2時半，周恩來、李作鵬離京，抵漢。周到漢後立即通過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找來陳再道司令員，部署安全保衛工作。對於此，王力提供了關鍵的回憶^[1]：“總理連夜打電話，並先趕到武漢佈置，把賓館的人都換了。**原來賓館的工作人員主要是‘百萬雄師’的，現在換成另一派。同時不是讓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負責主席安全，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特別在18日晚，“臨行前總理又強調佈置讓武漢空軍絕對負責主席的安全。本來武漢空軍司令員是傅傳作，因為有人說他‘是賀龍的人’，過不了關，**總理才決定由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蕭前負責的。**”^[2]東湖賓館工作人員當時分成兩派，《微行》一書已經交代過，不過當時在賓館內部並未武鬥衝突，只是工作癱瘓了。從後來楊成武和張根成回憶，都談到毛澤東對（造反派）工作人員有接見、談話；據張根成說，謝富治在20日凌晨被叫起，先想到要穩定內部工作人員——造反派，說明的確“主要工作人員”已經換過了。可見，決定賓館安全和日常服務工作，業已將武漢兩派取向作為一個參考因素。後來悲劇性事實也說明，對此換班心懷不滿的個別工作人員，就在20日凌晨帶路（“百萬雄師”）去衝擊了百花二號——找謝富治論理。

[1] 《王力反思錄》P1005，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

[2] 《王力反思錄》P1007。

更重要的問題是，將原來負責安全工作的陳再道——軍區和獨立師（8201），換成劉豐——空軍負責，20日凌晨賓館受到衝擊時，**軍區值班領導**則通知與空15軍有歷史淵源的29師（**8199部隊**）來加強保衛，後來空15軍介入控制武漢局勢處理武漢問題；問題是從一開始由劉豐前往接總理就露出蛛絲馬跡來。《微行》說陳再道聽劉豐的電話就發火了，確是事實，而且是一個吳法憲司令玩不了小聰明，做不了小動作的組織原則問題。畢竟是迎接給毛澤東打前站的周總理，又是空軍專機師的飛機，吳司令一個人不可能超越中央擅自決定如此重大的問題。

從劉豐接機，到後來劉被明確負責毛的安全，再由與空15軍有歷史淵源的29師解救王力，空軍掩護毛澤東離開被圍困的賓館到機場，空15軍入城警戒、支左（又於8月組建武漢市警備區），劉豐在武漢事件裏“勤王”立功，絕非偶然。可能毛、周在7月10日以前的會晤，中央在（北京）13、（武漢）14日會議，已經明確了毛澤東南巡武漢、解決部隊問題要借重的軍事力量——這就是武漢空軍部隊，以及曾隸屬於15軍建制的陸軍29師。這些重大嚴肅的軍隊人事，決非林彪個人就可以倡議和私自決定、指揮的。

王力接著回憶表白：“我認為這樣的作法很不妥當，但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針。我過去沒有研究過武漢問題，**這次總理交給我的任務也是保衛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決武漢問題。**”（後談到去街上看大字報，沒有武漢軍區的人作嚮導，更沒有劉豐，“**因為劉豐是總理指定的保衛毛主席的主要負責人，陪總理去接主席了。**”^[1]足以可見劉豐的

[1] 《王力反思錄》P1005。

位置一開始就與眾不同) 不論王力本人回憶和申述的心態與意圖是什麼，但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張根成作為當事人提供了重要補證：“**總理把 8201 的警衛換成中央警衛團的了；大家一開始就發現獨立師（8201 部隊）蔡炳臣政委不滿意，幾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說把警衛換了，好像不相信他們。**”^[1]（筆者已訪張再三證實無誤）並且在張的眼中，已經看到事件以前獨立師政委公開表現出的不滿。總理還未開始講話，兩位鄂豫皖的老軍人（陳、蔡）已經為此對中央的安排深為不滿。不過，直到 20 日事發，東湖賓館仍是由獨立師負責保衛，大門仍是他們看守，並沒有調換全院警衛人員，中央警衛團也僅僅密切控制了梅嶺 1、2、3 號一片建築和樹林、要道；在 7 月 15 日，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也沒有同意軍區保衛科王科長和孔慶德副司令事前提出的啟用 8199 部隊加強賓館警衛的建議。20 日凌晨，就出現了內外串通，衝擊進入賓館問題。儘管在場的獨立師幹部主觀上要阻止來人衝擊賓館，並向師部和軍區急報情況，也與中央警衛團有過聯繫。

周恩來對賓館一切安排停當，謝富治一行於 14 日中午到達；周同大家一一握手，並特別詢問了北航“紅旗”四個人的姓名、年齡、籍貫等，交代說：“主席今晚到武漢，他老人家一定要來游長江，叫你們來主要是協助保衛主席安全。武漢駐軍過去是你謝富治的部隊嘛！”謝富治反而迷迷糊糊：“我怎麼不知道？”見狀總理哈哈大笑^[2]……原來，謝對中央要自己趕赴武漢理由還未曾認真動腦筋，不明總

[1]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179，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 年。

[2] 同上，周的接話見《王力反思錄》P1004。

理意圖。周恩來說：**毛的記憶力真好，說武漢的部隊是謝指揮過的，周要秘書一查，果然武漢駐軍主要都是謝的部下。**足以可見毛、周對此頗費了心思；此外，謝、王一行來漢首要目的也並非處理武漢問題。

如果說駐軍曾是謝的部下，大概指 1948 年到建國前後的中野和二野一段歷史^[1]：中野的 2 縱是陳再道任司令，鍾漢華任副政委，並列的陳（賡）、謝兵團，謝富治兼任 4 縱政委，秦基偉為 9 縱司令；1949 年 2 月，中野正式改稱二野，野司和陳、謝的部隊有所調整；新陳謝兵團（第 3 兵團）司令員是陳錫聯，政委謝富治，政治部副主任為鍾漢華，下轄 11 軍第 31 師師長趙蘭田，1967 年在空 15 軍任軍長，第 14 軍（原 4 縱）第 40 師師長即 1967 年武漢空軍的劉豐；原來老陳謝兵團的 9 縱，改編為第 15 軍，也即 1967 年的空降兵第 15 軍，下轄 44、45 師，是 1967 年“7·20”出事，趕調入城支左的部隊；3 兵團第 10 軍的第 29 師，（也即 1967 年參加維持東湖賓館和軍區安全，奮力搶救王力的 29 師—8199 部隊）1950 年 12 月劃歸第 15 軍管轄，後赴朝作戰，1961 年才由武漢軍區直管。1961 年 6 月，原隸屬武漢軍區的陸軍第 15 軍軍部及所屬第 44、45 師劃歸空軍，與原空軍傘兵師（後改稱第 43 師）合併改建為空降兵第 15 軍。所以周恩來講武漢部隊是謝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長的。周在 14 日一見到謝，就道出解放軍序列歷史淵源，謝反而未曾注意；毛、周均畢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軍委領導，毛澤東認為解決問題，部隊是關鍵，無庸置疑，**周在去武漢前，**

[1] 參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大事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另參閱余汝信《“720 事件”中的“8201”與“8199”》（2005 年 1 月）。

中央軍委最高決策核心已經研究過武漢安全問題和部隊問題，這大概也與確定倚重武空，由劉豐負責毛澤東安全有關。

晚上，毛澤東一行也就抵達了。按張根成回憶：“總理正與三軍領導開會，汪東興、鄭維山走進東湖百花一號，一路走一路開玩笑說今天就只抓住一個扒車的是鄭維山……大家一陣玩笑，氣氛輕鬆。”或許這玩笑也一直說到了毛澤東處，所以《微行》講，17日總理叫參加聽會，毛澤東還在埋怨大家勸阻他“一路都聽你們說，連個鬼也沒有扒車”！張根成見狀，報告周總理汪主任到了，周出來，明白毛已安全到達，隨即宣佈散會，與謝、汪等就去毛主席駐地梅嶺一號。

7月15至18日，楊、李、余、汪、鄭和軍區領導曾去江邊踏勘，策劃游泳事宜；周恩來和謝、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澤東處彙報，下午，與軍區領導和師以上支左單位彙報，這些內容，在楊成武的有關係列回憶裏已經十分詳盡。17日會上，毛提出要周次日回京解決湖南問題。看來，毛與周，對武漢情況還是比較樂觀的。王力回憶^[1]則點出了周、毛意見的要點：“**主席提出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總理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聽取彙報，參加的不到30人。從15日一直開到18日。總理的總結不是個人的，而是傳達中央的方針，以及根據在武漢瞭解的情況，提出了具體的指示。他的總結提綱是用毛筆手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總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講：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

[1] 《王力反思錄》P1006。

來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主席就講得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方針，主席一條也沒有改變。”

而且在17日的會上，毛澤東說：“（造反派群眾）真正要打倒陳再道，怎麼行呢？錯誤改正了，他們還要打倒，那就是他們的不對。陳再道就是不動腦子，少政治。”周恩來即插話說他主動促進陳毅與韓愛晶當面溝通之例，韓說“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周示意陳表示一下，但剛烈憨直的陳毅元帥卻未吭氣。

需要說的是，雖然周恩來在17日已建議毛澤東次日接見軍區領導，當晚又與陳、鍾二人單獨談話做工作；但陳再道直到17日下午，並不知周恩來的講話原則正是毛澤東指示的精神，毛正在東湖親自指導處理武漢問題，甚至認為是周恩來因循處理各省問題思路對湖北的個人認識。頓時陳十分抵觸，不滿周這一講話，當場對要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表示不服氣。周恩來又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依然不滿，將支左辦公室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語直接衝撞周。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

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周也（氣的）拍桌子對陳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1]

讀到這段未曾披露的內幕，聯想其他回憶和武漢事件後各個人的心態和態度，似乎感覺到，在文革運動的認識衝突背後，有一個深刻的未曾撫平的心理創傷：中央與四方面軍的歷史衝突。或許，陳再道與周恩來在四目對視之時，腦海裏既難有“工人總部”也沒有“百萬雄師”，他們同時回想起的是 1936 年底批判張國燾時，紅軍大學的許世友串聯原四方面軍 30 多高級將領試圖拉回大巴山——被整的“反革命武裝集團”錯案，其中也有當時難以忍受過火批判的桀驁不馴的陳再道。誠然，周恩來想的是如何幫助陳認錯過關，讓群眾認可諒解，同時不受到心靈的傷害，而陳再道則想的是中央是否信任自己、有人要算計自己（過去軍內一些工作問題的紛爭，他總認為是“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武漢事件的一個悲劇性細節也許恰恰在這裏，老一輩心理的歷史創傷，可能還會暗滲血淚，影響著 30 年後的思維、情緒，乃至決策。鹵莽少文的將軍，完全知道軍政元老在以往路線鬥爭裏的角色和位置。另一方面，《微行》一再披露的恰有毛澤東和林彪在對待有關原四方面軍高級將領事宜上，極其慎重和特別的需要，實非偶然心血來潮。

[1] 見《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199，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 年。陳司令的生活副官陳某也證實他的確拍桌子對總理意見不通，此情當時在場的人都已私下傳開，消息也很快傳回北京，得知武漢出現變異的丘會作就聽說了陳與周總理拍桌子。但一些人回憶的時間不確，頂撞總理不是在 18 日，而是在 16 日。後來在湖北省學習班批判鬥爭陳再道時，在 11 月 23 日上午的會上，軍區機關領導和群眾還指責 16 日陳頂撞總理、拍桌子。15 軍軍長方銘後來也與群眾回憶起當時的衝突，陳說怕群眾不依，周說你不要用百萬雄師來壓我，不要說百萬，你就是千萬雄師我也不怕。

文化革命中，中共中央一再保護備受衝擊的韓先楚、許世友、陳再道，而且毛澤東在文革裏特別倚重的軍人就是出身四方面軍的將軍，恰是謝富治、陳錫聯、許世友，還有鄭維山、李德生、韓先楚，也非偶然。

深諳黨、軍歷史和歷史恩怨教訓的周恩來（1936年批判張國燾和批判擴大化時，他恰好不在延安，十分超脫），也特別明白必須保護一些心底有暗傷的剛烈老將（他多次苦口婆心勸戒紅衛兵，要明白黨內鬥爭歷史中的教訓，不要以為大方向對，就什麼都對；政策方法不對，大方向就不能保證。而且說如果不把歷史教訓告訴青年人，就是對毛主席不忠。針對武漢紅衛兵對待王任重的政策問題，他就苦心教誨：“現在你們重複（我們）四十多年前的錯誤，我心裏很難過。你們只能比我們更好，如果你們比我們當初作得還差一點，那是我們犯罪。”），但周恩來苦於一時難以說透，去說服陳。王力沒有將這段重要情況寫進他的“反思錄”，大概是為了當初要求的對“家醜”的“保密”，也為顧全總理和陳再道的面子。實際上，從15日到18日，周的講話不能使陳接受，後者也當場表示了難以買帳；陳在事後的檢查，也坦白承認了這點。

陳與周恩來對抗，旁證是：“7·20”事件後，揭發批判陳再道，15軍王新政委（後任河南省軍區政委）揭發陳“煽動下面幹部在會上給總理提意見，企圖壓中央改變態度”。軍區副參謀長王步青（後任軍區參謀長）揭發“鍾漢華埋怨軍區整理的材料沒有及時送交總理和彙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軍區領導對周的善意苦心的始終不理解和極端抵觸。這些抵觸，確實是針對中央的。其二：獨立師政委蔡炳臣，在18日回師部傳達會議精神時，說：“中

央首長來了四天，聽了三天彙報，作了一天報告。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彙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彙報。鍾政委在彙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鍾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彙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指師長和政委）”；在該師幹部對此情極為不滿時，還特別交代**“不要提總理說的”**，多少說明他們想留有餘地，不想直接和公開對抗周恩來，而師領導和下面幹部**已經對周講話非常不滿**。在7月20日下午，陳司令得知周將來漢，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同時，在獨立師師部，有團級軍官議論：**“聽說總理伯達要來”，“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1]客觀歷史地說，在整個事件過程裏，從陳再道到他的部下，已經對周恩來的觀點和態度十分抵觸。這種對抗情緒實際上比對王力來得更早更深層。這是沒有被史家披露的，也是陳司令在毛、周離世以後，1978年中央又為“7·20”事件平反時，不再承認的一個重要細節。

會後，周恩來如前所決定，帶陳、鍾去受毛澤東接見，毛親自做工作，安撫了忿忿不平的軍區領導，重申了解決問題的原則，要幫陳再道下臺階。忠厚的陳表示接受主席指示，堅決照辦。周也放心地回北京了，在當時，大家都相信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性，相信只要軍區首長願意按中央精神改正前期認識錯誤，對下面和“百萬雄師”做工作，武漢問題可以在既定精神和正常秩序下，逐步解決。今天看來，大家（包括中央）都嚴重低估了文革激起黨內和社

[1]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249、228，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會潛在的矛盾及其作用，高看了軍隊幹部和戰士、民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嚴重低估了反對毛澤東文化革命做法的體制性力量和群眾性力量的巨大能量。周恩來雖然多次說前面的省區有反覆，在武漢軍區也說湖北還會有反覆，**他沒有想到，僅僅在幾個小時後，甚至還在毛澤東接見同時，反彈已經在迅速、廣泛地醞釀中。**

這點，還是陳再道自己在口頭檢查承認的比較中肯：“七月十四號，**總理一來，就說毛主席說，你們屁股不要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為什麼呢？就是自己這個反動的思想，就是不重視，就是抵抗毛主席。以為我開的幾次會，都是搞的那。主席的這個指示總理說了，主席又說了，（如）傳達下去，這個力量會多大！這個反動透頂了，連主席的東西都不傳達。這不是反抗主席啊！還要怎麼樣反對主席啊！”“所以，**開了幾天會，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是他（按，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裏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麼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裏表態，心裏總還是抵觸的，不願意堅決貫徹。**所以，總理、謝副總理開會講了那麼多，自己總是在那裏陽奉陰違，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總認為還是要把情況講一講，材料還要他們（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復工總。工總…在我思想上……，我過去沒有說心裏話，（實際）認為生米已經做成熟飯，已經解散這麼久了，現在工人到處參加了組織，有了這個謬論。繼續對抗中央，對抗中央文革，對抗總理。就是不願意貫徹。指示這麼明確，這麼英明、正確，

就是抵觸，不願意辦，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在繼續頑抗，而且公開對抗中央，反對毛主席、周總理這些指示，拒不執行。所以，‘七·二〇’事件不是偶然的。”^[1]

陳在當時高壓的批判下，自己上綱很高，戴了許多大帽子，不可作為憑證，但他也說了實話，就是對周傳達的中央精神，以致對周本人，實際上是非常抵觸的。這些事情，陳再道在毛、周在世之時，沒想否認也不敢否認，所以在1972年他被解放出來，擔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時，還專門寫信給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重申自己解放了，不意味著自己在“7·20”事件做對了，沒有錯誤了；聲明他不會翻這個毛主席和周總理定的案。

軍區支左辦公室在1967年7月底於軍區內部的揭發批判會上，就談到當時向總理彙報的實情：“向總理彙報以前，鍾漢華就到陳再道那裏問他，我們怎麼彙報？誰講？陳再道說：‘你去講。’並且表示，還要堅決，不能動搖。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要繼續堅持錯誤……可是當總理講到工人總部的奪權和搞經濟主義的時候，陳再道很囂張的講‘你們調查嘛’！原來我們有些同志不瞭解這些情況，說謝副總理、王力來了三天就決定武漢問題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們，不是那樣子……彙報什麼問題人家拿出來，人家說的清清楚楚。我們有些首長說某某人被打了，怎麼怎麼樣。總理問你到現場沒有，叫什麼名字，根本答不上來……比如‘百萬雄師’調人（武鬥），調人有個調令，這個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後總理拿出來了，總理說：‘是這個調令吧。’

[1] 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297-300，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人家清楚的很”。^[1]

鍾漢華政委在當年11至12月於湖北學習班（按：大軍區和省軍區幹部在北京的集訓班）上的檢查，也如實地回憶情況與披露自己心態：“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由於我們反動的立場，就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的反革命決心不變，仍按原方案彙報。為了穩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兩日的彙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鬥以後，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18日下午，總理作了正式結論，表面上（我）也假意表態，承認方向、路線錯了，但這時五心不定輸個乾淨，內心不服。當晚主席對陳再道和我親自教導，要我們好好向‘百萬雄師’作工作，作好部隊思想工作，步子穩妥。工作細緻深入一些。由於我們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對主席沒有感情，仍是拒不執行，也不傳達。真是罪該萬死，千刀萬剮，也贖不了我的罪。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准蔡炳臣傳達了，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

[1] 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202，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後，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由於我們長期的毒化群眾，當時已是處於乾柴澆汽油的景況，見火就要爆發。我的罪過大啦。‘7·20’反革命暴亂的火，是我點起來的。”^[1]

誠然，這裏鍾漢華在當時高壓情勢下，自己無限上綱，給自己戴了一些“反革命”大帽子，有失偏頗；不過可以從他們交代中看到周恩來那時候對軍區領導真誠做工作，陳、鍾二人甚不領情，步步退守的實際心態，也看到他們從抵觸、被動，到組織失策、失誤的的心理和失控的過程。武漢軍區領導一級自己的思想完全沒有通（不可能通），又在極其艱難的思想工作未做時，將矛盾直接踢到下面，倉促佈置傳達周恩來講話精神（19日夜已經傳達到排級，並傳至士兵）；軍區秘書科後來在追查事件時揭發：19日下午獨立師戰士到值班室造反，反對四點指示，當時機關幹部都不知道什麼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麼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2]。顯然是讓中央被動難看，幫了周恩來的倒忙。實際情況是：獨立師蔡政委18日在鍾漢華處獲准傳達總理指示後，當晚師黨委常委開會決定次日上午傳達到各團團長、政委和司、政、後科長；午夜，獨立師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又到蔡政委家商量，居然兩人私下決定擴大傳達範圍。19日早晨，周忠令管理員閻保國通知機關

[1] 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2301-302，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2]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202，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排以上幹部、直屬分隊連以上幹部，以及部分支左人員參加聽傳達。所以在19日下午，獨立師全體幹部戰士都已經得知中央對武漢問題的四點基本指示精神。獨立師並未參加“四大”，個別人這樣做，顯然違反了黨紀軍紀。於是在獨立師有預謀、有組織的活動下，在沒有任何思想轉彎工作的前提下，中共中央的意圖提前被洩露了。文革結束以來的流行說法是王力和造反派群眾洩露了中央精神，激怒了不同觀點的群眾，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王力在武漢的公開講話，從未去傳達與透露總理講話的內容，造反派群眾則是在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群眾將所謂的“四點指示”在街頭公開，才聽說的。

三、7月18日周恩來講了什麼

周恩來所講的精神，就是中央當時準備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從當時形勢背景和正在解決中的河南、湖南問題看，原則是一致的。如果沒有出現後來的“7·20”大規模反彈，即便組織兩派群眾代表座談，中央最後下達的文件精神也將是如此；在發生“7·20”反彈之後，除改組軍區領導班子外，中共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基本精神也未發生根本變化。文革十年裏，在“徹底否定文革”之後，最大的遺憾就是大家都沒有看到這個講話提綱，去研討這個講話提綱。大家往往是在並不明瞭（或者掩蓋，或者歪曲）當時中共中央實際意圖的情況下，回避當時的實際背景，去認識和判斷歷史事件的，而且人云亦云、輾轉炒作。這樣，實質上不是維護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形象，而是嚴重扭曲了歷史

和周恩來，也絕對不利於認識和反思文革問題的實質及其深刻教訓。

在軍區的會議上，周恩來講話：

這個會議接連召開四次^[1]，會議是由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這是中央的決定，還沒有來得及去群眾那裏走訪，僅僅看大字報，走訪幾個組織，我首先談談個人意見。

先談湖北形勢問題。湖北沒有實行軍管，但又軍管了，又沒有軍管。^[2]形勢表面穩定，群眾對立情緒很大，這個亂的現象很好^[3]，鄰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說問題解決了，又有反覆^[4]，唯有湖北沒有提，有意讓在湖北多耽一些時間，看看對鄰近省有什麼影響，這次解決湖北問題，估計還會有反覆^[5]。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覆，先要把軍區領導問題解決，深刻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就可以更好地領導湖北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甘多個省的前面。^[6]過去，以王任重為首的當權；湖北問題解決對全國有意義，以兩條路線鬥爭開始分為兩段；奪權和奪權以後。中南地區的陶鑄是有影響的，解放後十六、七

[1] 按：指 15 日到 18 日四次。

[2] 按：這是幾個月來，周恩來在掌握全國未奪權成功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省市、自治區情況，斟酌是否要軍管時，反復考慮的一個問題。即湖北在某種意義上是軍管了，但文革活動又在缺乏實質性控制的情況下進行，且形式上也未宣佈軍管。武漢軍區是既有管理權，又沒有運動引導實權。

[3] 讀：說到要害，表面上軍區控制了形勢，但兩派群眾對立極大；周也按當時的套話說“亂的好”。

[4] 讀：有反覆的是黔、黑、晉、魯，這裏的“鄰近”是四川。

[5] 讀：總理一方面認真處理各省問題，一方面也充分估計到按當時處理文革紛爭的認識和方法，會有反覆；不過講的反覆，還是幹部和群眾的局部性認識反覆，還不是出現劇烈衝突和大規模抵制中央。

[6] 讀：周認為軍區領導有錯誤，是關鍵的，而認識了錯誤，就可以更好地領導全省運動；文化革命，人們犯錯在所難免，但認識和改正，還可以前進乃至先進。周打從內心是這樣期望武漢軍區的。

年的影響，湖北地區、廣東又是中南的模範省，有他的影響，這一主要責任在軍區，當然不能排除陶鑄的責任，當然不能叫陶鑄來解決問題。推遲時間來解決湖北問題（了），如解散工總時就來解決（就好了）。不過現在，特別“百萬雄師”成立以來問題暴露的更清楚了^[1]，你們是打過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奪權奪得對不對？奪誰的權？奪權是從上海開始的，奪誰的權，當然是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了上海市委的權以後，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種措施，中央毛主席就發出號召，各地推廣都這樣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奪了北京市委的權（李雪峰），中央始終是支持的。奪了幾個月才成立革委會，初生兒不管怎樣打扮總是毛手毛腳，我們是贊成的、支持的，不能說他的大方向走錯的。“一·二六”奪權就奪權，“二·八聲明”出來（按：指武漢的造反奪權運動實際和群眾衝突裏的文件），很多人支持的，“二·八聲明”儘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雖然這裏的錯誤是指責摘桃子（反託派）等都是北京發生過的，不管怎樣，以自己想想過去，但想到別人就不該把“二·八聲明”看得那麼嚴重，因此就出現了“2·18”，“3·21”（按：指武漢軍區對形勢的聲明和取締工人群眾組織的公告），由於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而接連出的錯誤，工總的圖片是醜化工總；“1·26”，“2·8”是積極因素，你們應該幫助的。二司在“3·21”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這一工總“十大罪狀”發到農村，農民就說工總翻不了案，北京受衝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們看得那樣嚴重，軍委八條的擁軍不能象逢年過節，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老

[1] 按：周的是非所指和傾向性應是明確的。

工人、黨員仍有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因而貴州、黑龍江、山西、山東都有反覆，八條出來後有了問題，江青同志講八條是擁軍，十條是愛民，八條出來後大家情緒都很高，十條以後大家情緒不愉快，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1]。

“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2]。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空軍後勤政委提出的工總保王任重我感到驚訝！如果劉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會，就能說明謝富治保了劉少奇嗎？^[3]你們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你們的‘六·四公告’出來就使‘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發展。‘六·六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就有調整，所以‘百萬雄師’是不是人武部的？^[4]在軍區開過會，六月八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5]。軍事院校鬥羅籌備處的聲明有錯誤，但當中有幾句話是說出了當時的幾個問題，把這四個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

[1] 讀：這裏批評任意解散群眾組織是無組織無紀律的，應當與中央彙報和知會、請示和批准；不過中央也未太當成事，認為對群眾的問題出現隨意處置，對文革開展有激進思潮和守舊思潮，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2] 讀：認為“百”的產生發展，軍區指導思想和傾向有問題。

[3] 按：軍區一直追索一個虛幻的口實，指責“工人總部”死保公認了的走資派王任重，犯了錯誤。在當時的彙報中，還將其作為主要理由，反對工人總部翻案。

[4]（下答：抓辦搞的）按：根據陳再道的檢查講話，周恩來還有一段話未記錄下來：“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

[5] 讀：周這裏全面概括了他介入武漢問題以來，社會矛盾衝突的發展過程；他對武漢局勢變化和激化心裏有數，將問題歸咎於軍區的責任。但這裏也明顯地把“百萬雄師”看成犯錯誤、對激化衝突有主要責任的群眾組織。

好好看看就夠了。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氣，加上河南問題的影響，二七公社解決的方案有影響，這是坦白說的^[1]。你們人武部、獨立師反映情況，不是第一手，是道聽途說，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負責同志。

我們有幾個建議：

第一、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鍾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

第二、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

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2]

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

第五、紅三司是傾向保守派一邊的群眾組織。（按：這裏點的“中間偏保派”）

第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

[1] 讀：周恩來這裏說明了，從軍區一開始去組織批判群眾的一個聲明入手，抓人，幾個環節幾個問題處理得不好，造反派群眾有氣，就要打倒陳司令，抓武老譚；而同時中央處理河南問題對武漢有影響，這都是實際情況。

[2] 按：總理講了一個原則，也是當時各地很難做到的；這裏周還高姿態承擔責任。周說的“指名”還不是指武漢，而大概是指湖南“湘江風雷”處理，王力在當晚就當眾人的面接毛澤東的話，說第一個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這裏說湖南影響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評，給湖北問題下臺階。

第七、軍區要承擔責任以外，要作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長期的影響，不作這工作是不行的。^[1]

第八、所有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改變對解放軍的看法，行為要澄清。^[2]

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說實在話，我們這些高級幹部對主席的話有時也不理解。有的（問題）中央要承擔（責任）。鍾漢華問題的處理有點不果斷，要勇於負責。

（該講話錄音整理稿輯入《口述“7·20”》，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196-199，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撇開價值、是非判斷的爭議，從事物的本質看，當時武漢軍區和湖北省獨立師主要領導，以及“百萬雄師”極其抵觸，不願意面對和接受的，實際上正是周恩來的這一席講話，他們要謝、王澄清的正是其最主要的所謂“四點指示”（公正地說，“百萬雄師”最先是要求謝富治澄清這個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來7月21日在武漢東湖邊對北航紅衛兵井崗山同學講：“王力同志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3]7月25日，他對河南省

[1] 按：7月18、19日，軍區的當務之急是著手總理要求的這個工作；陳、鐘由於思想不通，沒能也不可能把握總理的教育轉化要求與機會。

[2] 按：這條是引導群眾組織，要自己區分言行的正確與錯誤，要正確對待解放軍，也是批評了造反派對軍隊的態度。

[3] 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260，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的軍隊幹部也講：“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

7月26日，在中央常委會批判陳再道時，周恩來譴責“7·20”事件是“叛逆行為”。

今天必須再三強調的是，肇事者在19日開始抓住王力發難，實質並非王力自由散漫“黨性不高”——錯誤地在周恩來身後向群眾透露了周的講話精神，而是王力透露了獨立師和“百萬雄師”朋友們不願相信的聲音——他在19號軍區師級、二級部長會議上才傳達的周恩來18號講話精神要點。許多關心這段歷史的人，乃至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忽視了首先是獨立師指戰員到軍區“造反”，他們並非聽了王力在水院的錄音，而是聽了師裏的傳達——甚至是傳言。到19號下午，“百萬雄師”的群眾先後聽了大街上王力的錄音廣播，但也沒有不冷靜地自動聚集上街，而是他們的主要頭頭專門到武昌的軍區、鐵路局、支左辦公室交換情況、商量對策。把事件的激發責任推到王力個人身上，是王力在8月底被“請假檢討”以後，甚至是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以後的輿論。這種輿論，無視歷史事實和衝突的本質，讓一個文革小組幹將承擔了宏大的尖銳的路線鬥爭是非的責任。在1967年當時，也僅僅是王力此清高氣盛的“知識分子”適合“百萬雄師”群眾公開反對痛打，藉機發難而已；反抗和抵制中央文革激進文人的思潮，在謝、王抵漢以前早就客觀存在，在王力傳達中央精神之前，武漢就已流傳王力個人的流言蜚語，諸如說王力是劉少奇的人，是“二月提綱”的黑筆桿子，甚至獨立師的牛懷龍師長說省公安廳剛剛查出王力是國民黨員……

皆非空穴來風。但 19、20 號獨立師和“百萬雄師”藉王力來公開反對的，恰恰是周恩來的講話，即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商量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所以在 7 月 19-20 日，武漢上演的是一出“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鬧劇。

周恩來作了這一最關鍵的報告後，又帶領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聽取毛澤東談話，才當晚離漢返京。具有非常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的周恩來未能估計到的是：1、就在他離開東湖賓館以後，當晚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就在武漢軍區鍾漢華政委同意下開始傳達這個講話主要精神（紀律規定暫不下傳），次日傳達到排級、戰士，部隊開始出現騷動，就有指戰員去軍區造反；2、18 日下半夜，謝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群眾中發表激情的傾向性講話，表達了中央對造反派的支持，錄音於 19 日在武漢三鎮播放，加劇“百萬雄師”群眾在 20 日的反彈；3、更為嚴重的是，在 19 日下午，就有個別人又向“百萬雄師”頭頭，透露毛澤東就在東湖，要他們趕緊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在東湖的消息是絕密的，僅僅是軍區主要領導和負責安全的武空副司令劉豐知道）這是事件之後各屆中央政治局與擁護中共的一切幹部群眾，至今似乎不知道的秘密隱情。

獨立師部分指戰員和“百萬雄師”，在這些人自以為是“善意的”挑動下，頭腦狂熱地衝擊了武漢軍區，又衝擊毛澤東與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下榻的東湖賓館，抓走王力並在軍區批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7·20 事件”。

四、事件當天

周恩來已於7月18日深夜離漢返京，19-20日武漢時局劇變，周恩來並不在現場。所以，謝、王到水院講話、獨立師將他的講話要點向全師傳達、戰士與“百萬雄師”群眾去軍區要求澄清講話——衝擊東湖賓館，甚至揪鬥王力、對周不滿等等，他都未能預先估計到。

7月20日的上午，周恩來正在釣魚臺召集中央文革緊急碰頭，湖北方面楊成武的急電也打到會場，告知武漢情況；周即告楊根據情況可以將毛隨時轉移到安全處所，決定安排一下馬上飛漢。下午，林彪與中央文革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商議武漢問題及對策，周後也趕到。今天眾多文章皆稱在該次會議上林彪定調“7·20”是反革命暴亂，但根據不足，林彪秘書張雲生就提出異議。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回武漢，勸毛轉移。看來，這既是會議的決定，恐怕更是周的決定，他被武漢時局的變異，也為自己沒能如願化解武漢問題、保證毛澤東的安全而震驚。張雲生《毛家灣紀實》說，當日下午，“江青來到人民大會堂，十萬火急地要見林彪……在江青之後，陳伯達、康生、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也陸續到了林彪住的大會堂浙江廳，最後，總理也來了。……大約一小時左右，會議散了。葉群來到秘書值班室……作應急式的佈置。”葉說“……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總理決定親自去武漢，保護主席趕快向上海轉移”。張的記述是準確的，葉群的話也說到當時實情，

確實是總理決定親自去武漢。這些，從後來披露的他的系列言行也有所證實。今天研討“武漢事件”及當日的會議，似應傾向於**當時所有的中央領導人，至關擔心的首先是毛澤東的安危。**

《東湖風雲錄》裏引用的邱會作的回憶是可以作一個參考的：“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周恩來知道後，從北京勸毛馬上離開武漢。……總理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提議林出面給主席寫封信，勸主席馬上離開武漢。會議決定空 15 軍派部隊趕赴現場。葉群開會回來告訴林：……總理和鄧大姐決定都親自去武漢。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麼辦？林彪說：‘鬧這麼大的亂子，我就不去，也沒有本事處理。總理心臟不好，勸總理也不要。江青自己為什麼不能去？’……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和總理磋商，立即寫了一封短信，勸毛速離武漢，並派我帶上信立即乘飛機去了武漢。”^[1]

對於當時中央在武漢和北京的眾人來說，武漢情況極不明朗，幾乎是風聲鶴唳。所以出現粟裕在 27 日中央軍委傳達當時揭發的事：周總理秘密通知軍區抵漢消息，……但在周總理專機離武漢 100 公里時，陳再道派了 25 輛汽車，載著“百萬雄師”的人和戰士，親自到了機場，當時空軍發現情況不對，馬上給總理拍電報，改降在另一機場，另一架空機降在原機場。陳再道一看沒有總理，他說要“歡迎”，實是想扣留總理。陳的秘書說，陳再道得知周總理要來武漢，就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

[1] 該回憶輯於《親歷者的口述——民眾心中的武漢“720 事件”》，徐海亮，《東湖風雲錄》，P247，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 年。

今天心平氣和地說，陳是沒有企圖和膽量扣留周恩來的，他見事鬧大控制不住，去迎接總理（這次也直接通知了軍區）希化被動為主動，那就看周恩來去善處亂局吧。秘書的揭發也是事實，即陳的思想極其不通，對周 18 日的意見，實在是不服，現在軍隊和群眾亂起來了，看你周恩來怎麼辦？還不是和王力一樣被動！這點也被毛、周識破，所以毛澤東不同意周在武漢召集軍區與群眾代表談話：“總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漢沒有什麼談頭了……三方面在一起談，談不成可能被包圍……談不攏，會提出什麼條件？人扣在那裏強迫簽字承認他是革命組織！”（《微行》所引）至於“百萬雄師”人員聚集機場，是獨立師的蔡政委通知來“向周總理告狀”的，他的原意也不過是以群眾壓總理，要求重新表態而已。“百”派的意見和問題，在此前沒有得到充分表達的機會，激憤的群眾要求總理接見，傾聽他們的聲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見周的專機並未到漢口，集聚人群也就散去，此時，周恩來已在武昌縣山坡軍用機場著陸。

隨同到武漢的張佐良醫生說^[1]：“毛主席可能有危險，不然怎麼叫周總理親自去武漢還帶了部隊！周恩來再次趕飛武漢是為毛澤東解圍，救出王力和謝富治。”在王家墩低空盤旋時，“見到機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見機長（按：張瑞靄）走到周恩來身邊說了些什麼，飛機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飛去。”周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起飛約 40 多分鐘，約在信陽空境）機長報告武漢市已經貼出歡迎標語，

[1] 《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P15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而王家墩機場跑道停有滿載“紅衛兵”的卡車，無法著陸，只好改降“備用”的山坡機場。到達山坡後，周首先要通劉豐電話問訊情況，劉後從王家墩趕來，商量進城辦法；後飛還王家墩，天黑後由空司作戰科長帶路進城。

據當時駐山坡機場 7333 部隊同志的追憶：周到達第一句話就問“你們這兒有電話嗎”，說“中央很關心武漢情況，要去武漢瞭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在候機室，周電話詢問軍區和賓館：“謝副總理、王力在那裏？他們現在安全怎樣了？”^[1]張佐良醫生說天黑以後，“周恩來換上便服，戴上墨鏡”，趕去東湖；據多人回憶，周是在王家墩機場通知飛機可以降落後，下令全體登機，才在王家墩降落，待天黑後乘吉普車到武昌的（周居然採用了白區工作的方法，可見當時也做了多種準備）。晚上，張根成見到周恩來戴黑眼鏡穿軍裝進入百花一號，立即與楊、謝、李、汪、余商量確定安全轉移毛澤東的辦法，旋即去毛處，勸毛轉移。毛澤東同意了當晚乘專機去上海。武空警衛部隊、空 15 軍著名的黃繼光英雄連（上甘嶺特功八連，由 3 營的杜教導員率領）和部分在東湖的 8341 部隊指戰員，直接承擔了當晚護送毛澤東去漢口機場的任務。武空副司令員劉豐、軍區孔慶德副司令具體指揮和配合了轉移行動。

下半夜周從主席處回來，並帶回原駐在梅嶺的一個小分隊 8341 指戰員，加強百花一號院的警戒（當時北京來人已全部集中在百花一號），可見已經將毛送離東湖（周從北京帶來的兩個中隊 8341 留在漢口機場專線備用）。而且空降兵第 15 軍第 44 師、45 師的兩個團緊急趕來武漢執行警備

[1]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P253，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 年。

任務。半夜後，總理從主席處回來，吃過飯躺下睡了。不久周起來，問張根成那裏有安靜點的電話可以用，要找孔慶德副司令；張答在樓下有電話，帶周找到電話。周接通孔，問“到了沒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氣說：“我跟你交代什麼啊！為什麼不告訴我！我這個人這時到這裏幹什麼來了！”孔作解釋，與周彙報軍區安排。周說“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電話，一拍手（周輕鬆愉快時的習慣動作）說“到了就好了，睡覺”！劉、孔保證落實了中央安排，周落實了在武漢軍區和空軍的保護下轉移毛澤東的措施，而且，空軍政委余立金及秘書也落實了“空中走”的方案與工具，周恩來一陣輕鬆，拍手稱好，這樣周才真正安心睡了（19日凌晨他回到北京以來，兩天兩夜一直沒有時間真正休息一下）。周恩來20日再次赴漢的主要任務之一完成了。（《東湖風雲錄》，P250）

另按專機機長王進忠回憶，在20日下午5點後，載滿8341軍人的專機隨總理專機在山坡機場降落，周恩來親自命令“你們就在飛機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隨時準備起飛”；“晚飯已經通知送到飛機上來”。到天黑後，專機再飛到王家墩機場著陸，見到從雲南飛回的潘景寅的232號專機，很快，潘和余立金的秘書到了機場，秘書傳達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按此回憶，由於究竟是天上走還是從地上離開方案未最後敲定，所以空軍專機始終處於緊急待命狀態，不過毛澤東可能使用的專機已由余立金初選確定。而最關鍵的問題是，周恩來一到武漢，就地指揮了一系列重大決策並具體組織落實。這點今天鮮為一些回憶所披露。（《東湖風雲錄》，P252-255）

送走毛澤東後，周親自組織平息武漢事端，組織找回

被“百萬雄師”揪走又失蹤的王力；對照多種記述，全過程即由李作鵬、余立金出面與在漢海、空軍單位做工作，穩定局勢，安排保護和轉移毛澤東；總理親自與陳再道談話，要求他配合處理問題，找到王力，陳仍表示無能為力（當時“百萬雄師”不聽、8201不聽，8199也不聽陳司令指揮）。在現場的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後來回憶：周恩來親自組織平息事端，由李作鵬、余立金出面分別與海軍、空軍單位做工作，穩定局勢；周與陳再道談話，要求他配合處理問題，找到王力，陳再道怨氣不消，仍然表示無能為力；周恩來看到陳的消極態度，生氣地一拍桌子，說：你這是什麼態度？你不要以為你有“百萬雄師”，“百萬雄師”算得了什麼？你明白嗎？你對抗了中央的決定，威脅了主席的安全，綁走了中央文革人員，要是把你的行動通報全國，全國八億人民都會反對你的！陳再道無言可對，低著頭走了。^[1]周又通過武漢軍區其他領導（孔、葉）做工作，孔表示已經救出王力，但天黑後卻不見了蹤影，周幾乎是怒吼地說：“不行！你們設法把他找回來。”^[2]周恩來到武漢後三次要求軍區設法找人。到21日黎明前，仍無王力消息；早上，他焦急地命令劉豐親自去找到王力。對周恩來而言，現在並不單單是王力個人安危，而是涉及中共中央整體的權威性。

在周總理和總參作戰部、“中央軍委前方臨時指揮所”的指揮下，武漢周圍的空15軍，奉武空的命令緊急調派入城，實施緊急戒備任務（還有其他系列的軍隊調動）。或許到此時，謝富治才終於明白，在14日時，周恩來為何笑他忘了

[1] 在場者李作鵬回憶，1990年代。

[2] 鄭珠濱、屈德騫，《一代將星孔慶德》，P434，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

武漢駐軍曾經是他率領過的一部。

王力自己對這一段的記述也是確實的：“總理趕回武漢……最大的功勞是保護了主席。當時主席的住所（按指梅嶺，不過 8341 的警衛幹部依然牢牢地控制著梅嶺二號、三號游泳池和密切警戒周圍的小丘、樹林，衝進來的人群未曾靠近梅嶺一號）附近已有擁擠的人群。……總理親自佈置主席由賓館的後門（按：緊靠省博物館）轉移到機場，改乘軍隊的小汽車，用武漢軍區空軍的車號，大卡車在前面開路。……當時總理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廢寢忘食，費了很大的事，每個環節都作了周密的佈置。”^[1]

最近見另一紀實文字《政治旋渦中的楊成武》轉抄陳再道的回憶說：總理一到武漢，就叫孔慶德和牛懷龍同志（獨立師師長）把王力找回來。並讓孔慶德通知“百萬雄師”，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談判，軍隊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飛機，而由於林彪插手，這一計劃未能實現。這一傳聞近年屢見。孔慶德口述成書的《一代將星孔慶德》也講：周恩來對他說“你立即通知‘百萬雄師’派 100 名代表赴京談判，軍隊也派出代表和他們乘飛機前往，具體時間，明天再定。讓他們先作好準備”。此言應該在周再次抵漢以後。不過當時盛傳的總理從北京有電話打到武漢，要部隊與“百萬雄師”去人商議解決問題，時間大致是在 20 日的上午，周在北京得知出事的時候，不是後來“一到武漢”。20 日中午，軍區葉明副政委曾指示 29 師的張昭劍政委向揪鬥王力的“百萬雄師”頭頭傳達總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談解決武漢問題。”話剛說完，不料其中一個頭頭把桌子

[1] 《王力反思錄》P1009-1010。

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1]而且文革辦事組的張根成被抓到獨立師師部，也聽見有幹部大叫“**去北京幹什麼，就在武漢可以談，讓周恩來陳伯達來談**”。

抵制周的群眾和部隊幹部，當時的態度、對策和認識，完全是一致的。筆者分析，周到武漢的中心緊急任務，主要的就是轉移毛澤東，帶走謝、王一行；即便有重新談判的想法，也不至於“一到武漢”就顧得上。考慮到武漢問題沒有如外地那樣，先前叫各派充分發表意見，所謂“保守派”的意願更未充分表達，有人也提出再找群眾會談，他即便有重新談判解決問題的念頭，甚至在開始設想過請武漢人進京會談，但在到達武漢之後，面對武漢實際，特別是肇事群眾與部隊，根本不領情，公開抵制周恩來的建議與指示；他權衡解決方案，也不會頂毛、林之意，自己安排組織兩派和軍區去京談判，由他來重煮武漢的這一大鍋已經特別夾生的米飯；所以，到21日，周與武漢軍區，沒有再定此事。

《微行》披露，21日，武漢消息彙報到上海，說周“準備召集武漢軍區負責人及群眾代表談話，爭取穩定局勢”，但毛澤東不同意，“還是早點離開好”。況且，在7月20-21日，任何中央領導，在會上設想種種方案均可以，但不會在集體研究之外，忙亂裏個人公開出首，再出此策；22日深夜周主持研究召陳、鍾一千人到京，並親自起草中央電報，電文還專門提到了“中央考慮到‘百萬雄師’派代表來京

[1] 當事人（原8199部隊政委）張昭劍澄清事實真相，致楊先財、石仲泉的信（2002年）。

事，一時不易談成，而武漢局面又急需穩定，擬先約……”就是一個後話，且是周恩來親自撰寫的後話。當時毛、周、林頻頻聯絡商議，中央反復和慎重研究緊急對策，不是一個林彪或周恩來就可以個人決定的。陳再道之說事出有因，的確有周邀人進京之說，但僅僅是一些開始的主觀設想，並非中央認可的萬全之計；周恩來回到武漢，中央統一的決策意見勢必已逐漸形成。以上說法，是林彪死亡以後，才普遍傳開和反復強化的說法，似乎是一個壞蛋林彪破壞了周的正確決策。把事件歸罪於林彪，是反歷史的。這難以是真實的和主要的歷史，也把問題過於概念臉譜化與簡單化了。

另一個旁證是20日當晚，市抓革命促生產委員會^[1]的副主任紀輝召集會議，擬出一個行動綱領：“一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不能出面，他們不方便。”^[2]當天，“百萬雄師”主要負責人在忙亂中正佈置全面奪權，形成既成事實，再講其他的，主意也是非常確定的，他們並無進京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傾向和要求。武漢事鬧開以後，在1967年群情激憤，左傾思潮抬頭的大勢下，再邀請“百萬雄師”的人進京議事難以實現。不論軍區領導與周恩來的設想如何好，當時實際上不具備在京心平氣和談問題的任何條件。

後來，聽劉豐彙報王力已經在29師找到，周恩來心裏

[1] 該“抓辦”即“百萬雄師”的幕後組織操縱者。據陳再道的檢查講話，7月18日周恩來在軍區總結講話，問是否人武部是“百萬雄師”的後臺，下面軍區幹部答“是抓辦”；接著還有一段話未用文字記錄下來，即周說了：“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

[2]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P256-257，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一塊石頭落地。當事人回憶，當時周恩來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於是，周決定中央代表團立即返京，策劃了一行人著空軍軍服，在空軍部隊掩護下，半夜去山坡機場。周恩來不辱使命，行前一陣輕鬆；他同北京全體來員在百花一號一塊吃了晚飯，又讓北航井崗山、吳介之同學陪著他去湖邊散散步（一號就在湖邊）。他們一老二少在湖邊談了半個小時，為證實此事的真偽，筆者專訪了後被胡耀邦特許攻讀碩士研究生、今日已是一個企業老總的井崗山，他至今還記住的，是總理談武漢事件的一段話：“武漢發生的事，**是我們的家醜，回去要保密，不要亂說，一切聽中央的口徑。**”又說，“**出了這麼大的事，我是有責任的。**王力同志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1]這就是周當時對事件嚴重性的認識。周恩來在事後的沉重和難受，不需我們再妄自猜想和闡發了，只希望一切當事人和後來的研究者，都尊重業已辭世的周恩來，體諒他複雜的感情、尊重他的人格，尊重歷史，不要再傷害他了。

按說，周恩來對於當時受到中央壓制的所謂保守勢力的強力抵制與反彈，早在內蒙問題處理進行過程中已經有所體驗。7月4日他在接見河南問題會談軍隊幹部時就談到：“現在就是解決那個省的問題，那個省的**壞人，保字號頭頭，少數人**帶領群眾起來都到這裏來，內蒙搞過。四川搞過，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線都斷了。東北那邊向你們

[1]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P260，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學習，馬上成立三個小組，顯示你們的力量，說服嗎！不回去，……我要對你們負責，你們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訴軍委了，抓幾個頭頭。**總有人在後面挑動，壓中央**，內蒙開始地方上動員，八九千人到京說服回去了。又煽動軍隊來。最後幾個軍隊的壞頭頭，已暴露出來了。”5月下旬，內蒙軍區有幹部和戰士，抵制中央對問題處理的意見，組織人員到京請願、鬧事，在政協禮堂起哄，毆打軍區政委吳濤（在呼市還扣押、毆打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鼓噪要走。周恩來曾生氣地出現在主席臺上，厲聲說“把所有的門都打開，誰走就讓他走”！^[1]制止事端，並下令逮捕肇事者，與軍委領導商量處理內蒙軍區問題。他對抵制中央推進文革的思潮和極端行為不是沒有感觸與準備，但沒有估計到事態竟會惡化到這一步，甚至當著毛、周的面！

按總理的親自部署，7月22日凌晨3點鐘，李作鵬、王力、劉豐乘車從武空司令部到山坡機場。不久，周總理、謝富治一行，也在空15軍王銀富科長帶領與特功八連護送下趕到機場。連鬍子都未刮的周恩來上樓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裏？”趕到屋裏，總理緊緊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親了又親，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憶，周還流下眼淚）空軍幹部聽說總理已經幾天沒有進餐和洗腳了，十分心疼，幹部和飛行員、醫生護士忙著打水送飯。很快，周恩來又出去接見了護送兩支車隊的空軍指戰員。（《東湖風雲錄》，P267）是這些戰士，打著“百萬雄師”的大旗，喊著“百萬雄師必勝！”的口號直奔機場。

[1] 7月4日講話見河南問題的第5次接見文獻；此外，5月內蒙軍區戰士起哄，張根成在場維持會場秩序。內蒙問題的背景參閱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

大卡車上貼著大標語：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因而一路上“百萬雄師”的武裝人員掌聲不斷，欣然放行。周、謝和北京來人一行順利到達山坡機場。

應該說，對於王力，當時周是一片真情的，一個是出於危難之中的同志情誼，另一個，也是痛心武漢問題未料到出現如此曲折磨難。周對王力的認識，到8月初（八月七日前）未曾發生重大變化，他們回京以後，鄧穎超攜主席塑像去釣魚臺看王力，江青對此很不快，說“統一戰線統到中央文革來了”！也非偶然。

凌晨5點，專機從山坡機場飛到王家墩機場。在機場，周恩來召集李作鵬、軍區孔、葉、空軍劉豐，等負責人開會，要孔慶德中將（軍區黨委常委）暫時主持武漢軍區工作。並囑轉告陳、鍾要迅速表態，爭取主動，這樣才好講話（周有心要讓陳、鍾下臺階；陳再道回憶說周沒有責備軍區）。又交待武漢空軍仍為雙重領導，要聽軍區的話，不能隨意表態。周親自部署和調動部隊，穩定武漢局勢。於是武空命令空15軍機關帶直屬隊和第44師趕赴武漢執行三支兩軍任務；決定馬上派空降兵進駐水院、武測、華工、湖大、武大等學校和武鋼，當晚，部隊就進入了幾個預定位置。幾天後，人們才知道周恩來親自在武漢各要害部位部署了支左部隊。下午兩點多，周、謝、王、李等分頭登機回京。不過，周叫謝、王先走，說“我要把陳再道叫來，把抓走的兩個記者放了就走”（《東湖風雲錄》，P267-269）。原來，被拉走的《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駐漢記者還未找到；周恩來臨回京前仍惦記著這件事。作為參考的是，20日周恩來臨赴武漢前夕，在京親命5名記者趕赴武漢調查事件情況，張某去軍區，郭某與張某於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調查，並

向北京緊急反映了造反派的處境與要求^[1]。周與謝、王回到北京，中央廣播消息以後，武漢和河南的形勢依然十分緊急和複雜，25日凌晨，周恩來還命令駐紮開封的7249部隊（空15軍的43師）靳師長：“你們堅決保護左派，把東大寺周圍保護起來，絕不能讓‘八·二四’受損失。”當時周家鼎秘書，也正在鄭州群眾之中（鄭州“二七公社”群眾正包圍對立面在煙廠的據點）。而且，由於24深夜日大批“百萬雄師”圍攻體育學院、測繪學院，空15軍部隊立即前往制止，周恩來于次日11時再電制止“百萬雄師”孤注一擲，“百萬雄師”才撤走了。

29師按當時的統一部署，加強軍區和其他要地的警戒，配合了空15軍在武漢市的換防與支左軍事行動，其政委張昭劍回憶：在23日，軍區副政委葉明將張找去交待任務時，拿出筆記本，把周總理對29師說的話念了一遍：“張昭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29師這個班子好，但部隊不行，也上了街。”^[2]（按：指部分29師的戰士，也參加了上街造反的行動）

肇事的獨立師有關部隊，則在武漢軍區的直接調動下，於中央對武漢問題公開表態以後，陸續地也是井然有序地將城防、支左工作，轉交給入城的空15軍部隊。武漢未發生任何軍人衝突。

從陳再道的回憶《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看出，他到了7月22日早上，想請示總理還有什麼事情要辦，賓

[1] 見李近川，《回憶中央文革記者站》，載《百年潮》，2002年第5期。並綜合原中央文革記者站有關負責同志與被派赴漢記者回憶（2005年7月、8月採訪）。

[2] 當事人（原8199部隊政委）張昭劍澄清事實真相，致楊先財、石仲泉的信（2002年）。

館裏周恩來住處負責接待同志才告訴他，毛主席已經走了，總理也離開了東湖。的確，幾天來被事態弄得暈頭轉向的陳主官，對毛澤東的行止，對周恩來再回武漢來的活動和整個情況的變化，遠遠不如其他軍區的副職領導清楚了……

五、回到北京與後續的風波

7月22日下午5點左右，周返西苑機場，先下飛機，參加了歡迎謝、王（報道中還有余立金）的隊伍和儀式，謝、王受到隆重歡迎。當年新華社的新聞照片和新聞電影裏，周恩來在機場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手挽手的鏡頭，給世人留下深刻的記憶。晚上，他參加了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次日凌晨，周再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以中央名義召陳、鍾，獨立師師長、政委和市人武部政委進京。周恩來並代中共中央，親自起草電文：“武漢軍區黨委並武漢軍區空司黨委：周、謝、王、李四同志回京後面報一切。中央考慮到‘百萬雄師’派代表來京事，一時不易談成，而武漢局面又急需穩定，擬先約軍區和有關方面同志來京一商，請陳再道、鍾漢華、傅傳作、劉豐、吳世安、周志剛、趙蘭田、溫錫、張緒、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來京。中央已令空軍派機往接，何時動身，望告。”可見，他回到北京立即參加和主持了事件的善後處理。中共中央調陳、鍾等武漢地區軍事領導人赴京，是毛、林、周相商一致的。

據《王力反思錄》（1011、1027頁）回憶：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

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七·二〇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佈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佈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鬥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帳。”王力的認識可作一個參考。問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並非始於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〇事件”後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社論的提法他就難於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筆的林傑，就為武漢事件後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價——王力必須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詞句負責，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干係。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下八上短短的半個月裏，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多數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

回到北京後，連日來周恩來與毛澤東頻頻聯繫，也連續到林彪處開會，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常委擴大會，商討有關武漢問題事宜，落實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對事件本身定性，討論毛澤東起草的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召集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這些，楊成武的

系列回憶和《周恩來年譜》也有所披露，此處不再一一贅述。但是，從已經披露的史實和當年留存下來的中央首長講話來看，周恩來回到北京，已從“7·20”前後極度緊張和亢奮中轉過神來，他對於武漢問題的提法轉而比較低調。在全國群眾處於高度興奮狀態，以為文革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時，是否他已經在反思許多重大問題？

25日下午，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集會，歡迎謝、王回京，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林、周，中央文革、軍委辦公室成員和其他領導人出席。周恩來沒有留下什麼話語，只是答應考慮北航韓愛晶發槍“武裝左派”的要求。^[1]當日，總理接見河南軍隊幹部（武漢問題直接影響到河南），談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工總，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四點、八點都是我講的，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7·20”事件，參加會議的同志至今還記得，周恩來指出該事件是一個“叛逆行為”，陳再道和鍾漢華聽到總理嚴詞，幾乎當場癱倒在地。但周的整個講話還是平和的，並且批評了吳法憲批鬥陳的粗暴言行。會後周恩來到林彪處開會。

武漢事件發生不久，中央文革辦事組緊急通知“北航紅旗”將原湖北省長張體學（在京）“抓”回來查證與徐海東關係（是否與武漢事件有關）。張體學與北航的韓愛晶言談，溝通得十分融洽，張動情大哭，韓授意張給毛澤東寫

[1] Michael Schoenhals,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bilit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Great Chaos’ of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182, JUNE 2005

信表態，爭取中央和造反派諒解。7月29日，周要求衛戍區要回北航揪去的張體學等領導；（此前）清華大學學生抄徐向前家，周也指示所有進入人員全部撤走，保證徐及其家屬、工作人員安全、徐家的東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搶走的要全部向清華大學全部追回。30日，將葉劍英關於26日擴大會議的書面發言，批示印發到參加會議的同志。後來，又命文革辦事組通知“北航紅旗”退回在徐海東家抄走的物件（張體學同志帶路）。31日，請示毛澤東——積極安排受到批判衝擊的老帥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親自通知徐向前，佈置行車路線。這樣，周恩來及時阻止了因追查“7·20問題”衝擊原四方面軍老同志。“八一”晚宴上，韓愛晶把張體學給毛澤東的信送呈周恩來。周對張印象本來就不錯，一直在設法保護和選擇可供湖北“三結合”的革命幹部，很快中央即讓張回到武漢，準備恢復工作。9月19日，毛澤東到達武昌，就與軍區新領導人問起張體學，要求軍區做工作，讓張得到群眾諒解，多解放一些幹部參加“三結合”。

此外，7月30日清晨，周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我已經派飛機去接你，你立即來北京，3日你去武漢軍區工作”；當日旋接見曾思玉、劉豐，代表中央宣佈了武漢軍區新領導的任命。這個重要活動，不是由林彪親自通知和主持的；至於林彪到8月9日才接見曾、劉並發表重要訓誡，曾、劉後來在武漢一再申明自己是林副主席派來的，則是可以理解的事。不過，林彪發表重要的“八九講話”時，周恩來也和其他中央領導在接見現場，這是一次中央決定的集體的接見，是中央的正常組織活動，周沒有和其他人一樣有簡單插話。一些研究認為這個講話暴露了林彪處心積慮整治武漢軍區和藉武漢事件造勢，是否符合歷史與科學？

27日中央繼續召開揭批陳再道會議，周恩來因有事，安排楊成武主持。是日深夜，周第三次接見湖南省軍區負責人和群眾代表，批評造反派參加搶軍火。談到武漢事件時說：他們有個好處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萬雄師”和獨立師都帶有臂章。“百萬雄師”犯了錯誤，它一個群眾組織，可以教育（《周恩來年譜》）。查談話原始記錄，周說：“……我們原來也沒有宣佈要取消‘湘江風雷’的組織。‘百萬雄師’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我們還沒有取消嘛！何況‘湘江風雷’呢？”此時旁邊的戚本禹打斷周的話，認為“百”不能與“湘”同日而語，一個保一個造。周才又接一句：“**武漢亂，但是‘百萬雄師’就是‘百萬雄師’，鋼二司就是鋼二司，做壞事就明顯；長沙趕武漢都趕不上……**”從《年譜》引文和接見談話記錄看，周對“百萬雄師”是有保留的，儘管當時一片喊打倒，但他的調子不僅沒有比“7·20”前提高，甚至低於他在7月18日的講話。

不過他對各個地方的“革與保”的派別鬥爭，基本態度還與“7·20”前相同；同時，在“7·20”前後激化和蔓延的持槍武鬥也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7·20”的這些後續風波，似乎使他退守底線，在苦鬥和斟酌之中。河南、湘贛和邊疆、沿海的一些事例充分說明這點：

7月28日，周恩來為制止烏魯木齊市武鬥給新疆軍區發出指示：立即制止烏魯木齊武鬥，由軍隊戒嚴，**如果紅二司再死一個人，要拿你們是問！**給南梁地區（按：造反派被圍困）送麵粉。當日，周與姚文元接見江西省四方代表，他提到：“**現在問題的關鍵在軍區，軍區必須通知軍分區、武裝部，把民兵的槍收起來，武鬥才能停止。**”對江西聯絡總站說：“你們這邊偏保，保守一些，還是群眾組織，只要

你們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存在，還可以發展。就是被個別壞頭頭掌握了，也可以離開他。你們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對我的話就不滿意，其實過去你們就是受軍區的影響嘛！就是偏保嘛！你們要改過來，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我歡迎，支持你們，但可不要起來打砸搶，如果搞打砸搶就更錯。過去軍區錯誤，就是對軍分區武裝部發槍給農民，動員農民進城搞武鬥，我的看法劉培善同志，就是策劃，放縱！軍區要負這個責任。你們說對不對？”但是，在江西群眾代表談到武漢“百匪”時，他要求不要這樣說話：**共產黨光明磊落，不要罵人。**

在21日，第七次接見河南代表時，康生曾極其失態地罵“百萬雄師”是“白完行屍”；周卻說對於武漢“百萬雄師”，不要叫他們“百匪”：(30日)第八次接見河南代表時，周恩來就提到武漢：“對於武漢‘百萬雄師’，不要叫他們‘百匪’。他還是一個組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還要爭取教育這個組織中的群眾，啟發他們覺悟，揭露他們的壞頭頭。他們的壞頭頭還是依靠他們來揭。比如河造總、十大總部也有這樣的壞頭頭，也要他們組織中的群眾起來揭發，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來，那樣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犯了嚴重錯誤，幹部和群眾組織的壞頭頭要到群眾中去考驗，一要承認錯誤，二要堅決改正，認真改正，三要得到群眾的諒解。群眾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認錯誤，認真改正錯誤，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要通過群眾來證明。四要給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要幫助受蒙蔽的群眾提高覺悟，使他們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五不允許壞人鑽空子，破壞我們的社會秩序。如果壞人操縱、工人散了，威脅無產階級專政，

威脅革命領導，不怕，那有廣大群眾支持。在武漢證明了這一點，陳再道那樣掌握一個大軍區的兵權，現在他一叛變，最後暴露了，那個地方的問題可以解決的最徹底。‘百萬雄師’好像了不起，實際沒有什麼了不起。”還說：“軍區、軍分區、野戰軍給保守組織、支持軍區的保守組織發了槍，名字叫‘發給基幹民兵’，他們拿了槍進行武鬥，或者挑動農民進城市進行武鬥。我們反對這樣做……過去放縱群眾鬥群眾，是有人策劃的。”

周恩來在兩次對河南的講話裏，都突出了政策問題，要求造反派正確對待群眾，他擔心得到中央全力支持的造反派，並不能理性的掌握正確對待群眾的政策。

憑藉處理武漢事件的東風，新華社在新聞報道中順便點了全國各地一系列造反派的大名，以事件為“試金石”，全國“革與保”兩大陣線頓時涇渭分明。不過，受到中央表彰與支持的造反派群眾並非人人明理、爭氣，“保守派”們自然也不服氣；一些地方的情勢發展，本質上就與武漢一致，中央當時僅僅希望藉解決武漢問題以推動周邊，卻嚴重低估了一些地方、軍隊幹部和群眾組織，對解決武漢問題的逆反心理，低估了也可能出現的反彈。從中央的宣傳上，人們似乎看到湖北周邊地區革命造反勢力的高歌猛進，實際上許多地方根本權力與利益的衝突和“革與保”的衝突反而被激化，持不同見解的部隊甚至公開衝突，分別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乃至發槍），有的地方則是造反組織內部急劇分化，持械武鬥。在這個全民全軍的多方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的積極參與下，除湖北、河南，47軍支左的湖南和12軍進駐的安徽外，一些省局部形勢頓時失控，全國掀起亂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惡風。江西有的

地方和組織，公開抵制中央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認為是“挑動群眾鬥群眾”，以至出現嚴重武鬥和新成立的省革籌認為的“軍事叛亂”。別的不說，就武漢剛剛翻身的“三鋼”造反派，居然前後出動數萬人次，到湖北專縣乃至全國“武裝支左”，遭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和一些中央領導的劈頭蓋腦的臭罵。

這時候，中央高層業已對群眾亂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產生強烈憂慮，林彪曾寫信給毛澤東，說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奪槍的問題，但毛並不認同。王力回憶說：“林彪在此之前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前面說形勢很好，後面主題是奪槍問題很嚴重，必須發佈命令禁止奪槍。毛主席的信是針對這點說的，前面說同意形勢很好，這是套話，但他不同意後面林彪關於奪槍的話。毛主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他分析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他著重分析多麼嚴重！他原來說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隊，現在說部隊主要領導骨幹支持右派。他說當前文化大革命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從這封信裏還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裝。……毛主席8月4日的信，5日林彪主持會，就要貫徹執行，周總理也參加了。老實說當時大家都朦了。但都得表示擁護，都得這樣作。”（見《王力反思錄》P266-268）後來林彪又主張起草了一個針對廣東嚴禁奪槍的通告，周批給文革碰頭會準備發出，後接受他人意見（怕與毛的判斷“奪槍問題並不嚴重”相左），叫廣東先試驗一下，而且強調對勞改犯奪槍，部隊可以開槍。（見《王力反思錄》P1013）由於情況和認識不一，周恩來要求全軍文革小組將南京、廣州、瀋陽三個軍區受到衝擊的詳細情況立即上報，

並約三軍負責人和南京、瀋陽軍區領導談話。

8月5日，在天安門紀念《炮打司令部》發表一週年大會上，針對蒯大富和全國許多造反派認為的處於第三次大串聯階段，周恩來明確指出這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同日，他第六次接見江西幾方並談話。次日，周接見湖南群眾代表，嚴肅地批評了亂搶槍亂奪槍是非法的，“解放軍支左犯了錯誤，不等於是黑司令部。對野戰軍部隊這樣不尊重，等於不要領導了。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發展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行為，已引起他的密切注意。

6月以來，江西的武鬥比武漢更加激烈。在7月底和8月上旬，周恩來頻頻接見軍隊幹部和群眾，處理江西問題。當時，一方面要制止軍分區人武部發槍支“保”，要制止抵制調入支左部隊甚至圍攻毆打部隊，哄搶他們槍支的行為，另一方面，又要勸阻和制止得到中央支持的造反派搶槍反抗和圍攻保守派的行為。本來，周恩來接到江西告急電，在京西賓館主持軍委擴大會，由文革辦事組電告江西制止搶槍；但與會人員剛剛回到釣魚臺，毛澤東的批復已經發來，重申：為什麼軍分區可以向保守派發槍，我們不能武裝左派？^[1]（7月18日，毛澤東談話裏就有“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8月4日給江青的信也明確表示了這個意思，並在文革碰頭會中傳達）。結果該會議的精神未有真正執行，周恩來也只有維持武裝左派的總體意見，並寫入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所以，在關

[1] 辦事組負責人王廣宇回憶（2005年9月）。8月上旬，因皮定鈞電告中央，江西搶了百餘條槍，嶠玉山、何天琪接電起草彙報；上午，周緊急召集康生、張春橋、楊成武、韓先楚和王廣宇等開會，商議起草電報，批評軍區和造反派。該電也按慣例以要事彙報形式呈上海毛澤東，毛中午即批復。戚本禹見他們回來，問他們為何匆匆發電批評江西軍區和造反派，說毛已有批復發回。

鍵的8月上旬，周沒有能夠扭轉他業已警覺的錯誤傾向問題。

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決定》按照中央自7月以來的分析思路，依然批評“江西省軍區及部分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違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並挑動農民進城參加武鬥，切斷交通”。而且在文件的最後，提出：“在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目前首先在南昌、贛州兩地，準備研究實行。革命的群眾武裝，是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財產、維護革命秩序、制止壞人殺害左派群眾的強大力量。今後，軍分區、人武部，決不准以任何藉口把槍支彈藥發給或變相發給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藉口奪取解放軍槍支、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質。”

同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認為：“湖南省軍區黨委常委《關於支左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對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進行了認真的自我批評，態度是好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軍區打擊‘湘江風雷’革命群眾組織，壓制‘工聯’等革命造反派的錯誤，軍區黨委常委劉子雲、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應負重要責任。除了軍區負責之外，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二月三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未經調查清楚，何必那樣匆匆忙忙地根據一面之詞發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負責主要的責任。”文件對軍區犯錯誤等問題的基調，還是與以前一樣；也是藉處理武漢問題，解決周邊各省相似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由毛澤東修改的該文件承擔了中央在湖南問題

裏要負主要責任。這是周恩來與王力在武漢曾對毛澤東談到的問題，會後，張根成當即電文革辦事組查文件。

也就是這一天，中央發出《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強行維護交通秩序。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國準備分省和軍區辦武裝幹部的學習班。周恩來首先落實辦湖北省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調武漢軍區和鄂、豫省軍區的領導幹部進京學習。當時，毛對王力看法甚佳，還要王承擔辦班組織工作。8月12日，周恩來到京西賓館接見武漢地區軍隊領導，說“你們都是好同志，請你們到北京來，一是為了你們的安全，二是要你們好好學習，提高覺悟，跟上形勢”。謝富治、吳憲法、王力參加接見並有講話。

要特別強調的是，11日白天接見首都紅代會學生代表，周恩來有一段很長的話涉及到武漢問題和正確對待解放軍。他說：“事實上證明解放軍是勝任的。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趙永夫，內蒙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整個軍隊，就那麼少數幾個人。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保衛者。沒有解放軍，光發動群眾，敵人就要乘虛而入。我們的文化大革命還是前進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還要有力量來維護，當然首先是群眾，而解放軍是最有組織的。解放軍也會犯錯誤。只要把問題講清楚，趙永夫之流就會像豆腐而已。青海也開槍打過革命派，但是說清楚，就親如一家了。……陳再道也是這樣。武漢事件，我親眼看到。武漢問題的解決是解放軍大力支持的，……獨立師，百萬雄師壞的是一小撮壞頭頭。總司令說，我們的兩個同志對獨立師只作了半天工作，他們就聽話了，都照

我們計劃辦事，這也說明了這個問題。把王力同志搞出來了也是解放軍嘛！不錯，解放軍思想有些保守，軍隊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但跟劉鄧那個時期不一樣。一般的講，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大多數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軍區、軍分區、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還是多數。**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什麼廣州要抓廣州黃再道。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同志，瀋陽軍區司令員都是好同志，任重道遠，又沒有經驗，這幾年來接觸群眾又比較少，當然有些領導長期脫離群眾，加上傳統觀念，受《黑修養》的影響，容易犯錯誤，但也容易糾正，尤其是野戰軍還不同於軍區，他們不同於軍區，和群眾接觸就更少了。我們的軍隊只要給任務，去了以後，立刻就改變形勢。但壞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壞人奪了軍隊的槍，搶衣服，甚至抓軍區司令員等，是不行的。”

“武漢地區問題解決了，提出武裝人民，這是對的，首先要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這是有條件的。例如，武漢的工人，就可以武裝起來。還有江蘇、湖南的。北京的工廠，如果聯合起來了，可以武裝起來，但沒有聯合的單位就不行，（武裝了）就要打‘內戰’。可以武裝聯合起來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裝要收回來，農民進城，他們是不願進城的，受了蒙蔽。”

可以看到，8月11日周的這次關鍵的講話，重點已經在於引導紅衛兵，不要到處抓陳再道，搞亂軍隊和形勢。基調是穩定秩序穩定形勢，要首都紅衛兵帶頭。從目前可以看到的公開講話記錄看，基調在11日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且在這次會議上，文革小組的陳伯達也宣佈：被壞人操縱利用的“5.16兵團”是反革命組織，它把矛頭對準總理

實質是對準中央，對總理也（就是）對中央，要把它打倒。裏面的群眾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這樣的錯誤，（這）是以“極左”手法欺騙群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現在階級敵人歪曲“文攻武衛”的口號到處挑起武鬥，要反對。看來，周恩來與文革小組業已取得了一致，文革運動首次公開提出反對“極左”的反革命秘密組織的問題。

8月12日晚，周恩來接見江西四方代表發表講話，“首先，劉培善同志對江西省軍區所犯的錯誤要負責任，要檢討，他作書面檢討，……明天和以後也不要在北京開什麼大會，把某些同志揪去進行鬥爭，因為中央已經作出決定，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們按十六條辦事，按照最高指示辦事”。這裏，周再次強調了政策與紀律（也吸取了批鬥陳再道的教訓）。周提到“原來中央決定把（撫州）這個獨立營調上饒整訓，然後調去一個獨立營，但是這個獨立營拒絕調動，這是已經違背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不僅如此，……如果他們違抗命令，軍分區政委都在家，要他們負絕對責任，**如果他們對抗中央、中央軍委，那他們就要走陳再道的路。**撫州部隊我相信絕大多數是擁護中央的。我們相信，軍分區廣大指戰員，包括人武部，還是一分為二的，多數還是好的”。江西問題的處理，直接受湖北武漢的影響，而且周還提到陳再道的教訓（當事雙方也都看著陳的教訓）。但他肯定了地方部隊、人武部的大多數。

到中旬，毛澤東對《紅旗》雜誌八一社論的提法，對中央7月27日給武漢市軍民的公開信提及“軍內一小撮”不滿，對林彪送審的發全軍文件提及“揪軍內一小撮”不滿，但具體時間和批示，至今未正式公開，王力回憶說是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

法不策略”^[1]；別人說法不一，需要考證。^[2]毛澤東的新精神立即傳回北京，並傳說“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故有文革小組追查給武漢軍民的公開信原文修改和付印時出現“軍內一小撮”的事件。據說原來毛審閱稿無此語句，是王力在付印前加的；王力自己也記不起來了，還和關鋒到辦事組大發脾氣；工作人員從中辦調來原件，正是王力所加，才說“搞清楚就行了，不要大驚小怪的！”儘管這個提法本身並不新鮮，但釣魚臺得知毛澤東的不滿，精神已經十分緊張；康生與陳伯達忙於洗刷自己，拋出王、關。江青還專門考問秘書閻長貴，要他看“社論有什麼問題”。

這時候，周對於各地搶槍風和軍隊搞“四大”極度不滿，一再表示出來：

16日，周恩來對浙江省軍區發出電話指示，指出“浙江現在有敵情，你們都知道嘛！敵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蔣介石很可能搞亂子，你們要提高警惕”。“省軍區直屬機關搞四大。司、政、後直屬學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團也可以搞。軍隊不能搞四大，軍委早規定了，軍以下部隊進行正面教育，可以用發揚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評，不能用四大的形式”。“**部隊搞正面教育，獨立師、獨立營不能例外，部隊不能搞四大。但是，他們有權批評省軍區領導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送大字報、小字報，可以進行討論。部隊是一個戰鬥組織，不能成立戰鬥小組，部隊不能亂，部隊一亂，就不能作戰了。**”“對二十多縣來的造反派要動員他們回本縣鬧革命，通過軍分區、人武部支持他們，使各地方軍分區、人武部的態度

[1] 《王力反思錄》，P1014，北星出版社，2002年。

[2] 《微行——楊成武在1967》說是在8月14日，待考。

明朗起來……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軍區來來往往，軍隊不要串聯，有意見可以送大字報，你們可以同造反派講清楚，讓省軍區關起門來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亂了，部隊秩序亂了對敵人有利。杭州灣、浙江沿海敵人很容易鑽空子，你們也可以設想設想”。

到 21 日，周恩來就廈門某海軍基地十艘軍艦武器被搶一事指示陳伯達：“請伯達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來、陳伯達等人的名義宣佈：**不准奪炮艦的武器，在敵人面前奪野戰部隊的武器是錯誤的。如勸告不聽，繼續再奪，即宣佈為反革命。**”他對日益嚴重的搶槍爭奪武器，已經極其不滿，對群眾組織的批評口吻已經非常嚴厲。

同處於邊防前線的廣東，搶槍與武鬥嚴重。在 14 日，周就廣州治安和衝擊機場、搶民兵槍支問題，批評群眾，要有敵情觀念。到 22 日凌晨，更因搶奪軍備和援越軍用物質問題，接見廣州兩派代表說：簡直沒有敵情觀念，是無知。特別重要的是，周恩來慎重其事地指出：“**不要再提‘軍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後宣傳機關提錯了的。**”當晚，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周恩來于 23 日凌晨緊急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對火燒事件和外交部奪權，提出極為嚴厲的批評，“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並針鋒相對地說：“你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裏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在北京出現的文革危機，使周恩來多日來對全國出現危機的憂慮和憤慨，聚集形成了整體的認識：運動要觸礁了！所以對外事口群眾又說：“**‘7·20 事件’以後這個浪潮不正常，對形勢的根本估計都不對。什麼‘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的前夕’、‘武裝奪取政權’，完全不對。**”

可見，到8月中下旬之際，周恩來已經對中央處理“7·20事件”後引發的負面問題和後續全國形勢變異，形成了系統的相反意見，並向群眾公開表述了自己的意見。

不過他對造反派群眾依然熱忱如前，依然維持著毛澤東要武裝左派的意向，將領導負的責任、運動中的錯誤傾向和群眾本身區別開。如：24日周恩來接見廣州造反派和解放軍報記者，仍然提出：廣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紅旗工人”、“工聯”、“八一戰鬥兵團”，“廣州工人”為核心首先聯合起來。……工人造反派聯合起來後，馬上武裝工人，可以武裝2—3萬人，雙方簽訂的四項協議是靠不住的。指出“孤立分化瓦解“地總”、“春雷”、“(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工交紅旗”、“紅旗工人赤衛隊”可以爭取。同日，周恩來戚本禹接見廣西雙方代表，一開始就談到：很久不見你們了，兩個月了，最近很忙。你們“聯指”怎麼越搞越不象話，又去進攻人家，越走越遠了。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全部武裝他們（“4·22”），看你們怎麼辦？！“4·22”的同志，文革給你們的電話知道了嗎？（要上交援越抗美軍事物資）你們比較聽話，辦得比較快。還有一部分沒有收回是不是？！

周恩來在7月22日回到北京之後的七（月）下八（月）上，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處處提到批判陳再道、“百萬雄師”，更沒有說過頭的氣話，涉及武漢問題的基調是較低的。面對“揪軍內一小撮”狂潮，搶槍成風，以及北京運動中外事口的嚴重問題，他非常憂慮和氣憤，他正在冷靜地觀察和抵制走向狂熱的運動。同時，他在涉及外地一些問題解決和突發問題方面，基本認識和態度依然與“7·20”以前是一致的。武漢事件的善後工作，一直在他的主持下進行，

諸如組織對陳再道等的內部批判和認真保護，落實毛澤東對解決問題的一系列指示，主持起草、簽發有關中央復函、文件，調配和組織新的軍區領導班子、指導武漢運動進展、組織軍隊幹部學習。而且這些活動都與在上海的毛澤東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和高度統一，維護著毛澤東的意見和威望。

對於武漢革命群眾，他始終保持了一個幫助、愛護的積極態度。要求他們在中央和全國的支持下，不要頭腦膨脹，要掌握政策，團結群眾，發展大好形勢。他對群眾造反派中一些代表人物的情感是真誠和原則的，這一基本傾向，在10月份陪同阿爾巴尼亞的謝胡到武漢時，多次與群眾代表親切懇談，也一再表現出來。

六、總理兩次接見武漢群眾

在8月，他兩次接見武漢群眾代表。一次是8月9日，周恩來與其他中央領導接見武漢造反派代表，宣講形勢和政策；曾思玉、劉豐，15軍正副軍長，29師政委，空軍，北京、瀋陽、廣州、福建軍區主要負責同志，吳法憲、鄭維山、陳錫聯、黃永勝等參加。

武漢造反派和武漢軍區根據講話起草了一個較為平和與積極的紀要，回漢向群眾公佈：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非常關心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報刊就武漢問題發表的社論比那一個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漢這個典型的例子，把壞事變成頂好頂好的事情，武漢出了反革命叛亂，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漢軍區和專政機構的問題都是

在這場大風暴中徹底解決了。毛主席、黨中央，對武漢這樣關懷，應該走在全國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

……

二、武漢的右派勢力還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團結起來，聯合起來。三鋼、三新一定要加強團結，武漢對長江兩岸，對全國影響都很大。大家都是從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過去並肩戰鬥，共過患難。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千萬不可打內戰。彼此多看對方的長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評。中央首長一再指出，不要因為內戰辜負了毛主席和全國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遠，看到全省，還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你們要對武漢負責，對湖北一共三千二百萬人負責。國際上如援越抗美，武漢鐵路不通，物資就過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萬人浴血抗戰對付一個美帝國主義，如果你們三千萬人打起內戰來，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聲明”的大方向是對的。一·二六奪權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一個革命的奪權演習，大方向是對的。……陳再道抓住這個聲明的非本質的方面，作為鎮壓革命的一個主要依據，“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對待“二·八聲明”的反革命行為的繼續。一邊是革命，一邊是反革命、鎮壓革命，在這樣的問題上，應當立場鮮明，支持革命的。……

革命派一定要實行大聯合。至於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我們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應當是毛澤東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沒有第二條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種方式。武漢有武漢自己的特點嘛！應當創造自己的經驗，回去後，先搞個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把文化革命領導起來。在武鋼，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

革命。武鋼樹九·一三，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國人民的利益。當然，九·一三也要團結聯合其他革命組織，不要歧視人家。中央對武漢造反派的組織不能個個都點名，點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組織，不能說未點名就不是造反派組織。搞大聯合必須以左派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產”是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中央非常關心武漢的生產問題。“百萬雄師”怠工，我們造反派要頂起來。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產上做出了榜樣，大批學生到碼頭上去。你們現在要動員軍隊、工人、學生去疏通航道碼頭。現在是收割季節，還應動員學生到郊區去幫助收割，向貧下中農學習，學習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鐵道運輸部門必須把生產抓好，這不僅是關係到武漢，而且是關係到支援世界革命的問題。

……

四、革命派一定要響應毛主席“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高舉擁軍的旗幟。陳再道、鍾漢華，不能代表解放軍，他們是劉、鄧司令部的人，是解放軍的敗類。他們的爪牙還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軍指戰員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舉世無雙的人民子弟兵。沒有解放軍作堅強的後盾，決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這麼徹底。美帝、蘇修為什麼不敢動，就是由於我們有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廣大指戰員和你們共過患難，你們要做擁軍的模範。對毛主席、林副主席親自選擇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員、劉政委，你們要信任他們，大力支持他們，要注意維護他們的威信。我們已決定武漢原軍區黨委改組，由新班子來領導。……軍隊裏邊自己搞整風，他們會揭發出壞蛋來的。有錯誤你們可以揭發，但不要去

衝擊。

武漢出了個陳再道，這畢竟是少數個別的，不要全國到處都抓陳再道。現在有股風，到處都在揪軍內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軍內一小撮，沒有調查研究就到處揪，到處揪陳再道，這是由武漢這個事件引起的，這是不對的，一定要真擁軍，即使解放軍負責同志一時支持錯了，說了錯話，做了錯事，但只要改正了，你們就要擁護。對他們的缺點要熱情幫助。我們解放軍有個非常好的優點，就是一旦知道錯了，就立即改過來。三支兩軍工作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的，你們要堅決支持。亂奪槍也是不對的，不能形成奪槍風。槍桿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我們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武漢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裝力量，由左派來掌握，把槍支發給左派。首先是武裝工人，學校裏應該搞軍訓。但要強調指出，人民武裝是解放軍的後備力量，它應由解放軍來領導來指揮，首先要搞好大聯合，然後才能武裝起來。不聯合就不發槍。

五、中央對武漢軍區、人民武裝部，都是徹底解決的方針。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是個分水嶺。它檢驗了一切組織，一切人的政治態度。三司垮臺了，這表明是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的。因為是徹底解決，所以武漢的革命三結合的條件比別的地方要好……

公檢法要一分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還是舊的，好抓人，好抓小辮子。公檢法的最大的任務是保護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改造舊的一套。……

六、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高舉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終把矛頭對準劉、鄧及其在武漢

的代理人。對於“百萬雄師”和“公檢法”中的一小撮壞頭頭及證據確鑿的殺人兇手要實行專政。專政機關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發動“百萬雄師”中的群眾起來揭，起來抓，這點要千萬記住。專政機關在群眾的要求和協助下，只抓極少數。對“百萬雄師”必須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充分揭發一小撮壞頭頭的罪惡，對廣大受蒙蔽的群眾要做耐心細緻的工作，要幫助，爭取教育他們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邊來。

七、有的組織提到殺向社會，下廠、下鄉問題，現在武漢問題還未徹底解決，現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漢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話，也要有組織有計劃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組織要團結，要互相配合，不要單槍匹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與新的武漢軍區聯繫。你們學生不要干涉、操縱工人運動，不要當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你們要向工人學習，做他們的小學生，要促進他們。工人組織不要包括機關幹部，要實現按系統按部門的大聯合。

總之，你們回去主要是抓兩個方面，一個是大團結、大聯合、三結合、大批判，建立籌委會，一個是擁軍。

8月8日，是周總理親自命令空軍派飛機接武漢群眾代表進京，組織了這次接見。具體到這種小事，周亦躬親，可見這次接見在周恩來武漢運籌中的重要位置。但是文革以後一些回憶（特別是以陳再道同志個人名義公開的回憶）與某些描述，談到這次講話是中央文革小組搞的，是搞亂武漢的。據參加該次接見的群眾和部隊的人回憶，此紀要稿**主要是按周恩來講的原則乃至原話**寫成的。“陳再道的回憶”則認為，是陳伯達、康生等接見了造反派，講話，而

紀要居然是“這些‘中央首長’”的講話內容。目前沒有聽到這次接見談話的現場錄音，所以兩種矛盾的看法，有待進一步弄清。不過陳畢竟不是當事人，並未參加此次接見，他願意承擔頗帶個人情緒的回憶與認識責任嗎？這種小中學生杜撰的資料能否作為信史之佐證？需要一切熱心歷史研究的朋友斟酌。歷史地看，以上談話精神的基調是保護軍隊，要求團結多數、大聯合，要穩定的。

周的另一次接見是8月26日，從23時到次日零點多，周恩來、謝富治、王力接見武漢造反派在京代表（僅是幾個聯絡人員，非造反派頭頭），強調不能把形勢搞亂，要支持軍區領導，要團結，武裝左派，但不能亂搶，不要全國亂跑出壞主意，要正確對待“百萬雄師”的問題，做政治工作。其實，當天中午楊成武從上海回來，轉告毛澤東的指示；周先去林彪處面商，後又召集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顧問康生開會。之後，才來到接見群眾現場。神色凝重的周到場，謝、王已經對群眾說了半個多小時。當時記錄如下：

總理：現在搞出來了一個“新武漢”，知道吧？這是個新問題。

王力：三鋼的同志剛才說他們不同意。

謝：搞得不對，聽說三新支持的。這麼搞，三新的威信就會降低的。

總理：這是一點。**還有一個奪槍的問題。武裝問題不能亂搶。武裝左派嘛，我們說了嘛，為什麼又要搶呢？**

王力：隨便搶槍，你們自己又不能掌握了，壞人也可能去搶。難道內部沒有壞人嗎？自己的敵人往往被派別鬥爭掩蓋了。

謝：要顧全大局，全國都在支持武漢，你們把武漢搞糟了，就辜負了毛主席。

王力：總理提了兩個問題，“新武漢”，奪槍。剛才還說了一個不要到全國串連的問題。

總理：今天主席又說，**出去自己以為出好主意，其實出壞主意。出去也許主觀願望是好的，但往往幫了倒忙。武漢很多事要做的，不要到外頭亂跑。**

王力：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於百萬雄師的問題。

總理：聽說現在武漢出現了對百萬雄師的頭頭掛黑牌的現象。上次對你們代表講過的，第一政府不抓；第二左派也不抓，讓他們自己組織和群眾處理。這個法子是最好的。前些時，百萬雄師就有人反映又不抓，又不鬥，這個辦法最厲害。

王力：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兩個辦法比一比，你們說那一個厲害？他們不怕你帶黑牌子、遊街，就怕你搞政治工作，就怕你們不脫離群眾。……下面組織發生了問題，要及時解決和教育。聽說二司有很多人到瀋陽去瞭解曾思玉同志的情況，還搞絕食。

總理：二司代表去了多少人？瀋陽代表對我說，在那裏搞得很亂。

王力：我們打電話去有三條：一是都回去，二是矛頭對準瀋陽軍區是不對的，三是調查曾思玉同志是不對的。曾司令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選派去的。

謝：應該好好搞大聯合。

（要開會了，首長與代表，——握手）

總理對新華工代表說：你們回去要搞好大團結，大聯合（新華工代表說：我們內部意見爭論很大）。哦！你們內

部要搞好團結，你們也是一個比較有影響的組織。過去患難中能夠戰鬥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希望你們勝利後，也能戰鬥在一起，團結在一起。

這是武漢7月18日在武漢軍區小禮堂面對軍隊領導同志的中央周、謝、王三人，最後一次集體接見武漢群眾的談話；“武漢事件”中的英雄王力，因“揪軍內一小撮”宣傳問題處境已經十分艱難，還坦然地與周一同教育武漢群眾。王力當時不知道，謝富治也不知道，群眾代表更不可能知道，周恩來剛剛向中央文革小組的陳、康、江傳達了（楊成武記錄的）毛澤東的指示，即**把王力、關鋒抓起來**。據楊成武的口述回憶，他在8月25日凌晨記錄了周恩來關於全國16省和自治區運動的看法和處理意見，記錄了周報告外交部運動和火燒英代辦處問題，周擔心連鎖反映（應），“現在一個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一個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楊即去上海，向毛澤東轉交了周的意見和王力“八·七”講話，帶回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參見《微行》）

7月下旬以來，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了武漢軍區的改組，批判和保護了在“武漢事件”中犯錯誤的軍隊幹部，指示了武漢地區黨政軍民下階段文革運動的走向，批評了群眾中業已抬頭的無政府主義、極“左”狂潮，警惕和提出武漢事件後出現的極不正常浪潮，組織了湖北、河南軍隊幹部集訓，繼而端出了“武漢事件”中的英雄——所謂“小爬蟲”的王力，周恩來親自處理1967年7月武漢“七·二〇事件”，已經告一段落。

這些實際情況，筆者是到今天坐下來讀書、查資料，訪問知情人，才開始去弄清楚的。因為在1967年8月，武漢事件的一些內情，周恩來總理曾經親自處理前後有關問

題，的確處於高度保密狀態；文革以後，關於事件的真相記載和評價傳說，由於一些極不負責的編造杜撰，與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越來越大相徑庭，甚至大多數的文革過來人，幾乎不知道周恩來親自、主導處理 1967 年武漢“7·20 事件”問題的歷史事實，也並不真正理解他在該事件後，在文革進程出現重大轉折時機，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了。輿論有意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林彪和江青，甚至是王力的身上，這是對公眾的誤導與欺騙，這是對於歷史極不嚴肅負責，對中共和人民軍隊的創始人——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極不尊重，從而，也極不利於科學地全面地總結和吸取文化革命的深刻教訓。

為了證實其中一些關鍵史實問題，筆者廣泛採訪與調查了眾多得各方當事人，還徵求了當年在中央文革工作的一些同志的意見，王廣宇、閻長貴先生親筆修正和提出一些問題；特此一併致謝！

主要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2.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3.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6 年。
4. 徐海亮編著，《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 年。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及其在 文革進程中的位置^[1]

[提要]

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歷史進程和歷史的再反思中，處於什麼位置，這是毛澤東的文革歷史被顛覆後應該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從歷史變化發展的原質和追求毛澤東文革原意的廣大群眾的價值觀看，“7·20事件”是對於文革的一次帶群體性的最大抵制與反動，鬥爭實質上直指毛澤東的文革理念與方針路線，直指擁護他的革命造反的廣大群眾。“7·20”群體性騷亂的初衷是用強力乃至暴力請願，抵制中共中央，為的是改變或強制結束毛澤東的文革路線。1978年的中共中央批復平反“7·20”事件，也是結束文革和“徹底”顛

[1] 提交《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Rethinking the Genealogy and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四十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會議論文，香港城市大學，2006。

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關鍵舉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後的運動客觀走向，也選擇了“改變”和“結束”文革；該事件本身及後續歷史的發展，形成文革歷史的一次關鍵性的轉折。本文在對長期被封存的當事人集體記憶——口述資料和實際歷史過程的考證基礎上，澄清事件的真相，闡述事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以及國人應當思考的歷史經驗教訓。

1967年上半年，隨著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國進入奪權高潮。二月，中央上層關於運動方法和路線的辯論，帶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軍隊與造反群眾衝突，形成文革運動的新推進——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對文革的反動，是對於毛澤東及其文革的一次抗擊。春夏之交，群眾性持續造反、對於人民的基本權利和革命權利的執著追求，衝擊著黨政軍國家機器，運動再推進。與此同時，傳統的體制性的對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著從思想到實體的整合，從而以群眾對抗為外在表現形式的政治衝突升級到武鬥，對反傳統體制的革命造反壓制也發展到頂點。發生在武漢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體現。傳統的體制性力量在該事件前後公開提出對文革路線及其階級路線的嚴正質疑，正是文革派與質疑文革的反對派一個重要理論衝突焦點。對於這種帶群體性的政治反抗，毛澤東主席沒有採用一年來對待黨內和上層鬥爭的方式加以抗擊和壓制。但文革司令部推進運動之意圖和革命群眾真誠的“大民主”造反，也嚴重忽視了基於體制性的、群體性的對毛澤東文革原本意圖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視，表現在過於相信精神輿論和中央——即毛澤東的權威力量，群眾的局限在於始終並不真正理解毛澤東文革的宗旨，某種意義上在於探尋一種這個革命形

成的政權與體制，進一步完善——持續、發展的更好模式，不明白周恩來一再提醒“政策對於正確路線保證”的警告，更不熟悉政治遊戲的規律、不可避免的迂回。

在文革的推進和抵制的兩大思想傾向與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顯地表現出一種傾向竭力壓制另一種傾向，去追逐、競爭另一種傾向，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攀升，鬥爭反復加強，文革對於傳統的反抗、傳統對於文革的反彈劇烈，矛盾日趨激化。“7·20事件”對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和文革本身的反動，刺激了群眾性的對軍隊和國家機器的全面質疑與進一步衝擊；與此同時，客觀存在的無政府主義作為對於機會主義罪過的懲罰，也被推到極致。從而，並非完全因當時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派的直接反對，而是基於體制性力量對文革的強大惰性，也基於文革司令部內部的重大思想方法分歧，毛澤東不得不改變策略，拋出司令部內部幾個左翼激進文人，避開政治危機，以平“軍憤”、“黨憤”，並警示與約制造反群眾——防止運動過激觸礁和翻船。文革的進程終於在開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內部，和在造反群眾中規模性清洗“反革命5.16”分子，開始重大轉折，出現迂回、退卻。更深刻和影響深遠的是，司令部內部的思想與方法分歧，裂痕開始擴展，延及運動最後。

不過，文革1967年的“熱月”，並不像一些文革歷史學者那樣傷感與膚淺認為——由於文革司令部對“武漢事件”的“錯誤”處理直接導致，本文也不對“熱月”本身進行研討。“武漢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後相關形勢發展、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僅是產生熱月的成因之一。

“武漢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後出現的熱月，留給後人相關的歷史啟迪和教訓。

“武漢事件”以及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對問題的處理與“表態”，成為文革初期，以推進與抵制、造反與保守爭鬥為標誌的一個頂峰。文革進程從發動、普遍的反傳統秩序和持續上升推進，轉為相對收縮與回歸秩序。在革命造反派群眾心目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著接踵而至的“八月失敗”。

對武漢反文革路線的“7·20事件”的反擊和批判，解決不了文革的勝負問題，武漢和周邊地區的“紅八月”熱潮，為近期的“熱月”和根本性的“熱月”，埋下伏筆。文化革命的群眾性革命造反歷史被抵制文革的正統體制顛覆，成為必然。

毛澤東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群眾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維模式探索，未為兩派群眾真正接受與貫徹。他對自己親自創建的新的國家黨政體制的懷疑，他對於抵制文革的體制性力量和愚鈍武人的寬厚引導和政策迂回，沒有得到文革所衝擊的傳統體制與秩序的認同、理解；文革司令部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和非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再三約束，也未能被廣大缺乏政治素養的普通革命群眾真正接納。

毛澤東關於改善黨和國家機器的思量與嘗試，在武漢事變和“熱月”受到嚴重的阻遏。文革派的輿論和群眾，把部隊幹部的路線覺悟期望到經院化地步；實際上，對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老軍人而言，在文革中與其說路線衝突居於首位，毋寧說革命過程裏的生死情誼、軍地差異、對革命戰爭建立的新秩序合法性的恪守、維護，對於我們革命獲取的政權合法性的表像、簡單的理解，以及山頭、宗派衝突與個人、團體歷史過節影響著乃至決定著現實的是非取向。這些，無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澤東理想的：讓軍

隊打思想仗、政治仗，為創建持續的合法性——繼續革命保駕護航的初衷。他期望老將帥們真正理解、支持文革，來取得從合格的革命者到合格的政權管理者身份轉型，取得徹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難以實現。

“7·20”是對毛澤東文革理想的第二次重大挑戰和打擊，預示了未來文革的顛覆——體制性力量對於毛澤東文革路線和政策權威性的顛覆。

“7·20”是初期文革運動眾多矛盾交叉的一個契合點、爆發點，儘管是一個地區性的突發事件，它卻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觀點的人們長久地爭議毛澤東文革的初衷和功過，文革是“該”還是“不該”？也使人們從文化歷史的範疇沉思中國政治與社會矛盾、黨內歷史和現實鬥爭的實質。

* * *

1970年7月下旬，我已離開部隊，被再分配到河南農村鍛煉，參加“整建黨”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便在打麥插秧後休探親假，第一次遊覽了岷江映秀—都江堰、烏江—遵義、花溪—貴陽、灕江—桂林，瞻仰湘江—長沙—韶山，再趕回母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恰逢1969、70屆同學畢業分配。他們剛從“鬥批改”（清查所謂“5.16反革命集團”）的大別山區驚惶失措回到武漢，“樹倒猢猻散”般悄然離開學校，並傳告我：“老夫子”陳伯達親自誘導，在文革前期熱鬧一時的水院，挖掘出龐大的“5.16反革命集團”，軍、工宣隊正在等待造次者上門自首。過去鼎沸的學生宿舍現在十分冷清、零亂狼籍，我在低年級同學的宿舍，偶爾發現一本丟棄在書桌上的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蘭西階級鬥爭》單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籠般熱騰的蚊帳裏翻閱這書，開篇就讀到老馬克思那震撼心靈的話語：

“除了很少的幾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的每一較為重要的篇章，都題名為革命的失敗！”

但是，在這些失敗中陷於滅亡的不是革命。陷於滅亡的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餘，即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係的產物；陷於滅亡的是革命政黨在二月革命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

我仿佛被老馬克思話語的歷史閃電狠狠擊中。

我在悲憤裏離漢北上，感到：我們又遭遇了“江南一葉，千古奇冤”……！

無疑，文革的造反學生，在經歷了1967年文革反對派狂妄般的“7·20事件”僅僅三年之後，正徹底遭遇了自己的“滑鐵盧”，在領受對文化革命的一連串譴責和文革的失敗。當年，我讀法國革命史，比照馬克思的原話在思索：如果說不是文革本身陷於滅亡，那麼，陷於滅亡的是文革前的什麼傳統呢？是革命的共產黨沒有擺脫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觀念呢？1967年被樸素的民眾幼稚地比之為“七月革命”的勝利篇章，為什麼迅疾轉為革命的失敗呢？這也是我苦思了36年的問題。整個文革的問題過於龐大複雜，需要一部部專門史（範疇和學科、地區和階段）來分別闡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學的、屬於人民的文化革命通史來研究論述。但對一個地區震撼性的和全國運動節點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應該來事後談史了。

一、“7·20事件”史實的回顧與廓清

對於沒有專門研討過武漢“7·20事件”的海內外朋友與年青學者，需要首先回顧史實和廓清事實真相。

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部分指戰員和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衝擊武漢軍區和東湖賓館，揪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線與方針，形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〇事件”。

周恩來7月18日在武漢軍區的總結講話，交代了**武漢分歧的由來與發展**：“1·26奪權就奪權，2·8聲明出來，很多人支持的，2·8聲明儘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但是軍區卻組織了對群眾造反組織一個聲明的大批判。周接著指出：“不管怎樣……不該把2·8聲明看得那麼嚴重，因此就出現了‘2·18’，‘3·21’，由於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而接連出的錯誤，工總的圖片是醜化工總……”。軍區發佈“3·21”通告，解散了幾十萬人的造反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學生組織二司受到批評指責，所以周恩來說：“二司在‘3·21’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你們

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你們的6·4公告出來就使“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發展。6·6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就有調整……在軍區開過會，六月八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把這四個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夠了。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

本來是個群眾認識的分歧問題，軍區非要弄到鎮壓“反革命組織”，結果武漢各個造反組織團結起來，喊出“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的過激口號。而“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周語），醞釀組織起龐大的“百萬雄師”支持軍區對造反派的鎮壓，挑起系列大武鬥，造成緊張局勢。所以周恩來說“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負責同志”。並建議：**“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鍾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第二、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漢軍區的總結講話，概括了運動的過程，問題所在及其性質，解決問題的方針、思路，是認識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個關鍵。

通過重新發掘文獻和歷史記載、群眾組織和中央的調

查、訪問多方重要的當事人，考證一些事實，圍繞中央處理武漢問題、“7·20事件”，基本歷史事實如下：

1. 從著手準備處理武漢問題，到具體解決武漢問題、處理武漢事件與事件的善後中，周恩來始終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7月18日周恩來總理在武漢軍區二級部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代表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對解決武漢問題的表態，表達與貫徹對處理武漢問題的基本方針，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針對反抗的也正是講話的精神實質。

周恩來有規範的信息渠道與機構，如“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總理辦公室、總理聯絡員、中央文革記者站。他對於解決武漢問題，早有自己的實際調查研究與思想準備。受毛澤東委託，他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代表中央處理多個省市的問題。從本質上看，這些地方問題與湖北武漢並無二異，都是軍隊介入以後，造反派與軍隊發生矛盾、兩派衝突加劇。中共中央指導武漢地區文革運動的精神，應與當年其他省市問題的處理原則無二：批評部隊在支左工作裏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造反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團結對象”。歷史地看，中央認為“大聯合奪權”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現在我們終於知道，中央文革在毛、周到武漢前，並未正式研究過武漢問題，對武漢下什麼結論，如何處理武漢問題。但周恩來對武漢情況完全知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與毛澤東兩人在67年7月10日前，連續三日商議，並於13日在碰頭會宣佈毛、周率軍委其他領導南巡的決定，毛澤東在會上也沒有對武漢多說什麼，僅僅談了宏觀形勢與

任務，表示要去調查研究。而周恩來代表中央的 18 日講話提綱，是他在東湖聽取軍區彙報、與毛主席商議後，在當地草就的。這點，楊成武和一些當年在現場工作的同志均有記載表述。

事件發生以後，周恩來於 7 月 20 日下午飛抵武漢，組織將毛澤東轉移到上海，命令軍區尋找王力，調動部隊，平息武漢事態；旋即率謝富治、王力等離漢返京。

2. 在毛、周到達武漢前夕，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為軍區支左工作定調子。事後，陳在中央學習班的檢討中也說：“7 月 9 日常委會定調子，7 月 10 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明確的很肯定的統一口徑，統一思想，說沒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不能翻案，批判二·八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加以美化……‘七·二〇’事件為什麼起來？以前就有這個思想，我們貫徹了這個反動思想，蒙蔽了群眾。以後聽說錯了，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要翻案，（群眾）就保護我這個反動路線。長期這樣，所以一下子翻過來，群眾不願意……”

3. 毛、周到達武漢，開始對軍區做工作時，業已出現懷疑中央的輿論和謠傳：

“（獨立師）向連隊的戰士們大量灌輸惡毒污衊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輿論，把‘三新二司’的學校和他們所在的民眾樂園描寫成恐怖世界，人間的地獄，渣滓洞的宮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將說成混蛋流氓和殺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說‘6.17’大血案，解放軍去制止武鬥的一個加強團的人被民眾樂園的牛鬼蛇神殺了一大半，邱少雲生前的英雄連隊死的只剩十幾個人，一個空軍女廣播員被‘三新二司’拉進民眾樂園脫光了衣服，開腔破肚，

割了腦袋，說他們殺人放火，搶友好商場、搶糧店等等”。^[1]

16日，武漢三鎮大街上就已開始出現“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強烈要求王力、謝富治到工農群眾中去”、“強烈要求王、謝首長下連當兵”。17日，凌晨謝、王一行到“百萬雄師”總部，王力強硬批評其頭頭，接見非但沒有增進溝通瞭解，還促使了“百萬雄師”對中央文革的極度反感抵觸。^[2]並沒有參加此次接見的湖北省勞改局軍管會代表翁某，在17日白天就說過：“王力是知識分子，是相信知識分子的，是執行臭知識分子路線”；“這次王力這樣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問題，‘百萬雄師’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時候部隊才不管的。”真是一個天才的預見！19日，軍代表張某對“百萬雄師”說，“中央最近有個別人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其中有：河南省軍區支左方向錯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組織。毛主席看後，將這兩條劃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現在，中央把全權交給了武漢軍區，因為武漢軍區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過，運動至今還沒有開槍打死過人”。“江西軍區指戰員被迫轉入農村”；“中央某同志說產業軍是保守組織，與貧下中農相處很好。現在成都物資緊張，生活困難……關於成都問題，中央作出決定後，部隊不通，其中8個戰士徒步上北京，要將材料親手交給毛主席，對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 在軍區彙報、周恩來談話時出現的抵觸與衝突：

[1] 獨立師某部戰士揭發（1967年8月）。

[2] 採訪“百萬雄師”第一號頭頭翁文斌（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周恩來與陳、鍾談話做工作；但陳再道仍十分抵觸，不滿周的講話。周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上將軍依然不滿，將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嘛。說：“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1]

陳再道後來檢查說：（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是他（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裏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麼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裏表態，心裏總還是抵觸的，不願意堅決貫徹。鍾政委事後檢查說^[2]：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

[1]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P199，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陳司令的生活副官陳某也證實他的確拍桌子對總理意見不通，此情當時在場的人都已私下傳開，消息也很快傳回北京，奉命送信的邱會作就聽說了陳與周總理拍桌子。15軍軍長方銘也與群眾回憶陳頂撞總理事情，陳說領導好辦，群眾不好辦，總理說：你不要用“百萬雄師”來壓我，不要說你“百萬”，就是“千萬雄師”我也不怕。後來在湖北省學習班批判陳再道時，在11月23日上午的會上，軍區機關領導和群眾還指責陳再道數次頂撞周總理、拍桌子。

[2] 鍾漢華政委在事件後檢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文獻，1967年12月。

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我們……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仍按原方案彙報。為了穩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兩日的彙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鬥以後，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原文見附錄資料）

5. 省軍區獨立師將總理講話要點傳達，挑動了部隊反彈。

鍾漢華後來檢查^[1]是準確的：“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准蔡炳臣傳達了（按：7月18日晚），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後，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原文見附錄資料）

18日夜，軍區會議精神由獨立師蔡政委決定傳達到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並把派出去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蔡說：“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回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彙報。鍾政委在彙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鍾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彙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軍區後勤和其他單位觀點都是一致的，在彙報時也被頂回去了。

[1] 鍾漢華的檢查（1967年12月1日），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文獻，1967年12月。

我們彙報對新華工看法時，王力很反感……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群情激憤之下，牛、蔡說“你們對外不要提總理說的”，暗示把矛頭指向王力。

蔡又向 8201 機關幹部傳播謠言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的消息那麼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還是從公安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報告”；對於王力的政治謠傳，在 15、16 號已經在社會上散佈。

軍區秘書科揭發：19 日下午軍區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時，獨立師的戰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來造反，反對“四點指示”，（當時謝、王正在傳達總理指示）但是機關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麼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1]

19 日下午，蔡政委氣衝衝離開軍區會場，牛師長相繼退出回到師作戰部，牛對部下大發怨氣，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 時，8201 的 49 人衝進軍區，硬要謝接見，回答問題。並質問軍區：王力憑什麼把擁有 120 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23 時半，8201 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有 200 多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

對獨立師的異常行徑，幹部曾提出疑問和意見——19

[1] 武漢軍區秘書科揭發，輯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合編，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1967 年 9 月。

日晚 12 時許，六團翟團長顧全大局，當面向蔡提出“**要採取措施，不能讓部隊上街**”，蔡氣衝衝地回答：“**什麼上街不上街，不開槍就行**”。

“百萬雄師”主要頭頭現在怪事件首先是由部隊同志鬧起來的。

6. 獨立師領導縱容和參與了揪鬥王力和擴大事態。

獨立師主要領導在 19 日下午將“百萬雄師”首要頭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東湖的絕密消息，授意預謀揪鬥王力的頭頭去向中央反映對武漢文革問題的意見。^[1]下午，半夜至次日凌晨，獨立師幹部和“百萬雄師”在軍區密謀衝擊東湖賓館、揪鬥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長接見，與王力談判，要求澄清外傳的總理四點指示。

“百萬雄師”衝擊東湖賓館中，該部隊警衛賓館人員多次向獨立師首長牛、蔡報告情況，而牛、蔡無動於衷，不向軍區報告，也不積極設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時許，牛才到現場也並不採取果斷措施，放任圍攻、綁架王力，說：“讓王力上車吧，上了車還好些！”並親自參加在軍區內對王力的批鬥。事件發生之後，蔡探問大家看法，有機關幹部尖銳指出**其性質是兵變**，蔡當即回答說：“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黨中央、毛主席不會那樣處理。”當晚，蔡又說：“這次我帶了頭，創造了談判條件，以‘百萬雄師’和軍隊為一方，以‘三新二司’為另一方到北京去談判。”22 日上午，蔡炳臣和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召集宣傳車約 50 餘人到師部開會，蔡作了新佈置，講：1、這兩天他們做了一個大好事，

[1] 採訪“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2005 年 11 月、2006 年 3、6 月）。另見榮根採訪（2007 年 9 月）。

把群眾發動起來了，火已經點起來了，迫使武漢軍區作檢查的公告不能發表，創造了去北京談判的條件。……2、火已經點起來了，現在要求大家穩定下來，準備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來整理材料。

22日晚經蔡口述，傳達四條緊急命令，再次規定要堅信師黨委的決定是正確的。

7. “百萬雄師”部署繼續抵制、散佈謠言。

20日獨立師幹部戰士和“百萬雄師”在軍區批鬥王力，強迫他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又在全市組織大規模武裝遊行，呼喊反對中央精神的口號，掃蕩革命造反派。

當晚，“百萬雄師”會議擬出行動綱領：1、“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不能出面，他們不方便。‘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他們不能怎麼樣”。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必須保證每天有20萬以上的人上街遊行，迫使中央不能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跑出武漢”。

3、“全面奪省市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21日上午，“百萬雄師”召開奪權動員會議，一號頭頭俞文斌說“今天請大家來商量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很秘密，在‘百萬雄師’的勤務員中，也只有四個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市的權……”。下午，“百萬雄師”開會，將“臨時聯合代表團”改為“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訂出計劃：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王力問題由“專揪王力聯合

指揮部”負責批鬥；堅決不准為工總翻案，誰翻案誰負責；關於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謝、王回到北京，周總理等到機場迎接的消息。被壓制了幾天的革命造反群眾無不歡欣鼓舞。晚上，“專揪王力指揮部”有人針對中央對事件的表態，秘密制訂計劃，準備啟用人武部掌管的槍支彈藥，裝備60萬人抵抗；組織10萬人徒步進京告狀。此外，“百萬雄師”頭頭召開會議還決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24日，“百萬雄師”出動了百餘輛卡車遊行，呼喊“打倒陳再道”的口號和“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

在事件整個過程中，他們散佈大量所謂“毛主席語錄”和謠言：“百萬雄師大、好、純，是個創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發現：“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紅衛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漢的‘百萬雄師’”。

形形色色的“北京來電”：

“中央文革來電”：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關於武漢問題的表態，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將派周總理和陳伯達同志來武漢解決問題；三、謝副總理和王力是來武漢瞭解情況的，不是來處理武漢問題的。

“中央軍委來電”：一、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二、為了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萬雄師好，陳再道好。

8. 抗爭的矛頭已指向毛澤東與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獨立師師部，師政治部主任進來專門探問蔡炳臣政委“那個人呢怎麼樣了”，並追問“那個人呢!？”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問那老頭子那地**

方”？！後來師作戰科長和幹部科長盤問張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員），並說：“你們中央帶著框框下來，不深入群眾，不調查研究；來到武漢就到知識分子窩裏鑽。你們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識分子，不要工農兵……你們中央奪軍權”！其實，早在7月19日，有人專門用小車接走“百萬雄師”一號頭頭，授意群眾去向毛和周請願，有人專門告訴百萬雄師揪鬥王力的策劃、組織者：**毛主席就在東湖**。在他們批鬥王力時，軍區副政委葉明要29師張政委讓群眾頭頭放了王，傳達總理指示——派代表商談解決武漢問題。一個**群眾組織頭頭居然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1]顯然，動亂的挑動與組織者明明知道毛澤東在武漢而為之，就是要向黨中央施加壓力。

在游鬥張根成時，車上的軍人率直地指責：“中央文革都幹了些什麼事？把80萬人的‘產業軍’打成‘反革命’，在內蒙、河南幹了些什麼？把解放軍打成‘保皇派’！”對抗情緒十分激烈。在連續幾天的活動裏，有人在軍區大門外激憤議論：“謝富治算老幾？能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嗎？”“揪出謝富治！”兩個軍隊幹部說“謝富治想跑，老子海陸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脫”？支左辦公室門前守衛對旁人說“過去壓，壓得服，現在就不行了。我們解放軍的槍桿子是不好使喚的”，有人講“揪出謝富治的後臺”！一群眾對一個“百萬雄師”群眾說“你們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說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來漢支持反革命”。一個軍人說：“中央要解決武漢問題，沒有

[1] 當事人張昭劍，時為陸軍29師政委，見張致楊先財、石仲泉的信（2002年）。

我們武漢海陸空三軍通過，就不成！”

武漢測繪學院有署名“三司”的標語寫“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些大標語很說明問題：“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三司”有人貼出大字報“質問陳伯達”說陳是王力的後臺；甚至有人說“不管周XX資格有多老，職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馬”，矛頭直指他們已經極度失望和反感的周恩來。

以上都是軍民群眾的一些個人言論，但反映出一個普遍的、必然的對抗情緒。

20日周恩來將重返武漢，陳再道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和王力一樣”！在獨立師師部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

9. 實際上王力沒有洩露總理講話。

文革以後，輿論總是宣揚王力洩露了“四點指示”。實際上7月19日凌晨，謝富治在水利學院講話，並沒有傳達或提到中央處理問題的精神。王力接著謝富治發表激情和煽情的講話，也沒有傳達四點指示，而是談了幾個意思：**堅決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團結多數；造反派要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對待解放軍。**從講話內容看，王力在群眾中沒有洩露或公開周恩來的講話精神，大意完全是在中央確定的原則中的。在當時的具體背景下，這些精神是正確的，是引導群眾的。如不是獨立師一些人公開鬧事，武漢群眾根本不知道什麼“四點指示”，何來造反派在武漢三鎮大肆宣傳“四點指示”呢，豈非1960年代的“東

湖縱火案”之說嗎？

10. “7·20”中的武鬥是6、7月對群眾武力鎮壓的繼續和發展。

“7·20事件”中，鬧事者對中央代表王力的武鬥之外，他們在武裝示威中，繼續對不同認識的普通群眾，採取了掃蕩性的鎮壓。20日，“百萬雄師”大打出手：在警報聲和“‘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口號聲下，圍攻和衝擊武漢鋼鐵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一附中，掃蕩和抓捕造反派學生、教師。馬路上的群眾，一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衝擊湖北大學，並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長矛下，200餘人被關押。一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利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今天晚上血洗你們學校！”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並刺傷制止武鬥的解放軍戰士。直到次日上午11時周恩來親自來電制止，車輛才散去。

這些並非單一孤立的極端暴力事件，就發生在毛、周身在武漢之時，在建國以來，在文革的非常時期，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11. 當年中共中央對事件的處理。

周恩來與謝、王等回到北京後，新華社廣播消息，全國掀起譴責“百萬雄師”、支持武漢造反派的巨大聲浪。

22日凌晨，毛澤東在上海認為：陳是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離開以後，北京採取的措施是對的；軍隊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

頭會，指示以中央名義召陳、鍾和軍區、部隊部分首長進京。

25日，毛澤東就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代擬復電：“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時十分來電並所附武漢部隊公告全文已經收到。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一）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二）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機報復。（五）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得到毛澤東批准的武漢部隊《公告》中將“七·二〇”事件稱為“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並稱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宣稱“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

26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會上批判陳再道，指事件為“叛逆行為”。

27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稱此事件為“嚴重的政治事件”；表揚武漢造反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並且改組了武漢軍區黨委。

12. 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後，文化革命被“徹底”否定，“七·二〇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復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報告，為該事件平反；該報告稱：“‘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黨亂軍，挑動群眾鬥群眾，以達到其破壞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親手策劃挑起的一個重大事件。”

小結：

筆者當年目睹了武漢文革的歷史過程，筆者並不同意部分造反派動輒打倒當權派——乃至發出打倒不支持自己的部隊司令員的口號，筆者也認為誠如陳再道同志所言，發生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有前期運動的歷史背景。但是，“7·20事件”所表現出的以獨立師、“百萬雄師”為代表的傳統體制性力量，對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的反抗，在政治層面上講，的確是一次特殊歷史時期的事變，是嘩變、民變，是無產階級的黨和國家、軍隊關係決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決不容許的。鬧事者推崇固化的階級關係與革命對象理念，他們追逐發自其內心的謠言，狂熱地維護一個“過去的”說法，打擊進行中的現實的毛澤東。這是極端“無意識”下的極端有意識，是群體無政府控制狀態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國學者勒高夫所謂的**沒有意識**，“是自然的永恆內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虛無縹緲的觀念，是一些老生常談，禮儀和道德規範”，撇開這種西方的話語，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勢力“無意識”化的東西，就是十分傳統的政治規範的觀念。“由於無意識行為已深深地積澱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成為影響甚至支配個人和集體活動及歷史發展進程

的強大的歷史惰性力量”。（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P161）反革命的學者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不僅僅是對於歷來造反群眾的分析（或詆毀），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適合於“7·20”中的“百萬雄師”的某些特徵；他認為“群體中的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一個人編造的奇跡，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1]
而衝動的群眾的偏執、無知，專橫、狂暴，在群情激憤中得以充分釋放與輾轉放大，許多衝突、突發事件，不都有這種特性嗎？

西方著名學者熊彼得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就述及勒龐的群眾心理研究，告訴人們“人在群集影響下其行為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在激動情況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而且“群眾心理現象絕對不限於在拉丁市鎮狹窄街道上暴動的暴民。每一議會，每一委員會，每一由十幾位60歲開外的將軍組成的軍事會議，無不流露出暴民鬧事時那種十分觸目驚心的特徵，特別是流露出責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對非邏輯影響的較多的敏感”。

後來系列的顛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所謂文革回憶與研究，把事件的觸發，別有用心地歸結為造反派狂熱擁護被洩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國的“馬斯場”鎮壓，簡單看成為因為頑童偷窺——激憤的群眾懲

[1] 古斯塔夫 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P15、24，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

罰的暴力——觸犯了秩序——觸發了軍隊（對和平請願）的鎮壓一樣。而法國在復辟時期的資產階級歷史學者，也早已走出這種偏執、低廉、表面的“學術”圈子。

“馬斯場事件”，是法國大革命的右派積聚已久的對群眾革命的恐懼、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國文革的右翼勢力和群體積聚已久的對於毛澤東文革路線與理論的困惑與恐懼，對領袖與廣大熱心支持毛澤東文革的群眾反動的必然。

二、“7·20事件”成爲文革進程的拐點

R. 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個相互關聯又獨立的系統——1、黨政幹部體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發動、保護和指導的激進群眾組織，3、軍隊體系；指出從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個相互競爭的組織體系之間的平衡演變的時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長情況，可以通過研究四個關鍵的轉折點得到很好的瞭解：“二月逆流”、“武漢事件”、清洗“五一六”組織、楊成武被解職和遣散紅衛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發生在夏天的“武漢事件”，上承所謂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間接連接、觸發清洗“516反革命集團”、遣散紅衛兵（以及楊成爲中央權力鬥爭的犧牲），是轉折中的關鍵。分析深邃地提出^[1]：“儘

[1] R. 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P18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管‘武漢事件’對主要參加者的影響不是太大，但從更廣泛的方面來看，其影響是毀滅性的。”

1967年也成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從上升到下降的轉折。

1. 確實不是一個武漢的問題

從“一月革命”，毛澤東號召全面奪權，軍隊介入支左和普遍壓制革命造反，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繼續推進群眾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澤東和造反群眾來看，運動始終沿著上升的軌跡前進。春天到夏天，一個一個省區的問題得到解決，造反群眾得到中央的公開支持，群眾組織也在整理組合之中，與1966年相比較，所謂革命與保守的兩大陣線，業已初見輪廓。青海、內蒙、四川的鬥爭，體現出軍隊介入後情況的複雜未蔔——總體性對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導和壓力下，運動仍前進了，軍隊在重新體現保護人民、摒棄鎮壓的革命宗旨。但是，誠如邁斯納分析的，軍隊難以確定到底誰是真正的左派，基於傳統觀念和為了穩定局勢，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進的組織：“軍隊既擔負著援助群眾的革命行動的任務又擔負著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的任務，而這二者常常發生衝突。軍隊領導人通常寧願選擇後者。為了維護秩序，軍隊經常對那些比較激進的群眾組織進行武裝鎮壓。”^[1]

對激進的反權威和反秩序的造反進行鎮壓，實際上鼓舞和支撐、整合了逆反文革的傳統勢力。這個整合，從思想上到組織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潛行，進行中的革命運動終於遭到“7·20”的狙擊。儘管周恩來在7月18日

[1]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P44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講話裏也提到還會有反覆的，毛澤東和他空前絕後地共赴武漢，親自坐鎮解決運動問題，但毛澤東卻沒有料到體制性的反抗會如此地強大與頑固，特別，是以空前浩大的群體性反抗表達出來（儘管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也說：**軍區個別負責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眾，用造謠欺騙的手段，顛倒黑白，把他們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軍隊、發動群眾推進文革，卻遭遇到軍隊與體制性的群體的狂熱對抗。毛身臨其境，不能不在實際問題中感觸到抵制文革理論與路線的問題何在，甚至實際感悟到群體性的軍民“紅色”暴力與國家機器被蛻換為鎮壓人民工具的可能。而這正是他為提出文革的必要性一再警告全黨全軍的。毛澤東很不情願地撤離武漢，周恩來對事態發展作了最壞的一切準備，他也不得不化裝進入與離開市區。部分軍隊及其主官竟然抗拒軍隊最高領導的指令，對於黨和軍隊、國家的創建者來說，是一次刻骨銘心的衝擊。特別是這種狙擊來自一再宣傳的：我們應該相信的群眾和依靠的軍隊；被狙擊的卻是黨和軍隊的創建者與統帥，也正是幾十年軍隊與群眾運動的運作高手：毛和周。所以周恩來在7月22日說：“**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1]他清楚毛主席的文革的軟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癱瘓的黨政體系，唯一會與文革路線叫板的傳統、有組織的力量。

對毛澤東來說，擴大人民民主與改造國家機器的相互促進與對立統一關係，還有極艱險的漫漫歷程，巴黎公社以來國際共運始終沒有解決的現代政治學的問題，依然存

[1] 周恩來對“北航紅旗”紅衛兵井崗山、吳介之同學所言(1967年7月22日)。

在。今天，人們指責67年8月的狂熱，批判文革運動中“揪軍內一小撮”和“砸爛公檢法”口號時，實際上卻回避了毛澤東文革初衷的問題。就在1967年熱月之後，他還給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1]他在遭到阻遏和挫折，文革發生轉折後，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

2. 對文革的懷疑和抵制不容忽視

文革的領導核心和激進文人，對於基於傳統政治體制的軍隊和普通工農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計過高，以為用仰仗毛澤東的權威、文革的輿論攻勢、激進的群眾運動，就可以較快地使傳統的革命基礎群體覺悟起來，擁戴毛號召的實際運動。

大家研討文革，往往以為運動僅僅是傑出領袖與風雲人物號召鼓動的，低估了出自廣大群眾內心的支持，或抵制——群眾性自發的能動性。基層的造反群眾與傳統力量面對面，體會到要證明自己革命性並成為多數十分艱難；他們缺乏理論修養，缺乏政治訓練與經驗，在傳統力量前顯得十分衝動與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經驗的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們不懂得周恩來一再告誡紅衛兵：正確的政策是路線的保證，繼續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時——激進反抗的簡單手法，來對付已被他們用暴力簡單地“打垮”了一次的偏保守的群眾，並對抗在這些群眾背後的軍隊幹部（他們冷冷地觀察，極度的反感運動）。毛、周，乃至到武漢傳達精神的謝、王，一再強調要正確對待解放軍和不同意見的群眾，就是批評和引

[1] 《毛澤東傳（1949-1976）》，P15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導的造反派。部隊幹部和保守群眾的本能的反對、恐懼的心理就不用說了，前面引述的言論與心態，已體現出他們幾乎把在中央面前“攤牌”，作為一次生死決戰。

有意思的是，文革運動中我們一再喜歡引用一條語錄，說什麼幾何定律違背了人們的利益，也會遭致人們的反對。^[1]可能這老話在武漢三鎮的現實意義在於：“7·20事件”裏，毛澤東和造反群眾都清楚看到——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及其創導者毛澤東，違背了舊有政治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和部分群體的狹隘利益，也必然會遭到體制性力量從心理到實際言行的狂暴反對的。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反抗者的抵制對象沒有所限，哪怕你是我們曾經擁戴的毛澤東！武漢事件已經過去了近40年，“百萬雄師”的主要頭頭毫不掩飾自己的終極認識，無數的更為博大的社會巨變也證實了這一點。

“7·20”的反抗，由於它明目張膽地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反抗革命政黨與政府權威的暴力行徑，理所當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擁戴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造反群眾，反對和壓制下去了（“百萬雄師”一些逐步自覺與始終堅持的分子，後來明確認為“事件”是被已經公認為“壞人”的林彪、江青鎮壓下去了，是一種“路線趨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線的壓制和武漢軍區改組、“百萬雄師”如鳥獸散，並不同於聲勢遠大於宮廷“二月抗爭”（尚屬黨內高層正常的思想鬥爭）對毛澤東的第一次打擊，

[1] 出自列寧《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原話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自然歷史理論觸犯了神學的陳腐偏見，引起了並且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鬥爭”（《列寧選集》第二卷）。

更不等於抵制文革的傳統習慣勢力的全盤潰退。

3. 群眾運動的高潮就是頂峰

猶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氣流強烈交鋒、拉鋸的天氣乍寒乍暖一樣，武漢造反群眾在短短的一個半月裏，初次真正體會到政治鬥爭的激變與反覆，體會到激情的歡愉和實實在在政變的恐怖，經歷了挫折與轉折。在中央強大輿論的支持下，武漢造反群眾翻身了，“武漢的公雞下蛋了”！新華社連篇疊牘的報道與社論，給武漢群眾戴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榮譽桂冠；以對武漢事件的看法表態，新華社廣播點了全國一系列大致與“三鋼”“三新”類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國的“革與保”陣線頓時分明，中央也力圖讓湖北問題的解決影響周邊地區，推進全國運動。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歡呼“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按林彪秘書轉引葉群的話說：“中央文革決定，要藉這次武漢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文化大革命，把當前這種反動逆流打下去”^[1]。的確，武漢事件成為文革初期上升趨勢中的最高漲，成為鼓勵群眾造反的文革方針的頂峰。不少造反群眾以為新階段的任務就是解決軍隊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2]。但是，頂峰就是轉折，就是群眾性狂熱推進的急度回落。“百萬雄師”的暴力並沒有能使事件本身變成轉折——即路線的讓步，取得事件勝利的歷史進程卻悲劇性地促使了歷史必然的轉折。

[1]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參閱《“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公司，2003。

[2] 部分群眾的認識，來自於他們的自我分析，也受到“清華井岡山”核心的極左判斷的影響。

毛澤東在武漢事件發生以前，雖然有他路線的底線——強調大聯合必須以造反派為核心，但也一再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並不讚賞非得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他對武漢的態度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對長沙運動的關心與傾向作參考^[1]。就在7月12日——臨去武漢前夕的閒暇中，他與摯友周世釗暢談了長沙文革；他與周世釗一樣有自己的傾向性，但也堅持兩派沒有不革命的理由，沒有什麼根本原則的分歧，必須聯合起來才能將文革進行到底。這個精神，沒有在“7·20”的反動裏被泯滅，反而被毛堅持光大。因為，他的確看到了用簡單的群眾造反、壓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決原有舊體制影響下的群體思想問題，“百萬雄師”對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識到無法用戰爭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徑，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別鬥爭。他在繼而的大江南北視察裏，一路上講這個道理，要造反派團結大多數。甚至在剛到上海時，還單獨與“工總司”的潘“司令”真情傾談為什麼武漢不能像上海那樣做好對立面的工作？但勝利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實踐現代政治生活裏革命與民主的這個辨證關係。（“百萬雄師”一號頭頭至今也對毛的這一指示表示鄙視，認為群眾分裂就是毛造成的）

一個傾向壓制另一個傾向，一個傾向掩蓋和追趕另一個傾向，“7·20”後的武漢群眾，沒有能夠實現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對“百萬雄師”廣大群眾去政策攻心；雖然造反頭頭們也發了聲明，有所佈置，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1] 陳明新，《領袖情 毛澤東與周世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周彥瑜 吳美潮，《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甚至內心就是唯我獨左的，用自己在反對“反動路線”時，批判對方的“僵硬政治思維”，反過來對待壓制過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觀形勢根本不容許下層群眾自己去實現：在省市的層面上可以強調與宣示，但到了基層單位，情況十分具體和複雜；況且，17年體制形成的觀念分歧，怎麼可能在沒有政治經驗的造反群眾的勸說下，輕易動搖或化解。元月分“工人總部”對待潰散中的“職工聯合會”（“百萬雄師”群眾基礎的前身）的粗暴壓制行為在7、8月裏加倍——或許是殘酷的武鬥後遺症使之更為加劇^[1]；“革與保”的矛盾，在每個單位裏並非都是那麼清晰，人群因具體幹部問題或宏觀局勢歧見重新分化、掛鉤，紛紛反戈一擊的“百萬雄師”基層組織與群眾，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組織（在河南省叫做“跳過來”，武漢叫“站過來”）。

半年多來造反派內部所謂“鋼”派與“新”派的無謂爭執，在這個碼頭城市裏，也非得人為的幫會式地隨即發展與激化起來，周恩來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再告誡的“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僅僅成為一個口頭傳傳的信條。儘管大家都承認以中央確定的革命造反組織為核心搞大聯合，但由於當年一直批評的非馬列主義的小生產意識，革命戰爭年代業已存在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文革裏更以極端“革命”，也極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現。毛澤東的號召沒有實際的反響。

武漢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使周邊激化的衝突，得到某種冷靜的參照，實際上兩種思潮、兩大派群眾的鬥爭更加

[1] 一直在地下或公開活動為“百萬雄師”翻案的人，宣傳有18萬以上階級兄弟被造反派毆傷或打死；1978年湖北當局為“720事件”平反，直接採用了這一來自民間的誇張數字，上報中央。

自覺，更趨激化。情緒緊張的權力集團和頭腦發熱的群眾，都在尋求擺脫困境、勇爭革命與獲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與重慶在造反派內部的武力衝突，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升級到頂點，創下文革中火器衝突的典範。

江西一個軍分區司令甘冒當“小陳再道”的風險，公開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戰軍進入，保守派已持有武鬥軍械，又與造反派爭奪槍支，大打出手^[1]；在8月的高熱中出臺的中央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包含了武裝造反派的內容，已經不能遏止幾月來的基本態勢，甚至可能是適得其反，因為不少部隊和領導堅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對“支左”或“武裝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司令部的任何口號，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槍或明搶暗贈。

湖南在處理本省問題的文件出臺前後，兩派之間、造反派內部武鬥繼續加劇^[2]；甚至還出現了以鎮壓造反派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縣血腥鎮壓所謂“黑五類”子弟的大規模野蠻屠殺。河南的運動幾月來得到中央明顯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幹部的點撥，在武漢形勢與江青讚揚“文攻武衛”口號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對保守勢力的武力壓制的

[1] 在八月上旬，周恩來一再批評的江西搶槍行為，基本上是保守的一派的。中央決定在江西試點武裝左派。南昌、贛州、吉安、萍鄉、撫州、向塘都出現包圍支左部隊，搶奪武器事件。

[2] 8月7日，周恩來指出：（湖南）湘潭軍分區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發了槍，不僅高司、紅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產業軍，武漢的百萬雄師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軍分區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把槍發給保守派，是犯法的。現在湘潭發出九百多槍，從湘潭、長沙以南到韶山，變成了高司、紅色怒火、百萬雄師的據點，主席家鄉搞成這個樣子還行？！黔陽、常德、衡陽等地也有類似發槍的情況，這些地方的軍分區也要象趙仁山一樣，……希望其他軍分區，衡陽、郴州、零陵、黔陽、常德，都要檢查一下。

唯一的絕對優勢，但是，這些主動出擊難道真是必要的嗎？^[1]

安徽造反派的長期衝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搶槍割據一步，幸好12軍及時控制局勢，後來得到毛澤東的表揚，大概當時是武漢周邊最理想的一個地方。這些進展，當然都是基於各省自身的運動必然（河南受武漢制約影響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漢事件所體現的極力抵制文革與強力推進文革兩種勢力——政治能量劇烈衝突的外在釋放和一些荒誕的演繹（四川的事態很難說有多少路線鬥爭的原則）。武漢在7月沒能做或做完的事，周邊——甚至全國依然在更加強烈地進行。雙方都到了更加自為的地步。

連武漢人向來看不起的溫吞水的上海運動，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勢下，出現攻打“上柴聯司”以穩定上海局勢的棍棒武鬥，當事人徐景賢回憶：“毛澤東覺得上海的形勢和武漢的形勢大相徑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域，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裝十萬工人’……”，結果是“‘每人發一條棍子’”！^[2]

各派群眾對形勢的推動，調動了難以想像的能動性與奉獻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熱的八月，只是各種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與能動的合成。新華社以各地對武漢事件的表態為契機，點了系列革命群眾組織的大名，一時激進的造反派皆大歡喜，似乎每個組織都面臨“革”了或“保”了的鑒別。勝利的武漢群眾，居然自發出動數萬人次，向周邊

[1] 8月20日，河南劉建勳對造反群眾說：現在情況變了，“二七公社”佔優勢了，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們應該強調開展政治攻勢，耐心細緻的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爭取教育受蒙蔽的群眾，集中力量，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鬥。

[2]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甚至新疆“武裝支左”。的確，事件對於路線的劃分（？）和對立的加劇，都是有重大影響的。沒有點到名的組織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定性為保守派），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對軍隊或造反派的衝擊，更為嚴重的是，形成省際聯合逆反態勢。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漲”嗎？顯然不可能是。多數激奮的群眾可能都理解錯了，各種特別激動與活躍的群眾裏，真正想問題而且會思考的人，真是鳳毛麟角。

4. 繞不過去也衝不過去的軍隊問題

武漢出現的軍隊鬧事事件，令人們立即聯想到早在1964年的《九評》裏，就表述了毛澤東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众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普遍組織和訓練民兵，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黨和人民手裏，絕不能讓它成為個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條：“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众的監督之下。在保衛社會主義成果和人民利益的鬥爭中，要實行依靠廣大人民群众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針，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強調加強黨和人民對部隊的監督，清洗軍隊中的壞人和“公檢法要徹底革命”、提倡“群眾專政”的觀念，第一次以公開文獻形式出現。在文革當中，

類似的理念以各種文件、社論、講話形式表達出來。^[1]

武漢事件中部分軍人和“武漢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澤東有關理念的感性認識，他也從江西問題，和武漢軍區支持傳統的基幹民兵，發生殘酷的武鬥，意識到武裝革命群眾的必要。他在事件後，突出地感到部隊問題相當嚴重，一再提出“武裝左派”；給江青的信談到“現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2]，提出“大量武裝左派”“實行群眾專政”，他以為“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3]；試圖壓制他心目中文革運動的右派甚囂塵上的反攻。

事件發生後，中央在北京緊急研究處理、善後和宣傳措施。《王力反思錄》（1011、1027頁）說：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七·二〇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佈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佈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鬥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帳。”王力的認識可作一個參考。問

[1] 謝富治 22 日從機場與李震回公安部的路上，就決定在部裏公開傳達毛澤東講了多次的指示。

[2] 王力，《王力反思錄》，P853，北星出版社，2001年。

[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P232，引自周恩來的摘記手稿，明鏡出版社，2003年。

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並非始於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〇事件”後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系列社論的提法他就難於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筆的林傑，就為武漢事件後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王力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字句，將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干係^[1]。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個多月裏，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大多數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幹部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進文人就按他們理解的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利用武漢問題在宣傳中大肆宣揚了“揪軍內一小撮”，本來武漢事件就引發了左的傾向的抬頭，群眾性的懷疑一切，衝擊各軍事機關、部隊和對文革不滿的領導人，現在有了大家都一時難以懷疑的中央輿論，於是皆向著文革的“第三階段”奔去。僅僅是對所謂“陳再道似的”人物與順藤摸瓜的衝擊，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國，首當其衝的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高層幹部和各軍區領導。文革中在部分人士中一再顯露出的所謂“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暗傷^[2]，完全可能立即變成頂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線鬥爭和對軍隊高級領導的教育，引到山頭與宗派與

[1] 王力後來承認，在中央告武漢人民書上，在“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前面，加了個“黨內軍內”；新華社揭發，康生和關鋒在報道天安門廣場集會的清樣上增添了“揪武漢黨內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中發[1980]77號文件附件一。1980年9月。

[2] 如空軍成鈞的檢討所流露。

歷史恩怨的歧路去，這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乃至後來萬人所指的林彪絕對不主張的。

從目前披露的史料來看，作為具體主持軍隊工作的副統帥，林彪也尚無希望與驅使各個軍區癱瘓和主官垮臺的跡象。甚至，他在1967年元月至八月，對於軍隊與文革運動關係的態度，可能與其他老帥沒有太多分歧。儘管他對“武裝左派”的意見不好公開表示不滿，但作為一個紅色的職業軍人，他對普遍的槍械流失和搶槍浪潮極為擔憂與不滿，他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1]，認為情況比較嚴重，急需採取一些嚴厲措施，甚至讓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幫忙修改。看來，他並沒有發展到希望自毀長城。不過，親歷者張秘書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現前後判若兩人……過了‘八一’，他又恢復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

毛澤東沒有同意林的看法，他認為搶槍情況並不嚴重，多數槍支是由部隊有意流出的；江西形勢嚴峻時，周恩來曾主持一個參加者極少的緊急軍委擴大會，起草並發出制止江西搶槍的電報（顯然此舉是林彪知曉和贊同的），散會後人們剛從京西賓館回到釣魚臺，戚本禹就告訴他們：毛澤東在上海對該電文的批示已經傳到，仍然認為為什麼軍分區已經給保守派授槍，我們就不能武裝左派？^[2]過來人都知道，甚至到巡視大江南北時，毛澤東還多次輕鬆地從積極方面，看夏秋熱武器流入民眾、團體參與了他預言的政治思想的“全面內戰”。

在文革的初年，從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眾，實際上很

[1] 張雲生 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

[2] 當事人王廣宇回憶（2005年9月）。

難理解老軍人心理，儘管大家學習了幾年解放軍也崇拜擁戴解放軍。筆者通過連隊生活，耳聞目睹，才開始明白軍人這個群體與工人、學生、幹部的基本不同。他們的相互情感，融灌著兄弟生死情懷，沒有參加過戰爭的戰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講經歷過戰爭共趟過血海的生還者。造反民眾用簡單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來觀察和要求、追求軍人，其實嚴重地忽視了軍人的本質就是軍人；多數軍人已經很不熟悉地方與社會——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麼。他們用特有的視角來打量彼此，革命戰爭歷史與客觀存在的山頭——這中國革命特有的時空情愫，或許決定著他們在文革裏的特殊心理與行為。在地方黨政領導通通靠邊時，毛澤東試圖依靠軍隊來維繫黨的組織功能和政府權力。但是，17年來，部隊再也不簡單是戰爭年代的戰鬥隊、工作隊，他迅速成為掌握國家權力後的一個穩定秩序的重要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儘管在1960年代，部隊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厚，但也實在難以奉行文革政治的複雜功能，即當時所期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繼續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反對現存秩序），一方面又得維繫槍桿子打下的政權秩序、堅守專政工具的職能，並且捲入政治紛爭。革命戰爭的榮譽縈繞心中，不論是哪種老軍人，都認為自己當然是政權的合法掌持者，絕對意識不到也和黨政幹部一樣，有一個是否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問題。兩難的局面，終於演成毛澤東文革理念和實踐的悖論，出現了歷史的悲劇。

當時，陳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眾打倒的大軍區司令員，按照先前運動的慣例，僅僅是頂撞毛、周，放任部隊造次和嚴重失職的錯誤，在群眾中支持一派壓制另一派，就可

以點名打倒了，況且中央權威面臨了事件的極大羞辱，需要修復。各派系、山頭的老軍人（決非僅僅原四方面軍的），正滿懷同情——憂心忡忡地看著這只跳出來——群眾可恣意宰來嚇雞的“猴”，擔心出現“倒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許世友逃進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黃永勝在總理的一再訓誡下，也正準備丟棄保守派把屁股“坐過來”。諸軍區和軍事機關紛紛遭到衝擊，包括保守派群眾的衝擊。

可是毛澤東經過冷靜慎重考慮，很快決定將武漢事件作為“嚴重政治錯誤”處理，稱陳為“你們要打倒”的同志。這時，對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調查、審查都剛剛開始，事件是否有何嚴重政治背景並未弄清。但是，毛主席對事件有個基本判斷，絕不相信軍隊的反彈是針對他自己的，也絕對不願把自己統帥的軍隊置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邊，輕易地依靠激憤的民眾去搞臭搞倒一個又一個剛烈的，不適應文化革命的老軍人；也不願意有人利用陳再道的錯誤打破政治平衡。周恩來出面，首先阻止了對原四方面軍同志的可能傷害，保護了業已靠邊的開國將帥。被造反群眾抄家的徐向前與徐海東^[1]，立刻得到周的關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對原四方面軍的領導的懷疑與衝擊——文革滑向宗派鬥爭痼疾的可能，進而保護了彭紹輝、許世友和韓先楚等。^[2]明白人都清楚，這個武漢事件，在文化革命冠冕堂

[1] 衝擊徐向前，似為“清華井岡山”在“三軍無革派”影響下的自發行為，衝擊徐海東，是江青和葉群授意，文革小組指示“北航紅旗”做的。但是，毛、周擔心的問題並未解決，在1968年12中全會上，又組織了對於徐帥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720事件”。

[2] 對文革衝突看成宗派鬥爭的怨言早就暗暗流傳。軍委空軍的成鈞1967年在一個檢查裏就承認自己把空軍黨委裏的鬥爭，錯誤地理解成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四野整其他野戰軍的。嚴格說，因武漢事件受到錯誤衝擊的彭紹輝，僅僅是後來中央派到四方面軍工作，恰好與各方面都有正常的人事關係。

皇的詞語背後隱含著三十多年前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幹部的芥蒂暗傷。

如何正確處理與安撫軍隊對文革的疑懼、集體怠工和反抗，毛澤東主席選擇了極大的讓步和迂回，顯示了他深諳中國政治歷史和現實的偉大戰略家胸懷。

誠然，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軍隊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未必每個人都深沉地意識到軍隊和群眾產生芥蒂乃至衝突的歷史悲劇，那是想在不同範疇和層次上，保衛我們這個政權和江山的群體間，在毛澤東一度最借重的解放軍和紅衛兵之間發生的悲劇。總有些同志，在歷史的當年，或者在幾十年之後，把文革裏的群體與個人，分別評價為所謂“擁軍派”、“反軍派”，對於革命幹部、群眾來說，這種反歷史、非理性的劃分極不科學，也極不嚴肅，“擁軍”和“反軍”對於革命群眾來說，只是一個表面現象，而非事情的本質。當事人的糊塗基本上是無知加偏見，後事者的跟進抨擊，基本上是無知。我們親身參與文革運動人的偏見比無知距真理更遠。按這樣“物以類聚”，在文革運動裏是不是也能夠劃分出一個“擁黨派”和“反黨派”！？

但是由於運動觸犯了軍隊“眾怒”，文革的出軌已成事實，路線鬥爭中傾向性的回潮、反覆，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國外學者邁斯納公正指出：“極左的領導人便大張旗鼓地對軍隊的革命性表示過懷疑，造反的群眾也對軍隊發動人身攻擊，這樣，軍隊也面臨著這樣的危險，那把黨弄得四分五裂、使群眾運動分裂為許許多多互相交戰的派別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強加於軍隊之上，內戰的幽靈不詳地越來越逼進了……為武漢事件和極左領導人的激烈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情緒給8月的新的極左行為火上加油，攻擊的矛頭

主要指向中央國家機關……到8月底，中國看來已徘徊在無政府的邊緣。毛澤東在結束了對各省的‘視察’後返回北京，他此時認識到，如果繼續進行作為一場建立在群眾首創精神基礎上的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勢必會冒使全國陷於大規模的並且可能是致命的內戰的危險。他選擇了秩序，實際上，他是選擇了結束文化大革命。”^[1]

周恩來親自處理武漢問題，也最早對7、8月出現的“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風潮產生強烈的憂慮。8月中旬以來，他連續告誡群眾：“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趙永夫，內蒙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整個軍隊，就那麼少數幾個人。”“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7·20事件’以後這個浪潮不正常，對形勢的根本估計都不對。什麼‘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的前夕’、‘武裝奪取政權’，完全不對。”

到8月中下旬之際，周恩來已經對中央處理“7·20事件”——後續的負面問題和全國形勢變異，形成了系統的相反意見，並在各種場合向群眾公開表述。但是，在“武裝左派”的問題上，他十分謹慎地與毛澤東保持一致，沒有輕易去懷疑這個提法^[2]。就在7月25日北京支持武漢的大會上，周總理答應北航的韓愛晶，武裝北航的“紅旗戰鬥隊”。

[1] 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P445-4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2] 在毛澤東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來還對廣州問題說要以旗派為核心大聯合，“工人造反派聯合起來後，馬上武裝工人，可以武裝2—3萬人”；同日，對廣西問題說：“聯指”怎麼越搞越不象話，又去進攻人家，越走越遠了。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全部武裝他們……又批評兩派搶援越軍用物質。

在文革司令部裏，小組長陳伯達畢竟是老派激進文人，在6、7、8月，他的觀點與總理相近，也不至於發瘋到同意亂搶槍。後來陳與他兒子回憶：“1967年夏天，全國很多地方發生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我提出應當收繳群眾組織的武器，卻遭到江青的反對。她反過來提出要‘文攻武衛’。我的收繳武器的意見就落了空。”^[1]

從更深層的更“歷史”的意義上看，革命的軍隊在新政權成立和鞏固之後，勢必有一個向政治制度化、專業化現代化的過渡，對於依靠槍桿子獲得的中國革命政權，更有一個如何處理革命軍隊、將領與黨和國家關係的重大問題。將帥老同志，都和其他非軍事工作的黨政領導一樣，有一個從光榮的革命者到稱職的國家管理者的身份轉換問題，有一個通常理解的、第一層面——革命戰爭奪權的合法性，到第二層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權——取得深刻徹底合法性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的文革初衷，意在紅色政權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而不是簡單打倒幾個人。在文革以前一些軍隊內部以及軍隊與黨和國家關係問題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證軍隊繼續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黨、國家），爭取軍隊現代化、軍事管理制度化的實際生活中、軍隊國家管理的進程裏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鬥爭。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劇事件，文革中的軍隊集體和個人的悲劇，文革以後依然存在的分歧、衝突及其化解，都是我們這樣的革命政黨和革命軍隊，在探索政權建設與體制取向，以及實現軍隊現代化的道路中

[1] 陳曉農編撰，《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P308，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不可避免的系列陣痛，是漫長的分娩。

文革裏，毛澤東看到軍隊不適應文革的政治（但又太異常政治化），特別是看到軍隊可能被社會波拿巴主義利用（或者說社會法西斯）的苗頭，他想起了大革命國共合作階段的“武裝工農”，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歷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與探索。經歷過北伐戰爭的林彪，當然不願意他參與創建的工農軍隊的將領，成為新政體新制度下的“反動軍官”，成為對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眾推翻。群眾中僅有極少的先覺人物，明白主席為什麼早就說我們這個政權若變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聯想到俄國“二月革命”後兩個政權並存局面，聯想到大革命中北伐軍反動軍官背叛革命的教訓，強烈地要求將人民解放軍置於黨和毛主席的絕對領導下。在“武漢事件”中，他們面對獨立師打出毛澤東語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號召軍隊造反，針鋒相對打出毛的另一原則“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因而，從另一個方面講，歌曲《我是一個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國家、社會與軍隊的一個非常諧和狀態。由於文革爆發，在1967年的實際政治生活裏（包括以後），人們發現歌曲浪漫的表述“來自老百姓”、“愛國愛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權來自人民要高於人民一樣，軍隊來自人民，必然也要高於人民！！

由於歷史發展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武漢問題在軍隊問題上爆發，毛澤東、激進文人，和他們支持鼓動的激進群眾對軍隊的要求，與恪守傳統秩序的軍隊的心理、思想發生嚴重衝突。問題似乎是最徹底地解決了（林與周都這樣說過），卻有完全相反的連鎖反應，並造成嚴重後果。

以上陳述說明這“解決”，仍煮的一鍋政治夾生飯。1967年以後，涉及軍隊的種種問題依然不少，毛澤東就再不叫群眾介入了。

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右傾抵制和左傾的盲動，交織在一起，掩蓋了問題的實質。事件後的左傾與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嘗了，陳再道和“百萬雄師”成為受害者，人們不敢說“武漢事件”裏陳再道將軍和部隊一個不字。人們忘了軍隊悲劇性的錯誤，忘了去總結軍隊捲進派性、干預政治、帶政代黨的嚴重教訓，不願意承認部隊違抗軍紀黨紀的教訓，不以為部隊鬧事並非軍人的榮耀，更不願去思考歷史與後繼可能的社會波拿巴主義問題。^[1]

5. 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

8月在軍隊問題上的極左，僅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轉化的一個關鍵契機。周恩來業已徹底看到“軍心”何在，更重要的問題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權威的問題，是支持陳再道或者打倒陳都影響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眾不顧周的勸阻，執意打倒陳毅；在極左情緒影響下，港辦給英國政府下最後通牒式的照會，憤激群眾火燒英代

[1] 王力在反思支左的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時，談到“毛主席認為依靠軍隊發動文化大革命，依靠軍隊奪權，亂不怕，只要軍隊站在毛主席一邊，聽毛主席指揮，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亂……國家機器一旦被資產階級掌握了，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人民武裝也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新的政權的組織形式要保證人民武裝不變質，人民解放軍不變質，保證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武裝，或者是武裝的人民。……軍隊支左產生的消極作用也很大，這歷史的教訓也很嚴重的。……首先他違背了毛主席一貫反對的軍黨論，一貫反對的軍隊直接代替黨這樣的論點，這是個重大原則問題……這樣勢必走向毛主席本來主觀願望的反面”。參見《王力反思錄》，P848-851。因“反軍亂軍”待罪之身的王力，能夠如此直截了當地談文革教訓，還是不避敏感問題，實事求是的，可以作一參考。

辦處。周總理的秘書周家鼎回憶^[1]說：“事後，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整陳老總的也就是整總理的。把陳毅打倒了，你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此時此刻，周總理對這種目無中央，極端無政府主義行徑，表示極大憤慨：‘再不採取堅決措施我們就要犯罪了。’一項經過周總理反復考慮制定的，解決中央文革黑幹將——王力、關鋒、戚本禹問題的重大決策，已經醞釀成熟。”親歷者周秘書的回憶是非常可信的，周恩來對於文革小組支持的所謂“不停頓地打倒一切”，已經忍無可忍。

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漢問題上的被動、失策，遭致大規模反彈，毛、周政治權威掃地，隨之是宣傳口徑出格，對於全國性的極左反軍，陳司令鹵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2]，周恩來心裏早就十分壓抑、憤懣；在北京，從圍攻中南海，批鬥“劉鄧陶”，中央各部運動趨左，外事口在打倒陳毅和港澳問題上也捲入極左浪潮；周恩來冷冷地聽說王力的“八七講話”，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聞司宣佈限制英國記者的行動自由，8月12日，中華全國記者協會抗議港英當局；8月19日，外交部港辦上報給英國政府的限時照會，也即最後通牒。照會發出，外事、宣傳輿論和民眾團體，再也不可能下臺階緩和局勢；儘管周恩來立即通知文革小組，要他們出面干預群眾造次，陳伯達也出面勸說。但一切已經不可能扭轉。48小時限期結束後，示威人群衝擊辦公室，火燒了英國代辦處。儘管當天周恩

[1] 周家鼎，《天欲墜，賴以拄其間》，見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P499-500，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2] 一些部隊同志（如廣州軍區研究文革歷史的遲澤厚）至今覺得武漢的事件僅僅是策略性不夠，授文革小組以反軍的口實。

來就緊急召見外交部、北京衛戍區、北外紅衛兵代表，嚴厲批評紅衛兵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行為，氣得手直發抖，也坦承“我們沒有料到你們來這麼一手……就是目無中央”，“同志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弄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後還是要中央負責”；同時也承擔了自己的責任，“說那天晚上他實在太累了，沒有仔細考慮就批准了那個照會，這是他的責任”。^[1]事情的急遽惡化，使他警覺到王力矛頭所向：他兩次氣憤地打斷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講話，說“你們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裏撈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講話，你們不能拿這個撈稻草”！（不過，在宣佈王力錯誤時，吳法憲批判王鼓動火燒英代辦處，周還承擔自己在批准照會問題上的責任，說與王力無關）。

外交部造反奪權，直接影響外貿部和對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運動走向。

國內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個重大失誤；各地的動亂，不比中央政府權威失靈中樞癱瘓更為可怕。周恩來本人面臨了比武漢事件遠要嚴峻得多的挑戰。

他清楚一些院校學生（如“516兵團”）公開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陳毅，目標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後是文革小組。^[2]如果說，在困難複雜和危機的武漢問題中，周恩來保持著與毛澤東的高度統一，盡力與中央文革保持合作與相互支持的話，武漢事件以後的局勢——特別是中央核心部門運動的發展，不能再保持這種

[1]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P161-162，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 參閱周恩來在67-70年關於揭批“516反革命集團”的系列講話。

貌似團結而被動的態勢了。研究者認為^[1]：“（他）也並不是一味地遷就、退讓和忍耐。一旦時機成熟，周恩來會像閃電一樣，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夥沒顧及到他們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陣，使他們操縱和煽動造反派奪外交權、奪軍權的陰謀來了一個充分暴露，給周恩來提供了一個出擊的機會。周恩來看准了這一時機，決意給狂妄的中央文革當頭一棒”。周恩來可以認為，全國和外事口運動的極左狂熱，恰是武漢事件後左傾抬頭引發的，8月22日，他批評廣州搶槍是沒有敵情觀念，忿忿強調“不要再提‘軍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後宣傳機關提錯了的”；9月17日，在處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務時，忿忿批評外交部負責人：“我懷疑你們是革命還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後，外交部不聽話了。”

火燒英代辦處事件後，外事口的造反群眾繼續圍攻陳毅，壓制周恩來。8月26日，就在毛澤東同意將文革小組的幹將作為8月來一切被動與失策的“替罪羊”的當天，外事口造反派試圖劫持批鬥陳毅，將事態推向高潮。周恩來從該日中午面見剛從上海回京的楊成武，並派楊去見林彪通報，再與陳伯達、康生、江青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讓王力、關鋒“請假檢討”之後，在子夜時分還（和謝富治、王力一起）接見武漢在京群眾，已經精疲力盡；北外兩派爭批陳毅，周不得不接見學生，但學生不聽勸告，繼續無理糾纏已服藥物的總理，接見到27日6點40分才結束。工

[1]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6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有類似敘述：“他……決定在政治上轉守為攻，抓住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同時伺機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見原書P240，明鏡出版社，2003年。

作人員將周攙出會議廳，其心絞痛急性發作，暈倒在院子裏。

八面應對、焦頭爛額，高速運轉、心力交瘁的周恩來終於被擊倒在地。這僅是一個標誌——狂熱的8月到了收場的時候；總理的病倒，也標誌著文革的中樞心臟病急發。不過，周恩來在倒下之前，已經和毛澤東分別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風險，通過最高層的運作，他也在拋出王力問題上得到毛、林的認同；他等待了政治時機的成熟，扭轉了文革運動的航船，終於維護了他的政治信念與尊嚴。如果說毛澤東是文革的精神導師，被歡呼為舵手，周恩來在1967年8月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來後來對外賓說：“在1967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干擾……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1]

毛澤東次年也說：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後再攻別人；外事系統裏有壞人，“黑手”反革命。^[2]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斯諾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毛說：“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內戰，……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

[1] 《周恩來外交文選》，P48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2] 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P234，新天出版社，1997年。

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斯諾：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毛答：“就是那個時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這個敵人叫‘五·一六’。”

6. 開始整肅左派

毛澤東已經看到批評極左思潮成為必要的任務。而且，群眾背後有黑手，群眾裏混有壞人、反革命。在當年視察大江南北時，毛也指出：“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並多次講到到次年結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還說要改變黑暗面才搞文革運動，“現在來看，情況就不同了，工人起來了，革命派佔了多數。現在可以說，多數省革命派佔了多數。”^[1]

不過在1967年8、9月，毛澤東未必把司令部內的問題看得這麼嚴重。而且造反派群眾的左傾思潮，也沒有超出毛澤東的理念的底線；具體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風暴雨的群眾實踐中，往往是中國式的遊民文化和類布朗基、蒲魯東主義者^[2]的文化成了氣候。這些自然是與主張馬列主義政黨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與關鋒被“端”了出來，作為錯誤傾向的替罪羊；在他們“請假檢討”中，也僅僅承認自己是犯了“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戚本禹則向毛主席檢討了三點錯誤：1. 錯誤地估計了全國的形勢，把鬥爭過程中的反覆現象，看作是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看不到革命群眾的鬥爭成果和力量。2. 錯

[1] 《毛澤東傳（1949—1976）》，P1505-15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 我們青年人在學習馬克思正確對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眾運動、讚揚公社經驗時，往往不知公社優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魯東分子組成的。

誤地估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報紙、電臺到處號召“抓軍內一小撮”。3. 懷疑一切，隨便動搖毛主席司令部的領導。他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是個人主義，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比誰都革命，聽不得不同意見。

王力、關鋒住在釣魚臺二號樓，學習和檢討，起居照常。

特別是，毛澤東9月7日在戚本禹的檢查上還批示轉告王力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1]。說明當時毛也並未一棍子打死王、關，基本還屬於文革初期講過的“左派整風”範疇。

比較能夠顯示毛澤東內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後，王海容於9月24日去打聽消息，毛澤東只是引了羅隱悼念諸葛亮的詩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王與外交部的劉華秋弄清楚詩句典出後，僅僅理解為王、關完蛋了。^[2]其實，政治詩人毛澤東並不是簡單比喻“武漢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一切早已經成為歷史以後，一些當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測8月劇變時偉大哲人的內心世界，“他究竟說的什麼”？後來，王力與關鋒都坦承毛的“英雄”不是比喻他們或惋惜他們，毛澤東是比喻的他自己！經歷了半個世紀政治風雲的英雄毛澤東，面對武漢事件後變幻的形勢，深深體會到英雄理念的孤獨和身不由己。儘管此後他也從未放棄過自己的理想與宏願，以致一直堅持到生命的終結。

或許，毛澤東8月4日給江青的信，並不如今庸人們批評的那樣——是一種理論混亂的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P412，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2]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P189，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的左傾盲動，可能7、8月全國全面內戰，反而激發他懷念法國大革命和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大革命，引發他對巴黎公社武裝民眾和大革命武裝工農的理想與史實的追念？但7、8月的左傾與熱月，文革的出軌和抗爭、反對，時世與願望大相徑庭，毛主席的初始願望也與客觀後果很不相同。他想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的諸葛亮嗎？有知情的研究者說在文革十年中，毛至少有四次抄寫和詠吟該詩，為什麼在他視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勢大好”之時，吟出風雨獨行、無可奈何情懷的詩句？可能這恰恰是他在武漢“七·二〇事件”後，目睹乍熱乍寒，卻不能扭轉文革運動日漸趨下之勢，發出的英雄長歎。^[1]

在武漢事件後運動迅猛發展、變化的十字路口，毛澤東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來的全力緊跟、支持。文革小組的配合他也感到並不理想，可能真是適得其反。

處於第一線的江青，當然也在8月中央宣傳口徑和政治急變中，感悟到什麼問題。所以她在毛澤東批評“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不策略時，還派姚文元去上海探聽毛的底，還發牢騷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彙報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2]姚文元傳回毛澤東的話“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陳伯達慌了神，文革小組內訌起來；司令部高層的內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級了。解決小組內部的問題出現一個機遇。

同時，出現值得深思的問題：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

[1] 1967年繼任文革辦事組負責人的閻長貴認為：“這兩句詩，確實是毛澤東經過‘七二〇事件’後心態的寫照，也是他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心態寫照”，是值得參考的。其前任王廣宇也認為事態發展，到8月中旬，“毛澤東終於發覺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

[2] 王力，《王力反思錄》，P1018，北星出版社，2002年。

的重頭人物，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無不敏感意識到難以駕馭的群眾造反運動和調查歷史與過節的陰雲，已經威脅著他們自身的政治安全，他們都在不同場合（甚至面對身邊工作人員或紅衛兵），多次聲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歷史和政治問題，小到雞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們擔心無法無天的造反學生和年輕幹部，警覺他們背後的“政治黑手”。有人認為當年大抓叛徒成風，其實是轉移了文革初衷。文人相輕和權臣爭寵的庸俗陋習，被帶入本應十分嚴肅的黨政高層政治生活。誠然，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對司令部內部出現這種政治局面，也應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從“安亭事件”以後，一直跟不上毛澤東文革步伐——備受批評的陳伯達，權力與聲譽式微，但又拼命想鞏固地位、職權。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範疇，防範著少壯激進者可能的揭發告密，暗暗組織阻遏和彈壓。這是個大家推進了這個革命的思想激蕩，也被脫韁的群眾運動和詭異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時期。也是一個文革整體性悲劇的問題。這個或那個文革派風雲人物被整肅，僅僅是時間的問題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區的左派大將陶鑄、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說過不怕被人懷疑打倒的大話。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類似雅各賓恐怖的荒謬和諷刺。“懷疑一切”與“警惕一切”的恐懼充斥了人們嚮往的紅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園”。陶鑄在一年前許諾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懷疑”，都可以炮轟，成為不可遏止的政治實際。

此外，也由於文革司令部內部的政見分歧，有些領導人各自暗示或公開支持一個學校、一個派別的學生組織，

北京的左翼紅衛兵運動出現了災難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眾裏的各種衝突，透露了高層的政治歧見和紛爭。

8月11日，在中央首長接見首都紅代會的關鍵講話裏，陳伯達和江青都公開點明“5·16”問題，強調它是反總理的。從而也發生了長達數年的全國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導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絕大荒謬。荒謬當然不出自所謂“劉鄧陶”，也不出自所謂“二月逆流黑幹將”。文革司令部的裂痕，從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發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對立。文革的徹底失敗，某種意義上講也就從文革司令部內部猜疑開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員，一次又一次地內部紛爭。如果說1966年清洗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還只是一種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裏的政治鬥爭，並延伸到群眾中，是文革運動開始衰竭的重要標誌。從動員和鼓動群眾投身這個政治運動，轉化為節制群眾、規範群眾，以至收拾群眾運動。大家似乎都後悔把群眾從潘朵拉的魔匣裏放了出來。從此，文革運動從不整群眾，轉換到也整群眾（所謂群眾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論與組織準備欠缺，文革的終極對象的混亂、飄逸，概念之不明確，傳統的政治文化之頑固，由此可見一斑。武漢群眾不久就領教了“林副主席派來的”軍區新領導和支左軍人的“路線覺悟”，40年後，有人感到他們甚至比陳再道們對群眾更不感興趣！造反派與掌握實權的軍人的衝突，已是必然，這就是即將發生在新生的革命委員會中的悲劇。

坊間總說林彪製造了“武漢事件”。其實，林彪在該事件後立即得到的東西，並不如一個“5.13事件”。他是十分

內向和舉止陰鬱的人，僅僅從他考慮再三的“7.25”天安門群眾集會亮相和“八·九講話”，我們很難看出他對“武漢事件”的深層態度。畢竟，事件暴露的是他和軍隊支持文革不力，而不簡單是陳再道不力；事件並不是僅弄得所謂原“四方面軍”幹部面上無光，。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當然不會如有宗派傾向的將領或幼稚的紅衛兵那樣簡單。67年春夏的問題，直接暴露了林彪維護文革路線不力。邱會作對事件發生當天的回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葉群開會回來告訴林：“陳再道只會打仗，腦子簡單，在武漢支持保守派，助長了保守派氣焰，你趕快給主席寫一封信，勸他離開武漢，不然，很快就會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葉群還說，“……主席的安全保證不了，會賴到軍隊頭上來……”^[1]

1966年，林彪對於軍隊參與文革運動，總的講處於一個守勢，他並不情願軍隊捲入政治鬥爭。毛澤東在1967年初對軍隊參與和支左的要求，實質是對林而非對其他老師的批評。可以說林總和其他老總相比，對於文革看法並無本質的區別；所謂林系的將領（如“四大金剛”等），並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軍人更有“文革的路線覺悟”。軍隊投入支左以後，矛盾更加複雜尖銳，甚至出現規模性的流血事件，這是毛澤東沒有充分估計到的。毛澤東在應對來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擾阻遏時，並不能得心應手；特別

[1]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P247，銀河出版社，2005年。後來在8月9日接見武漢軍區領導人時，林彪又講到：“各地區的同志有的犯錯誤，現在出了陳再道、不要再出陳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還要挽救。現在沒有垮臺的，也不希望垮下去，連許世友在內……現在老實講，擔心我們同志擔負這樣重的任務犯錯誤，對文化大革命不利。現在依靠軍隊，軍隊不犯錯誤就好。要不犯錯誤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眾，最重要的是請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都是類似的想法。

是從武漢事件開始顯示出來。林彪說過一些大話，但實際行動並不積極，並不能起到人們期盼的文革“副統帥”和“尊神”“鍾馗”的作用。

必須注意一個細節，就在67年5月，毛澤東找鄧小平談話，試探鄧的態度——能否出來工作？鄧認為時機不宜，毛讓他找林、陳談談，鄧也不願意。當時正是批判劉、鄧的高潮時期嘛。^[1]在1967年春運動關鍵的時候，毛澤東在林彪的政治態度和身體狀況都並不理想時，找鄧小平談話僅僅是一個偶然嗎？僅僅是因鄧在4月要求過見主席嗎？有關聯的是：就在武漢東湖之時，毛澤東於7月15日還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的話，還是要鄧小平出來。**”王力認為，“當時主席已經對林彪不滿，流露出想用鄧小平換林彪的意思”^[2]。從前後看，王力這兩句講的總還是事實。

毛、林在文革問題上開始不信任，恰恰在武漢事件後露出了蛛絲馬跡，楊成武公開的系列回憶多次流露出來了一些跡象，僅作為一種參考。林彪在67年8月寫信給毛澤東，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搶槍問題，毛給江青的信說“並不嚴重”；隨之，林又主張起草嚴禁搶奪槍支的通告，由總理去商辦。林與毛對事件後的形勢估計是有原則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會上，也說“軍區以上的幹部沒有幾個好人”。之後，一反亢奮狀態，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實思想和主張，還是怪異詭秘的。

不過，正是武漢事件以來，足以顯示林影響軍隊運動

[1] 鄧榕的回憶，提到這次接見；但毛與鄧最關鍵的話，涉及到毛、林、鄧在文革中的微妙關係，她沒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或故意不講，或出版時被刪，還是鄧小平壓根就沒有給孩子談。參閱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P4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 王力，《王力反思錄》，P1030，北星出版社，2002年。

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在軍隊文革重大問題上發揮了決定作用（“5.13事件”是一個標誌，“7·20”後“三軍無革派”則影響了全軍）；軍委看守小組轉變成軍委辦事組。在支持武漢和維護軍隊穩定的一個大旋回中，林系軍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裏坐大的局面，的確發展了。被周恩來挽回的黨政官員體系，想收回在運動初喪失的權力，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毛澤東對於群眾運動風雲人物的猶疑，也在這時發展到一個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就說過：“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裏頭。”當年五一節，毛又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存在總體失望，早在67年五一節就講了。其後，才產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傳隊和軍宣隊結束紅衛兵運動的想法。

特別是，經過了“熱月”，毛澤東9月在武漢又說：“中國歷次革命，以我經歷看來，真正有希望的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會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不明事理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即將成曇花一現了！

他一再要身邊的軍政官員告誡紅衛兵小將，現在是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武漢軍區的曾、劉首長，立即向學生們傳達了。戚本禹回憶：毛澤東回到北京，也當面向中央文革小組，再三談到他的想法，包括他認為誰算想問

題的有希望的人。而大學生們，則是到了1968年7月28日後，才慢慢明白毛主席在一年前的意思。

毛澤東想結束紅衛兵運動的徵象，從“武漢事件”以後業已明顯出現。他感到依靠群眾造反的大民主來改革我們這個政治體制，時間並不成熟嗎？周恩來通過一系列促進大聯合，審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員會，落實幹部政策，加快了收斂與結束文化革命的步驟。不過，儘管出現“熱月”，王力被軟禁，周恩來保持著當年中共中央對武漢事件的基本態度，並不因為王力而禍及武漢；他也對武漢造反群眾充滿熱忱，幫助和調教他們，他審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吸納了一批激進的群眾組織成員。或許，湖北的造反群眾嘗到熱月的苦果，推遲了一年。

8月4日，毛澤東與江青寫信要求“武裝左派”，整整一個月後，中央頒佈扭轉形勢的“九五命令”，並由同一個江青出面講話，動員群眾，從自以為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造反派手裏收回流散的武器。輿論一再宣揚“大聯合”和成立革命委員會，驅使學生們回到學校“復課鬧革命”。

不過，文革的急劇轉向，文革小組激進文人的更迭，在兩派鬥爭激烈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414總部某些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麼，他們提出文革的航船轉向了，毛澤東掌舵繞過了暗礁。進而，在9月14日、17日接連拋出大字報攻擊文革組長陳伯達，指責中央文革小組推行極左路線。“武漢事件”後還沒有來得及系統概括的問題，似乎得到了過敏的反映。事件開始得到了它的另方面的精神成果。

廣大群眾還沉浸在熱潮與欣喜中，確實並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經轉向了。

已經40年了！似乎仍然難以理解它——緊接著一個震

驚中外的事變之後，文革歷史發生的轉折性變化。

畢竟，“**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文革歷史而言，這裏的“不能隨心所欲”，包括廣大熱心投身於運動的各派群眾，也包括“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當年熱忱支持文化革命的群體，以及實質上反對運動的群體的言論行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影響和干擾了毛的理想化進軍，歷史就這樣順著政治合力方向前進。而這是個人民群眾和他們的領袖共同在創造的歷史。

2006年春 節 初稿

2008年五一節 修改

附錄 1

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二八聲明）

（載《長江日報》1967年2月8日第一版）

我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處在一個激劇鬥爭的過渡階段。以王任重、張體學為首的湖北黑省委更加瘋狂地颯起經濟主義妖風，極力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他們轉入地下，躲到幕後，驅動嘍囉，勾結一切牛鬼蛇神，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陣綫內部製造反對派，扶植托洛茨基及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分子，實行腐蝕侵襲，軟硬兼施，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內外夾攻，挑起混戰。最近，正當“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偉大革命運動席捲全國全省的時候，而以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某些人為首，却把矛頭對準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他們充當了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起到了“職工聯合會”所不能起的作用。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進行無理攻擊，否認其革命大方向，公開挑起分裂和混戰，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反撲。他們還拼湊了一個烏七八糟的大雜燴，策劃了一個形“左”實右的假奪權。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認為有必要就目前局勢發表聲明。

武漢地區目前所發生的圍攻工人總部、猛轟“九·一三”戰鬥兵團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綫鬥爭的反映。

現在，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以王任重、張體學為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混蛋退居幕後，操縱一些所謂“造反”組織，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

毛主席教導我們：“決不可以認為反革命力量順從我們了，……他們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圖就不存在了。決不是這

樣。”他們決不甘心失敗，他們必然地要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這種鬥爭的新形勢新特點，就是王任重、張體學利用其爪牙走狗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夥同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應打入革命造反派內部，配合各種機會主義分子，利用個人主義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記階級鬥爭，忘記為黨奪權的糊塗蟲，馬大哈，還騙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眾，糾集了一個圍剿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大雜燴，他們從去年十月份開始，就逐步結合成了托派小聯合，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

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發生了，一種值得人們深思的嚴重情況出現了。那些在標語、廣告和喇叭裏叫喊反對經濟主義，叫喊“抓革命，促生產”叫得最響的人，他們本身就是王任重、張體學用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豢養的哈叭狗，它在“職工聯合會”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瘋狗落水後跳了出來。就是這幫東西，對泛濫經濟主義，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罪魁禍首王任重、張體學不揭露，不批判，不鬥爭，不採取行動。反而架起一百二十門大炮，猛轟工人總部、猛轟“九·一三”，搞什麼反對工人總部的“經濟主義”，妄圖把工人總部整垮，妄圖把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聯合、大奪權的鬥爭，把反對湖北黑省委的經濟主義，把“抓革命，促生產”的當務之急，引向革命群眾之間的糾紛。他們到處亂跑，到處亂說，到處亂寫。極力造謠、誣衊、中傷工人總部，胡說什麼工人總部的領導集團“修”了，揚言與工人總部誓不兩立，有我無你。北京南下中的一小撮壞蛋與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傢伙們互相呼應，狂妄地叫囂要砸爛工人總部。真是欺人太甚，猖狂至極！他們已經撕下臉皮，公開同以王任重、張體學為首的湖北黑省委，同以武漢“職工聯合會”為首的保皇黨徒坐在一起了，他們還公然叫嚷，要我們搞什麼全民“整風”，叫我們下臺。見你們的鬼去吧！收起你們的破爛！目前，我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下所開展的整風運動，應該是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學習毛澤東思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糾正各種錯誤思想，健全各級領導班子，組織好革命造反派隊伍，更高舉起“造

反有理”大旗，大鬧武漢三鎮，大鬧全湖北。而決不是整天賠禮道歉，決不是糾纏于繁瑣闢謠，決不是整掉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不能允許那些口蜜腹劍的傢伙妄圖把我們整得萎靡不振，垂頭喪氣，置我于被動，轟我們下臺。誰敢這樣幹，就把他揪出來，砸爛他的狗頭！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極少數半路出家的投機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營壘的那些壞東西，現在把手伸得老長老長，糾集一幫烏合之衆，排斥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分裂革命造反派陣營。他們居心險惡，把大印一搶，名曰“聯合奪權”。然後，恬不知耻地擺出一副“革命造反”的祖師爺的架勢，對我們呵斥到：“不准動，不准你們爭權奪利！不准你們鬧分裂！”啊呀呀，好一副神氣姿態！我們呼籲一切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同志們，千萬不要上當。我們決不爲個人和小集團爭權奪利！但是，我們要爲毛主席，爲黨，爲人民誓死奪權！目前發生的一系列情況集中到一點，就是王任重、張體學通過他們的“造反”奸賊對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實行反奪權。我們能允許他們這樣幹嗎？不能，絕對不能！我們在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圍攻中殺出來，就是爲了奪權。今天，我們更要乘勝前進，以百倍的造反精神奪權！奪權！！奪權！！

我們最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文中曾經嚴肅地，全面地，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統一論，就是全國人民的統一論，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統一論。這種統一論是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只有進步才能團結，只有團結才能抗日，只有進步團結抗日才能統一。這就是我們的統一論，這就是真統一論，這就是合理的統一論，這就是實際的統一論，那種假統一論，不合理的統一論，形式主義的統一論，乃是亡國的統一論，乃是喪盡天良的統一論。他們要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消滅，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滅，以便統一于國民黨。這是陰謀，這是藉統一之名，行專政之實，挂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一黨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耻事。”毛主席提出的這條方針就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統一論，就是我們無

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總綱領，就是我們在毛主席革命路綫指引下建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統一戰綫的基本原則。

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必須注意，不要因為有人指責我們爭權奪利就縮手縮腳，不要因為有人咒罵我們想獨攬大權就心怯手軟。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應當明確，我們決不能把“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同資產階級的謀權篡位、爭權奪利混為一談。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頑固分子及其追隨者看來，他們的“奪權”就是看誰的手腳快，心眼多，奪得大印的便是王，搶不到大印的靠邊站。他們企圖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拉向反面，為資產階級復辟效勞。他們的“奪權”，不是為了把資產階級當權派鬥倒、鬥臭、鬥垮，而是為了維護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統治；或者為了他們自己爬上臺，建立復辟資本主義的新機構。他們奪權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老子說了算，揮“權”如兒戲，發號施令，登報揚名，濫印傳單，愚弄人民。當前，在他們策劃分裂造成混戰的假奪權陰謀的流毒下，致使經濟主義泛濫成災，生產幾陷癱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同他們相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綫最忠實的執行者，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要當仁不讓地奪權，掌權。在這個問題上千萬不能縮手縮腳，不能心軟，不能有半點的折中和調和。有人叫嚷說我們“野心大”，公然咒罵我們“純血統”，“手伸得長”，“老子天下第一”，“大國沙文主義”等等。我們認為，凡是出自敵意的攻擊，我們就要堅決還擊！但是，來自同志的善意批評，我們就要虛心接受；那些挂著“革命造反派”的招牌，推行機會主義，實行托派路綫的混蛋們，野心大得很，手伸得長得很。因此，我們的“野心”還要再大些，我們的手伸的還要再長些，否則，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就要滅亡！這是極其殘酷的階級鬥爭，不能有絲毫的庸人觀點，不然，腦袋被別人搬了家自己還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天來，“九·一三”戰鬥兵團正遭到托派瘋狂的圍攻和內部瓦解，這是以王任重、張體學為首的階級敵人對無產

階級革命路綫的新反撲！這就是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階級敵人慣於聲東擊西，妄圖各個擊破。他們在開黑會，整材料，千方百計挖我們的牆角。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嚴重注意。對托洛茨基派必須全綫反擊、迎頭拼殺。

在目前的形勢下，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要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要採取果斷的決策和具體措施，高舉“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的大旗，高舉“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大旗，向托洛茨基主義及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發動總反擊，大清算，在鬥爭中不斷壯大左派，團結群眾，爭取多數，孤立頑固勢力，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向以王任重、張體學為首的湖北黑省委發動全面的總攻擊，自下而上地大奪權。

當前，湖北省武漢地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還不深不透，反革命經濟主義泛濫還很嚴重；儘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努力下，正在扭轉局勢，開始掀起抓革命、促生產的高潮，但是湖北省的大聯合、大奪權還面臨著托派的大分裂、假奪權的威脅。總之，湖北省武漢地區沒有亂透、還沒大亂。所有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要緊急動員起來，行動起來，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決不要陷入反革命的分裂混戰。我們就是要把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白色恐怖下的鬪勁拿出來，把我們在反革命圍攻中的造反精神發揚光大。丟掉幻想，投入戰鬥，在四面圍攻、內外夾擊的戰場上，看准方向，殺出一條血路來！

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我們要繼續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子彈上膛，刺刀上槍，朝著以王任重、張體學為首的湖北黑省委衝啊！

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工人總部

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

後字二四八部隊紅色造反野戰軍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澤東思想紅衛軍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委員會

毛澤東思想紅工兵湖北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

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

毛澤東思想紅教工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澤東思想紅教工武漢中等學校革命造反總部
《長江日報》毛主席路綫戰鬥兵團
北航紅旗戰鬥隊駐漢聯絡站
西安軍電（臨）駐漢聯絡站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駐漢聯絡組

1967年2月7日

附錄 2

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嚴正聲明（二一八聲明）

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革命左派大聯合、大奪權的一個新階段。“一月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震撼世界，革命形勢大好，好得很！武漢地區由于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相互勾結，玩弄各種陰謀詭計，進行新的反撲，以致破壞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大奪權的鬥爭。在這個時候，《長江日報》2月8日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這個所謂“聲明”，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這個所謂“聲明”，是與《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所指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的大方向背道而馳的。這個所謂“聲明”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進行策劃的，是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堅持把鬥爭矛頭指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堅決捍衛“三結合”的正確方針。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絕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一切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必須提高革命警惕，加強團結，堅決粉碎一切製造分裂的陰謀活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鬥爭中老老實實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別要學好“老三篇”、“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等光輝著作，不斷整頓思想，整頓隊伍，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奪自己頭腦裏“私”字的權，大立毛澤東思想，一心為公，為大聯合、大奪權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礎。必須堅決徹底地批判和克服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非組織觀點、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錯誤傾向。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偉大領袖

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重大方針和“要節約鬧革命”的偉大號召，保證工礦企業正常生產，保證各行各業服務正常。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無產階級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工具。最近，偉大統帥毛主席向全軍發出偉大的戰鬥號召：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我武漢部隊廣大指戰員滿懷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激情，最最堅決地執行最高統帥毛主席的一切命令，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地徹底地粉碎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瘋狂反撲，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長江日報》在2月9日社論中提到，《長江日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支援下，已經順利地回到了廣大讀者手裏……”。這裏必須嚴正指出：2月9日，我們部隊去紅旗大樓，是爲了維持秩序，防止武鬥，絕不是支持《長江日報》發表的那篇所謂“聲明”，這完全是兩回事。至於後字二四八部隊紅色造反野戰軍在“聲明”上簽字，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組織，不能代表武漢部隊，更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特此嚴正聲明。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萬歲！

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

1967年2月18日

附錄 3

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通告（三二一通告）

當前，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新階段，形勢很好。但是，階級敵人決不會甘心滅亡，他們正在糾集各種反動勢力，妄圖進行垂死掙扎。

“武漢地區工人總部”成立以來，在少數反革命分子操縱下，與湖北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互相勾結，幹盡了壞事。他們竭力封鎖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反對毛澤東思想。公然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把矛頭指向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指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指向革命的領導幹部。拚命反對革命的“三結合”，到處單方强行奪權，實行反革命復辟，肆意違抗“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大搞反革命經濟主義。他們的滔天罪行，已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極大憤慨。

爲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保障“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的順利貫徹，保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行，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若干規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要求，特宣布從即日起，“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一律解散。現將有關問題通告如下：

一、對這個組織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後臺，採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立功贖罪的政策，區別對待，徹底查處。

二、這個組織中的一小撮反革命頭目，凡自動投案，徹底坦白認罪者，允許他們改過自新，立功贖罪，給予從寬處理。抗拒、破壞和畏罪潛逃者，予以嚴懲。

三、參加這個組織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換姓名，偽造歷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群眾組織，如有破壞行爲者，要依法嚴辦。

四、這個組織中的群眾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一律不予追究。他們應當迅速醒悟過來，自覺地與其反革命頭目嚴格劃清界限，積極揭發和控訴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真正回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上來。各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對他們應當採取積極熱情的態度，團結、教育、幫助他們，歡迎他們參加革命群眾組織，一道進行革命。

五、一切革命職工、革命幹部，要最熱烈地響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關於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更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成為現階段全國勞動群眾抓革命、促生產的最出色的模範。

一切群眾組織，一切革命同志，廣大民兵和我部隊全體指戰員，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行動起來，與專政機關密切配合，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壯大革命左派隊伍，爭取團結大多數，儘快地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完成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偉大戰略任務，為爭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而共同奮鬥！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萬歲！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

1967年3月21日

附：“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一、“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壞分子當權，大肆網羅牛鬼蛇神。這個組織“總部”的九個頭目有四個原來就屬於壞分子，有的被判過七年徒刑；下屬的“分部”、“兵團”的頭目，不少的是

地富反壞右分子等牛鬼蛇神。“市電信局分部”控制要害部門的三十八人，全係國民黨員、偽軍官、特務、地主、封建把頭、右派分子等社會渣滓。

二、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中的反革命分子，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控制起來，名曰看管，實為保護，并且製造事端，蒙騙群眾，搞假奪權，企圖保住他們所篡奪的黨、政、財、文大權，繼續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革命統治。假奪權的陰謀被粉碎以後，又精心策劃，掀起一股新的反革命逆流，把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革命派，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和革命的領導幹部，繼續進行垂死掙扎。

三、反對毛主席，衝擊中南海，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宣揚“懷疑一切，反對一切”的反動論調，并且公然聲言對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也可以懷疑”，“也可以反對”，公然呼喊毛主席親自批發的“軍委的命令是黑指示！”他們叫嚷“向中央‘將軍’”，兩次衝擊中南海，揚言要“揪陳伯達回白石橋辯論”；糾合二百多人，圍住中南海大門，高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并揚言要把衣服脫光，赤身睡在大門口，非要毛主席、周總理接見不可。他們要周總理派飛機，未達到目的，就誣衊周總理是“和稀泥，態度不鮮明”；而且還別有用心地說：“中央為什麼提誰反對陳伯達、江青同志，誰就是反革命，而不提誰反對周總理，誰就是反革命？你們要獨立思考。”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他們所控制的單位，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大肆宣傳他們的反革命黑貨，公然封鎖毛主席的聲音，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

四、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陰謀武裝暴亂，妄圖奪取軍權。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毛主席親手締造的人民解放軍看作眼中釘，肉中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明目張膽地把武漢部隊當作他們的“四大敵人”之一。他們惡毒地誹謗、咒罵、醜化、攻擊我軍，說“武漢部隊黨委是黑黨委”、“武漢部隊是黑省委的看門狗”、是“保皇軍”，等等，敗壞我軍聲譽，離間軍民關係；

圍攻、綁架我軍人員，扣押、破壞我軍車輛，公然呼喊“絞死武漢部隊”、“打倒武漢部隊”、“武漢部隊指戰員沒有好下場”、“解放軍是反革命組織”等反革命口號；竊取軍事機密，衝擊軍事機關和軍事機場，搶走作戰值班日記，并强行拍照；大量印發反動組織“開封師範學院‘八·二四’”的所謂“×××副總理五點口頭指示”的反革命謠言的傳單，大肆製造奪取軍權的輿論，并和黨內一小撮壞分子相互勾結，準備啓封庫存武器，陰謀武裝暴亂，妄圖奪取軍權，搞垮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五、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反對革命的“三結合”。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著“革命造反”的旗幟，盜用群眾組織的名義，在他們所控制的《長江日報》上，拋出了反革命的宣言書“二·八聲明”，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對抗《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的精神，隻字不提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却把一些不同意他們反革命觀點的群眾組織誣衊為“托派”、“造反奸賊”、“黑省委的別動隊”，等等，妄圖把這些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并且猖狂叫囂“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接著對這些革命群眾組織發起瘋狂的襲擊，妄圖搞垮武漢地區的革命陣綫，造成混亂局面，以達到他們實行全面反革命復辟的罪惡目的。

六、強奪要害部門的大權，實行反革命復辟。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深知要奪取政權，首先要控制要害部門。他們强行奪取公安機關的大權，毆打公安人員，控制一些公安分局，掌握逮捕證，任意捕人；控制電信系統，侵犯人民通信自由，竊聽國家機密，盜走電報密碼，非法動用戰備物資，占用戰備綫路，任意扣押電報，使通信聯絡受阻，國家機密遭到嚴重損失；強奪一些工廠、企業人武部的權，啓封民兵武器。

七、進行階級報復，製造白色恐怖。這一夥反革命分子，把鬥爭矛頭指向革命群眾、黨團員、積極分子和革命幹部。說“現在的黨員，都是劉、鄧的黨員，都是修字號的”。大批地任意開除黨員黨籍，焚燒入黨志願書。他們私設公堂、監獄，肆意進行搜身、毆打、綁架、搶劫、行凶、封門、抄家、戴高帽、挂黑牌、

游街、體罰、審問、拷打等等。以抓“職工聯合會員”為名，命令所屬基層組織抓人游街，規定每個“戰鬥隊”至少要抓三至五人；僅今年1月20日一天，就抓了六千多人戴高帽游街。游街的人，大多數是勞動群眾，有些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還有十二三歲的孩子和五六十歲的老人。有的高帽用鐵皮做成，重達三十斤；有的用以鋼絲彈簧，名之曰“緊箍高帽”。他們把井岡山大樓（機電局辦公樓）的革命職工趕到馬路上辦公，用鋼板、角鋼和鋼筋焊死門窗和樓梯口，拆除高空走廊的保險欄杆，準備好了水龍帶、石灰、刀棒等器物，以對付革命群眾。他們通過各種手段，製造白色恐怖，把革命群眾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企圖趁火打劫，藉以變天。

八、大搞殘酷武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開說“工人總部是靠抓、砸、打、搶起家的”。他們的反動口號是：“不打不搶是老蔣”，“不抓不偷是老修”。爲了搞武鬥，專門成立了“敢死隊”、“夜襲隊”等法西斯組織，配帶匕首、鋼鞭等凶器，白天休息，夜裏出動。他們多次製造流血事件，嚴重踐踏《十六條》。“二·八聲明”發表後的三天內，這夥反革命暴徒就砸了某組織下屬的四十三個組織，打傷二百餘人，重傷四人，死二人；又據不完全統計，從二月八日至二月十五日的七天中，這個組織進行打砸、搶奪、圍攻、衝擊等武鬥行動一百一十餘次。嚴重地擾亂了社會秩序。

九、大搞經濟主義，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重大方針。大量揮霍浪費和破壞國家資源，煽動大批工人離開生產崗位，使一些工廠企業生產下降。這個組織的成員越多的單位，破壞生產的情況就越嚴重。××廠是“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重要“基地”之一，一月份只完成計劃的百分之四十，二月份只完成了百分之八；該廠的××車間，二月份停工二十五天，國棉×廠有“工人戰鬥隊員”一千五百餘人，脫產的約一百人，“請假”的約五百人，一月份虧損了八十五萬元。嚴重地破壞了生產。他們還到處強占公房，大肆破壞，所造成的損失無法統計。

十、竊取國家機密。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竊取了許多機密

文件和圖紙，有的還拍了照，還將一些機密資料作為傳單扔撒；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照片和資料傳往國外，外國報紙為之刊登。

“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罪惡滔天，以上所列，只是一些片斷，望各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檢舉、揭發、控訴，把這個組織中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徹底公諸于眾，把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徹底粉碎。

附錄 4

中共中央對河南軍區黨委《關於支左工作中所犯 錯誤的檢查報告》的批示及兩個附件

1967.07.10；中發〔67〕216號

河南省軍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農、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造成了部隊同群眾、群眾同群眾之間的對立。這個錯誤主要應由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同志負責。這次，河南省軍區黨委所作的關於支左錯誤的檢查比較好。我們相信，在省軍區作了認真檢查以後，廣大革命群眾是會擁護解放軍，會歡迎並支持軍區改正錯誤的。河南省委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書記處書記趙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同志，過去在河南的工作中雖然犯有某些嚴重錯誤，但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認真地作了檢查，回到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是革命的領導幹部。中央決定著手成立以劉建勳同志為首的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隊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參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全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河南各群眾組織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鬥等問題達成了六項協議，中央認為這六條協議是好的，希望各群眾組織認真貫徹執行這些協議。

附：河南省軍區黨委關於支左工作中 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

1967.06.27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軍委文革並武漢軍區黨委：

毛主席教導我們，如果有了錯誤，定要痛痛快快地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改得越快、越徹底越好，絕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堅持錯誤，越走越遠。我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打擊了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與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給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損失。我們對這一嚴重錯誤，在中央首長指出以前，沒有從根本上認識，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經過中央首長指出我們的錯誤，循循善誘，諄諄教導，才使我們逐步的醒悟過來，這是對我們政治上的最大關懷、最大愛護，使我們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實際的毛澤東思想教育。我們決不辜負中央首長的期望，堅決改正錯誤，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我們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大方向就錯了。我們對省委領導成員的情況未作全面系統的瞭解和階級分析，沒有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錯誤地把劉建勳、紀登奎同志當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將他們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組織看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組織二七公社，看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因此，我們在二月份先後錯誤地發表了《嚴正聲明》和《告全省人民書》，把鬥爭矛頭指向了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而沒有對準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報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們組織雙方代表赴京彙報，這對解決河南問題、糾正我們的錯誤，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我們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對鄭大聯

委與河南二七公社採取了壓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們的代表名額，不想赴京彙報，這實際上是無視主席、中央的指示，與主席思想是對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佈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以後，造成連鎖反應，全省各地宣佈解散了許多革命群眾組織，錯抓了許多人，打擊了革命小將，壓制了群眾運動，黨言川同學也被拘留和遊了街；社會上一度出現了肅清二七公社“流毒”，讓革命群眾掛黑牌、請罪的錯誤傾向；這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乘機興風作浪，操縱保守組織，進行階級報復，打擊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傳達貫徹了林副主席在全軍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和會議精神，中央發出了關於安徽問題的五點指示，中央軍委頒發了十條命令，這又給了我們一次改正錯誤的機會。但是我們對中央、軍委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這些重要決定，沒有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盲目自滿，自恃正確，沒有從根本上認識錯誤，把當時河南二七公社向我們的反抗，看作是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操縱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風”。所以軍區領導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眾大會講話中，又重申宣佈鄭大聯繫為非法組織“是有充分根據的，鄭重的”，並且還把這個講話登了報，這就進一步打擊了鄭大聯委，壓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們錯上加錯，越陷越深，越來越被動。直至赴京彙報前夕，才作出宣佈撤銷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決定，但只承認是作法上的錯誤，沒有認識到是根本上搞錯了。

我們在支左工作中，不僅壓制和打擊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還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別是三月份我們在急於奪權的思想指導下，沒有按照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原則，組織了幾個總部，這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很大被動。

趙文甫給軍區寫信，挑撥離間，用意極其惡毒，但我們政治上麻木不仁，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給以及時揭露和反擊。

我們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線立場錯誤，責任在軍區黨委常委，黨委書記何運洪同志要負主要責任，並應作深刻檢查。

我們所以犯如此嚴重錯誤，而且在長時間內不覺悟，不認識，不改正，根本原因是：

一、路線覺悟不高。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很不理解，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認識不足，對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始終體現著鬥爭的大方向認識不清，把本質和非本質，主流和支流的關係搞顛倒了，對他們非本質的和屬於支流的缺點錯誤看得太重了，錯誤地把他們當作右派勢力，進行壓制和打擊，自覺不自覺地站錯了隊，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二、保守思想嚴重。驕傲自滿，自以為是，固步自封，因循守舊，墨守陳規，習慣於按常規辦事，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動看不慣，甚至反感，對他們缺乏深厚的階級感情。對保守勢力在思想感情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態度曖昧。支左工作旗幟不鮮明，立場不堅定。

三、怕字當頭，不相信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黨委領導成員很少深入實際，到群眾裏面去，虛心聽取群眾意見，即使對我們所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提出的善意批評和實貴建議，也聽不進去。患得患失，不敢挺身而出，冒風險，擔擔子，缺乏勇於負責的精神。怕群眾，怕革命，怕丟面子，怕丟官，一句話就是怕革命。

四、黨委領導不力。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前，對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聞不問，很不關心，參加省委文革小組有名無實，沒有積極主動瞭解情況，因此介入後，心中無底，倉促上陣。在支左工作中，常委沒有形成核心領導力量，工作忙亂，處處應付。我們對一些重大問題，缺乏明確的方針和有效的措施。作風不民主，工作不深入，情況不明，決心不大，猶猶豫豫，朝令夕改；包辦代替，聽不進不同意見，未能充分發揮黨委的集體領導作用。

五、歸根結蒂是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不高，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樹立得不牢，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觀沒有得到徹底改造，既不能正確對待群眾，又不能正確對待自己，把

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多，把自己當作革命的對象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很好的觸及靈魂，破私立公，促進自己思想革命化。

我們所犯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教訓是沉痛的。我們辜負了最高統帥毛主席、副帥林副主席和黨中央對我們的教導和信任，辜負了廣大革命群眾對我們的信賴和期望。我們深感萬分痛心，對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黨中央，對不起河南五千萬人民。

毛主席教導我們：“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我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徹底地檢查錯誤，堅決地改正錯誤。我們一定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進一步提高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認識，徹底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堅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決心以山東省軍區為榜樣，公開向群眾作檢查，給鄭大聯委徹底平反，對二七公社堅決支持。努力做好各派群眾組織的工作，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現以左派為核心的革命的大聯合。堅決支持革命的領導幹部，促進革命的三結合。對部隊加強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路線覺悟，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努力完成偉大領袖毛主席交給我們“三支”、“兩軍”的光榮任務，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爭取革命，生產雙勝利。

以上僅是我們的初步檢查，還很不深刻，懇切盼望給予批評指示。

附：中共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的復電

1967.07.26；中發〔67〕227號

中共武漢軍區黨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時十分來電並所附武漢部隊公告全文已經收到。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一）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

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二)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五)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錄 5

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

1967.7.26

一、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時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漢市發生了衝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派來武漢處理文化大革命問題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謝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紅旗》雜誌第一副總編輯王力同志的住地的嚴重政治事件。謝富治副總理遭到推打、圍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員張根成同志和北航紅旗的革命小將遭到綁架和毆打。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此後，還發生了圍攻、毆打、綁架《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記者以及圍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嚴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參加這些事件的幹部、戰士和群眾是受蒙蔽的。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幹部、戰士和群眾，一定要迅速猛省，堅決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二、我們軍區領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尤其是陳再道對上抵制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領導，對下壓制打擊群眾意見。長期地、頑固地堅持錯誤，以致發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黨中央、反中央軍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〇”叛變事件。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對我們所犯的錯誤，我們將迅速作公開檢討，並堅決、徹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做好“三支”、“兩軍”工作。過去受我們所犯方向、路線錯誤影響的群眾和幹部，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責任由我們來負。你們

應當迅速地覺悟過來，向我們的錯誤作鬥爭，堅決地向革命造反派學習，向革命造反派靠攏。

三、立即為“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鬪將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為他們恢復名譽。堅決支持“工人總部”的革命行動，積極幫助其恢復、發展和壯大隊伍。

四、堅決支持“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三司革聯”、“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堅決同他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我們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的廣大指戰員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無限信仰、無限熱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誰反對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誰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我們就堅決打倒誰，不管他資格多老，職位多高，我們一定和他拚到底。我們是作好了一切準備的。任何反撲都必將為我們無限忠於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工、農、兵革命群眾所徹底粉碎！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陶鑄！打倒王任重！打倒陳再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光焰無際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附錄 6

**在《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
稿中所加的一段話**

毛澤東 1967.07.25

黨中央號召：犯錯誤的人們覺醒過來，只要他們能夠認真改正錯誤，取得革命群眾諒解，這種人還是好的。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

1967.07.27

武漢市英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的工農兵，一切忠於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忠於我們偉大的黨的事業的指戰員們！

近幾日來，你們為著保衛毛主席親自領導、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出非常巨大的業績。

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

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

我們毛主席、黨中央為解決武漢問題派出的代表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們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他們已經勝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夠遵循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指導的軌道上前進。

武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現著一個新的勝利的階段。

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凱歌正在鼓舞著全國。

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

當然，你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困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妄圖垂死掙扎，還妄圖鎮壓。因此，你們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們要善於團結一切群眾。

你們要善於啟發、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過去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或群眾組織，只要他們一旦覺悟，願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都要歡迎他們，並肩戰鬥。

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解散“工總”這個革命組織，並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們逮捕很多革命組織的群眾，也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這些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應當堅決平反，一律釋放。

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他們利用“百萬雄師”的一些受蒙蔽的群眾，用造謠欺騙的手段，顛倒黑白，把他們引入迷途。

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竟然採用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

這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造成的嚴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漢市的廣大革命群眾和駐軍廣大指戰員的無比憤慨，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嚴正譴責，遭到了全國陸海空三軍的強大反對。

他們已經陷入億萬軍民憤怒聲討的汪洋大海之中。

對於策劃這一嚴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壞人和打人兇手，必須立即追查，依法查辦。

武漢市的一系列革命組織，工總、二司、九一三、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革聯等革命群眾組織，堅決保衛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保衛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你們做得很對，做得很好！武漢市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鬥爭絕對不是孤立的，勝利一定屬於你們，屬於廣大的工農兵和革命知識分子，屬於我們的偉大的黨，屬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屬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

黨中央號召：一切受蒙蔽的群眾，應該迅速覺悟，改正錯誤，回到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同革命群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徹底揭露“百萬雄師”“公檢法”中一小撮壞頭頭和武漢軍區內個別壞人的陰謀活動。

黨中央號召：犯錯誤的人們覺醒過來，只要他們能夠認真改正錯誤，取得革命群眾諒解，這種人還是好的。

黨中央號召：武漢地區的農民群眾，千萬不要上壞人的當，不要進城來干涉工人和學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黨中央號召：武漢駐軍廣大指戰員，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支持和保衛左派廣大群眾，同他們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武漢事件，對全國革命群眾，是一次最生動的階級鬥爭的教育，是最深刻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條路線的教育，它必將廣泛地動員全國人民的革命積極性，把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向武漢的廣大革命群眾致敬！

武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戰無不勝的、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

附錄 8

1967年陳再道同志的檢查

向毛主席請罪！

向大家請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執行了劉鄧路線，以致造成了罪過。我犯這麼大的罪，這麼大的錯誤，毛主席還一再寬大，教導，還希望我回頭，不要堅持錯誤，認真的改正，取得廣大群眾的諒解，還可以站起來。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學習，重新革命”。黨中央、中央文革對我也是不斷教導，也是很寬大，又把我送到學習班來，來接受造反派和幹部對我罪過的批判，鬥爭也好嘛。都是對我很大的幫助，我以前總是有僥倖心理，認為錯誤不是那麼嚴重，也有一些錯誤的想法。所以，我應該低頭認罪，好好認識自己的錯誤，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重新革命。在我來說，就是重新做人。我這個人，已經是敵人了，已經壞了，修了，應該是重新做人。脫胎換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請罪，向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文革請罪，向武漢部隊的指戰員請罪，向今天在座的幹部和造反派請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還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導，還想我真心的回頭。所以，我現在講三個問題。

一、我犯罪的主要罪惡事實

我已經是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我的總暴露，我長期以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蛻化變質，第二部分我再來講（犯罪的根源）。

（第一）我養病休息一年多，去年九月回來，回武漢，回來就參加省委會議，我就參加了文化大革命，自己本來以前就是修了的，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回來也沒有很好學習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針，對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領導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的偉大意義不理解，一些政策、方針也沒有學習，領會。一回來，因為我是省委常委，就參加常委會，就聽張體學的，就跟張體學在一起了。我自己已經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一參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右的方面參加的，一參加就站到省委一邊去了，站到這個黑省委的反動路線一邊去了。保省委，說省委有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基本上還是正確的，總是在那裏幫舊省委定調子，幫助張體學，說你們不要去活動（這也是幫助他）；要做的好看一點，隱蔽一點，都是站在省委這個反動立場，不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一方面，堅決去向省委進攻，而是站在省委方面，怎麼對付革命派，怎麼樣應付革命派。那時，革命派在省委絕食，送飯不吃，還照下相來。省委提出“高姿態，軟辦法，真狡猾，難對付”，這些反動的東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都是打擊對付造反派的，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我跟張體學，他叫我就去，通知我開了四次大會，都是保守派召開的大會。一次是武大，名義是紀念毛主席觀察的，九千人的大會，我去了，這一次，我還講了話，當然是講意義了，也講省委沒有大問題。一去就是保省委，鎮壓造反派的，因為我們還是以解放軍的名義嘛，玷污了解放軍的名譽。省委禮堂歡迎南下學生，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這個會我也參加了，這是一次。再有湖大保守派，開會紀念國慶，又說是發毛主席著作，這是在湖大禮堂開的。我參加了四次大會，很積極，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鎮壓造反派，壓，幫助省委塗脂抹粉，包庇，助張體學的威。多次參加省委的常委會，對付造反派。一次說報社被封，要撤職幾個，罷官幾個，我說要停職就停幾個，先拿下來，以後再拿上去，這都是給省委出謀獻策，搞不出革命的東西。幫助省委搞檢討，檢討一下就行了。討論檢討開了兩次會，保張體學，借房子給他住，把濱江飯店借給他們，開了幾天會，還準備把洪山房子借給他們辦公，幹什麼？就是把他們藏起來，掩護，保這個黑省委，支持他們的反動路線。站到省委這個反動立場上去了。

保王任重。王任重本來是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江青同志

早已說他是個黑槍手，點了，我以前不敢點他的名，只是他錯誤嚴重，批判了以後再講，將來看他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十二月，造反派從廣州把他揪到武漢來，我還叫韓東山到飛機場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問好！這是什麼立場？資產階級立場嘛，看這個鬼啊！他是敵人嘛，還是保他，助他的威。三月，王任重寫信，當然也給了中央，也寫給我、韓東山、姜一，要轉給省裏幹部，那個信就是抱著成績不放，什麼檢討？就是自己過五關斬六將，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自己有錯誤，但不是三反性質，說湖北要是反革命領導，能夠增產，能夠搞好？那不是劉少奇的理論，信上都有。我們以後把這個信打印發到省直，我們沒有組織批判，這不是保他？

而且我們給他寫了個信，也說他這個檢討，抱著成績不放，很不深刻，沒有觸及靈魂。寫這個信，還寫了個“同志”，這是明目張膽地保王任重。這個時候應該知道麼，為什麼還寫個“同志”，所以，這是個立場問題，站到他那個立場上去了，沒有站在革命的立場。站在革命的立場，他是個敵人，就應該和他堅決鬥爭，應該揭發他，應該鬥爭他。所以，我保省委，保張體學，保王任重，參加了一些活動；起了極壞的作用，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動立場上，來對付造反派，幫助省委出謀獻策。跟省委一起堅持反動路線。這是我九月份回來後，到一月這個階段。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鎮壓革命造反派

一、二月會議以後，這個階段。這次會議，貫徹的就是自己的，亂用八條來鎮壓革命。為什麼鎮壓呢？因為我已經是個資產階級分子，已經蛻化了，已經很多問題了。李迎希起來，李迎希和造反派結合在一起，有些聯繫。司政機關起來了，自己過去有一些錯誤，腐化墮落，生活糜爛，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陳伯達同志指示的，舊的很多，歸根到底就是怕群眾，就是怕革命。我就是這樣的人。怕把自己醜惡的髒東西搞出來，暴露在群眾的面前。所以就藉口穩定部隊，抓革命生產促生產，藉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擊造反派。總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

怕革命，到反革命。這次回來什麼不做，在北京就準備說李迎希、張廣才是野心家，要奪軍權，要把軍隊搞亂，活動了許多造反派，衛校啊，高級步校啊，文藝團體，凡是接近他們的，談過話的，就說是有問題，亂污蔑，就說政治不純是混進來的。藉公安六條，其實不是那麼回事，認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時就認為軍隊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風，過去的保守派沒有反對我們的，那是好的，反對我們的，反對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擊，有“我”字，自己已經成了修正主義，那麼壞，還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對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氣又恨，就是要報復。藉著李迎希這個東西，來打擊造反派，藉著李迎希，藉口穩定內部，部隊不能亂，部隊要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要隨時保持警惕，藉著這個東西來鎮壓革命，解散組織。在生產方面，藉口生產來壓革命。生產要抓，現在春耕季節來了，自己就赤膊上陣，有幾次我就親自抓人。高級步校副校長，我就抓起來了麼，衛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團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圖，在這個整個反動路線下面，實行白色恐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在軍內捉了兩百多，那時候說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來。“十六條”上說什麼樣人都不能捉抓，就是右派有問題也要在運動後期處理，所以違反了“十六條”，違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是劉少奇、鄧小平那樣子，就是毛主席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打劉少奇的司令部，我們那個司令部，以我為主也是那樣子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調兵遣將，用部隊。那樣怕，完全不是那個情況，你現在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你是真正革命的，那問題就好說得很麼。你站在反動方面就看著他不好，要革你的命。所以現在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看，我們那時候完全是執行了劉鄧反動路線，完全是採取白色恐怖，鎮壓，很惡劣，很毒辣，反革命很堅決。因為我們玷污了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指揮的，有崇高的威信。我那時候就是修了的人，還沒有暴露。所以，以後就鎮壓的更利

害，就是在這些藉口下面：李迎希要奪權啊！野心家啊！張廣才啊！所謂穩定部隊啊！促戰備對付帝國主義啊！這都是假的，就是為了對付革命，為了自己執行反動路線，鎮壓革命，打擊造反派，報復。抓革命促生產啊！實際上就是乘這個機會搞“抓辦”。因為這個“抓辦”將來幹部好，就是準備搞三結合的。把壞人也搞進來，鎮壓革命，鎮壓的學校多了，還有北京管理的九個學校也採取了，這樣辦法，藉口要支援北方，趕快搞整風，整風九天，總想趕快把革命鎮壓下去，打擊下去，不是就沒事了嘛！不打下你了嘛！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誰個要革我的命，要打倒，就是有氣，就想辦法要整。依照我們那樣子，國家就不革命，資本主義就復辟了，就是我們復辟了。因為你就是資產階級分子麼。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幾十個組織，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再就是處理李、張，什麼政治扒手啊！什麼野心家啊！處理張竟的問題，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來，他們很好麼，就是過去他跟李迎希他們說了一下，現在看，說得對麼，說有兩條黑線，軍區一條，省委一條，這就是兩條黑線麼，這樣就說他們不尊重領導，也是有野心，所以要停職反省，這都是我親自做的。開會，我親自參加的。為什麼這樣做呢？這些人就是反對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滿，就是報復，就是要整。參加省委大會，抓革命促生產，想搞生產高潮，鬼！那全是假的，就是藉口這個東西開上層會議，就是光開那些當權派的會議，在省委開的有百把人的大會，在體育場開了三萬人的大會，都是機關、省直、市委各個戰線上的，各行業的當權派。這些會議我們的講話，拿這個生產來壓革命，歪曲事實，思想上就是還正在鬥和還沒有鬥的人，給他們打氣，向造反派示威。把一些當權派塞進來張旺武、閆鈞、姜一、夏世厚都塞進“抓辦”，這些名單我在北京還是跟張體學商量提出來的，這不是有鬼啊！原封不動，還革什麼命啊！把舊省委那些人搞出來復辟，把一些當權派，有嚴重問題，像張旺武是歷史上自首了的，我知道，就是說過去由省委解決了問題的，是什麼人解決的？是舊省委張體學、王任重解決的，到底是怎樣解決的，自己就是認為過去歷史問題解決了。

都把這些人拉出來，塞進辦公室，不經過造反派，也不經過群眾，這我們的罪多大啊！所謂成立“抓辦”，以後，周總理去時，說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武漢的抓辦，人武部領導的抓辦，支持保守派，打擊造反派，辦反革命事情，這都是在我的意圖，思想指導下面一系列都是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為了自己不革命，那裏有反對就採取報復。

批判“二八”聲明，錯誤的批判“二八”聲明，“二八”聲明批判的時間那麼長，已經是挑起群眾鬥群眾，什麼香花派，什麼毒草派，已經把保守派勢力搞了起來，跟造反派鬥爭，打擊鎮壓造反派，特別是對於二司，打擊二司，打擊工總，為解散工總加罪名。還拉三新，說支持你，他們那個時候同意批判“二八”聲明麼。不是真支持，就是利用，挑起幾派鬥爭，鎮壓真正造反派，為取消工總作輿論準備。不管批判“二八”聲明怎麼樣，我負責，起了這麼樣壞作用。“二八”聲明有什麼錯誤？我們用解放軍的名義，用毛主席締造是人民解放軍在群眾中的崇高威信來批判，這對革命派的打擊是多大啊！

扶植保守勢力，扶植三字兵，這個大專院校三字兵，中等學校的三字兵，都是保舊省委的。已經幾個月的鬥爭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如果我們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徹底地爭取瓦解、分化、那武漢的形勢就不同了。我們承認它的組織，把它又恢復了起來，所以造反派二司、三新都說三字兵恢復，表示反動路線的猖狂，我們就是站在劉鄧反動路線上，又把保守派勢力扶植了起來。過去他保省委，以後又扶植起來保我們。在北京打電話說瓦解，說了又後悔，就是要團結、教育、提高，准許人家革命。保守組織應該堅決瓦解，這才是革命的立場。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看他們保軍區，保我們，所以就親熱，就扶植，把它重新組織起來。說他幹部子弟多。這是我們執行反動路線，站在資產階級立場。這個觀點，我們從過去那個舊省委把它接過來了，還變本加厲了，比他們鎮壓革命，鎮壓造反派還厲害，為什麼呢？他們辦不到的我們辦不到了，我們玷污了毛主席締造的人民解放軍這個榮譽，這個威信。自己是個修正主義分子，自己不革命，

利用這個東西來打擊。所以，總的來說過去那個舊省委做不到的事情，起不到反動路線的作用，我們起到了。我們玷污了人民解放軍的威信，比過去的省委還厲害。我這個資產階級路線，造成的惡果損失，比過去那個舊省委還大，還惡毒，更厲害，你帶槍嘛，有槍桿子麼。

發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總，這是發展到了高峰，把工人總部這樣大的組織解散了，也不調查，也不研究。報告報了，沒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總，抓了工總的負責人。那個十六條、八條上說的是個別的，證據確鑿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誰個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對麼！我們採取大批捕人，解散工總，當然材料整了，我點了頭麼，說材料看不看，誰看那麼多。說照公安六條做是對的，對個鬼啊！一個都不對，就是反動的，你站在資產階級方面，鎮壓無產階級，鎮壓革命，那你說的對羅，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無產階級方面看，那就是反動透頂，那是實行白色恐怖。點頭之後，準備汽車，牛懷龍獨立師，還把羅孟剛叫來，叫後勤出汽車，先說抓二百，抓三百，結果一夜抓了四百七。這是什麼革命啊！這完全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專政。不管情況怎麼樣，這個罪我應該負主要責任。是你這個反動路線，是你點了頭麼。就是你幹的，也不要推誰麼，就是我的罪麼。我們抓的這些人，現在看來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加緊批判“二八”聲明來壓工總，解散工總來壓二司，打擊造反派，一系列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拉一派，打一派，撥弄是非，就是想把造反派一個一個的打下去。這是二月會議後，在武漢鎮壓，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破壞的時候。

第三，軍委四月會議以後，這是我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十條命令、江青同志講是愛民的，就是要糾正錯誤。我們參加這次會議，一個是討論十條，一個是接受教訓。要轉變麼。毛主席講糾正錯誤發揚成績，有錯誤就趕快改，改的越快越好。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許多教導，都沒有聽進去。十條革命就是好啊。好啊，內心裏這還得了啊，又要來衝啊，又要搞亂啊，自己做的這些罪惡事實，怕人反攻。不執行十條命令，不貫徹，

不討論，不認真執行，不檢查方向路線錯誤。已經早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就是不承認方向路線錯誤。在內部也不說，在外部更不說。工總不平反，抓的革命群眾也不放，組織也不恢復。說的要平反，要趕快放人，我們就是不堅決，放一點，留一點，說什麼嚴重的不能放。有什麼嚴重問題啊。就是繼續頑固的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繼續對抗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路線。拒不執行十條，不檢查錯誤，工總不平反，抓人不放，組織不恢復，變本加厲，放一點人，恢復一點。說過去解散是對的，現在恢復是對的，放個鬼啊！過去就是錯的，就是繼續反動路線，不公開在群眾中檢討，承認錯誤，更沒有決心發動群眾來批判自己。

鍾漢華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義向家中打電話，說江青同志的四點指示，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什麼工總不翻案，保守勢力大方向是對的啊。這個極端錯誤的東西，害了下面，欺騙了廣大群眾、幹部，江青同志批評我的“藉勢壓人”。我們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檢查。回來，作為我來說應該提出這個錯誤，這是造謠，對這個東西應進一步消毒，我沒有做，那你為什麼不做啊？因為他說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動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動思想，因此，回來也是這樣做，工總不翻案，我們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三字兵大方向是對的。那時，百萬雄師還不多，因為自己是這個反動思想，就不可能進一步去處理這個東西，並不是什麼自己忘記了，自己沒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這些反動的東西合乎自己。回來後，言論、行動還是那些東西，這是我們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義，這個就不同了，這是個大罪過，欺騙人哪！盜用江青同志名義，蒙蔽人，下面當真的，還有什麼懷疑的。所以，這個惡果是很大的，這個罪責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員，也不應該顧及，要好好把這個東西收回，公開闢謠。沒有這樣做。

在三級幹部會議上，我作了個總結，繼續堅持錯誤。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報告，也是錯誤的。錯誤的分析形勢，歪曲事實欺騙上級，打擊造反派，這個問題，就是我堅持反動路線發展到了最高峰了，那個時候，把等待他們覺悟，一面鬥爭，一面團結，那個團結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譚”，什麼陳再道，

“打倒陳大麻子”就是有氣，心裏惱火。對三新、二司就是想辦法報復。所以這個總結就是把反動路線更系統化了，形成了反動的藉口的綱領。以後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據這個精神，我們整個黨委也是這個精神。這是我們定了調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二八”聲明沒有錯，應該麼，解散工總沒有錯，不能恢復麼。造反派大方向錯了，我們大方向是對的，他們背離了毛主席思想，我們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種反動的論調。說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我們是對的，我們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錯誤的說成是好的，把好的說成是錯的，把革命的說成是壞的，把我們的反革命說成是革命的。所以這樣一系列，還加上我們政治部發了一個通知，說陳、鍾不是三反分子，誰要喊打倒陳、鍾就抓起來，所以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過最大。我聽到了沒有，聽到了，那時孔慶德在那裏講，說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時也認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聽了就很順耳。因為自己總是堅持反動思想，聽了洋洋得意，不會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自己認為自己是革命的，其實自己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給毛主席、中央的報告和會議總結，提出他們大方向錯了，說孟夫唐、劉真站過去了，說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復辟，把種種罪名加到造反派頭上。這時，真正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說，我們已經是資產階級當權派了，百分之百，一點不假。而且還說他們被孟夫唐操縱了，是一股逆流，搞資本主義復辟，把鬥爭矛頭指向造反派。這個時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鎮壓革命的罪魁禍首，自己是個資產階級當權派，自己把過去省委的那一套接過來了，變本加厲了，自己這個反革命分子，還在那裏指手畫腳地說造反派這不對，把一切罪名鬥爭的矛頭加到造反派身上，這是污衊革命派。是千方百計地來對抗造反派。這個時候革命派同我們鬥爭，這是完全對的，你老堅持，你打擊他，阻礙他，你是資產階級當權派，你就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麼。所以，這樣子我們越堅持，想方設法調兵，把革命派當敵人，怕的那樣。新公校事件，絕食鬥爭，到軍區來要見我，我沒有見，以後鍾漢華簽了七個協定。一回來我們就研究，把這個推翻，這事我主要

負責，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個五一二文告，打擊造反派。說衝擊軍區，把副司令員打的怎樣，把政委綁架走了，許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這是我們的罪過，以後又說他們衝軍區，就搞鐵絲網，水槍、護具，護具少了還到信陽去拉，說是防啊！怕殺啊。我是躲到廿九師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來談、商量，還是可以來，我們就是不見，不談就怕。就是想辦法對付，就是哪裏住個連嘍！哪裏廣播是他的嘍！以後到五月，百萬雄師就起來了，推翻這個七條，還出來個文告打擊造反派，這是我的罪責。總理說這個七條也沒有什麼問題麼。寫了個給張維榮（按，指湖北大學造反派頭頭）的信，把七條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還加到造反派身上。

發表六四公告，不檢查錯誤，不執行十條，不平反。反而把矛頭指向造反派，進一步定調子，肯定了解散工總是對的，不能翻案。這也對的，那也對的，存在缺點，強調沒有經驗，初次上陣，強調很多的客觀原因。任務多，時間緊，來掩蓋自己的反動路線。繼續對抗中央，反對毛主席的路線，繼續打擊造反派，進一步定調子，進一步迷惑欺騙蒙蔽群眾，造輿論。我這個反革命盜用軍隊的名義，我是軍區的司令員，利用解放軍這個崇高的榮譽，壓造反派，保守勢力百萬雄師就趁這個機會發展很快。而我們總是說他好，給他地位條件，而在輿論上給他造便利條件，這樣百萬雄師當然根據我們的六四公告，不執行六六通令，搞動員，搞大規模武鬥，就是我們挑起來的，挑起武鬥，沒有堅決貫徹陳伯達同志制止武鬥的指示和批示，還說百萬雄師好啊，他執行六六通令好啊！執行個鬼嘍，打得那麼厲害，自己在鼓裏頭，說單方面打麼，自己沒有堅決貫徹中央文革的指示，伯達同志打電話叫我制止武鬥，我沒有堅決的執行貫徹。百萬雄師殺人。以後還說他們執行的不錯。處處在造反派臉上抹黑，在保守派百萬雄師臉上抹粉。以前說我是百萬雄師的後臺，我不通，我也沒見他，我也不知道。其實你的這個方針，你說了話還要你去，這是助長了也麼，你在思想行動上幫助它喝了采，給他創造條件，培養它，支持它。

所以立場沒有站正，一講起來就抵觸，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我也是反映這個問題。好像我是操縱百萬雄師，我挑起武鬥，鬼我也沒有到過，我兩個月住在廿九師，我沒見過。說他有許多好的，大方向是對的，又說是這麼大個組織，是個革命群眾組織，這就是承認，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來看，別說口頭的，屁股已經坐到保守勢力方面，坐到百萬雄師方面。所以百萬雄師發展那麼快，打的那麼凶，那時都感到很好，不感覺裏面已經是資產階級復辟的東西，是我這個反革命造成的。對它壞的方向看的少，對它好的方面看的多，還誇大，把造反派的個別缺點誇大，這是什麼？這是支持保守派，打擊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資本主義復辟了。我們早已把毛主席領導的這個革命給斷送了，打了下去，但我們還說自己革命。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因為孟夫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幹部我們希望他們很快的亮相，亮麼，搞三結合麼，組織很大一批幹部亮到百萬雄師，我們也很欣賞，很同意，還去策劃，叫他們亮，趕快亮。以後，省市這些保守組織，都跟百萬雄師一塊，都亮到我們這方面來了，以為很好嘛。所以現在幹部站不出來，還受批判，這都是上了我們反動路線的當了。

做了上面這麼多罪行，這是主要的，還多嘍。當時就認為這麼多幹部亮到我們這邊好，還是個勝利。我們反動路線搞的這樣，害了幹部，當然，也有少數的對我們的反動路線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〇”反革命事件

這個“七·二〇”反革命事件，這是歷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張膽的反對中央、反革命、反對中央派來的代表，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應該對這個反革命事件的罪負主要的責任。這一次，經過大家對我的幫助、鬥爭、批判，才使我進一步認識到嚴重，過去我認為有很多客觀原因，還有推卸責任的想法，這是極端錯誤的；不出“七·二〇”事件，我這個環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說了話麼，為什麼出了？我不知道，這就是對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沒有很好的認識。再一個，說王力不應該在水院講話廣播出去，怪那些事，沒有說我的責任我要負。這是我一系

列的……執行這個……造成的。但是還有旁的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長期站在劉鄧路線，執行反動路線，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反對主席路線，而且頑固的堅持，造了許多輿論準備，定了許多的框框，調過來欺騙下面，欺騙戰士，欺騙群眾；但是群眾認為當真的，因為是上面說的還有什麼假的？我們就聽嘛！結果做的都是我們的這個反動路線。

七月九日常委會定調子，七月十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明確的很肯定的統一口徑，統一思想，說沒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不能翻案，批判二·八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他們裏面還有造反派嘛，是個很大的組織。他們抓防汛，復課鬧革命，（本來）都是假的，還加以誇張，說這些都對嘛！方向是對的。把百萬雄師加以美化，為我們這個資產階級路線服務，加以扶植；對造反派方面，也定調子，說他們大方向錯誤，完全不照中央的辦，不照社論上的辦。什麼衝啊搶啊，把我們的戰士打傷多少啊，是來污蔑造反派，來擴大造反派的缺點，進行打擊，使自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一步去發展，擴大市場，爭取人心，欺騙蒙蔽群眾。這都是我策劃麼！“七·二〇”事件為什麼起來？以前就有這個思想，我們貫徹了這個反動思想，蒙蔽了群眾。以後聽說錯了，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要翻案，（群眾）就保護我這個反動路線。長期這樣，所以一下子翻過來，群眾不願意；而且我放毒的這個時間又長，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騙。所以這個就是你造成的，所以這就是做輿論準備、思想準備，就把保守勢力搞起來保自己。

七月十四號，總理一來，就說毛主席說，你們屁股不要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為什麼呢？就是自己這個反動的思想，就是不重視，就是抵抗毛主席。以為我開的幾次會，都是搞的那。主席的這個指示總理說了，主席又說了，（如）傳達下去，這個力量會多大！這個反動透頂了，連主席的東西都不傳達。這不是反抗主席啊！還要怎麼樣反對主席啊！就是堅持資產階級的東西，你就是沒有做嘛。所以，開了幾天會，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為什麼彙報

彙報總是在會議上彙報，沒有講不要這樣彙報麼，總是他（按，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裏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麼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按，指中央領導）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裏表態，心裏總還是抵觸的，不願意堅決貫徹。所以，總理、謝副總理開會講了那麼多，自己總是在那裏陽奉陰違，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總認為還是要把情況講一講，材料還要他們（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復工總。工總……在我思想上……，我過去沒有說心裏話，（實際）認為生米已經做成熟飯，已經解散這麼久了，現在工人到處參加了組織，有了這個謬論。繼續對抗中央，對抗中央文革，對抗總理。就是不願意貫徹。指示這麼明確，這麼英明、正確，就是抵觸，不願意辦，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在繼續頑抗，而且公開對抗中央，反對毛主席、周總理這些指示，拒不執行。所以，“七·二〇”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〇”事件一發生，那就晚了。“七·二〇”事件，是我們反動路線的必然結果，必然的產物。獨立師也是嘛，也是我們蒙蔽欺騙了嘛！“七·二〇”事件發生以後，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來；就是說王力的四點指示，四點指示是對的，應該挺身而出。那時候說，以前是讓我們說出去，還沒有公開，我還在給公檢法這樣說，你們在外面聽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錯誤是我們的責任，不怪你們，還在那裏不承擔責任，把責任推在中央，繼續造成自己的罪過。打你幾下沒有妨礙大事，你怕什麼嘛！中央首長在那裏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樣，這件事情簡直搞的糟糕，沒有辦法，束手無策。也就是抵抗，好像是我們有責任，也有旁的的原因；這種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沒有一點階級感情。“七·二〇”事件發生以後，中央首長我們沒有很好的加強警衛，根本就沒有放在心。這麼大的事，這麼天大的事，這不是我一個頭、兩個頭頂得了的，這個安全工作，首先我（還是）去開會去了，由XXX佈置去了。但是“七·二〇”事件發生以後，我們對安全沒有注意，沒有放在心上，這是最大的罪，那裏還有比這個還重要的。這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多可恨啊！中央首長在你那裏，

你還不採取措施，假使有事怎麼得了啊！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

那個時候衝進來，把王力帶進我的軍區大院，他們也打了我，那就不說了，那是打錯了。但是，這個時候，王力綁架到大院裏去了，謝副總理叫我、鍾漢華去，我就沒有去，鍾漢華去了。不管怎麼樣，也是中央代表，我們沒有挺身而出，沒有很快去搭救（按：陳檢討時，王力已經被所謂“請假檢討”關起來了）。當時認為有人去，軍區那裏還有人麼。自己怕死，這個反動的思想。過去說我是“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禍首，是我自己搞起來的，感到冤枉。現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點也不冤枉。這確確實實就是我們造成的，策劃的，做了許多輿論準備，一系列的堅持造成的，還定調子蒙蔽群眾。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還把老婆叫來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這個資產階級思想反動透頂了。一切為了自己，為了我。為革命的事情，為黨的事情，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沒有了。自己確確實實是個資產階級分子，沒有無產階級氣味，沒有無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多。

以上這些罪行，說明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分子，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推行劉鄧的反動路線，幫助劉鄧搞資本主義復辟，我這樣搞不打緊，我欺騙和蒙蔽了廣大的革命群眾，廣大的革命幹部，廣大的指戰員，使他們犯錯誤，使他們受氣，就是在我的罪惡下面，我們欺騙了他們，蒙蔽了他們。想方設法，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說得他們為我們這個資產階級路線服務。使他們跟著我們的錯誤走，扶植保守派，打擊造反派，把武漢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烏煙瘴氣，烏雲蓋天，破壞了武漢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這個“七·二〇”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對黨、對革命、對人民、對我們下面的幹部、戰士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極大的惡果。

我的罪惡滔天，請求審判我，槍斃我，殺一個頭也不行，殺一百個也應該。

二、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這麼大的錯誤和罪，頑固執行、堅持反動路線，站在劉鄧反動路線，鎮壓革命，這個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蛻化變質了，我的思想像林總那個報告指出的，老幹部也要用階級觀點來看，有的保持了光榮傳統繼續革命，有的受了資產階級的侵蝕，有的蛻化變質，變成了新資產階級分子，我就是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我個人的一生，如果活著的話，這是一個人的血的教訓。自己就是蛻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變化，量的增加，無產階級的東西，革命的東西，慢慢少了，資產階級的東西往裏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資產階級的東西來了，別的不說，就是進城以後慢慢的變了質，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的，勝利了居功驕傲，停止不前，貪圖享受，就是由這裏起的，自己認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沒有毛主席、沒有黨那裏還有中國的勝利，還有我們呢？把黨、把人民都丟開了，就是認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個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變了，蛻化了，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裏房子好，走到那裏看到設備好，回來就搞設備。汽車、釣魚、獵槍、表、沙發、生活方式極端腐化，至於說勞動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進城以後，總是學資產階級的東西，看到那裏有地毯，自己搞個地毯，買沙發，買餐具，燉什麼果子醬，麵包。都是學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蝕，生活糜爛，流氓作風，看見女同志，護士，就是流氓習氣，動手動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人。生活糜爛，亂搞女人。這都是我長期的資產階級思想，污辱人格，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上都有麼，卻都是犯了。我這麼高，這麼老，不像個人樣，哪個愛你啣？自己不照一照自己，這麼大年紀，醜得要命，自己還腐化墮落。這樣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那裏一天吃、樂、玩耍，對於工作，對於人民事業，為人民服務，老三篇看了，都沒有做，都違犯了。人民為我，多少人為我服務，自己還不做工作，革命事業心沒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

海，還看什麼家具廠，想買什麼好家具，買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現在怎麼就是過去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麼有興趣，那麼牽心。是對時時為個人打算，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車要好一些，釣魚杆子要好一些，沙發、地毯……什麼都要人家服侍，還不稱心，還要訓人家。主要指示出來了，官做大了，錢多了，架子大了，當官做老爺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這樣子毛主席的書就不想讀，讀不進，沒有讀，毛主席的話不聽，不照毛主席指示辦事，你不犯錯誤，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裏去，毛主席的書帶著，帶著不學，做樣子，學也沒學進去，學了也不會用。就是貪圖享受，到那裏就玩，鬥志衰退。我一個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說，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這些教導都不聽，多麼重要的指示，不讀毛主席的書，不聽毛主席的話，不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你不栽跟鬥？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辦，照劉少奇的資產階級的辦事。就是蛻化變質，墮落腐化，背叛了無產階級，背叛了原來自己階級，我是個孤兒，是個窮孩子幫人家牧牛的，過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飯就想吃，欠碗飯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黨，哪裏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話不聽，主席的指示不照辦，不貫徹，不學習，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這個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今年一、二月軍委會議，四月軍委會議。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文革的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聽，聽不進去。特別是今年一、二月會議，就是說亂了，就看了表面現象，就是聽不得了，連林副主席的講話都說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陳伯達同志的報告，還要其他的報告，都說不解決實際問題。什麼實際問題，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領會，好好學習。回來也沒有很好的傳達，研究、貫徹，還是照自己的一套搞，還是搞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錯誤不改。四月會議，制訂的十條，就沒有很好地執行，就對抗。蛻化了嘛！秘書把毛主席親自批的浙江問題的指示，夜裏送去，讓在門外念，還發脾氣，說打攪了自己的瞌睡。這麼重要的東西，也不看，到了什麼程度。

今年四月，總理當面傳達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兩省的領導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沒有好好做，也沒有向中央報告，向主席報告。四、五、六月這個時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東西。都沒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們的警惕。批廣州、濟南的就是看了，也沒有聽進去。這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思想多頑固，該死啊！（略）

不聽林副主席的話，對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關於突出政治這樣偉大的指示，多麼重要，多麼英明，自己都跟羅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聽羅瑞卿的，很積極。對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緊。羅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積極的。林副主席糾正的時候，自己還在那裏幫羅瑞卿的腔，同羅瑞卿唱一個調子，幫羅瑞卿，說什麼葉群、那個時候還有劉志堅，他們蹲點調查的材料。拼湊尖子，弄虛作假。自己認為我們那個部隊，沒有那麼嚴重。其實很嚴重，我們不知道，自己官僚主義，還說人家材料不確實，不能代表整個部隊的形勢。一天在那裏搞練武，拼湊尖子，日夜練，不搞政治，單純軍事觀點，衝擊政治。羅瑞卿就是拿這個大比武來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是幫了羅瑞卿的腔。還提出林副主席的報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實就是說林副主席那麼指示要修改。某些詞句，就是指的拼湊尖子，對於大比武也要一分為二，好像還有成績。那麼會議上，當然其他人不說了，我個人就是這樣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這也是反對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說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說八條是過癮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學習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邊，階級鬥爭，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為革命的對象，這些指示就不聽，沒有把自己作為革命對象。你自己資產階級，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這是必然的，不聽主席、林副主席的話，非垮臺不可。不是一次、兩次，一次不改，一次不聽，那多麼危險。

對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實說，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觸情緒，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滿，這是心裏話，現在不要再藏著。中央文革是多麼好啊！總參謀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勳，

做了偉大的事情，立了偉大功勳。這個問題，過去有人講過，自己不看這些事情，對中央文革牢騷不滿，就是反對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陳伯達同志的報告時，我們提意見，要講階級，講成分，不能唯成分論。對那一段討論時，提意見，請韋國清同志提上去，我們態度不好。血統論這個問題，我們都沒有什麼理論，就叫到這個血統論也是有意見。批評反動的血統論，這是非常正確的。所以，對伯達同志報告時，以很不好的態度提意見。討論提意見是對的，但是你就是有點抵觸情緒。（略）說他們不聽我們的，只聽革命小將的。這都是暴露了證實了我們不滿。對中央文革怎麼能一報告就能答覆？說不答應。就是自己的反動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堅持自己的反動思想，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對這個無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的參謀部有意見。四月會議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這個省看還沒有好的書記，調個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個地方學校多，工業多的城市，派一個是到那裏去坐鎮。我們武漢要派個人到那裏去坐鎮，我們來做工作，你們掌握。意見就是自己不負責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滿意，就是說你沒有人在那裏，報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麼提意見，膽大妄為，反對中央文革。

再就是嚴重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當官做老爺。這就是伯達同志那個報告裏講的怕，怕這怕那，歸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眾，辜負了主席一再教導，要到群眾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我們呢？不相信群眾，到怕群眾，以後要鎮壓群眾，實行劉鄧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動路線，怕群眾就不是共產黨人麼，當然現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鬥爭激烈，自己就藏起來。硬是不到群眾中間去，這也是我犯罪的一個根本的東西。長期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懶惰，沒有共產黨人的氣味，沒有革命事業心，一天就是為我，吃、樂、玩耍，不到實際中去，也不到群眾中去。不說地方，連我們軍隊也脫離了，所以以到最後採取鎮壓群眾怕群眾，不相信群眾到鎮壓群眾。作風非常惡劣，聽不進反面的意見，說反對我更不行。受我們訓的人不少。為什麼呢？沒有道理。自己那麼懶，不做事情。為什麼訓呢？就是照

顧你生活照顧的不好，並不是為革命，為工作。所以說我主觀片面，驕傲自滿，目中無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們批評我的完全對。到資產階級這樣子就怕死，怕群眾，不革命。以後我們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見。“七·二〇”事件也證明，也是怕死。

我們黨委工作，我們這個黨委已經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壞了的。我這個班子，把大家帶壞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黨委長期的不突出政治，我這個人就反對突出政治，作風不民主，就是自己說了算，人家說了不算。政治空氣很稀薄，政治原則很差，對上面的東西，就是當了個交通，當了個收發，沒有很好的認真研究，認真貫徹，認真執行，認真檢查。黨委內部長期思想鬥爭不開展，我的錯誤就怕人揭，自己對思想鬥爭不提倡，壓制，就是表面上表現還不錯，一致，實際上意見還是很多。班長壞嘛，錯誤那麼多，怕人家揭，怎麼去搞思想鬥爭，怎麼去搞思想鬥爭，怎麼能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來批判。所以，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我這樣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錯。當然，我們下面還有些同志跟我們的意見不同，他們看的還有一些對的。但是，那不行，要打擊，要批評。特別是哪一個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說話，說他們還有些道理，那馬上就找來批評。二十九師那個副師長趙奮，他跑到三新，到處可以說話，覺得親近，我聽到有人說，就把他找來，說他偏向了，說他沒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錯誤，就打擊。所以，我們這樣思想早就蛻化了，變質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過是總暴露而已。這是必然的，你是資產階級，怎麼能跟主席搞無產階級革命呢！資產階級思想，自己靈魂深處的肮髒東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總想糊住，包住。這一下搞，都搞出來了，大家幫嘛，徹底把我過去這個陳大麻子，陳再道，連骨頭帶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資產階級了，都是腐化的東西了，今後要重新來脫胎換骨，又按主席的教導，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脫胎換骨。過去的徹底拋掉，對我只能這樣。我以前總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資產階級位子，你不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看，資產階級的陳再道這個壞傢伙。你就看不出來，你站在無

產階級革命方面，陳再道這個壞傢伙，你什麼都看出來了。林總講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觀察問題才是正確的，我早已拋棄自己的階級了，革命的事業心，革命的幹勁，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話，你不聽，你不執行，你革什麼命。怎麼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長期是這樣的資產階級思想，所以，自己變了質，到了劉鄧那裏去了，自己還說自己滿對的。對主席、對中央文革為什麼這樣的？只有敵人，只有資產階級才反對他，只有敵人，只有反動派才不滿。他（按指毛主席）是無產階級最高的領袖，世界人民的領袖。中央文革是無產階級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們反對他，就不聽，就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對抗無產階級，對抗革命，反對偉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這次來，鬥，那沒有什麼，主要是我們好多幹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這個錯誤，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堅決執行主席的，人家還是根據主席的這個精神，還是想我回頭來。所以這十天來，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裏去教育我，幫助我。開了幾次鬥爭會，對我是很大的幫助。我以前就是有僥倖心理，認為錯誤不是那麼嚴重。沒出“七·二〇”事件，我解決好，“七·二〇”事件與我無關係，也不是我組織來的。這樣想，不是你組織的，你一直在活動，一直在那裏搞輿論，搞策動，不是你造成的是誰？所以罪責難逃。特別是我這個人，一個人死了算什麼，對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損失。所以，我們對主席、對中央、對中央革命，對武漢的造反派、武漢的人民、軍隊的廣大指揮員、民兵。造成多大的惡果。都是我這個黑線害了的。把我一個陳再道殺了，把一百個陳再道殺了也應該。有些同志提出了這一錯誤的性質嚴重，面大、深廣。幾方面，這一方面吃了虧，造反派方面，被我們打擊。扶植百萬雄師起來，完全是資產階級復辟的東西，來鎮壓造反派，殺人、放火、打死了那麼多革命小將，這都是我們的罪過。還有什麼說的。所以，我現在沒有一點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錯誤。所以說我是鎮壓造反派，鎮壓武漢革命，“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禍首，一點也不冤枉。反對毛主席路線，反對毛主席。罪該萬死。你連毛主席的話都不聽，毛主席說的話始終不辦，還

不罪該萬死，破壞了武漢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騙了廣大革命群眾，幹部、部隊的指揮員，這是罪惡滔天。毒害大家，保陳再道。那個時候政治部還發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個要喊打倒我，還要捉。這種下了多大的惡果。這就是我們搞的麼，我搞的。所以，我現在成了反革命，等著中央、人民審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這樣的蛻化變質，到最後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我的決心

最近主席幾次指示，我犯了這麼大的罪，當然，主席不僅是為了我一個人，是他偉大的幹部政策，再就是為了武漢廣大幹部、廣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來幫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講的，來一個人就叫看哪，就念給我聽。那真是來一個就問我看了沒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個群眾諒解，重新革命好好學習，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來讀文件給我聽，幫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應該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負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總理、中央文革，以反對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將們對我們的幫助，對我的教育，對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聽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還想把錯誤帶到那裏去。以前是帶到火葬場，現在那還有火葬場。自己到了這麼大年紀，做什麼不靠毛主席，不靠黨，不靠人民，你一事無成。活著吃飯，也得有人給你一碗飯吃。所以沒有什麼不可以丟的。毛主席教導，過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們一想起他們來就很難過，我們戰爭幾十年，跟我們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強的人多哩，我是個沒有用的人活著了，沒有打死，那犧牲了多少，他們為什麼？我現在對人民造成了這麼大的罪，還在要你轉變，承認錯誤，把錯誤交出來，那個野獸，牛都不如。所以我決心不能辜負主席的教導和大家的教育。

武漢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裏破壞了，搞的烏煙瘴氣，搞的個“七·二〇”反革命事件，公開的向中央進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錯誤惡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採

取果斷的及時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漢文化大革命挽救過來，把壞事變成好事，使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勢同全國一樣。我一萬個擁護。對我個人的處理，罷官、撤職都是非常應該的，我沒有半點怨言。而且我犯了這麼大的罪，還在想各種辦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還希望我重新革命，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對我的處理，我是堅決擁護，我是堅決擁護，一點怨言也沒有。只有感恩不盡。今後要拿實際行動，你光說不行。像恩格斯說的，看一個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說，要看他在做什麼，是個什麼樣的人，我這個人壞了，看你能不能拋棄你那個壞的東西，過去你那個人是壞人，現在重新做人，脫胎換骨，應該下這個決心。今後叫我勞動，做什麼堅決跟群眾在一起，拿到群眾中去監督。所以，我一個是堅決的聽主席的教導，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繼續的不斷的來給自己這個資產階級思想鬥爭。是什麼鬥爭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鬥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斷鬥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骯髒的，改造自己資產階級靈魂，改造世界觀。世界觀不轉變，不站到無產階級立場，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導的，今後要好好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爭取做一個勞動人民。不管做什麼，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聽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個，不是在這裏說了，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點道理了，形勢好了一點又變了。這個老老實實的在這個基礎上，今天的認識還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斷的，對錯誤認識不夠的，還要不斷的鬥爭，不斷的對錯誤進行揭發。拿無產階級立場，無產階級的觀點，無產階級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來改造自己，不斷的改造。我只要下決心，有主席指示這個最銳利的武器來改造，就會把自己能夠挽救過來。只要自己不頑固，聽說，真正的好好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會好。真正地立場站過來，真正把過去的骯髒東西，真正不怕

醜，真正不怕割尾巴。醜就是這樣醜嘛，已經全國都臭了麼，你還包著幹什麼呢？我一定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靈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今後一定要聽毛主席、聽黨的話，以人民為自己的老師，當小學生現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轉變，你是個反革命麼，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廣大幹部、群眾。我現在是個反革命，轉變好了是個勞動人民，在人民監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務員，自己有決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後還要靠大家來監督，來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髒東西拋掉。你再頑固不頑固，毛主席講了，頑固是堅固，以後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頑固，頑而不固了。所以，我還是不想死，這樣死了連根鴻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導，我重新革命。能勞動幾年，我總是爭取做個勞動者吧！許多同志都說了：“不是你呀，聯繫到後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個野獸就應該懂得。我感謝主席的教導，我一定照著做，同志們對我的幫助、教育、我下決心不辜負，我今天講到這裏。

1967 年鍾漢華同志的檢查片段

（三）“7·20”反革命暴亂的罪行

“7·20”反革命暴亂事件，是張國燾叛黨事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演，是我與陳再道頑固的堅持劉、陶、王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線所醞釀成的嚴重罪惡的總暴露，是我與陳再道實行資本主義復辟面臨徹底破產最後死亡掙扎的表演。我在這場表演中，充當了無恥的總導演角色。我的主要罪惡事實是：

1. “7·20”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是陳再道和我頑固堅持反動路線的產物。批判二·八聲明這股黑風和四月十九日的罪惡造謠毒害了幹部戰士和群眾的思想，為這一反革命事件作好了組織準備。

2. 7月9、10兩日召開了總動員會，並且作了總的策劃和佈置（9日是常委會，10日各單位領導的會）。

在會議上強行統一認識，統一口徑。要求各單位也要統一在陳再道和我的觀點上，整理出書面材料，以便和三新二司打官司，使工總不能翻案，肯定六四公告是正確的。這就是鼓著幹部戰士團結在陳再道和我的領導下與造反派最後決戰，也是臨戰前的動員會，會議也是鼓勵“百萬雄師”更猖狂地壓造反派。雖然“百萬雄師”沒有參加會，但都早已是一家了。這也反映了陳再道和我的反革命決心，反革命的頑固性。

3. 14日—18日，頑抗最高指示，一再向中央反撲。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由於我們反動的立場，就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的反革命決心不變，仍按原方案彙報。為了穩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兩日的彙報中，中

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鬥以後，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4. 再次抗拒中央指示，對中央結論不滿，進行煽風點火。

18日下午，總理作了正式結論，表面上也假意表態，承認方向、路線錯了，但這時五心不定輪個乾淨，內心不服。當晚主席對陳再道和我親自教導，要我們好好向“百萬雄師”作工作，作好部隊思想工作，步子穩妥。工作細緻深入一些。由於我們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對主席沒有感情，仍是拒不執行，也不傳達。真是罪該萬死，千刀萬剮，也贖不了我的罪。

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准蔡炳臣傳達了，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後，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由於我們長期的毒化群眾，當時已是處於乾柴澆汽油的景況，見火就要爆發。我的罪過大啦。“7·20”反革命暴亂的火，是我點起來的。我是總導演。千刀萬剮，也不能贖我的罪呀！當19日夜晚開完會，我從軍區大院回東湖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出亂子的徵候，可我這個反革命的立場促使著我，亂就亂吧，潑著幹，也不採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當“7·20”拂曉，暴徒衝進東湖的時候，我這個卑鄙無恥的東西，把謝副總理推到前面。我躲到地下室裏去了。就是“7·20”事件發生了，我如果是有一點解放軍的氣味，也還可以挽救。當時要是挺身而出，果斷處之，還是可以制止下來的。我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低聲下氣，作揖磕頭，這是更助長了暴徒的氣焰。我這個反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

千罪惡、萬罪惡，也沒有我不保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安全的罪惡大呀！

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東湖，保衛科長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夠，

需要增加人。他和孔慶德都建議調 29 師的人進去。我說 29 師和獨立師有矛盾，就不了了之。20 日主席也在東湖，我不管不問。資產階級思想毒害得我連對主席都丟了感情。就是一個普通戰士，也要保衛毛主席的呀！（哭）就這一件事千刀萬剮我也是應該的呀。我穿著解放軍的衣服，是以蔣介石的態度對待主席的呀。可恥呀，可恥！這不但是保衛中國革命的領袖，也是保衛世界革命領袖的問題。我骨子裏壞透了，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林副主席，對不起中央，對不起中央文革，對不起全國人民，對不起全世界的人民，這是我反動的階級立場的反映，不能用其他的解釋，也解釋不了。我是完全站在帝國主義、蔣介石的立場對待主席了，我的罪惡滔天，千刀萬剮也難贖罪。我為什麼叛變了主席呢？我是個小學生出身，未有參加過勞動。大革命時期混到革命隊伍中來的，在民主革命階段打土豪分田地，打蔣介石，還可以跟著走。小資產階級思想沒有斷根，全國勝利後貪圖享樂，政治上腐化了。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資產階級思想毒害了我，我叛變了毛主席，叛變了黨，叛變革命，也叛變了我自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寬大我，挽救我，重新革命。我的罪惡重大，千刀萬剮也不能贖罪。早該審判我了。我再次向主席請罪，向大家請罪。我的靈魂深處還有很多髒東西，我要以“鬥私批修”為綱，脫胎換骨地改造，重新做人。我將近 60 歲，還爭取做一點有益於人民的事，希望大家幫助我。

（根據 1967 年 11 月 30 日和 12 月 1 日下午，在湖北省學習班全體人員大會上兩次檢查交待記錄綜合整理，整理稿經本人同意，輯於湖北省學習班編印文獻，1967 年 12 月）

人名索引

陳再道司令員（1909—1993）：原名程再道。湖北麻城人，1927年9月參加秋收暴動，11月參加黃麻起義。192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鄂豫皖根據地的歷次反“圍剿”；參加川陝根據地反“三路圍攻”和“六路圍攻”等戰役。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長征。1936年7月，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後，陳曾到紅軍大學學習，後回到紅4軍，先後任副軍長、軍長；10月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後，率紅4軍進入陝甘寧根據地。抗日戰爭爆發後，東渡黃河，任八路軍第129師第386旅副旅長、東進縱隊司令員。1940年8月，任冀南軍區司令員，率部參加“百團大戰”。1944年5月，冀南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新的冀魯豫軍區，1945年6月，冀南指揮部成立，將所屬部分部隊編成平漢縱隊，9月改為冀南縱隊，陳再道任司令員。1945年10月，冀南軍區恢復，晉冀魯豫軍區將所屬冀南軍區主力部隊孔（慶德）秦（基偉）支隊、雷（紹康）寇（慶延）支隊、杜（義德）支隊編成冀南縱隊；11月，冀南縱隊編為軍區第2縱隊，陳再道任司令員，宋任窮任政治委員。1946年7月，2縱與冀南軍區合併，仍保留2縱建制；陳再道任司令員，王從吾任政治委員，鍾漢華任政治部主任。從1946年8月到1947年5月，2縱先後參加定陶戰役、鄆城戰役、滑縣戰役、豫北戰役等。1947年6月底，2縱與冀南軍區分開，歸晉冀魯豫野戰軍建制，隨劉鄧大軍參加魯西南戰役，挺進大別山，陳任中原野戰軍第2縱隊司令員。前後參加了上黨戰役、邯鄲戰役、巨野戰役、魯西南戰役、宛東戰役、淮海戰役等重大戰鬥。1949年2月起任河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任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武漢軍區司令員兼湖北省軍區司令

員，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文革初期支持保守派，鎮壓造反派，釀成“七·二〇”事件，被解除職務。1972年6月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1975年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1977年任鐵道兵司令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78年12月在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委員。1982年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鍾漢華政委（1909-1987）：江西省萬安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少共區委書記，紅三軍團補充師宣傳科科長，補充團政治委員，軍委部政治部組織部組織科科長，軍委直屬政治處主任，總供給處政治處主任，軍委衛生部政治處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第一團政治委員，八路軍一二九師先遣縱隊政治委員，東進縱隊政治部主任，新編第七旅、第四旅政治委員，冀南軍區第四軍分區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三兵團政治部副主任。建國後，任川東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四川軍區第二副政治委員，西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庭長。文革初期任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67年“七·二〇”事件後被撤職，在江西下放勞動5年。1972年5月任廣州軍區副政委。1975年8月待分配。1977年12月任裝甲兵政委，黨委書記。1979年1月—1982年10月任成都軍區政委，黨委書記。3、4四全國人大代表。中共7大代表，12屆中顧委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蔡炳臣（1915-1978）：8201部隊（湖北省軍區獨立師）政委，河南商城縣人，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25軍73師217團排長，商城縣區遊擊隊指

導員、便衣隊隊長。主力紅軍轉移後，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四支隊 7 團政治處主任，第 2 師 4 旅 11 團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松江軍區第二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三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長，四野第 40 軍 153 師政治委員。建國後任公安軍的師政治委員，吉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廣東省公安總隊第二政治委員；1965 年 11 月調任湖北省公安總隊政委，1966 年 7 月隨部隊改編改任省軍區獨立師（8201）政治委員。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後，被免職。1973 年 3 月任河南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陳再道任鐵道兵司令員後，1978 年 5 月被調到鐵道兵任政治部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牛懷龍（1922-1975）：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師長，山西定襄人，1935 年 10 月參加紅軍，次年 12 月入黨。曾任 115 師騎兵排長，東北野戰軍一縱一師一團二營營長。建國後任漢口第四高級步兵學校聯繫團團長、公安二師副師長兼參謀長、北京警衛師副師長兼參謀長。1965 年 11 月，任公安部隊湖北省總隊長，1966 年 7 月任省軍區獨立師（8201）師長。在取消軍銜前夕為大校軍銜。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後，被免職。1973 年 4 月被任命為湖北省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8201 部隊，1962 年以前為湖北省公安大隊，62 年改為公安部隊，1966 年 2 月撤消公安部隊番號時，改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編制，為湖北省軍區獨立第一師，有官兵 9 千人（一說有 1 萬 3 千人，下有 6 個團和輪訓隊，“武漢事件”前夕，有四個團的兵力駐在武漢市內^[1]353）；負責城防、保衛大橋等。1967 年上半年，8201 的幹部多派往公、檢、法和重要單位，主持軍管會工作。

[1] 參見余汝信《“720 事件”中的“8201”與“8199”》（2005 年 1 月）。

群眾組織索引

三鋼三新：文革期間武漢的六個重要造反派組織的簡稱。“三鋼”是指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三新”是指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

鋼工總：全稱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或“工人總部”，成立於1966年11月10日，1967年3月被武漢軍區發通告強行解散，各級主要負責人被抓捕，4-5月，其基礎各級組織重新樹旗，1967年6月中旬開始簡稱“鋼工總”。主要負責人為朱鴻霞、胡厚民、夏邦銀等。

鋼二司：全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二司”，成立於1966年10月26日，1967年6月中下旬開始簡稱“鋼二司”，武漢市大中學校造反派學生紅衛兵組織，主要負責人為楊道遠（武漢測繪學院）、方保林（武漢機械學院）、丁家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

鋼九一三：全稱為“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成立於1966年12月12日，簡稱“九一三”，前身係“工總”的武漢鋼鐵公司分部，1967年6月中旬開始稱“鋼九一三”。主要由武鋼及一冶的產業工人組成。主要負責人為李想玉、楊玉珍等。

新華工：當年華中工學院（現名華中科技大學）造反派組織。全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司令部新華工”，簡稱“新華工（紅司）”，成立於1966年10月下旬。主要負責人為張立國、聶年生、郭保安。

新湖大：當年湖北大學的造反派組織，全稱為“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簡稱“新湖大”，成立於1966年10月下旬。主要負責人為龍銘鑫、謝幫柱、彭勳。當年的湖北大學現改名為“中

南財經政法大學”，今湖北大學由原武漢師範學院改名而成。

新華農：當年華中農學院的造反派組織，全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華農東方紅總部”，成立於1966年10月下旬。該院現名華中農業大學。

三司革聯：“紅三司”中部分學生不滿頭頭的機會主義路線，1967年4月18日從“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中分化出來成立革命造反聯絡站，站在造反派一邊，簡稱“三司革聯”，主要領導人有謝華之（武漢大學）、雪湘明（武漢師範學院）、徐筱芳（武漢醫學院）等。原“紅三司”全稱為“武漢地區東方紅紅衛兵司令部”，屬大中學校偏保守派的組織。成立於1966年11月4日，因公開支持“720事件”，在事件後自動解散。

工造總司：全稱為“紅色造反者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造”或“工造總司”，成立於1966年12月8日。主要負責人為吳焱金、彭祖龍等。

長辦聯司：1966年12月26日，以“長辦捍衛毛澤東思想革命陣線”為主，與其他十多個組織，組建了“毛澤東思想革命陣線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聯合司令部”，簡稱“長辦聯司”。一號勤務員為顧建棠。“長辦”為水利電力部派出單位“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的簡稱。

新一冶：第一冶金建設公司造反派工人大聯合組織，全稱為“毛澤東思想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於1967年3月底，簡稱“新一冶”。一號勤務員為曹承義。

公安聯司：武漢地區公安機關的造反派組織，全稱為“毛澤東思想公安聯司武漢總部”。一號勤務員為田學勤。

省直紅司：湖北省直機關幹部、工人造反組織，1967年4月2日從“省直聯司”分化出來正式成立，主要負責人鄭軍。（團省委幹部）

中學紅聯：全稱為“武漢地區中等學校紅色造反聯絡站”，成立於1967年4月24日，有60多所中等學校造反派組織參加。1967年8月更名為“武漢地區中等學校紅色造反聯合指揮部”。

市直機關紅司：1967年8月由市委人勤總部、市人委人委聯

司、市總工會紅尖兵聯合組成的造反組織，魏繩武為一號勤務員、鄭峰為二號勤務員。

老紅衛兵：武漢 1966 年 8 月下旬出現以幹部、革軍子弟為核心的“紅五類”紅衛兵組織，他們走上街頭“破四舊”的行動，受到省市委和各級政府的支持，後由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分別組織其司令部，並發展成為保守傾向的紅衛兵。1967 年元月自動解散，後在春夏重新恢復，對抗造反派學生和工人組織，參加“百萬雄師”活動，被武漢造反派群眾蔑稱為“三字兵”。武漢事件後隨“百萬雄師”自動解散。

百萬雄師：成立於 1967 年 5 月 16 日，為 1967 年元月被自動解散的保守傾向組織的重新聯合體，全稱為“百萬雄師聯絡總站”，1967 年春夏得到武漢軍區全力支持。主要組成為：“紅武兵”、“革命造反大軍”、“紅衛兵”、“紅星軍”、“紅色造反軍”、“紅色尖刀”、“革命工人三司”、“武漢公安”等。自成立之日起至 7 月 23 日，發起了數十起針對造反派和普通市民的武裝圍剿事件。“七二〇事件”後解體。主要頭頭俞文斌、楊道安、孫運東、蔡俊善、謝敏華、劉敬勝、孫德洲等。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書目



書名：四十三年望中猶記
作者：吳焱金口述 鍾逸整理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20日
簡介：吳焱金，武漢地區區工人造反司令部（工造總）一號勤務員，三結合後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處八年徒刑。



書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
作者：[法]夏爾·貝特蘭
系列：文革研究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月20日
簡介：夏爾·貝特蘭，西方著名學者，經濟學家，曾任法中友好協會主席。本書拋開陰謀論、權力鬥爭論等模式，直面工廠文革。



書名：真實的張志新和遇羅克
作者：索風
系列：歷史真相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月20日
簡介：張志新案件和遇羅克案件是文革結束之後轟動一時的大案，是否定文革的重磅炸彈。本書試圖揭開這兩個案件的真實面目。



書名：毛澤東億萬稿酬之謎
作者：索風
系列：歷史真相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月20日
簡介：毛澤東著作是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中文著作。網上風傳毛澤東稿酬總計1.3121億元。本書試圖揭開毛澤東稿酬之謎。



書名：悲欣交集話文革

作者：曹承義 初稿 鍾 逸 整理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3月20日

簡介：曹承義，文革前任一冶施工處技術員。文革初期任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勤務員，親歷“六一七大屠殺”、七二〇等重大事件。



書名：改革開放年代的資本運動

作者：嚴 峰

出版日期：2010年3月20日

簡介：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撥開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歷史觀的迷霧，分析資本運動的條件和要求，研究現存生產關係及其運動變化過程，以此為基礎來研究現實的階級矛盾，總結改革開放史。



書名：百年尋夢

作者：李承弘

出版日期：2010年6月17日

簡介：李承弘的父親李西屏是辛亥革命元老，李承弘文革初期是湖北最大造反組織“鋼工總”的發起、組建人之一，作者以平實的文筆，記述了父子兩代一百年的政治史和心路歷程。



書名：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

作者：武彩霞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8月18日

內容簡介：武彩霞，文革期間在河南農學院就讀，親歷了河南省的整個文革過程。本書是作者的文革回憶及研究文章合集。



書名：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作者：楊道遠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8日

內容簡介：楊道遠，文革初期任武漢鋼二司一號勤務員，三結合后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處12年徒刑。



書名：敢死隊

作者：歐陽健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8日

內容簡介：歐陽健，一位中學語文教師，因為日記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他學生組織了一個名為“敢死隊”的組織，一心要為他平反昭雪。



書名：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

作者：徐海亮

系列：文革研究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10日

簡介：“七二〇”事件是文革期間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本書博采眾多當事人回憶及歷史文獻，條分縷析，全方位揭示“七二〇”事件前因後果。

文革研究叢書

-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
[法]夏爾·貝特蘭 著
中國工人研究網 譯
- 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
徐海亮 著

文革回憶錄叢書

-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
吳焱金 口述
鍾逸 整理
- 悲欣交集話文革
曹承義 初稿
鍾逸 整理
- 不再沉默
——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
武彩霞 著
- 奉獻
——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楊道遠 著
- 敢死隊
歐陽健 著

責任編輯：柳 陽
封面設計：世 慧

1967年武漢“7·20事件”過去40多年了，人們對事件的回顧、演繹樂此不疲；1980年代以來，一些出版物連篇累牘地發表、回憶其真相，這特殊階段歷史似已全部廓清，撥亂業已反正。其實，當時的全部真相至今尚未公開講明，更未由嚴肅的記載一一公開出版。特別是普通民眾眼裏、心裏的歷史真情，至今鮮為披露。本書力求回復歷史真實，以普通民眾口述歷史事實為主，記載“7·20”前後的半月大勢，聊補文革研究資料的不足。



ISBN 978-988-19703-1-2

定價：HK\$140元